

主 编 张明胜

延安
史
博
苑

第二辑

陕西人民出版社

延安博苑

(第二辑)

主编 张明胜

陕西人民出版社

主 编 张明胜

副 主 编 孙麦才 党全义 霍静廉

执行副主编 齐佩良

编 辑 刘 滢 刘卫平 花海洋

马 琼 郝 璐

目 录

·探索与研究·

- 毛泽东历次遇险记 张明胜 (3)
- 论刘志丹对中国革命的突出贡献 杨延虎 (329)
- 毛泽东与延安精神
- 纪念毛泽东诞辰 110 周年 马广荣 惠 宁 (46)
- 延安时期王明挑战毛泽东领袖地位始末 巴志鹏 (52)
- 延安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与建设 霍静廉 (67)
- 共产国际十位主要来华代表的最后归宿
- 孙麦才 孙凌云 (81)
- 延安时期的侨联与华侨 米世同 (87)
- 随中央红军长征的三十名妇女干部
- 姬乃军 姬 睿 (104)
- 红一、二、四方面军的由来及为何没有
- 红三方面军 齐佩良 (121)
- 我国授衔的惟一外籍将军——洪水 ... 王晓莉 黄卉青 (125)
- 群众领袖 民族英雄
- 纪念刘志丹诞辰 100 周年 刘 滢 (135)
- 延安自然科学学院对陕甘宁边区经济建设的贡献
- 刘卫平 (142)

转战陕北中的西北野战军	栾锦萍 (153)
萧三及其撰写的《毛泽东传》	江林 高慧玲 (160)
浅谈周恩来延安时期对统一战线的重大贡献	董玉梅 (163)
浅谈毛泽东党建理论与实践的发展	石晓丽 (170)
刘志丹兵运活动初探	米晓蓉 (175)
《沁园春·雪》的发表及其引发的文坛大论战	齐佩良 刘金林 (185)
延安茶坊兵工厂	刘卫平 (194)
“双拥”是延安时代密切军民关系的基本政策	张 娴 (203)
延安时期党领导边区金融的成功经验	杨 健 (210)
毛泽东三调陈龙	霍静廉 (216)
《论持久战》的第一个英译本.....	齐佩良 李 鑫 (222)
对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原则的理论思考	刘 滢 (226)
浅谈“抗大”教育的特点	齐 辙 (237)
群众艺术的先驱——杨醉乡	刘卫平 (243)
浅谈延安整风运动	董玉梅 (251)
浅析延安时期民主政治对新中国政治 建设的影响	孙麦才 (255)
新时期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亟须大力弘扬延安精神	王晓瑛 (260)
用整风精神开展思想教育	冉春曼 (266)
清正廉洁是执政党的立党之本	党政军 李晓剑 (272)
发扬延安精神 实践“三个代表”	王晓瑛 (277)
延安革命纪念馆任弼时宣传与研究情况综述 ...	霍静廉 (286)

延安时期翻译工作发展简介	齐 轶 (294)
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历程中的翻译工作	齐 轶 (301)

·延安岁月·

劳动英雄杨步浩	刘 煜 (309)
赵占魁运动的前前后后	姬乃军 (316)
中共中央贺寿徐特立	刘卫平 (323)
寻找“四八”烈士遗体经过	齐 轶 惠 蓉 (327)
丰碑	王晓莉 (332)
大生产运动中的三五九旅	栾锦萍 (335)
延安时期的体育活动	米晓蓉 (346)
延安时期第一次公祭黄帝陵	江 林 (350)
一位美国朋友的延安情	田林艳 (352)
劳动英雄申长林的壮丽人生	贺延荣 (355)
延安时期的独臂将军左齐	党政军 刘 晶 (360)
李鼎铭与三五九旅	任 勇 (362)
“窑洞大学”育英才	黄卉青 王一美 (367)
丁玲在延安	白 彬 (373)
李木庵与怀安诗社	马 琼 (382)
延安时期的几则婚礼	郝 璐 (385)
中共中央机关遇险瓦窑堡	花海洋 (388)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国外	孙凌云 (390)
《为人民服务》与张思德	冯 勇 (391)
《兄妹开荒》之原型——马杏儿父女	钱竹梅 (394)
冼星海在延安	张国全 (396)

三位书记与两个馒头	花海洋（405）
为毛泽东借皮鞋	窦崇贵（407）
首届中国青年节	霍志宏（409）
张治中三到延安	白富平（412）
人民艺术家张寒暉	贾亚娟（418）
共和国从延安走来	刘 滢（421）
延安中央警备团组建始末	米晓蓉（427）

· 深切的怀念 ·

陈云在延安二三事	霍静廉（435）
江华回延安	刘 煜（447）
杨尚昆二回延安	齐佩良 黄卉青（451）
情系黄土地 丹心为人民 ——纪念习仲勋同志逝世一周年	刘卫平（457）
延安时代的历史见证人 ——贺清华与延安革命纪念馆的情结	刘 煜（466）
从毛主席身边走来的人	刘 滢（474）
周总理回延安	李秀梅（47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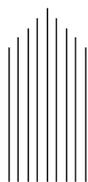
· 宣教论坛 ·

讲解员培训工作之我见	于延俊（487）
浅谈博物馆宣教队伍的科学化、规范化管理	蔡 琳（495）
讲解技巧初探	

——谈“主”与“辅”的灵活运用	张 娴 (504)
也谈讲、唱、跳的讲解艺术	刘 滢 (507)
用讲解展示革命旧址的历史价值和永恒魅力 ...	高延红 (514)
独具魅力的讲、唱、跳讲解风格	张 娴 (520)
增强讲解员的责任感 加大宣教工作力度	孙麦才 (526)
“我”与观众.....	刘 滢 (530)
讲解员应矫正的不良心理	孙麦才 (533)
如何培养一支建设精神文明的宣教队伍	刘 滢 (537)
弘扬先进文化与纪念馆宣教队伍建设	张 娴 (544)

· 旧址观览 ·

“七大”会址的变迁和维修.....	党全义 (553)
延安时期的光华印刷厂	栾锦萍 (558)
抗日战争时期的延安交际处	米晓蓉 (562)
干部休养所——红楼	钱竹梅 (565)
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	白 芸 (567)
鲁艺简介	王一美 (569)
后 记.....	(571)



YANAN BOYUAN

● 探 索 与 研 究 ●

延安博苑

毛泽东历次遇险记

张明胜

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和理论家，在中国历史上，“数风流人物”首推毛泽东。他的丰功伟绩与神州共在，与日月同辉。但毛泽东一生与敌人斗争、与自然斗争、与疾病斗争中那惊心动魄、生死攸关的经历却鲜为人知。而更神奇的是每次在危难时刻，毛泽东都能逢凶化吉，遇险呈祥。

一、中共“一大”会场被抄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望志路106号秘密召开，毛泽东参加了大会，并作记录。7月30日大会举行第六次会议。晚饭后，按原定议程，由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对几天的讨论发表意见，然后再通过党的决议，选举中央局。代表们落座后，主持会议的张国焘刚刚作完简短的说明，突然巡捕房程探长借口找联社的王主席闯进会场，又称找错地方，匆匆离去。富有秘密工作经验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当即宣布休会。就在代表们撤离会场15分钟后，巡捕房的侦探包围了会场。真是不幸中之万幸，那个跟踪“外国赤色分子”的程探长不知道屋里正在召开的是将改变中国命运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否则与会人员将要被一网打尽，中国

共产党有可能胎死腹中。

二、遭敌通缉

1922年5月底，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省委——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成立，毛泽东任书记。并在长沙创办湖南自修大学，利用三尺讲台，宣传马克思主义，培养进步青年，发展党的组织。反动军阀赵恒惕为之恐慌，下令关闭学校。一天，毛泽东正在家中草拟工作计划，在省政府供职的一位同志跑来对毛泽东说：“快跑，赵恒惕派兵抓你来了，已经快到村口了。”毛泽东迅速把文件塞入墙洞里，从后门悄悄离去。赵恒惕没有抓到毛泽东，当即四处发出“通缉令”，悬赏1万大洋捉拿毛泽东。一时间，毛泽东处境相当危险。

三、巧施脱身计

一边敌人悬赏捉拿毛泽东，一边毛泽东领导的工人运动却取得了一次又一次胜利，赵恒惕不甘心失败，悬赏数额不断增加，高达数万元，并四处撒网，企图秘密逮捕毛泽东。一天，两个特务暗中来到毛泽东经常出入的长沙宝南街鲁班庙，赶来开会的毛泽东与两个特务擦肩而过，其中一个家伙搞起“诈认”来，在毛泽东背后大喊一声：“毛泽东先生有人找你。”毛泽东闻声止步，一侧身看到两个陌生人，马上意识到特务在耍花招，灵机一动，迎上前去，问：“二位找姓毛的吗，我也正要找他呢。”俩特务急问：“看来你认识毛泽东喽，只要你指一下哪个是毛泽东，赵省长有重赏。”毛泽东故作神秘的样子压低声说：“你们在外面等着，我进去看看，只要毛泽东在，我就出来喊你们。”毛泽东进去后，带领几位工会负责人从后门

迅速转移到别处去开会，并派几个工友出来，把两个特务当作盗贼狠狠地揍了一顿。

四、魔爪伸向板仓冲

1924年，毛泽东在长沙县清泰乡板仓冲搞农民运动。一天夜晚，毛泽东在杨家堂屋里以玩麻将作掩护召开农民干部会议。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出于安全考虑，要求同志们先离开。送走大家后，毛泽东打算去几个农民家里访问。谁知，刚迈出大门，就被两个便衣特务堵住。一个特务用手指着毛泽东，气势汹汹地盘问：“毛润之在这里吗？”毛泽东坦然自若地回答：“他们正在玩牌，老总你们也进去试试运气。”说完顺手拿起门边的扁担，挑起水桶，佯装去挑水。两个特务大步向院内走去。毛泽东趁机丢下水桶，迅速脱离险境。

五、韶山遇险

1925年毛泽东在韶山传播革命火种，领导农民运动，开办了20多所农民夜校，组织了秘密农协，在韶山发展了第一批共产党员。毛泽东的一系列革命活动，引起了土豪劣绅的极大恐惧和仇视。土豪成胥生发现毛泽东在韶山谭家冲农民家开会，密报军阀赵恒惕。赵恒惕欣喜若狂，密令湘潭县团防局，派兵直奔韶山冲，“逮捕毛泽东，就地正法”。多亏在湘潭县政府当收发员的内线郭麓宾，在县长办公室看到密电后，急忙派他的侄子郭士奎，连夜赶往韶山冲，告知毛泽东。毛泽东在当地群众掩护下，连夜撤离，转危为安。

六、甩掉便衣特务

1927年毛泽东在武汉开办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培养农运人才。“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农民讲习所师生，每天都打着红旗，深入街道、工厂，散传单、贴标语，揭露蒋介石叛变革命，惨杀农工的罪恶行径。就在这时，毛泽东被列入“国民政府”秘字第一号通缉令上，要求“务获归案重办”。7月末的一个黄昏，毛泽东为回乡的农民讲习所学员送别，回来路过六渡桥时，两个便衣特务突然拦住毛泽东问：“喂，你看见‘要犯’毛润之没有？”毛泽东心中一怔，但马上镇静下来，急中生智地说：“我刚才看到有几个人从这里过去，其中一个高高瘦瘦的像个教书先生。”特务信以为真，急忙朝那条小巷追去。毛泽东回到家中，偕妻儿迅速转移。

七、虎口余生

1927年9月，毛泽东受中共湖南省委委托，来到湘东赣西发动群众，组织起义军，在安源张家湾主持召开了一个军事会议，决定中秋节举行起义。会后毛泽东准备去农民总指挥部的所在地铜鼓县城亲自指挥第三团起义。毛泽东化装成安源煤矿采购员张先生路经张家坊时被敌抓获。这是毛泽东第一次被捕，也是他一生中惟一的一次被捕。在被押往刑场途中，毛泽东急中生智，佯装脚痛落在后边，趁机掏出身上几块银元，塞到一个团丁手里说：“这点钱拿去买碗茶喝。”团丁接过钱，朝山林方向一努嘴，示意毛泽东可以往那边跑。毛泽东迅速转身钻到山林里去了，直到看不见人影了，那个团丁才装模作样大喊：“跑了一个，快追呀！”毛泽东在山上的草丛里一直躲到黄

昏才出来，碰到一个好心的樵夫，把毛泽东接到家住了一夜，第二天带路把毛泽东送到铜鼓县城。9月9日，毛泽东领导了震惊全国的湘赣边秋收起义。

八、井冈山上唱空城

秋收起义后，毛泽东率领工农红军转战千里，上了井冈山。1928年，朱德率领南昌起义部队也来到井冈山。朱、毛两军相会实力倍增。井冈山红色革命根据地的迅速发展，引起了敌人的震惊和恐慌，江西省主席朱培德，下令赣军二十七师分兵两路，对井冈山进行“会剿”，一时间根据地上空风云突变。一天晚上，毛泽东在塘边村正在分析调查材料，村外突然枪声骤起。原来敌人偷偷袭来，想活捉毛泽东。这时部队都分散到各村去做群众工作去了，一时无法集中。情况万分紧急。毛泽东镇定自若，下令“通知群众，马上撤出村子上山”。群众很快转移到山上。刚才还人声喧闹的山村，霎时静无一人。敌人进村后，发现家家锁门闭户，村里不见一人，知道已有了准备。心惊胆战的敌人，怕中了红军的埋伏，打了一阵乱枪后撤走了。群众在山上居高临下目睹远去的敌人，欢呼雀跃，称赞毛委员料事如神，退敌有方。

九、败走麦城

1928年11月，彭德怀率领红五军来到井冈山。看到共产党力量日益壮大，蒋介石惶恐不安，纠集3万兵力，分五路向井冈山进攻。1929年元月22日，红军进占赣粤边城大庾。然而万万没想到，就在部队扎营休整时，敌二十一旅突然发动猛攻。由于当地没有党的组织，无人给红军通风报信，以至于敌

人已冲到眼皮底下竟无人知晓。红军仓促投入战斗，不一会儿部队垮了。朱德和毛泽东在撤离时也走散了。第二天毛泽东和朱德带领的人马在广东南雄县的乌远会合，战士们横七竖八躺在地上。午夜时分，毛泽东突然接到一个地方党支部派人送来情报说敌人向这里追来。毛泽东当即决定，马裹足，人下鞍，行军不能有任何声响，迅速转移。事后，毛泽东曾多次谈到这件事，他深有感触地说：“一个地方党支部，一个人、一封信，救了我们的党，救了整个红军。”

十、来自远方的讣告

1929年5—6月，红军内部在前委和军委的问题上发生争执。6月22日，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在龙岩城内召开，对前委书记进行选举。毛泽东落选了，被迫离开了自己一手创建的军队。祸不单行，由于毛泽东受精神打击较大，加之身体虚弱，在山区毒蚊子的攻击下，他得了一场疟疾，曾一度病危，后在傅连璋医生的精心治疗下，终于转危为安。由于毛泽东病重没有随红军主力行动，国民党久无毛泽东音讯，便造谣说“匪徒毛泽东已死”。上海《申报》9月27日第四版刊登了福建军阀张贞给南京国民党中央的电报“毛泽东在龙岩病故，党代表由陈毅年继”。共产国际在莫斯科也听到了毛泽东病故的传闻，于第二年3月20日在《国际新闻通讯》上发了1000多字的讣告，对毛泽东作出了很高的评价。事实上毛泽东只是得了一场重病。11月26日离开红军整整五个月后，又回来就任前委书记。

十一、警卫员细伢子救了毛泽东

1930年10月至12月红军内部因“AB团”问题，爆发了亲者痛、仇者快的“富田事变”。原红二十军一七四团政委刘敌趁机散布“赤色恐怖”流言，想搞乱红军，并派刺客准备暗杀毛泽东。12月29日夜，毛泽东写完了一方面军攻击进占龙岗之敌张辉瓒的命令后，站起身来准备休息。就在这时，窗外一支手枪慢慢地举起，黑洞洞的枪口正对着毫无防备的毛泽东……就在刺客扣动扳机的一刹那，毛泽东的警卫员正好到毛泽东的住处准备劝毛泽东早点休息，一看情况危急，大喊一声“政委小心”，猛扑过去，把刺客扑倒在地。刺客举枪向警卫员开了一枪，闻声赶来的哨兵将刺客乱枪击毙。毛泽东又一次脱险，但他的警卫员细伢子却牺牲了。

十二、兴国突围

1931年6月，蒋介石对红军发动第三次“围剿”，并“御驾亲征”，总兵力30多万人。7月底，蒋介石发现红一方面军主力集结于兴国地区，立刻调九个师的兵力占据了东南与西南战线，形成了钳形包围阵势。情况万分危急。料敌即先、临危果断的毛泽东常常有惊人之举。他当机立断，决定避实就虚，率领红军连夜急行军，神不知鬼不觉地从敌军之间的空隙穿插而过，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并对敌人各个击破，取得了三战三捷的胜利。

十三、今晚只唱借东风

1931年4月，毛泽东率领东路军执行攻打漳州的任务。

为了组织好这次战役，毛泽东带领警卫排要连夜从汀江坐船赶往上杭。这是一个月落星稀的夜晚，江面上漆黑一团，警卫员从附近找来几个船工，其中一个上了年纪的老艄公说：“今晚没月亮，看不清，风浪太大，搞不好会船翻人亡呀！”毛泽东祈求道：“老人家，情况紧急，等不得呀！”老艄公只好冒险行船。木船进入山峡，山谷两边突然响起刺耳的枪声，子弹从毛泽东和警卫员的头上嗖嗖飞过，大家立刻掏出驳壳枪，准备战斗。毛泽东抬头望了一眼打冷枪的地方说：“敌人是在打冷枪搜寻目标，我们只装作没听见，我们今晚只唱借东风，不唱草船借箭。”大家听了毛泽东这番风趣幽默的话，紧张的心情顿时轻松下来。风高浪大，船在黑夜里行驶到天亮，毛泽东率领的三条木船顺利到达上杭。4月20日，毛泽东指挥红军攻占漳州，歼敌四十九师大部，俘敌1600多人，还缴获两架飞机和大批军用物资。

十四、子弹与我毛泽东无缘

1934年9月，蒋介石调集了百万兵力，采取“碉堡推进，步步为营”的战略战术，分六路向中央苏区纵深推进。由于博古、李德推行“用堡垒对堡垒”的死打硬拼的防御军事路线，致使战局连连失败。当时，作为中央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毛泽东，被博古以“宗派主义”为由剥夺了军权，在一座古庙里休养。一日，毛泽东正和当地一个老学究谈论《周易》，一个名叫宋雨来的农民，因为被农会划为富农，被分了浮财，没收了土地，这人便把仇恨记在毛泽东头上。他手提一支火枪，藏在竹林后边举枪对准毛泽东的头部扣动了扳机。不幸中之万幸，这一枪竟然是个瞎火。事后毛泽东说：“子弹与我毛

泽东无缘。”这话不假，毛泽东一生经历了无数枪林弹雨，但令人惊奇的是他从未受过一处枪伤。

十五、惨烈的湘江之战

1934年10月，红军开始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毛泽东随第一纵队前进。长征之初，红军虽然突破了敌人的三道防线，但却付出了较大代价。毛泽东在反复研究敌情后，提出了避其锋芒改变行军路线的建议，但却被博古、李德拒绝。顽固不化的左倾领导仍然让红军抬着“轿子”、背着“石碾”前进。11月28日，空前惨烈的湘江之战开始了。蒋介石凭借人多势众，采取密集的“羊群战术”向我军阵地连续冲锋，几百门大炮猛烈轰击，又调来了大批飞机，炸弹像下饺子一样从天而降，把红军阵地炸成一片火海。土地是红的、江水是红的、天空也是红的。湘江、潇水二百里战场上，人喊马嘶，枪炮声昼夜不息；湘江两岸，血流成河，尸横遍野，惨不忍睹。三天后，毛泽东来到湘江的浮桥边，对正在指挥渡江作战的朱德、周恩来，又一次提出建议，“红军一定要轻装前进。”然后，昂起头，挺起胸，大步走上晃动不已的浮桥。突然，空中传来隆隆的飞机声，周恩来急忙大喊：“主席，敌机来了，快回来防空。”毛泽东猝然停下脚步，冒着敌人的炮火和飞机的扫射站在浮桥上轻蔑地看了一会儿敌人的飞机后，大步通过了硝烟弥漫的浮桥。惨烈的湘江之战，红军损失3万多人，毛泽东又一次从炮火中走了过来。

十六、出师不利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回到了领导岗位，但1935年1月28

日，他掌握军权后指挥的第一仗土城之战，由于情报失实，致使战斗失利，中央机关被迫转移。当来到一条山沟时，突然发现北面山坡上来了一个连的敌人。毛泽东、周恩来都在敌军火力射程之内。敌人吹起冲锋号，大喊“剿灭红军，活捉朱毛”。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军委纵队副司令员叶剑英，带领通讯排冲上南面高山，集中火力向北面敌人还击，敌人遭到猛烈的阻击，摸不清底细，不敢再往下冲。双方对峙了一会儿，敌军弃阵而退，毛泽东和中央机关才转危为安。

十七、突破天险又遇险

1935年5月12日，中央红军全部渡过金沙江。消息传到南京，蒋介石被气得七窍生烟，浑身发颤，星夜飞往昆明，策划对红军新的围追堵截。5月25日，红军强渡大渡河，然后又抢占安顺场，飞夺泸定桥，摆脱了敌人的围追堵截。红军大踏步地向马水行进。一天中午，敌机突然出现，而且飞得很低，然而毛泽东却没当回事，仍然像平常那样谈笑风生。飞机越来越近，传来刺耳的呼啸声。警卫班长胡长保立刻意识到敌机投弹了。他猛喊一声“主席”，同时身体腾空飞起，将毛泽东扑倒在地，只听“轰”的一声巨响，一颗炸弹在不远处爆炸。毛泽东安然无恙，而警卫班长却为救他牺牲了。建国后毛泽东在中南海还常常忆起胡长保，有一次毛泽东沉痛地说：“没有像小胡这样一些好同志，就没有我毛泽东的今天！”

十八、会师遇险

1935年6月25日，红一、四方面军在川北两河口会师，张国焘凭借人多势众，想要夺取最高领导权，并以武力相威

胁。他给亲信陈昌浩密电：“劝告毛、周、张放弃北上，如他们不听劝告，则以武力解决之。”电文先被叶剑英拿到，叶剑英赶紧通知毛泽东。在这紧急关头，毛泽东镇定自若，以看地形为名，离开了张国焘部队控制的警戒区，来到中央红军三军团司令部驻地，然后立即召集周恩来、洛甫、博古、王稼祥开会，史称“巴西会议”。毛泽东果断决定“三十六计走为上计”。立即率红一、三军团和军委纵队连夜转移，脱离了危险区。为此，毛泽东赞扬叶剑英：“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

十九、敌机轰炸会场

1935年9月下旬的一天，红军进入甘南哈达铺一带，下午抵达一个叫北洋城的地方。北洋城名义上叫“城”，实际上是一个土围子，只有四五间土头土脑的民房。毛泽东对大家说：“我们在这儿开个会，聂荣臻给我们送来好消息，从国民党报纸上得知，陕北有块颇大的红色根据地，我们的远征要结束了。”正当人们欢喜不尽时，敌人一架飞机突然低空飞过来，好像知道毛泽东在土围子里开会似的，扔下几颗炸弹。奇怪的是其他几间房子都被炸弹击中，梁倒屋塌浓烟滚滚，只有开会这间完好无损。陆定一同志庆幸地说：“真是马克思在天有灵啊！”

二十、他们把炮弹打光了就不打了

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甘边区后，重新有了可以立足的根据地，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次重大胜利。瓦窑堡会议后，为了扩大革命根据地，毛泽东率部东征。红军主力突破黄河天

险，阎锡山闻讯大惊，速调重兵从南、北、东三面阻击红军东进。一天晚上4点多钟，敌人的山炮和迫击炮突然向红军总部驻地一个山村营地打了过来，有两发炮弹落在毛泽东住的窑洞附近。大家担心毛泽东的安全，都劝毛泽东快走，毛泽东却说：“慌什么！等他们把炮弹打光了就不打了。”果然敌人打了一会儿就停了下来。毛泽东这才不慌不忙地起身转移。东征历时75天，红军扩增新兵8000人，筹款30多万元。

二十一、敌来我走

1936年端午节这天，驻守在石湾的国民党高双成一个炮兵营和一部分地主武装1000多人突然袭击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当时主力红军已转移，城里只有一个通讯连和保卫队，以及红大学员百把人，敌我力量悬殊。城外人喊马叫，枪声密集，响声越来越近，警卫员贺清华请求说：“主席，敌人就要从西边进城了，快走！”毛泽东不慌不忙地说：“敌人从西门进来，咱们就从东门出去。”敌人从西门蜂拥而进，毛泽东大摇大摆地从东门出城。出城后毛泽东因抢救保卫局李科长，耽误时间落在后边。天快黑了，毛泽东和警卫人员等人拐进一条山沟，山沟左侧土岭上突然过来了敌人的搜索队，大家有些慌乱，毛泽东说：“同志们沉住气，不要开枪。”大家分头隐蔽起来，不一会敌人骂骂咧咧地从他们头顶的土坡上经过，到附近老百姓的窑洞里抢东西去了。这时，毛泽东和警卫战士才起身追赶前边的队伍。

二十二、他投他的弹，我办我的公

1936年7月3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进驻陕北保安县城。

12月7日上午，国民党三架飞机轰炸保安。当飞机飞来时，城里的老百姓从未看见过飞机，不晓得是什么怪物，纷纷走出家门看稀罕，结果被敌机炸得四处奔逃，保安城一时间乱作一团。当时毛泽东正在窑洞里办公，警卫员进来让毛泽东赶快躲一躲，毛泽东微微一笑说：“怕什么，他投他的弹，我办我的公，井水不犯河水嘛！”说罢向窑外扫了一眼，又继续低头工作起来。这时，在毛泽东窑洞的左边，接二连三地落下了几颗炸弹，震得窑洞嗡嗡直响，沙石、泥土落了一桌子。毛泽东依然如故坐在那里，并风趣地说：“随地投吧，投下1万颗也奈何不得咱们，保安保安，有安全保障嘛。”说罢依旧神态安然地伏案工作。敌机似乎听到了毛泽东的话，无可奈何地飞走了。

二十三、窑洞外的枪声

1937年元月13日，毛泽东率中央机关进驻延安，住在城西凤凰山麓的石窑洞里。在这里毛泽东写下了著名的《实践论》和《矛盾论》。一次，毛泽东伏案写作了整整一夜，天亮后，他马马虎虎地抹了一把脸，随便吃了两口东西就上床睡觉了。警卫员李长培，在毛泽东院内值班，他背靠黄土墙，擦拭着他心爱的手枪，一不小心枪走火了，“砰”的一声，子弹穿过窗户射进毛泽东住的窑洞。窗户下正是毛泽东的办公桌，李长培吓呆了。毛泽东被枪声惊醒，高喊一声：“哪个打枪？”警卫员翟作军赶过来给毛泽东说：“可能是哪个小子擦枪时不小心走火了。”听说枪走火了毛泽东没再说什么，重新躺下休息了。下午起床后，毛泽东看了墙壁上的弹迹，如果再偏一点后果就不堪设想，毛泽东不由得连声说：“太危险了，太危险

了。”

二十四、日寇空袭延安城

抗日战争爆发后，延安便成了领导全国民众抗日的指挥中心。日本侵略军把延安视为眼中钉、肉中刺。1938年11月20日上午8点多钟，大家刚吃过早饭，毛泽东还在睡觉，日寇飞机飞临延安轰炸。警卫员和机要秘书叶子龙在敌机的狂轰滥炸中连拉带推总算把毛泽东请进了防空洞。就在毛泽东刚刚走进防空洞，敌机投下的炸弹就在通向防空洞的小道旁爆炸。毛泽东住的窑洞被敌机炸裂了。陈云等其他领导商议，决定让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立即搬到北门外杨家岭去住。警卫人员连夜行动，毛泽东当夜就搬到杨家岭。第二天早晨太阳还没出山头，几十架日本飞机果然又来轰炸延安城，一颗大炸弹就落在毛泽东住的窑院内，已被震裂的窑洞这回倒塌了。敌机走后，暂时留下来看家的警卫员贺清华受了轻伤。他从窑洞里爬出来望着大弹坑，喃喃自语：“好悬乎，幸亏主席昨夜搬走了。”

解放后，修复这里的旧址时在毛泽东住的窑洞附近又发现了一枚未爆炸的大型空投炸弹。

二十五、有朋自远方来

1941年9月中旬，绥德地区有位副专员去西安途中特意来延安，他想亲眼看看共产党管辖的延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耳听为虚，眼见为实。通过几天的参观访问，他被延安人民如火如荼的斗争生活深深地打动了。他改变了过去的偏见，从内心里佩服共产党，于是提出要会见毛泽东。接待人员向毛主席汇报后，毛主席笑着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理应欢

迎，明天我请副专员吃个便饭。”第二天上午，毛泽东即在南门外交际处接见了绥德来的副专员，下午又在大砭沟青年食堂举行招待宴会。听说毛泽东主席来了，不少群众赶来欢迎，毛泽东向群众微笑着朝食堂门口走去。突然，一个年轻人一个箭步蹿到前面，抡起大棒向毛主席的后脑拼命砸去。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呼喊开枪都来不及了。毛泽东的保卫参谋蒋泽民急速抬起右臂拦挡，警卫冯永贵飞起一脚踢在刺客的肚子上，刺客“扑通”一声摔倒在地，被其他战士捆绑起来，毛泽东平安地走进食堂。后经审讯，此人原来是国民党顽固派派来暗杀毛泽东的刺客。

二十六、深入虎穴

抗战胜利了，和平并没有到来，蒋介石想捞一把政治资本，于1945年8月14日、20日、23日连续三次致电邀请毛泽东到重庆谈判。蒋介石认定，毛泽东不敢前来重庆，这样就可找到一个诬蔑共产党不要和平的口实。毛泽东早已洞察蒋介石假和平真内战的阴谋，决定亲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8月28日，毛泽东率周恩来、王若飞等同志赴重庆。深入虎穴的毛泽东在重庆与蒋介石谈判九次，而且广泛接触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越到谈判后期，特务活动越猖獗。在回延安的前一天晚上，毛泽东去看京剧。戏演得正精彩时，有人递上一张纸条，周恩来打开一看脸色骤变，迅即离席。原来是毛泽东的车子被国民党士兵袭击了，八路军驻渝办事处秘书李少石饮弹身亡。周恩来当即找到蒋介石的首席谈判代表，表达了极度愤慨。10月11日，毛泽东在张治中将军和我方人员护送下，顺利飞返延安。

二十七、病中又遭煤气中毒

1945年冬，“双十协定”墨迹未干，国民党就开始向晋冀鲁豫解放区和中原解放区发动了大规模的军事进攻。在此关键时刻，操劳过度的毛泽东却病倒了。当时边区的医疗条件太差，毛泽东的身体状况越来越令人担忧，他躺在床上头晕目眩，高烧不退，冷汗不止。更不幸的是，在此期间毛泽东又遭煤气中毒。煤气中毒虽没有酿成大祸，但毛泽东的身体却一直不见好转，在无可奈何之下，中央给斯大林发电请求派医生来。斯大林同意派两名医生来，同行的还有多年不见的儿子毛岸英。这真是喜从天降，医生还未到，毛泽东的病好像已经好了一半。

二十八、游戏胡宗南

1947年5月，中共中央前委转战陕北移驻安塞王家湾，毛泽东的电台信息被胡宗南部下董钊截获。蒋介石、胡宗南听说发现了共产党的“老窝”狂喜万分，胡宗南立刻命手下两员大将重兵合围中共机关，声称要活捉“共匪毛周”。当时毛泽东身边部队只有300多人，形势相当严峻。6月8日，国民党整编第二十九军军长带四个半旅扑了过来，距王家湾只有15公里路。毛泽东镇定自若，率领中央机关一会儿向东一会儿向西，一会儿在天赐湾，一会儿在小河村，在敌人中间来回穿插，牵着敌人的牛鼻子走。天上飞机，地下追兵，就是抓不到毛泽东。经过一个月的周旋，毛主席于6月17日摆脱了敌人的围追，又平安地进驻靖边县小河村。

二十九、坚决不过黄河

1947年8月，胡宗南命刘戡率领10万之众，再次向我中央前委——昆仑纵队紧追而来。敌人从绥德追到米脂，又从米脂追到葭县，双方距离有时还不到10公里。当时昆仑纵队只有二三百人，其中有中国共产党的核心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我军处在前有黄河阻挡，后有10万追兵的险境之中，突然天又下起大雨。在这危难之际，不少同志建议东渡黄河。但毛泽东说：“我有言在先，不打败胡宗南决不过黄河。”毛泽东认为过了黄河就算认输。就在这时，枪声大作，敌人追兵已和我警卫部队接上火。情况万分紧急。毛泽东坐在一块湿漉漉的大青石上，神色严峻，大口地抽着烟，沉默不语。部队向何处去？周恩来、任弼时和几百名战士都等待着毛泽东作出最后的抉择。这时敌人已占领对面的山头，子弹在头上飞掠。蓦地，毛泽东立起身，扔掉烟头用力跺上一脚，说：“不过黄河，放心地跟我走，老子不怕邪。”他用讥嘲蔑视的目光朝敌人射击的山头扫了一眼，从容地走上黄河岔口堤岸，向西北方向走去。周恩来快步追上，警卫战士们紧随其后。突然，雨停了，云中射出一缕金光，恰好照在走在高高河堤上的毛泽东。奇迹出现了，毛泽东身体后侧的那些山头上，枪炮声戛然停止。两军相逢勇者胜。毛泽东以其惊人的气魄和奇特的自然景观，使10万追兵吓得目瞪口呆，他们全都放下手中的枪支，眼睁睁地看着毛泽东在河堤上走过去并翻过一个小山坡不见了。

三十、险遭车祸

1948年4月上旬，毛泽东率领中央机关翻越山西五台山，由于风雨交加，坡陡路滑，毛泽东乘坐的吉普车突然失控，像一匹脱缰之马沿斜坡向路边的悬崖滑去。司机周西林急忙打方向盘仍控制不住，他两眼一闭，猛踩刹车，右手死死扳住手闸，车终于停下。后面赶来的同志跑到车前面一看，好险呀！汽车的一个前轮已经滑到悬崖边上，另一个前轮已经悬空。毛泽东下车走过来，拍了拍浑身发软的周西林的肩膀，不但没有责怪，反而用感激的语气说：“老周啊，这次你救了我一命。”周西林脸色煞白，连声说道：“主席命大，主席命大。”

三十一、敌机偷袭城南庄

1948年4月13日，中央机关移驻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5月中旬的一天，工作了一宿的毛泽东吃了两片安眠药上炕睡觉。刚睡着，山上的防空警报响了。怎么办？毛泽东最讨厌最恼火的是睡觉时叫醒他，几名警卫员正六神无主时，聂荣臻司令员闯进毛泽东的房间，急切地叫醒毛泽东。毛泽东被惊醒后双眼怒睁，正欲发脾气，李银桥赶紧解释说：“敌人飞机要来轰炸。”毛泽东不急不躁地说：“怕什么？他来无非是想丢下一点钢铁，正好打几把锄头开荒。”这时飞机的声音越来越大。

三十二、一纸退敌十万兵

1948年5月下旬，中央机关移驻河北平山县西柏坡。10月24日，中央军委接到中共华北局城工部一个紧急报告，蒋介石与傅作义策划组成一个约两个军兵力的快速部队，企图夺

回石家庄，偷袭西柏坡。石家庄离西柏坡只有 90 公里，情况万分紧急。周恩来、任弼时建议中央机关撤离西柏坡，毛泽东坚持己见，说：“谁要走谁走，我是不走”。他思考着退敌之策，最后决定用空城计退敌。他亲自写了一篇题为《蒋傅军妄图突击石家庄》的电讯稿，送交新华社播出。毛泽东不仅揭露了蒋介石、傅作义相互勾结偷袭冀西的罪恶阴谋，还公布了他们具体部署和各路军师长官的尊姓大名。新华社播出的消息使傅作义大吃一惊。他万万没有想到，一个精心策划的作战计划还没有来得及实施，就大白于天下，战略企图暴露已无偷袭可言，若再冒险进犯，无异于自投罗网。11 月 1 日，国民党先头部队撤退保定。蒋介石精心策划偷袭中共中央驻地的行动，就这样不战而败。

三十三、香山兵变

1949 年 3 月 25 日，毛泽东在西苑检阅部队后，住进了北京香山双清别墅。4 月初的一天上午，值班室突然响起紧急集合哨声，警卫人员立即持枪集合。中央办公厅警卫处长汪东兴，神情严肃地告诉大家，今天晚上傅作义的警卫团约两个营的兵力阴谋冲击香山，我们要加强警戒，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原来北京和平解放的谈判中，党中央同意傅作义保留一个警卫团，可是这个团中有些顽固分子思想没有转变过来，他们在士兵中煽风点火，准备偷袭香山，幸亏李克农秘密安插的地下党员趁早上买菜之机把情况报告李克农。李克农立即报告周恩来。周恩来命代总长聂荣臻派二〇七师一部火速前往翠微路八里庄实行军事包围。这次行动由作训处长唐永健指挥。部队到达八里庄迅速包围了叛军，并用喇叭喊话，要求他们派人来

谈判。经过几小时的宣传教育，傅作义警卫团的连营军官同意放下武器。

三十四、刺客潜入北平

1949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纪念日，毛泽东决定出席在北平先农坛召开的纪念集会。在台湾的国民党保密局很快侦知这一消息，派经验丰富、手段高强的特务崔铎潜入北平执行刺杀任务。正当公安部忙于“七一”大会保卫工作的紧张时刻突然接到天津公安局的重要报告：“从间接获悉‘七一’将有刺客潜入北平行刺毛泽东。”这时离“七一”只有三天，情况十万火急。公安部召开紧急会议决定：①加强安全保卫工作。②开展反谍调查。这时天津又派人来报告，通过天津码头“武林”的一个朋友透露，新近从台湾来的特务崔铎，住在前门外大街甲69号。公安部一局责令侦察科长曹纯之立即组织抓捕。公安人员将崔铎住处包围后感化让其投降，崔铎持枪射击拒不投降，我几名公安人员同时从房顶跳下将其生擒。经审讯，崔铎来北平任务就是乘“七一”集会刺杀毛泽东。7月1日，晴空万里，毛泽东顺利平安地出席了纪念大会并作了重要讲话。

三十五、炮轰天安门

1950年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周年，北京将举行盛大集会。美国战略情报局密谋炮轰天安门，杀害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美国特务头子杜诺万亲自同老牌谍报专家包瑞德共同策划。包瑞德向杜报告，他在中国有经营多年的间谍网，这个间谍网囊括有意大利人李安东、哲立，日本人山口隆

一，法国人魏智，德国人甘纳新。撤离大陆前他亲自留给他们一门 STOKES 型迫击炮和一些炮弹，这次可以用来炮击天安门。杜诺万非常高兴。包瑞德亲自来中国进行布置，并对李安东等许诺成功后，奖励 50 万美元。李安东高兴地加紧准备，做试验，但他们万万没想到，他们的阴谋早被我公安部发觉，正秘密注视他们的行动。国庆前一天，公安部一声令下，一辆吉普车、两辆摩托车、十六辆卡车满载公安干警，开往敌特藏匿地，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他们一一逮捕，缴获了 STOKES 型迫击炮一门和炮弹 24 发。美国战略情报局精心策划的炮击天安门，暗杀毛泽东的阴谋彻底破产了。

三十六、访苏途中有险情

1949 年 12 月 21 日是斯大林的 70 大寿，毛泽东要率领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代表团前往苏联祝贺，并就两党两国之间共同关心的一些重大问题交换意见，商讨和签订有关条约和协定。这一重大外交活动引起世界各国的极大关注，美国和蒋介石想方设法进行破坏和捣乱。为了确保毛泽东旅途安全，中央军委调动三个军的兵力进行护路，从北京到满洲里数千公里铁道线上，一根电杆旁站一名全副武装的解放军战士。

毛泽东出境一路平安，顺利到达莫斯科。1950 年 2 月 14 日上午，中苏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2 月 18 日准备回国。为了保证毛泽东回国途中的安全，公安部下令逮捕了潜伏在北京的国民党电台台长计兆祥。根据计兆祥交代，东北有一伙国民党技术纵队的亡命之徒，司令马耐，代号“205”，准备派人将炸药埋在哈尔滨市郊想炸毁毛泽东专列。我公安人员根据计兆祥的交代，在哈尔滨不远的山林里张网以待，很快

捕捉了国民党高级刺客段云朋的助手张大平、于冠群，缴获了美式卡宾枪、气象预测器、烈性炸药、无线电台等作案工具。随后我公安人员化装成张大平、于冠群，根据套取的“一百七十人联络图副本”，里应外合，巧妙地将以马耐为首的东北技术纵队一网打尽。一周之后，毛泽东专列安全通过京哈铁路顺利回到北京。

三十七、专机失踪 40 分钟

1956年6月4日下午，毛泽东结束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南巡活动，由武汉飞回北京。飞机飞临河北衡水上空时，只见前方乌云密布，而且雷声隆隆，电光闪闪，这就是飞行员最忌讳的雷雨云，假若不慎闯了进去，飞机不被雷击个七零八落，也会被它掀个底朝天。时间刻不容缓，机长当机立断，马上指示飞行员临时改变航线，向沧州机场飞行，再由沧州转向正北，经天津再飞北京西郊机场。窗外黑云密布，飞机不停地颠簸，强大的雷电干扰，使机上无线电设备失灵，飞机与地面完全失去联系。毛泽东专机失去踪影，不知去向，这可是惊天动地的大事。空军司令刘亚楼急得团团转。40分钟后，从飞机场的东南方向传来飞机马达声，大家才放下心来。飞机刚停稳，还没等主席下飞机，刘亚楼就冲着飞机大声嚷道：“主席呀，吓死我了！我们一直在为您的安全担心，现在好了，平安无事了。”这次空中遇险后，有关部门决定，毛泽东以后外出一般不允许坐飞机，改乘火车。

三十八、南巡路上险象环生

1971年8月14日，78岁高龄的毛泽东乘专列离开北京。

这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也是最具传奇色彩的周游“列国”。毛泽东在武汉停留了10天，先后和湖北、河南等地党、政、军负责人进行了五次谈话。毛泽东着重谈了1970年8月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的斗争，点名批评了林彪等人在庐山搞突然袭击。林彪敏锐地感觉到毛泽东看穿了他的险恶用意，他已经“失宠”，“和平接班”事实上宣告失败。在这种情况下，林彪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准备发动武装政变，夺取全国政权。9月8日，林彪用红铅笔在三张白纸上写下了他反革命武装政变手令：“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9月9日，林立果一伙在北京西郊机场工字房里密谋政变具体措施。南京空军政委江腾蛟出主意：如果毛泽东专列到了上海，向北京通报时就说“王维国因病住院”，如离开上海时就说“王维国出院了”，然后根据具体情况安排了刺杀方案。10日下午3时，毛泽东专列离开杭州向东北方向疾驶，与此同时，北京林立果“联合舰队”收到了从上海发来的密语情报“王维国因病住院”。林立果一伙按照常规推算，估计毛泽东在上海总得停留几天，他们在上海有三种方案可选择实施：一是用火焰喷射器扫射毛泽东专列；二是用一百毫米口径高射炮平射火车；三是让上海空四军政委王维国带上手枪趁毛泽东接见时动手。9月10日下午，专列顺利驶进上海虹桥机场附近的吴家花园转运站。毛泽东一改过去下车住几天的习惯，决定在车上接见上海市党政军领导，其中有马天水、王洪文，值得庆幸的是王维国没有被允许上车。

晚上，毛泽东让高秘书给南京军区打电话，通知许世友立即来上海。第二天上午，毛泽东与这位老将军谈了一个多小时，中午一起吃了饭。送走许世友后，毛泽东说：“我们走，

不要同他们打招呼，谁也别通知，马上开车。”列车驶过长江大桥，此时林立果正在紧锣密鼓地继续策划谋杀毛泽东的计划。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正当他们打着如意算盘做美梦时，王维国从上海打来电话，毛泽东已离开上海。这一消息犹如五雷轰顶，林立果顿时眼睛直了，身子软了。毛泽东的专列像一只雄狮一路愤怒一路嘶鸣一路狂奔，蚌埠不停，徐州不停，12日凌晨到达济南车站，加水检修更换机车后，继续向北疾驶。快到丰台了，毛泽东下令在丰台停车，接见北京四位党政军负责人。9月12日黄昏时分，毛泽东专列驶进北京站。林彪得知这一消息后，自知阴谋败露，大势已去，于9月13日凌晨偕妻儿及其死党乘飞机叛逃，结果折戟沉沙，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

三十九、突然休克

“九一三”事件的发生，使毛泽东内心充满了难以言状痛苦，加之病魔折磨，致使身体状况越来越差。1972年2月12日凌晨，护士长吴旭君给毛泽东把脉，摸着，摸着，她脸色煞白，说：“没有摸到脉。”这可把在场的工作人员吓坏了，赶快叫医生，赶快请总理来。心脏病专家胡旭东气喘吁吁赶到，和医务人员一起对毛泽东进行紧急抢救。周总理从西花厅听到消息后飞车赶来。总理一到现场就用命令的口吻说“你们要用全力抢救，这个国家的担子重，不能没有主席啊！”毛泽东的生命是顽强的，经过半个小时奋力抢救，毛泽东终于有了微弱的呼吸，心脏开始正常跳动。毛泽东终于脱离了危险。他看到眼前的医疗器械和围在身边的工作人员才知道自己刚才休克了，他幽默地说：“我好像睡了一觉。”

四十、眼睛失明

1974年8月中旬，南巡的毛泽东在武汉下榻的东湖宾馆检查眼睛时，被确诊为老年性白内障，两眼都有。这种病要经过初发期、膨胀期、成熟期，待其成熟后才能手术治疗。1975年8月经医疗组会诊，认为毛泽东右眼的白内障已到成熟期，根据毛泽东的健康状况，提出了实施手术的意见经报请中央政治局批准，并征得主席本人同意后，采用当时新研究出来的针拨术，手术简便可靠，只有七八分钟就顺利结束了。第二天，大夫摘掉毛泽东眼睛上的纱布后，毛泽东就能看清画报上“人民画报”四字并能说出图案和颜色。毛泽东兴奋不已，高兴地大夫说：“太好了，明年我再请你来做那一只眼睛。”

四十一、一代伟人停止呼吸

1976年，毛泽东已经步履艰难，口齿含糊，但他头脑清醒，仍然用顽强的毅力向死神挑战，他要在向“马克思报到”的前一刻为十多年来为之揪心的接班人问题作最后的努力。“中国究竟向何处去”的现实问题一直困扰着毛泽东。因此，他对接班人的选择异常慎重，且下手极早。但事与愿违，他选择接班人的过程一波三折，屡改初衷，结果三选三空。“你办事我放心”，华国锋终于被毛泽东提出来担任国务院代总理。几个月后在天安门广场上的那次风潮中，华国锋被正式选定为总理并兼任党的第一副主席，毛泽东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脸上表现出大功告成的满足。1976年9月9日晚上7时，毛泽东的呼吸忽然变得急促，经过抢救情况有所好转，但没过多久，监视器上再次显示毛泽东心脏严重异常。医务人员迅速对毛泽

东施行全力抢救，人工呼吸，打强心针……然而，这一切对于已走到生命尽头的毛泽东来说都无济于事了。

1976年9月9日零时10分，震撼了整个世界的中国一代伟人毛泽东终于停止了呼吸。巨星陨落，举世悲恸。

（作者：延安革命纪念馆馆长）

论刘志丹对中国革命的突出贡献

杨延虎

刘志丹，1925年入党，1936年牺牲，是全党公认的陕甘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人。毛泽东称之为“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周恩来题词：“上下五千年，英雄万万千，人民的英雄，要数刘志丹。”在党的历史上，对一位资历并不算深的地方领导人给予如此高度的肯定和赞誉，是极为罕见的。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刘志丹对中国革命的突出贡献至今没有深入研究，本文借纪念刘志丹诞辰100周年之机作一些尝试。

张闻天：“志丹同志的路线是我党领袖毛泽东同志的路线，是我党布尔什维克的路线，是真正的中国马列主义路线。”^①

探索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是马克思中国化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中前期的主要内容，也是刘志丹在这一时期的主要活动。刘志丹的探索，首先是从武装斗争和建立一支革命武装队伍开始的。1926年，刘志丹从黄埔军校毕业后回西北在国民革命军冯玉祥部、马鸿逵部搞政治工作。从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中，刘志丹认识到：“我们没有枪杆子，结果人家一翻脸，我们就只有滚蛋！”“抓革命的枪杆子，建立革命的武装，是一条革命的真理。”^②1928年5月，初次尝试建立革命武装的渭华暴动失败后，刘志丹结合陕北、陇东的实际认为：

“枪杆子不会从天上掉下来，现成的办法，是把各种民间的武装和敌人的武装变成革命的武装。”主要形式分“白、灰、红”三种，白是派党团员到国民党部队中去工作，灰是做土匪工作，红是搞自己的武装力量。”^③1929年夏秋之后的两年多时间，刘志丹以主要精力从事兵运活动，努力建立一支由党领导的革命武装。

各种民间武装是刘志丹搞兵运活动的主要对象之一。这部分武装的情况非常复杂，既有乱世保家的“哥老会”，也有啸居山林的“山大王”，还有各地的地方民团。对这些人，刘志丹说：“能团结的就要主动去工作，争取它们，团结它们。这样我们才能有基础，站住脚。”^④经过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这些人有的与刘志丹保持着长期的友好合作关系，有的参加了革命，成为创建陕甘红军和根据地的重要力量。例如，马锡五是永宁的大爷（哥老会头人），后来入了党，参加了革命，还担任了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郭保珊是黄龙山的“山大王”，1934年带了300多人参加了红军，全国解放后曾任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对这些民间武装的复杂情况，刘志丹也有清醒的认识，他说：“哥老会里的坏事多着哩，基本上是一群狐朋狗党，应付是要应付一番，但要靠他们是成不了事的，甚至还要坏事。”^⑤

国民党军队是刘志丹搞兵运活动的又一个主要对象。他先后打入陕北军阀张廷芝部队、谭世霖部队、驻甘骑兵第四师苏雨生部、和甘军新编十三师陈圭璋部，少则数月，多则一年。在这些军队中搞兵运，刘志丹：“一定要争取带兵，千万不要做细腿子（指文职人员）。”他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说：“我本来可以在北伐军中带一个营或一个团，但陈独秀的右倾

机会主义不容许，只当了一个政治处长。结果‘武汉事变’一发生，便被赶了出来。如果我那时带兵，本来是可以起义的。”^⑥有了这样清醒的认识，刘志丹便利用国民党部队的名义，要番号，抓兵权，积极发展革命武装。这符合武装斗争这一中国革命的最大特点，也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策略原则，但并不是根本的办法。在屡起屡伏之中，刘志丹逐渐认识到“利用军阀是暂时的，搞红军单靠军阀的名义是搞不成的，准备好了条件，我们就单独去搞”，^⑦表明了他对结合实际建立革命武装的认识日渐成熟。1931年秋与陈圭璋的合作失败后，刘志丹成立了一支二三百人的南梁游击队，活动于深山老林之中，为创建红军和陕甘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刘志丹的兵运活动，像万花筒一样充满了失败、沮丧、造反、冒险和死里逃生，也正是这种传奇式的经历使他对建立革命根据地有了明确而坚定的认识。习仲勋在1979年和1993年的两篇文章中都说到了这样一件事：1932年7月间，我第一次见到刘志丹，他就说：“几年来，陕甘地区先后举行过大大小小七十多次兵变，都失败了。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军事运动没有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没有建立起来革命根据地。如果我们像毛泽东同志那样，以井冈山为依托，搞武装斗争，建立根据地，逐步发展扩大游击区，即使严重的局面到来，我们也有站脚的地方和回旋的余地，现在最根本的一条是要有根据地。”^⑧“最根本的一条是要有根据地”，毫无疑问，是刘志丹探索中国革命道路认识的飞跃。这个认识的获得，当然有井冈山道路榜样的影响，刘志丹多次说过：“我们一定要像毛泽东、朱德那样建立根据地，搞武装割据，开展游击战争，”^⑨但更主要的是自己实践经验的总结。在远离中央、消息闭塞而党内连续发生

“左”的错误的情况下，井冈山道路对刘志丹的影响毕竟是有限的、模糊的，甚至是极其抽象的。

当然，“要有根据地”还不等于说就已经弄明白了如何建立根据地，二者之间还有着相当大的认识距离。毛泽东曾经在1928年分析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发生和存在的五个方面的原因，无疑代表了党内认识的最高水平。而刘志丹也在探索之中，努力对这个问题作出马克思主义的回答。从大量的回忆材料来看，他主要强调了这样几点：第一，“我们要成功，非靠山不可。”^⑩他说：“我们不到梢山就存在不住，建立不起根据地。”^⑪这是刘志丹最重视讲得最多的一条。其中的理由，刘志丹认为山里培养了许多军阀力量，如陈圭璋、刘宝堂、李培霄等人都是从桥山出来的，这些人能出去，难道我们共产党人还顶不上他们吗？他还认为“在革命力量暂时还很弱小的情况下，根据地只能建立在反革命力量薄弱的地方”。^⑫桥山山脉就是一个最薄弱的“三不管”山区。第二，根据地必须建立在有群众基础的地方。1933年5月，桥山山脉南段的照金根据地受到敌人的严重包围，时任红二十六军政委的陕西省省委书记杜衡力主红军南下渭华一带，创立新的根据地。刘志丹坚决反对南下，说：“渭华暴动失败后，那里的群众受到极大的摧残，有失败情绪。我们费尽心血，才搞起这一块根据地，那能轻易放弃！只要我们坚持创造和发展陕甘边苏区，形势是会好转的！”^⑬这话虽然是针对具体事情而言，但可以看出刘志丹已经认识到红色割据能够长期存在的地方，应该是受过革命影响、有着比较好的群众基础的地方，而陕甘边经过几年的革命活动已经具备了这样的条件。第三，创建根据地必须要有正式的红军，开展游击战争，建立起几个联系配合的根据地。红二十六

军南下渭华失败后，1933年11月陕甘特委在包家寨召开会议，刘志丹明确提出：不能只建立一个根据地，而应同时在邻近地区建立几个根据地，以便红军主力有迂回盘旋的余地，积极协助游击队打击消灭敌人。^⑭根据这一设想，会议决定以红二十六军为主力，配合各地游击队，建立以陕北安定、陇东南梁、关照金为中心的三个根据地，使陕甘边形势很快出现了新的局面。

像毛泽东一样，刘志丹的意见和主张也受到过左倾错误的严重指责，诸如“梢山主义”、“游击主义”、“逃跑路线”、“右倾机会主义”等等，但事实证明“志丹同志远离中央，能从革命实践中体会马列主义之精髓，使马列主义之普遍真理具体实现于西北”。^⑮陕西党史界曾有“南瑞北照”的说法，其中的含义有多种解读，而主要的应当是毛泽东、刘志丹对中国革命道路的共同探索。特别是在整个北方，只有陕甘根据地异军突起，独擎探索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大旗，更是可贵。当然，探索的水平会有高低差异，但只要符合实际都会发现那个客观存在的真理。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说毛泽东思想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南瑞北照”就是对这个结论的重要诠释。

毛泽东：“陕甘宁边区的作用非常大，我常说它是中国革命的一个枢纽，中国革命的起承转合点。这个地方是落脚点，同时又是出发点。”^⑯

这是对刘志丹革命贡献又一个客观的但被史学界长期忽视的重要评价，其中包含着非常丰富的涵义。

首先，硕果仅存的陕甘根据地是在张国焘企图危害党中央之后选择红军长征落脚点的决定性因素。众所周知，1935年9

月 27 日，榜罗镇会议根据从国民党地方报纸上了解到的消息作出党中央落脚陕北的决定。实际上，在此之前党中央对陕甘的情况还是有所了解的。1932 年 4 月 20 日，党中央就有一个《关于陕甘游击队和创建陕甘边新苏区的决议》，其中决定将陕甘游击队改编为红二十六军。^{①7}1934 年 1 月，贾拓夫代表陕西省参加了六届五中全会，也应该向党中央汇报过陕甘根据地的情况。直到 1935 年 8 月初，在沙窝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重申两河口会议（6 月 26 日）创造川陕甘苏区的决定时，把“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六军等活跃在这一地区”^{①8}作为有利条件之一。而 9 月 8 日中央在给张国焘力主北上的电文中还指出：“拟从右路军中抽出一部，先行出动，与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六军配合，吸引敌人，以利左路军进入甘肃，开展新局面。”^{①9}由此可见，党中央不仅知道红二十六军，而且将其作为配合红一、四方面军联手创建川陕甘苏区的一枚棋子。

陕甘苏区地位的凸现，是在张国焘企图危害党中央之后。9 月 9 日，坚持南下的张国焘背着中央电令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并提出“彻底开展党内斗争”。毛泽东得此消息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党中央率红一军、红三军立即北上，9 月 11 日到达甘南的俄界，脱离了险境。这一变故，使创建川陕甘苏区的计划化为泡影，下一步行动安排却迫在眉睫。次日召开的俄界会议认为：中央应该继续坚持北上的战略方针，而“当前的基本方针，是要经过游击战争，首先在与苏联接近的地方创造一个根据地，将来向东发展。”^{②0}应该说，这是一个没底的行动计划，毛泽东已经有了思想准备。谢觉哉说：“过了大雪山的时候，毛主席找我和徐老、林老、董老谈话说，看来咱们的部队是要长期无后方地打游击。你们年纪大了，在部队上长期拖下

去，会把你们拖死的。到了甘肃以后，你们可以自找掩护关系，到白区去做党的地下工作，请要予以考虑。”^{②①}这个话的具体时间不明确，但多方面分析应该也只能是在俄界会议之后。值得注意的是，俄界会议确定的基本方针，并没有像沙窝会议考虑红二十六军的因素。其中的原因还没有材料能做出准确说明，一个合理的解释就是陕甘苏区的实际情况究竟咋样，很不明确。如果作为战略配合的一枚棋子，无碍大局；但要作为安身立命的依托，就是极其危险的。在这种情况下，哈达铺找到的那张报纸（徐向前说是《山西日报》，谢觉哉说是《晋阳日报》）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这张报纸究竟提供了哪些信息？许多文章有详有略，说法不一。最详细的是谢觉哉的说法：7月某日的《晋阳日报》上载“陕北刘志丹赤匪部已占领六座县城，拥有正规军5万余人，游击队、赤卫军、少先队20余万人，窥视晋西北，随时有东渡黄河的危险性。”^{②②}这篇报道明显地夸大了陕北红军的数量，但它真实地报道了陕北苏区6月下旬结束的第二次反围剿的辉煌战果，让人相信陕北的确“有相当大的一片苏区和相当数量的红军。”^{②③}对于处在困境之中的中央红军来说，这无疑是雪中送炭。毛泽东当即表态：“首先要到陕北去。”^{②④}七天之后的榜罗镇会议，“改变俄界会议关于接近苏联建立根据地的决定，确定把中共中央和陕甘支队的落脚点放在陕北，‘在陕北保卫和扩大苏区’。”^{②⑤}党中央终于有了一个安身之处，历时一年多的红军长征终于有了确定的目的地。更为重要的是，这个落脚点为党在结束长征后，迅速开创新局面赢得了时间和空间。当然，我们不能说没有陕甘苏区落脚，中国革命就会失败，但谁又能肯定不会经历更加曲折艰难的历程呢！今天，在党中央挽救陕北苏区挽救了中央的问题上，确

实没有必要争个高低，因为它们都是客观的，两句话都要讲。而问题在于，所有的党史本子至今并没有对“落脚点”的贡献和意义作出公正充分的评价。

其次，陕甘根据地对中国革命战略重心由南方转移到北方产生了重大影响。近代以来，中国革命长期在南方发展是不争的事实，太平天国、辛亥革命、北伐战争、土地革命主要的都是南方，包括陕北共产党人在20年代初中期的活动和在此之后创建根据地的所有斗争，实际上都是南方革命风暴中心的涟漪。到了抗日战争时期，中国革命的战略重心才转移到了北方直至共和国的成立，而陕甘根据地就是这个转移的出发点。

1935年10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吴起镇召开了长征结束以后的第一次会议。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现在全国革命总指挥部到这里，成为反革命进攻的中心。我们的任务是保卫和扩大陕北苏区，以陕北苏区领导全国革命。”^⑥

1935年10月29日，毛泽东以陕甘支队的名义发布了《告红二十五军、二十六军全体指战员书》，说明中央红军与红二十五军、二十六军会师的意义：“是中国苏维埃运动的一个伟大胜利，是西北革命运动大开展的号炮，它将为开展西北苏维埃运动大局面、赤化全中国打下巩固的基础。”^⑦

1935年11月30日，毛泽东论直罗镇战役的意义指出：这次胜利为在西北建立广大的、领导全国反日反蒋反一切卖国贼的革命战争的根据地“算是举行了一个奠基礼”。^⑧

毛泽东不仅联系这些具体事件说明中国革命奠基陕北的意义，还从迎接即将到来的抗日战争说明陕甘根据地是中国革命的起承转合点。党中央认为：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将开始以中国工农红军为主力的民族革命战争的新的历史阶段。”^⑨为了

推动这一新的历史阶段，11月13日中共中央发布了落脚陕北后的第一个对外宣言——《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11月28日毛泽东、朱德联名发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抗日救国宣言》，12月10日毛泽东以中央政府主席名义发布了《对内蒙古人民宣言》，表明了抗日反蒋的政治立场和建立抗日反蒋统一战线的政治态度。直罗镇战役刚一结束，毛泽东就开始了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统战工作。11月26日致信东北军第五十七军军长董英斌，12月5日致信杨虎城和第十七路军总参议杜斌丞，其间还以红一方面军的名义发布《告围攻陕甘苏区的各部队官长与士兵书》，“基本方针是用积极诚恳方法争取其反日反蒋。”^⑩12月召开的瓦窑堡会议讨论并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圆满地解决了党的政治路线问题。毫无疑问，瓦窑堡会议是极其重要的。同样，陕甘根据地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有了这块根据地，中央红军在榜罗镇会议之后20天时间结束了长征，为党迅速抓住即将到来的抗日救亡高潮的机遇创造了先机。有了这块根据地，党中央能够集中精力思考推动民族革命战争的重大问题，在长征结束之后的67天时间里，就有了瓦窑堡会议的正确决策。有了这块根据地，党能与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面对面地对话，促成西北“三位一体”联合战线率先建立。总之，陕甘根据地在重大的历史转折关头为党中央研究新情况、决定新政策提供了不可缺少的活动舞台，这应该是“起承转合点”的微言大义所在。

最后，陕甘根据地是确定红军作战行动方针的依托。红一、四方面军会师之后，党中央就提出了打通苏联和共产国际

联系的设想。俄界会议提出的“首先在与苏联接近的地方创造一个根据地”，也包含了这个想法。到了陕北后，毛泽东还多次肯定“红军靠近外蒙”是一个根本方针，“打通苏联”是红军1936年的基本任务，而依托陕北苏区是实现这个目标的关键环节。

直罗镇战役的胜利，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陕北苏区的第三次围剿，红军的阶段性任务已经完成。下一步该怎么办？先期到达瓦窑堡的张闻天致电前方的毛泽东，提出北上宁夏靠近外蒙的建议。11月30日，毛泽东致电张闻天认为：“根本方针仍应是南征东讨”，并强调“东讨利益是很大的”。^⑩12月1日，毛泽东再次复电张闻天，详细说明了自己的想法：“关于红军靠近外蒙的根本方针，我是完全同意的”，“不同意的是时间与路线问题。”第一，我们必须依据陕北苏区，用四个月的时间增加红军1万人。第二，最好是走陕西与绥远，“用战争、用发展、用不使陕北苏区同我们脱离的方针与外蒙靠近。”^⑪二人就这一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沟通。

此后，中央政治局就战略问题向军团领导干部征求意见。据《聂荣臻回忆录》载：“林彪在信中正式向中央提出，要到陕南打游击，说这比在陕北巩固和扩大根据地更重要，而且更求把红军主要干部调出，由他带领到陕南打游击。”^⑫12月21日，毛泽东、张闻天致电彭德怀并转林彪指出：“在日本进占华北的形势下，陕南游击战争不能把它提到比陕北等处的游击战争还更重要的地位，实际上后者是更重要的。尤其不能把游击战争提到似乎比主力红军还重要的地位，这样的提法是不妥当的。”^⑬很显然，毛泽东仍然肯定了陕北苏区对红军向外发展的重要地位。

12月23日，毛泽东在瓦窑堡会议上作了军事问题的报告，其中关于行动方针确定了三个步骤：第一步，在南北两线给进犯之敌以打击，巩固和发展陕北苏区。第二步，到山西开辟西部五县以至十几个县的局面。第三步，根据日军对绥远进攻的情形适时由陕西转向绥远，与苏联取得联系。^⑤在此后一年的时间里，红一方面军依托陕北苏区，东征西战，精心做好巩固和扩大陕甘宁根据地这一工作，使其成为三路红军会师之地，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的出发地，党领导抗日战争的战略后方基地。

周恩来：“刘志丹同志对党忠贞不贰，很谦虚，最守纪律。他是一个真正具有共产主义品质的党员。”^⑥

这是一个借话说话的问题。从题目上看，是讲刘志丹的人格品质和党性原则，而非对中国革命的贡献。然而，这确实关系到党中央能否在陕北顺利落脚的大问题。因为，对那场突发的迫害事件，刘志丹能否顾全大局，相忍为党，不仅是对他个人党性的考验，而且关系到这场危机发展的结局。如果这块根据地也被搞掉了，真如毛泽东所说“那就不得下地”，^⑦党中央连歇脚的地方也没得了。

1935年九十月间，在中央驻北方代表派驻西北代表团和新成立的陕甘晋省委的主持下，将包括刘志丹在内的原红二十六军营以上干部和西北军委机关、陕甘边县委书记和县苏维埃主席以上的干部几乎全部逮捕。这场有针对性的错误肃反事件，是王明左倾路线的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恶性膨胀的产物。在事件发生和处理过程中，刘志丹光明磊落，顾全大局，把党和革命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他事前曾亲手接到逮捕自己的密

令发出机关所在地。许多回忆文章解释这一举动的原因有二：一是，他认为自己是无辜的，要向有关领导同志面陈理由，希望能制止这场错误的肃反运动。二是，为了不使党分裂，不使红军自相残杀，不给敌人以可乘之机，竭力避免冲突，维护党的利益和团结。党中央到达陕北后，迅速制止纠正了这场错误肃反，并在11月底召开了平反会。会上，宣读了《西北中央局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宣布刘志丹等同志是无罪的，立即释放，分配工作。不少受害同志发言，情绪非常激动。刘志丹也讲了话。关于这个讲话的内容，李维汉回忆道：刘志丹说：“这次肃反是错误的，我们相信中央会弄清问题，正确处理的。我们也相信犯错误的同志会认识错误，改正错误，团结在中央周围一道奋斗。”^⑧参加会议的杨和亭回忆说刘志丹讲了三点：“一、同志们受了委屈，现在党中央正确地处理了这些事情，弄清了问题，大家应该高兴；二、中央领导全国，大家都要顾全大局，团结一致，共同对敌，我们要拥护党中央的决定；三、有些同志现在身体不好，要休息，要很好地学习马列主义。”^⑨对这次肃反事件，刘志丹认为“这是在错误路线影响下当地党组织犯的错误，应当吸取教训”。^⑩对搞肃反的主要负责人，刘志丹表示：“当时中央派来的同志（指中央驻北方代表派驻西北代表团）不了解情况，我对他们本人没有什么意见。”^⑪对蒙受不白之冤的同志，刘志丹告诫大家：“党内的历史问题不必性急，要忠诚为党工作，让党在实际行动鉴定每个党员。”^⑫在当时复杂的情况下，刘志丹能做到这一点，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对刘志丹来说，如何处理与红二十五军的关系，也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其一，由于历史的原因，党内和红军存在的“山

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毛泽东说：“山头主义是中国社会的产物，是中国革命特殊情形的产物，应该承认这个东西。”^④其二，在那场错误的肃反事件中，红二十五军的部分主要负责同志的确也扮演了很不光彩的角色，至少在客观上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这二者从一开始就纠缠在一起并很快地表现出来。1935年9月16日，红二十五军冲破敌人重重封锁来到延川永坪镇，同红二十六、二十七军胜利会师。这是红军长征到达陕北的第一支部队。为了欢迎二十五军的到来，刘志丹亲自起草了《欢迎红二十五军的指令》，并派陕甘边苏维埃主席习仲勋、陕甘边军事委员会主席刘景范前往保安豹子川热情迎接。会师后，在永坪镇召开了中共西北工委和中共鄂豫陕省委联席会议，决定撤销西北工委和鄂豫陕省委，成立陕甘晋省委，并改组原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这次组织变动，刘志丹作为一方主要领导人被排斥在了新的省委和军委之外，显然是不公正的。永坪联席会议之后，便发生了从小到大、先地方后军队的肃反事件，直到10月2日劳山战役之后刘志丹等一批同志被投入监狱。这个事件极大地伤害了红二十六军指战员的感情，也伤害了两军的合作与团结。12月31日，毛泽东、周恩来联名致电彭德怀、徐海东等人：要求“对红二十五军指战员进行一次普遍而深刻的教育，使他们对地方、对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务必发生良好关系，不应以骄傲而轻视的态度批评红二十六、二十七军；对于二十六、二十七军原有干部之不安与不满应进行诚恳的解释，使十五军团全体指战员团结如一个人一样。”^⑤刘志丹也教育老部下说：“告诉原二十六军的干部，要尊重红二十五军和中央红军来的同志，他们打仗经验多，要搞好前后左右的团结，碰到复杂问题，要

多动脑子，不要急。”^{④5}如果说这番话还属于鼓励性质的，那么在东征途中与原红二十七军八十四师政委张达志的一席谈话，则表明了他对这个问题的深刻看法。刘志丹说：“要说总结经验的话，不能完全责怪外来的同志（指红二十五军）。外来的同志不了解我们西北的革命情况，也不了解我们这些人是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是左派，还是右派。要说责怪的话，主要是我们陕西党内王明路线的执行人，没有把我们西北的情况如实地向外来同志说清楚，并挺身而出制止这场肃反运动。如果他们这样做了，使外来的同志更多的了解我们，也许不至于造成这样的恶果。现在问题总算弄清楚了，总算解决了。大家不要再记前仇，应该想大局，想团结，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把革命工作做好，再不要提这回事了。”^{④6}这段话隐含着的发生陕北肃反事件的复杂性也许无法搞清楚了，但刘志丹团结为党对中国革命奠基西北作出的突出贡献却永留青史。

事实上，刘志丹还遇到的一个问题却是来自党中央。党中央及时果断制止并纠正了陕北肃反事件，使陕甘根据地转危为安，应该给予充分肯定。但是，“1935年《西北中央局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也有缺点错误。”^{④7}李维汉说：“由于左倾错误路线没有清算，陕甘边苏区的地方干部和军队干部仍然带着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所以对他们的工作的分配，特别是对一些高级干部的工作分配，一般是不公正的。”^{④8}毛泽东在“七大”口头政治报告中论述“本地干部、本地军事干部”问题时承担了责任说：“我初到陕北，开头忽视了这个问题。这个边区是高岗同志他们一手搞起来的，因为我对这个问题处理不好，所以陕北人就讲闲话。有人说，陕北人只能建立苏区，不能当红军。出这样的言论，是由于对本地一些军队处理不好。”^{④9}为了

帮助支持刚刚落脚陕北的党中央顺利地开展工作，刘志丹和毛泽东、彭德怀联名发布了《告陕甘苏区工农劳群众书》，号召陕甘苏区人民勇敢地当红军到前方来，用一切力量来保护我们的土地和自由，保卫我们的苏维埃政权。陕甘苏区人民并不知道毛泽东何许人物，但“老刘”的话却有着特殊的号召力、凝聚力。刘志丹出狱后服从了中央的组织安排：调离红二十六军，出任刚刚组建的红二十八军军长。刘志丹对平反后在党校任班主任的习仲勋说：“向受过整的同志都说说，要听从中央分配，到各自岗位上去，积极工作。后方的工作很重要，我们有了巩固的后方，前方才能打胜仗。你要带头做好地方工作。”^⑩综上所述，刘志丹的言行对党中央落脚陕北并能顺利开展各项工作，确实发挥了无法替代的特殊作用。这样的特殊作用来源于他顾全大局、相忍为党的崇高精神和党性原则。在为刘志丹的众多题词中，这是一个重要的主题词。朱德、陈云说他是“优秀的共产党员”、“共产党员的模范”。周恩来说他“很谦逊，是一个非常守纪律的党员。”^⑪毛泽东说他忠心耿耿，为党为国，是一个很好的共产党员。刘志丹像50年代的彭德怀，更像“文化大革命”中的周恩来。正是由于他们在特殊历史时期的事件面前，顾全大局，相忍为党，才保证了党的团结，保证了党的事业的发展。

注 释

⑩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刘志丹》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下同），第482页。

⑪王子宜：《记志丹同志二、三事》，黄罗斌：《具有崇高品质的领袖人物》；《刘志丹》第205、174页。

③马文瑞：《革命楷模》，冯文江：《刘志丹主持陕北特委会议》；《刘志丹》第98、299页。

④马文瑞：《革命楷模》；《刘志丹》第98页。

⑤⑫张策：《共产党人的光辉榜样》；《刘志丹》第166、163页。

⑥⑨张秀山：《裹革沙场虽死犹存，纪念先烈以启后人》，《刘志丹》第136、136页。

⑦⑩王世泰：《“九一八”前刘志丹的革命活动》，《刘志丹》第312、313页。

⑧习仲勋：《纪念刘志丹同志九十诞辰》，《刘志丹》第68页。

⑪黄罗斌：《具有崇高品质的领袖人物》，《刘志丹》第174页。

⑬⑳⑤⑩习仲勋：《群众领袖，民族英雄》，《人民日报》1979年10月16日。

⑭张邦英：《永远活在人民心里》，《刘志丹》第197页。

⑮刘志丹碑文，《刘志丹》第477页。

⑯⑳㉑㉒㉓㉔《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65、365、297、253、343页。

⑰房成祥主编：《陕甘宁边区革命史》，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5页。

⑱⑲《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92、295页。

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毛泽东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73、476、476、477、482、483、488、490、493、499、499、498、501页。

㉠㉡高朗亭：《谢觉哉同志谈刘志丹》，《刘志丹》第74、74页。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4月第1版（上册）第372、373页。

㉥杨和亭：《中央为他平了反》，《刘志丹》第388页。

㉦㉧宋任穷：《刘志丹同志在红二十八军》，《刘志丹》第88、88页。

④②王世泰：《耿耿丹心照千秋》，《刘志丹》第 121 页。

④⑤刘懋功：《怀念伟大的革命家、军事家刘志丹》，《刘志丹》第 223 页。

④⑥张达志：《怀念刘志丹同志》，《刘志丹》189 页。

⑤①周恩来：1970 年 3 月 26 日接见延安地区插队青年工作座谈会代表的讲话，《刘志丹》第 2 页。

（作者：延安大学教授）

毛泽东与延安精神

——纪念毛泽东诞辰 110 周年

马广荣 惠 宁

延安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延安时期培育和形成的革命精神，是中华民族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的历史体现。毛泽东是延安精神的培育者和实践者，他科学地提炼了延安精神的实质，概括了延安精神的内容，身体力行了延安精神，为延安精神的形成、发展和光大做出了杰出贡献。

确立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坚定不移地进行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建立崭新的人民共和国，是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的奋斗目标，也是惟一正确的政治方向，是延安精神的政治灵魂。1938年6月，毛泽东在为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题词中指出：“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用以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设新中国。”1939年5月1日，毛泽东在《国民精神总动员的政治方向》一文中讲道：“我们民族历来有一种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要把它发扬起来。……共产党历来更提倡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这种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是与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是不能脱离

的，没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就不能激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没有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也就不能执行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并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确定为抗大的教育方针。毛泽东始终认为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他强调青年应该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1942年12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高干会上所作的《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报告中明确指出：“延安县同志们们的精神完全是布尔什维克的精神。”

如何走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毛泽东认为只有面向实践、面向社会、面向人民，才能找到新的起点，确立新的方向，摄入新的力量。他号召延安青年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向实践学习，“拜人民为师”，把知识和劳动结合起来。他两次把长子毛岸英送进“劳动大学”，与农民同吃同住，深入了解中国社会。正是在延安这座革命的熔炉里，在毛泽东的关怀、教导下，青年们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争中，树立起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制度的信念，使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成为延安精神的政治灵魂。

倡导了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

毛泽东一贯倡导的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是延安精神的精髓。1936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论证了战争问题的实事求是。1938年10月，他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使用了“实事求是”的概念，提出科学的态度就是“实事求是”，并要求共产党员做实事求是的模范。在《共产党人发刊词》（1939年10月）和《改造我们的学习》（1941年5月）两文中，对“实事

求是”作了最完备的论述和科学的解释。他说：“实事求是”，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区内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为了强调“实事求是”这一思想，毛泽东多次作这方面的题词。1942年他给延安中央党校作了“实事求是”的题词。他还先后为“三八妇女节”作了“深入群众、不尚空谈”的题词，为受表彰的靖边县委书记书写了“实事求是，不尚空谈”八个字，给抗日军政大学书写了“不但要有革命的热情，而且要有实际精神”的训诲。1945年毛泽东为党的“七大”纪念册作了“实事求是，力戒空谈”的题词，号召全党实事求是地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毛泽东认为，实事求是是一种科学精神，是无产阶级最尖锐最有效的武器，共产党人不靠吓人吃饭，而是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吃饭，靠实事求是吃饭。

为了在党内形成实事求是的好风气，毛泽东亲自领导了延安整风运动。毛泽东认为，党内的教条主义不消除，就无法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为此，毛泽东率先垂范，他一边利用一切机会搜集马列书籍，发愤攻读，一边又引导全党以马列主义理论为指导，研究中国历史和现状，总结中国革命经验，毛泽东十分注重调查研究，无论走到哪里，都同人民群众密切交谈，了解实际情况，形成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在思想理论上达到了空前的统一，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使实事求是成为延安精神的精髓。

树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根本宗旨，是我党从事一切革命事业的出发点和归宿，是延安精神的核心。井冈山时期，毛泽东为工农革命军制定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从头到尾体现了共产党人的人民利益观。到延安时期，我们党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响亮的口号提出来。1944年9月，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中指出，我们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军队“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的为人民利益工作的”。我们“不是为着少数人的或狭隘集团的利益，而是为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着全民族的利益。”他还强调：“‘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1939年12月，他在《纪念白求恩》一文中告诫人们要学好为人民服务的本领，对技术精益求精，做好本职工作。他号召大家学习白求恩“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在《论联合政府》中，毛泽东又鲜明地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组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致一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他要求所有的共产党人和革命干部“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

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

毛泽东是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他时刻关心人民的疾苦，细心倾听人民的呼声，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无论走到哪里，都身体力行这些准则。在毛泽东的号召与垂范下，全心全意为人民的思想广泛地渗透在延安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各个方面，融入中国共产党人的言行举止中，从而使延安时期的党群、干群、军民关系如同鱼水，使“为人民服务”成为延安精神的核心。

弘扬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

毛泽东一贯倡导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是延安精神的本色。他指出：“我们的方针要放在什么基点上？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叫做自力更生。我们并不孤立，全世界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国家 and 人民都是我们的朋友。但是我们强调自力更生，我们能够依靠自己的组织力量，打败中外一切反动派。”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遇到极大的经济困难时，毛泽东号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边区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其中三五九旅开垦南泥湾成为当时的模范，在他们的努力下，荒无人烟的南泥湾变成了“陕北的好江南”。1943年9月，毛泽东在视察南泥湾时说：“困难并不是不可能征服的怪物，大家动手征服它，它就低头了。大家自力更生，吃的、穿的、用的都有了。目前我们没有外援，假定将来有了外援，也还是以自力更生为主。”

在大生产运动中，毛泽东以身作则，身先士卒，处处以自己的模范行为给全体军民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他在杨家岭的河边开出了一块菜地，种上了辣椒、西红柿、土豆、白菜等。一

有空余时间，就在地里锄草、施肥、浇水，年年获得丰硕的果实。毛泽东穿着缝有补丁的衣服，住在土窑洞里，但这丝毫不影响他的光辉形象，人民群众更加崇敬这位生活朴素的伟人。在毛泽东的影响和带动下，延安军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他们一手拿枪，一手拿锄头，发展了生产，基本实现了粮食、棉布等日用品的自给，克服了困难，创造了人间奇迹，使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成为延安精神的基本特色。

建国后，毛泽东十分重视发扬延安精神。1949年10月，他在给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人民的复电中，号召“全国一切革命工作人员永远保持过去十余年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工作人员中所具有的艰苦奋斗的作风”。1951年，他又给革命老根据地人民题词：“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1957年，他再次号召全党同志“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在毛泽东的指引下，延安精神得以继续发扬光大。

总之，延安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在特定历史环境下培育和创造的一种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再现。我们要继承延安精神的根本宗旨，大力发扬延安精神的本色，不断为延安精神增添新的时代内容。这对于我们今天弘扬与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促进两个文明建设，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大的意义。

（作者：延安大学副教授）

延安时期王明挑战毛泽东领袖地位始末

巴志鹏

一、六届四中全会后，王明登上权力之巅

王明，又名陈绍禹，安徽金寨人。1925年秋被党组织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校期间，王明读了一些马列主义书籍，并深受校长米夫的器重。1929年4月王明从莫斯科回到上海，先后在沪西区委、沪东区委、《红旗》报编辑部、中央宣传部、全国总工会等部门工作。

1929年到1930年，国内和国际的政治形势都发生了一些有利于革命的变化。这时，党中央的一些领导人鉴于形势的变化并受共产国际的左倾指导思想的影响，头脑开始发热。他们无视当时国内和国际革命力量仍然相对弱小的基本情况，片面夸大形势对革命有利的一面，逐渐形成了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给革命带来严重的危害。六届三中全会以后，李立三离开了中央领导岗位。在瞿秋白、周恩来领导下，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的错误在实际工作中逐步得到纠正。但共产国际不久就对李立三等所犯的错误的性质估计有了变化，对瞿秋白等新的中共中央领导人不满。共产国际执委会于1930年10月末向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的信》，把李立三的左倾错误说成是同共产国际路线根本对立的路线错

误，并不点名地批评了中共主持六届三中全会的同志抹杀国际路线和立三路线的原则区别，犯了“调和主义”错误。王明在10月底通过其他留俄归国学生的渠道预先知道了这一信件的内容，乘机打着“拥护国际路线”、“反对立三路线”、“反对调和主义”的旗号反对六届三中全会及其后的中央。

1931年1月7日，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秘密召开。在共产国际代表、王明的恩师米夫的大力支持下，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王明在会上一跃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尽管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是工人出身的向忠发，但他不具有领导才能。因此，六届四中全会后，党中央的实权落在了王明手中。而王明的许多看法比李立三等的看法更“左”。他认为中国革命的动力只有工农和下层小资产阶级；他把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并列看成革命对象。他坚持城市中心论，并强调全国性的革命高潮已经到来，要在全中国范围内实行进攻路线。

1931年6月22日，向忠发在上海被捕叛变。为安全起见，王明赴苏联出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赴苏联前，经共产国际远东局提议成立了由博古负总责的临时中央政治局。

以后，受王明遥控的临时中央，继续贯彻执行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政策，最终导致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红军被迫开始了漫漫长征。

二、两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王明挑战毛泽东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决议充分肯定了毛泽东等指挥红军取得多次反

“围剿”胜利的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明确指出，博古、李德（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在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重要原因”。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毛泽东进入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一个多月后，毛泽东成为了当时党中央最重要的领导机构“三人团”成员之一，与周恩来，王稼祥一起负责指挥全军的军事行动。当时的中央由张闻天负总责，但毛泽东已逐渐成为中共中央领导的核心和领袖。远在莫斯科的王明，走下了权力的巅峰。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共两党开始第二次合作，国内的政治气氛好转。时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的王明受共产国际委派回国，贯彻共产国际的“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政策。

1937年11月29日，延安东关机场布满了岗哨。毛泽东、张闻天、朱德、周恩来等人亲临机场欢迎从莫斯科归来的王明及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康生、陈云、曾山等人。轰鸣的飞机在机场上空盘旋几周后稳稳降落，王明——一位身材不高，三十多岁，眉目清秀的男子，和他的夫人孟庆树以及康生、陈云等人走下飞机。早已在机场等候多时的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立即迎上去和王明等人一一握手。毛泽东在机场致热情洋溢的欢迎辞：“欢迎从昆仑山下来的‘神仙’，欢迎我们敬爱的国际朋友，欢迎从苏联回来的同志们。你们回到延安是一件大事，这就叫做‘喜从天降’。”就连王明本人后来也赋诗抒怀：

国际连番命启程，
日船静悄四人行；
六年中外风云变，

蒋请苏机万众迎。

由此可见当时欢迎场面之热烈。

王明等回到延安的当天晚上，毛泽东即设宴款待王明、康生。以后又召开欢迎大会，毛泽东、张闻天主持欢迎大会。王明、张闻天和毛泽东都讲了话。此时的毛泽东对王明并无成见，甚至是抱有好感的。毛泽东在欢迎会上讲得很热烈、很兴奋。应该说明王明回到延安后，中共中央、毛泽东真诚地期望他能同心同德，与其他中央领导一起工作。然而，王明却俨然像捧着尚方宝剑的钦差大臣，在欢迎会上的讲话即蕴含了对毛泽东的党内政策和国内政策的谨慎的批评。

王明久居国外，对中国革命的实际不甚了解，年纪轻轻，经验不足，爱放高论，又缺乏贯彻其主张的能力与方法。回国不几天，其表演便让许多人感到有些不安。

王明回国时，各地政治局委员大多已齐集延安。为贯彻自己的主张，王明提议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

1937年12月9日晚，延安寒冷彻骨。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延安城内凤凰山麓的一个窑洞里召开会议。与会政治局委员有张闻天、毛泽东、王明、康生、陈云、周恩来、博古、林伯渠、彭德怀、凯丰、刘少奇、项英、张国焘等13人。史称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会上，王明按照共产国际的基本态度在会上作了《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的长篇报告。报告在坚持联合国民党抗战问题上发表了一些正确意见，但在如何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提出了较系统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主张。他对抗战以来党的方针、政策提出许多批评，且很多都是针对毛泽东的。他强调“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要“承认国民党和领导的优势的力量”；他认为对

敌斗争的主要形式是运动战；他不赞成毛泽东关于国民党营垒有左、中、右三种不同势力的提法；针对毛泽东提出的统一战线内无产阶级的领导权问题，王明认为不应该说谁领导谁，而是国共“共同负责，共同领导”。王明回国前受到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接见，因此声称自己传达的是共产国际的指示。而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当时在中共党内威望很高，这使得许多参加会议的人一时不能明辨是非，产生了盲目的信赖。另外，有一些军事将领和中央负责人希望和日军打大仗打硬仗，主张把运动战和游击战结合起来，配合国民党军队打几个大胜仗以鼓舞士气民心。王明的报告恰恰满足了这些同志的意见。不少同志根据王明提出的观点，其中很多是错误的或片面的观点，检查总结过去统一战线工作中的得失，承认过去有“狭隘观”和“不策略”的地方。毛泽东后来多次回忆说“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他本人是孤立的。

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不得不对独立自主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国民党营垒左、中、右的不同倾向，国共两党谁吸引谁，群众救亡运动中的迁就主义，统一战线中的“和与争”的对立统一，改造政府和改造军队的重要性等问题，作了辩白和进一步的解释。

毛泽东指出，在统一战线中，如果没有共产党的独立性，便会使共产党降低到国民党方面了。国民党与共产党谁吸引谁这个问题是客观存在的，不是说要把国民党吸引到共产党，而是说要国民党接受共产党的影响。在统一战线中“和”与“争”是对立的统一。共产党若无独立性，何异于国民党？蒋介石有抗日和反共的两面性，我们对蒋要采取陕北人赶毛驴的办法，一拉、二推、三打。八路军与游击队应和国民党军队政

治上有区别。我们也有必要反击国民党对八路军的侮辱、破坏。八路军的战略方针，应该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在有利条件下打运动战，集中优势兵力消灭敌人一部。由于毛泽东等同志的抵制，王明的错误意见没有形成会议决议。

彭德怀后来对十二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做过这样的回忆：“我认真听了毛主席和王明的讲话，相同点是抗日，不同点是如何抗法。王明讲话是以国际口吻出现的，其基本精神是抗日高于一切”，“对无产阶级在抗日民族战争中如何争取领导权的问题，他是忽视的。这就可以肯定他这条路线，是一条放弃共产党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失去无产阶级立场和投降主义的路线。”因为会议精神不一致，“回去传达就只好是毛主席是怎样讲，王明又怎样讲，让它在实践中证明吧。”^①

十二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增补王明、康生、陈云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并决定成立中共“七大”筹备委员会，由毛泽东任筹备委员会主席，王明为筹备委员会书记。尽管王明在土地革命时期犯了严重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给党的事业造成严重损失，但毛泽东与党中央对他还是比较看重的，仍给他在党内安排了很高的职务。

十二月中央政治局会议标志着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开始，并在党的领导层中产生严重影响。但会后不久王明即赴武汉任中共长江局书记，所以他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主要是在局部地区发生直接影响（对主持新四军工作的项英的严重影响就是一例）。中共中央的工作仍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党中央仍按照原来的方针领导八路军的抗日游击战争。

由于在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王明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支持，使得王明头脑发热。他过高估计了自己在党内的地位，以钦差

大臣自居，目空一切，独断专行，凌驾于毛泽东和中央书记处之上。1938年2月2日，未经毛泽东和中央书记处审阅，王明就擅自起草并发表《毛泽东先生与延安 新中华报 记者其光先生的谈话》；又如他以通知性的口吻致电延安，单独决定下一次政治局会议的议程并规定会期不超过两天。为求党中央团结统一，中央一些领导人没有立即对王明等提出批评。

1938年2月27日至3月1日，根据王明的建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再次召开会议，主要讨论抗战形势、军事战略问题以及同国民党的关系问题。出席会议的有张闻天、毛泽东、王明、周恩来、康生、凯丰、任弼时、张国焘等。在这次会议上，王明不仅继续坚持十二月会议上的错误，而且还进一步阐述自己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主张，把右倾投降主义的观点在军事上加以发展。他在发言中否认中共领导的游击战和敌后抗日根据地在抗战中的伟大作用，把抗战胜利的希望寄托在国民党军的正规战上。他盛气凌人地强调军事上服从国民党统一领导，要求建立真正统一的“国民革命军”，做到统一指挥，统一编制、统一武装、统一纪律、统一待遇、统一作战计划、统一作战行动。

毛泽东等对王明的错误观点再次予以抵制。毛泽东等人发言重申抗日战争的长期性和争取统一战线领导权的必要性，指出蒋介石怕我们发展壮大，我们在不忘记与国民党合作的同时，亦须存有戒心，需保持战略统一下的独立自主；游击战争是八路军的重要斗争形式；要建立抗日根据地等。但这次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等人的主张仍未达成共识。毛泽东感到要说服大家还需要一段时间。为了维护党的团结，他只好保留自己的意见。

会后，毛泽东的心情非常沉重。他担心党再次犯全局性的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他曾私下对李维汉说：“我们命令不出这个窑洞！”忧党之情溢于言表。

两次政治局会议上王明气势逼人，毛泽东为了党内的团结做了一些让步。缺乏实际斗争经验的王明飘飘然了，以为即将召开的中共“七大”上，党的总书记之职非他莫属了。

三、六届六中全会给王明致命一击

3月政治局会议结束后，王明回武汉写了题为《三月政治局会议的总结》（1938年3月11日）一文，在4月23日出版的《群众》周刊第19期上公开发表。他根本不重视政治局会议上其他领导人提出的一些正确意见，仍然把工作重点放在了城市和同国民党谈判上。3月21日，王明不经中共中央同意，擅自做出重大决定，起草并向国民党中央递交了《中共中央对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提议》。他的这次无视党纪的行为，受到了中央的严厉批评。1938年5月，徐州失守后，中共中央指示，华中工作的中心任务“是武装民众，准备与发动游击战争，有计划地建立几个基干游击队与游击区”，并强调要大量动员住在武汉的鄂、豫、皖三省的学生、失业工人和其他革命分子，回到乡村，领导抗日游击战争。为此目的，武汉城市工作受到部分损失亦不应顾惜。对党中央的这个指示，王明没有认真执行，仍把华中工作的重心放在大城市，不积极派人去农村开展工作，王明擅自将长江局的文件散发全党，甚至不准武汉的《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刊登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毛泽东在党内的地位变得非常微妙。

王明在统一战线中的退让迁就的言行和独断专行的作风，

引起了毛泽东、张闻天等中央领导的忧虑。政治斗争经验丰富的毛泽东心里十分清楚，王明的主张之所以能够形成决议，是因为王明是带着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指示回来的。毛泽东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他一方面尽力争取同志，尽量缩小王明夸夸其谈带来的影响，一方面派任弼时前往莫斯科汇报工作，以期让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更准确地了解中国革命的实际，从而得到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对中共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的支持，这是说服党内为王明所迷惑了的同志们的前提。

1938年3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后任弼时即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报告中国抗战和国共两党关系的情况。4月14日，任弼时代表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提出《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与任务》的书面报告大纲；5月17日，他在共产国际会议上对报告大纲作了说明。任弼时在口头说明中，对国共重新合作的特点、阻碍以及八路军在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作了较详细的解释。共产国际执委会在听取任弼时的详细汇报后，确认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认为中共在复杂的环境和困难的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列主义。1938年秋天，王稼祥从莫斯科回国。临行前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会见他和前去汇报工作的任弼时。季米特洛夫特别向他们指示：“应该承认毛泽东同志是中国革命实际斗争中产生出来的领袖，请告诉王明，不要争了吧！”这就是说，共产国际正式承认了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中的领袖地位。

1938年9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王稼祥传达了季米特洛夫的指示：共产国际认为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领导机关中要有亲密的团结的空气，抗日统一战线是中国人民抗日的关

键，而中共的团结又是统一战线的关键。

这样，王明的“尚方宝剑”就掷铛坠地了。

另外，实践也在证明着真理掌握在谁人手中。比如，刘少奇领导下的北方局坚决执行毛泽东的路线，各项工作发展很快。八路军增长了5倍，发展到了15万人。而贯彻执行了王明路线的长江局和东南分局（主要指项英），新四军只增长了1倍，发展了25000人。随着抗日战争形势的发展，王明错误路线的危害日显，一些一时为王明所迷惑的同志也不断觉悟起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逐渐得到了全党的认可。

为了尽快克服王明的右倾错误，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上决定召开六届六中全会并由王稼祥电报通知王明回延安参加六届六中全会并听取传达共产国际文件。

为了抬高自己的政治地位，王明接到通知后竟马上回电要毛泽东等全体中央领导和中央委员到武汉或西安去，在那里召开六届六中全会。并且要求王稼祥赴武汉向他单独透露共产国际讨论问题的经过和传达文件的内容，以及在莫斯科谈话的情形。王稼祥经毛泽东同意复电如下：“请按时来延安参加六届六中全会……否则一切后果由你自己负责”。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举行。会议首先由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和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重要指示。这对企图夺取中央主要领导权的王明来说，无疑是当头致命一棒。在六中全会上，毛泽东作《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这是会议的中心议题。全会通过了《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批准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从组织上肯定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会议批判了党内的统一战线问题上的关门主义和投降主义

的偏向，着重批判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迁就主义的错误主张。会议还针对在抗日战争的新环境下党内有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的人违反组织纪律等情况，通过了《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等几个组织建设方面的文件以巩固党的团结和统一。

六届六中全会撤销长江局，并决定王明留在延安工作，担任中央统战部部长，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主任等职。此时王明仍担任着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依旧是中央领导人之一。

四、毛泽东在全党领袖地位的组织形式的转战最终完成

经过一年的较量，王明输了，但思想深处并未认输，仍暗中较劲力争在全党的领袖地位。六届六中全会结束后，王明仍很活跃，到处出风头，作讲演。每每讲演时，总要抱一堆马列原著放在台上，以显自己读书多；运用革命导师的话时，总要把卷、节、页、行一一说出，然后大段背诵，“有哗众取宠之心，无实事求是之意。”但王明的这些表演，在当时还是挺迷惑人的，他的错误路线虽被终止，但就其地位和影响而言，他实际成了党内二号人物。有人甚至在公开场合喊出了“王明万岁”的口号。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发表前，到马列学院给师生作报告，反响强烈。王明也跑到马列学院讲《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以图抵消毛泽东讲演的影响。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2月在《中国文化》创刊号上发表，5月王明就再版了他六届四中全会前写的集主观主义之大成的小册子《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不

料这本小册子成了左倾错误路线的证明材料，受到刘少奇等人的激烈批评。

王明执意不对自己所犯的错误作深刻反省。在 1939 年九十月间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在发言中第一次在公开场合点了王明的名，认为“立三路线”和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倾机会主义都是主观主义，而王明反驳了毛泽东的批评。他坚持认为四中全会的政治路线也是正确的，并把自己错误的责任全部推到博古身上。王明的不实事求是的态度引起了党的领导层的强烈不满。但分歧依然存在，王明错误的最后定论有待进一步讨论。

1940 年 12 月，毛泽东起草了《论政策》的党内指示，明确指出，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的“左”的政策，不仅在抗日战争时期一概不能采用，就是在过去也是错误的。但党内对王明“左”的错误的认识仍然不一致。因此，毛泽东认为，要彻底克服教条主义，就必须解放思想，在全党范围内进行马列主义教育运动。

由毛泽东提议，全党普遍开始整风学习。1942 年 2 月 1 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发表《整顿党的作风》演说，拉开了全党整风的帷幕。

此时，病卧在床的王明却以为毛泽东号召学习、整风是与他过不去，心情懊恼，作七绝《忆牡丹》一首，以示对抗：

雍容傲骨岂凡流，
荷菊梅兰未可俦。
自是凛然争气节，
独逢乱谄不低头。

甚至赋诗谩骂，发泄不满：

名为整三风，
实为行四反；
一切为个人，
其他都不管。

（注：四反：即反马列主义、反共产国际、反苏共和苏联、反中国共产党。）

但任何谩骂都无济于事。随着整风运动的发展，全党认识逐步统一，毛泽东的威望日益升高。1943年3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做出《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推定毛泽东为政治局主席、书记处主席，规定凡重大的思想、政治、军事、政策和组织问题，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通过。书记处是根据政治局决定的方针处理日常工作的办事机关，它在组织上服从政治局，但在政治局方针下有权处理和决定一切日常性质的问题。书记处会议中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这样，毛泽东在全党的地位在组织上得以彻底确立，毛泽东在党内的权力、地位全面上升。而王明的左右倾错误也从组织上得到彻底的纠正，王明的书记处书记、南方工作委员会主任、妇女运动委员会主任等职务被解除，只保留中央委员和以刘少奇为书记的组织委员会管理之下的统战部部长之职。王明的党内地位一落千丈。

王明对毛泽东的地位上升深感不安，这位共产国际的宠儿指望着共产国际在关键时拉他一把。然而，6月10日共产国际却正式宣布解散了。不过，前共产国际负责人季米特洛夫还是以个人名义写信给毛泽东，认为“反对王明的运动在政治上是错误的”。但毛泽东不予理会，继续把对王明左倾错误的批评深入化、公开化，最终彻底排除了王明机会主义对权力的挑

战。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共“七大”在延安杨家岭召开。毛泽东当选为中央委员，毛泽东思想被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在随后召开的七届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又当选为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并被选举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兼政治局、书记处主席。至此，毛泽东在全党领导地位的组织形式及法律程序全部完成了。

“七大”召开前夕，毛泽东把六届七中全会准备讨论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三个草案都送于王明过目，并连续派人找王明谈心，劝其反省自己的错误。4月20日，王明写信给任弼时，请他阅转毛泽东并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各位同志，表示赞同这一决议，并高度赞扬了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的正确与功绩，较全面较系统地检查了自己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所犯的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但后来王明在《中共五十年》一书中说这次检讨是被迫的，并非他真心所愿）。“七大”开幕式上，病中的王明躺在担架上进入“七大”会场，出席时间大约15分钟。根据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毛泽东说服代表们将王明选进中央委员会。王明在44名中央委员中排名倒数第二，位列博古之前。毛泽东不计前嫌，宽以待人，表现出了一个政治家的博大胸怀。

注 释

①彭德怀：《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24—246页。

参考文献

- [1] 《毛泽东选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
- [2]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 [3] 郭德宏、李玲玉：《中共党史重大事件述评》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版。
- [4] 周国全、郭德宏：《王明传》，安徽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版。
- [5] 牛兴华、任学岭、高尚斌、杨延虎：《延安时代的毛泽东》，陕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 [6] 何立波、牛海蓉：《走下权力巅峰后的王明》，《中华儿女》2002年第8期。

（作者：中央党校党史部博士研究生）

延安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与建设

霍静廉

延安是党中央生活战斗了 13 个春秋的地方。在这块红色的热土上，党中央率领亿万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赶走了日本帝国主义，推翻了蒋家王朝，使中国革命的航船从黑暗走向光明，从失败走向成功，从延安走向北京。13 年的峥嵘岁月，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给延安留下了 350 多处革命遗址，仅延安市区就有 168 处，故有“革命博物馆城”之称。还留下了 5 万余件珍贵的革命文物。这些遗址和文物生动地再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为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坚忍不拔，宁死不屈，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伟大精神和崇高理想。这些遗址和文物也给延安增添了无限的风光和色彩，体现了文化名城特色和景观风貌，成为今天延安现代化城市建设的发展方向。1961 年，国务院将延安革命遗址公布为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2 年 2 月，延安进入全国第一批历史文化名城行列。1994 年中宣部又将延安列为全国十佳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三位一体的光荣称号使这座古城的文化神韵更加深邃与丰富。

延安作为第一批全国历史文化名城，是因为她曾经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是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指导中心和总后方”。这段光辉的历程使她的历史积淀得到了升华，从而受到海内外人们的崇敬。所以，保护延安的历史文化名城，重点是保护名

城的历史见证，重要的文化载体——革命旧址。这也是延安历史文化名城特色与价值。

一、党中央对延安历史文化名城的关怀和支持

延安历史文化名城的载体是革命旧址，在这些革命旧址的普通窑洞里，居住过一代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在这些窑洞里培育和锤炼了一大批抗战建国的英才。因此，延安窑洞是中国革命的历史见证，是延安精神的源泉。党和国家领导人一直对延安给予极大关怀和支持。延安革命纪念馆是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怀下成立的。它的主要任务就是保护管理好延安的革命旧址、研究宣传老一辈革命家在延安的丰功伟绩。从1953年到1959年，战争的创伤还没有完全恢复，国家还处于十分困难时，党中央和陕西省就拨款60万元，先后将枣园、杨家岭、王家坪、凤凰山等革命旧址群修复开放。这使延安的革命旧址在较短的时间里得到了有效保护。接着，文化部、省政府又陆续拨款把被国民党破坏的大批革命旧址，进行了抢救性维修。1964年7月7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延安革命纪念馆赴京汇报延安革命旧址陈列方案的全体同志，体现了主席对延安革命旧址保护与宣传的关心。1966年3月4日至6日，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和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来延安视察工作，参观了延安革命纪念馆和革命旧址，对延安革命纪念地的建设和保护做出了重要指示。1989年，江泽民总书记上任还不到三个月就来延安视察，参观了延安革命纪念馆和革命旧址，对延安革命纪念馆陈列的文物和革命旧址保护给予了较高的评价。1992年5月，国务委员李铁映带领国家有关部委负责人专程到延安视察、研究延安革命旧址保护和纪念地建设问

题，并拨款对枣园、杨家岭、瓦窑堡革命旧址和“四八”烈士陵园进行了抢救性维修。1995年，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吴阶平来延视察，回京后就延安革命旧址保护与城市现代化建设问题给江泽民总书记写了一封信，江总书记批示：“正确处理现代化建设与保护古迹及革命纪念地的关系。”并派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率两部一局（建设部、林业部、文物局）考察延安纪念地保护与建设，做出了延安历史文化名城、革命纪念地保护与建设的初步方案。9月，国务委员李铁映再次率有关部委负责人调查落实江总书记的批示。深入细致地论证了延安历史文化名城及革命纪念地保护与建设中的20个项目，并落实了部分资金。这种总书记亲自批示和众多部委共同参加考察的办公会，在全国纪念地实属首次，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延安历史文化名城、革命纪念地的保护与建设的极大关心和支持。陕西省的领导也多次在延安召开革命旧址保护与建设的现场办公会，帮助解决旧址保护中的具体困难。全国各地的广大干部群众也积极给延安献计献策，表现了对延安的关注。延安受到各级政府和全国人民的关爱，正是这种关爱，使延安革命旧址得到较好的保护，始终保持了历史风貌。

二、延安对名城的保护与建设做出不懈的努力

党中央的亲切关怀和大力支持，深深地感动和鼓舞了延安的历届领导和广大群众。他们以老一辈革命家为光辉榜样，把保护与建设好延安历史文化名城及革命纪念地为己任，正确处理了现代化城市建设与名城保护的关系，城市建筑风格与革命旧址环境相协调的关系，为延安名城的保护与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

1. 领导重视，组织健全，严格把关

延安位于黄土高原的群山沟壑中，地域狭窄，城市建设可利用面积较小，而最主要的革命旧址和部分古迹也大多集中在市区内，现代化城市建设与革命旧址、古迹的保护时有矛盾发生。特别是较大规模的建设项目，与革命旧址、古迹争土地、争资金、争环境、争建筑风格的现象非常突出。时常也有人埋怨说，要搞现代化城市建设就不能保护革命旧址和古迹，否则，无法建设。也有人建议只保护国家级重要旧址和具有代表意义的古迹，其余一律纳入城市建设。还有人建议将革命旧址进行搬迁，集中于一地，腾出地方进行城市建设。还有人认为，现代化城市建设，就是高楼林立，大规模的建筑群、大体量建筑物，保护古旧建筑是守旧落后的表现。对于种种议论，延安的历届领导冷静思考，慎重从事。他们采取认真调查研究，广泛听取各方意见的办法，集大众所智，汇专家所议，正确地做出了合乎民心的决策。延安的城市建设必须坚持四个有利于，即：是否有利于历史文化名城和革命纪念地的保护；是否有利于发挥三大教育基地的作用；是否有利于把延安建成陕北经济文化中心；是否有利于延安经济的长远发展。较好地把握了在建设保护好名城，在保护中求得发展的基本原则，使一些盲目冒进的意见得以纠正，从思想上取得保护与建设的统一。有了政策和原则，还需一定的组织做保障，设立专门的机构和组织，让名城的保护和建设，事事有人管，件件有人抓。1997年在中央、省、市领导的关心下，延安成立了革命纪念地管理局，专门负责延安革命纪念地的保护与建设。1998年还成立了由主管市长任主任，文物、城建、规划、财政、工商、公安等有关部门主要领导任委员的延安市文物管理委员

会，不定期地听取有关部门汇报，专题研究城市建设与名城保护的问题，使一些不利于名城和革命旧址保护的项目，与革命纪念地不协调的项目及时纠正解决。例如：1989年曾提出在延安革命纪念馆右侧建立窑洞宾馆的项目，1995年提出在凤凰山革命旧址院外建设变电站的项目，在陕甘宁边区政府旧址院内建政府大楼的项目，都在领导重视和有关部门的审议中取消。50年来，延安基本没有发生大的城市建设破坏革命旧址或古迹的问题，为弘扬延安精神保留了重要的历史见证。

2. 动员社会，分类定级，分层管理

保护历史文化名城是一个艰巨、复杂、长期的工作，稍有疏漏就会造成破坏和改变历史文物古迹风貌的可能。延安的革命旧址和古迹大多集中于市中心，延安方圆40公里的市区内就有168处，量大面宽且分散。单纯地依靠政府，做到旧址保护完整，环境美观，周边建筑协调是非常艰难的。168处旧址、古迹周边有上千户个人和几百个单位，一段时间，今天这里蚕食了旧址，明天发生了乱修乱建，后天那里又出现了违章建设，文物部门频于奔忙，收效甚微。革命旧址和古迹周边的保护一度成了政府和文物部门十分头疼和棘手的事情。周边界线纠纷越来越多，官司也越打越大，涉及财力、人力问题和掌握政策，依法办事问题。为了加强历史文化名城和革命旧址的管理，卓有成效地治理周边环境，1998年延安市政府颁布了《延安革命旧址保护管理暂行办法》，依法加强对革命旧址保护与建设，并采取动员社会各界实行区别情况，突出重点，分类定级，分层管理的原则，将全市350余处革命旧址和古迹分为四个级别，即国家级、省级、县级、乡级。已公布为国家级和省级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由市、县文物部门全权负责，设立专门

机构，严格管护，定期汇报，不定期巡查。县级文物保护单位，由县文化、文物部门负责，专人管理，定期检查。乡级文物保护单位由乡文化站负责，指定专人管理。对一些与行业、部门有关联的重要旧址，如清凉山新闻出版革命旧址、边区银行旧址、南区供销社旧址，则交由其对口单位保护管理，并建立纪念馆和教育基地；对地理位置较偏远，参观游客较少，至今被非文物单位占用的革命旧址，如陕甘宁边区交际处、西北局、边区政府、边区参议会、六届六中全会旧址等，通过与使用单位签订保护、使用合同，由占用单位负责管护；对一些当年影响较大，但因建筑物已坍塌无法修复利用或修复难度大的革命旧址，如民族学院、民众剧团等革命旧址，则建立健全档案资料，树立永久性纪念碑，以告慰先辈，昭示后人。还有一些地处偏远但保存较完整的革命旧址，设立村民保护小组，指定专人管护，发现问题及时纠正或汇报，做到革命旧址和文物古迹层层有人抓，处处有人管，职责明确，落实到人。在宣传《延安革命旧址保护管理暂行办法》的同时，将重要旧址保护范围、四址界线，一般保护区域的建设标准，控制地段的建筑风格，层高、体量都宣传得清清楚楚，让周边的单位和个人明确职责，清楚界线，掌握建设要求，自觉维护革命旧址，提高保护历史文化名城意识。这样，既动员了社会各界的力量，又使签约单位和个人，感到责任重大，法规不容，自觉地承担起保护和建设任务，使多起违章建设和不协调建设消除在萌芽时期，避免了人力、财力的浪费。这也是延安创立的一条独特的保护革命旧址和古迹的有效途径，取得良好的效果。

3. 统一规划，精心设计，确保名城遗存

制定科学的城市规划，优化城市发展空间结构，是处理好

名城保护与建设关系，用足用好城市土地的必由之路。一个好的城市规划可以使这座城市的文化底蕴得到升华，成为凝聚这座城市的精神力量。为把延安建成昔日文明和当代成就及大自然之美融为一体的现代化城市，延安市的领导对延安的规划十分重视，特邀陕西省规划院协助规划。1996年政府组织规划、文物部门重新修编了延安市城市总体规划大纲。明确指出：要把延安历史文化名城和革命纪念地保护纳入城市统一规划。在规划与设计过程中，必须做到四高、四大、六到位。四高：高起点、高标准、高水平、高速度。四大：采用大手笔、绘制大延安、实行大保护、开展大建设。六到位：观念到位、规划到位、投入到位、保护到位、建设到位、管理到位。观念要有高度，规划要有深度，投入要有强度，保护要有精度，建设要有速度，管理要有力度，六度合一。让革命圣地延安和现代化延安融为一体，交相辉映，既显示了现代文明的崭新风貌，又保留历史文化的奇光异彩。1997年6月，《延安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经国家正式批准，确定将延安建设成革命圣地，历史文化名城，三大教育基地和陕北经济中心。明确了纪念地保护与建设的指导思想、控制范围，确立了重点保护对象，按照“点、线、片、面”相结合的原则，进行保护与建设。点：是指在延安168处革命旧址和古迹中选出15个重点保护景点，如枣园、杨家岭、王家坪、凤凰山、边区政府旧址和宝塔山、清凉山等。线：将党中央在延安时期最繁华的商业街区市场沟和二道街两个地段，进行专线保护与建设。片：延安西北川，从王家坪至枣园约5平方公里的面积，集中约18处革命旧址，原则上保持田园风光的自然景色。面：将延安原古城约8.5公顷面积的完整城市格局和部分传统街区，从总体上全面保护。

点、线、片、面相结合的保护与建设方法，基本将延安历史风貌全部包括在内。在点、线、片、面范围的建设风格，以传统形式为主，选用当地用材为外装饰，严格控制高层建筑，体现革命圣地的气氛和环境。另将东关至桥儿沟，辟为开发区，以现代化的建筑风格为主，可选用新型外装饰，体现现代化的延安，并对革命旧址和古迹的周边及一般保护区的建设进行详细的规划设计，公布于世，让家喻户晓，人人皆知。这一规划特色鲜明、布局合理，是一个较符合延安人民心声的科学规划。这一规划绘制了新延安的宏伟蓝图，将历史神韵和现代科技及自然风光有机地融为一体，有机关联，相得益彰，使延安的保护与建设有章可循，有法可依，有图可遵。这是保护和建设好延安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步骤。

4. 强化措施，加大力度，确保保护与建设的统一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建设的规模越来越大，各革命旧址、历史地段和古迹周边的建设，也时常出现一些乱修乱建等不良现象。强化措施，加大力度，确保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与建设已刻不容缓。延安市政府立即颁布了《延安革命旧址保护管理暂行办法》，第十六条：革命旧址重点保护区不得建造与旧址无关的建筑物、构筑物，不得搭建各种临时设施，堆放建筑材料。已经建造的应当依照文物法律法规，限期拆除、迁出或改造。第十七条：革命旧址重点保护区不得随意设立经营摊点……第三十一条：违反本办法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规定，进行违法建设的由文物行政管理部门或城市建设管理部门责令停工和拆除违章建筑，恢复原状，并根据情节轻重，由市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处以2万元以下罚款。城市监察大队也调动精兵强将集中整治城市和旧址周边环境。1995年政府领导

还采取分片包干、责任到人的方法，限期按要求进行多方面治理旧址周围环境。1995年枣园村部分村民借口有人支持，在枣园革命旧址绝对保护区强行修建6孔石窑，作为旅游开发地。纪念馆、文物局、监察大队多次阻挡却置之不理，并扬言谁敢阻挡，与谁拼命。市委、市政府立即召开紧急会议，责成规划、城建、文物、工商、公安组成联合小组，坚决予以拆除。这一行动有力地遏制了一些准备在旧址周围乱修乱建的苗头。借此东风，联合小组又对所有旧址和古迹的周边环境大清理，先后拆除了桥儿沟鲁艺旧址、凤凰山、王家坪旧址周围的40余座违章建筑，取缔了枣园旧址《为人民服务》讲话台旁的碎石场，凤凰山上的垃圾台；清理了王家坪旧址外的9个木材市场，废品收购站，汽车修理厂。并对周边环境进行了绿化美化，使旧址的周边环境有了巨大改变，群众满意，观众称赞。

旧址周边环境治理是一个长期性的工作。为使此项工作坚持不懈地进行下去，市政府要求城建、规划、土地部门严格控制旧址、古迹周边建设的报批手续，加大执法力度。在革命旧址、文物古迹周围的一切设点摆摊、在一般保护区和建设控制区的建设项目、风格、层高必须经文物部门审核同意后方可报建，否则按违章办理。通过报建程序规范行政行为，摒弃了建设中的随意性和盲目性，有力地促进了旧址和古迹周边建筑风貌的协调统一，维护了名城的风貌。

文物部门也加强检查监督，凡经文物部门同意的建设项目，做到事前调查，事中检查，事后勘验。从组织和规章制度上给予文化名城和革命旧址以有力保障，促进了名城的保护与建设沿着科学、健康的轨道前进。

三、对延安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建设的建议

延安是中外驰名的革命圣地。50年来，党中央和全国人民给了延安巨大资助与关心，在新的历史时期，延安要利用好名城的文化资源，让革命遗迹成为延安经济发展的一个新的增长点。这就需要保护、利用、发挥好名城效应。

1. 保护、建设、利用和发挥名城效应

延安历史文化名城在各级政府和人民的精心呵护下，经过50年的不懈努力，取得了一定成果。名城基本维护了历史风貌，但在保护与建设和利用方面不尽完善，既有忽略了建设也是保护，也有忽略了保护就是为了利用的现象。保护历史文化名城，是保护它历史建筑风格，保护历史原貌和文化底蕴，不是几十年不修缮，破旧不堪，到处残砖烂瓦就叫保护。特别是一些历史地段，建设面积比较大，更应注重保护中的建设。在按照历史的体量、风格建设的同时注入现代的生机和活力，使历史风采依旧，现代技术耳目一新。保护的目的是为了利用。文物保护的原则就是“有效保护、合理利用、加强管理”。在保护中加快建设速度。建设也是保护，在保护中加以利用，让遗址为当代社会服务。延安的革命旧址较多，过去我们对革命旧址除陈列对外开放外，再不敢挪作他用，使旧址显得呆板、沉重，没有生机。近几年，随着观众需要，群众的要求，将旧址内一些未开放的旧址进行彻底的维修，利用其举办专题展览，丰富陈列内容，开办旅游商点，方便了游客，服务了观众。使旧址内虽未增加建筑却达到服务周到、项目齐全，这是对旧址内闲置建筑的合理利用。我们对历史地段，保护专线还可采取大保护、广利用、强管理的办法将旧址周围的一些辅助

建筑恢复起来，建设一新，让其“古为今用”。如杨家岭旧址中央花园的修复利用。杨家岭中央花园位于杨家岭以南的300米处，靠近公路，占地约15亩，它本是杨家岭旧址的一个组成部分，现有大片的柏树、花木，因参观不方便，已闲置30年。我们认为，延安至今还没有一个像样的公园，将中央花园按原建筑风格恢复开放，既保护了旧址又增加了杨家岭旧址景区，还可供延安人民休闲消遣，一举两得。其次，延安市场沟原南市商业街的开发利用。新市场是党中央在延安时期极其繁华的商业中心，从沟口到边区银行纪念馆约1.5华里处，就有46个合作社、商店、食堂、供给部，真是鳞次栉比，蔚为壮观，至今沟口还有林伯渠主席的亲笔题字“南市”二字，毛泽东应邀题写的对联：“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边区是民主的抗日根据地；反对投降，反对分裂，反对倒退，人民有充分的救国自由权。”现既然将这条街按历史原貌保护，并恢复了大众合作社、妇女工作社、部分街区，那么就应将这一条街按历史本来面目全部恢复建设起来，让历史的繁华在今天重演，为当今的社会服务，发挥其经济效益。市场沟位于市中心，又不是中心点，地理位置好，文化底蕴深，文物资源丰富，商业潜力大，将这里恢复开放后，就像上海的虹口多伦路文化名人一条街、杭州的宋城一样，既是革命旧址的旅游景点，又是商贸中心，吃、喝、游、购都可以在这条街上体现，是延安极具潜力的保护建设开发区。应尽快恢复原貌，统筹建设开发利用，给延安旅游长足发展奠定基础。

2. 动员社会，加大旧址投资建设的力度

现在革命旧址的保护是以国家为主，社会各界赞助为辅。这只能保证省级以上革命旧址的维护和建设，大多数的革命旧

址还无法顾及。延安市财政较紧缺，政府的投资极为有限。我们应解放思想，大胆创新，动员社会各界人士来投资，加大旧址周边环境建设的投资力度，提高建设速度，恢复旧址精度，让其为现代化服务。例如，新市场商业街历史阶段的恢复和建设，可以采取个人投资，政府统一规划，统一建设，统一管理，根据投资大小，谁投资，谁保护，谁利用，由政府 and 文物部门与投资者签订合同书，使用达一定年限，将其收回政府或文物部门统一管理。这样，解决了资金不足，加快了建设，繁荣了经济。在二道街，西北川田园风格建设中也可以采取此方法。这也是加大延安文化名城保护与建设的有效途径。

3. 理顺体制，加强名城和文物管理

加强管理是保护历史文化名城的永恒课题，管理到位就能促进保护与建设，就能加快繁荣经济的速度。延安市 23 个革命旧址、古迹、自然景观开放点中，延安市区内有 13 个，却分 7 个行业，9 个单位管理，有银行、供销、报社、绿化、旅游、文化、文物，行业跨度大，非文物部门管理占 60%。尽管各管理行业和部门为延安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与建设做了不少工作，但在周边治理、环境建设、宣传接待等方面仍有着不同程度的差距。各自为阵、互不联系，致使延安市区 13 个开放点实际观众重点参观的仅 6 处。这不仅是人力、财力、物力的浪费，更是一种资源浪费，以至于造成延安的传统教育、观光旅游形不成气候，留不住人，观众是头一天来，当晚就走，达不到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建议相关部门应尽快理顺文物管理体制，将非文物部门的开放景点，采取双重领导，行政由各对口单位实行管理，业务归文物部门管理。文物部门可根据全市规划，对全市各旧址、古迹的周边治理，绿

化、建设、保护、宣传、接待实行统一规划、统一治理、统一建设、统一开发利用，整体推出加大宣传。用丰富的内涵感染人，美好的环境吸引人，独特的风格影响人，热情周到的服务温暖人，快捷便利的条件带动人，加快延安旅游发展步伐。

4. 发挥文物管理委员会的职能

充分发挥专家在历史文物名城保护与建设中的积极作用，提高行政行为的科学性。延安虽已成立了文物管理委员会，也发挥了一定作用，但专家的面还不够宽，行政参与人员比例较大，应充实城建、考古、环保、历史等方面的专家。组成延安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委员会，研究总结名城保护与建设的经验，协助审查名城保护规划和重要项目的建设方案、监督检查保护规划的实施和有关法规的执行情况，积极进言献策，为政府决策，提出有价值的政策意见和科学考证意见，进一步提高名城保护和建设的科学水平。这是名城保护、建设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职能部门。

5. 加大文物部门的执法权力

文物部门是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建设的忠实卫士，它的工作好坏，直接影响着名城保护与建设。《延安革命旧址保护管理暂行办法》第三十条、三十一条、三十二条、三十三条都规定，违反此办法，文物行政管理部门责令赔偿损失并处以罚款。但实际上，文物部门只有宣传文物法，宣传管理办法的义务，没有执行操作权力，遇到棘手问题，只有向执法部门求援，从而造成执法不及时、不严、不力等现象。希望政府给文物部门一些实际操作的权力，以保证管理办法的贯彻执行。

6. 加大名城宣传，争取各界人士的支持

建设与保护历史文化名城，是全社会的事，应将名城的具

体规划与建设进行广泛的宣传，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这样，才能唤起人们对名城的保护意识，使各行各业都将保护名城、建设名城、奉献名城为己任，达到保护名城，人人有责的目的。为此，对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区域，建设风貌，发展规划要利用电视、报纸、广播、宣传牌、陈列展览会议、散发宣传资料等多种途径广泛宣传，让《文物法》、《城市规划法》、《名城保护规划》等深入人心，妇孺皆知，逐步提高全民的名城意识。人人成为名城的建设者、监督员，使名城严格按照规划实施。

延安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和建设，也是延安现代化城市建设的主要内容，是城市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我们要珍惜延安所拥有的大量的极其宝贵的文化遗产，按照严格保护、统一管理、合理开发、永久利用的原则，保护、建设、利用、管理好延安。

过去的成绩，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今后的工作还任重而道远，还需要我们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针，继续解放思想，加快延安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建设和开发利用，让独具魅力的革命圣地延安和现代文明的延安，交相辉映，相得益彰。

（作者：延安革命纪念馆副馆长、研究员）

共产国际十位主要 来华代表的最后归宿

孙麦才 孙凌云

在中国革命过程中，共产国际曾先后派遣了许多代表和顾问，实施它对中国革命的指导。在来华的国际代表中，与中国革命关系较深的主要有 10 位。他们离华后，由于各种复杂的政治原因，其最后归宿是很不一样的。

一、离华后，曾做过有益于中国革命工作的有 1 人

维经斯基，1920 年 2 月来华，是共产国际派遣到中国的第一位使者。他对中国革命的主要贡献是帮助了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但维经斯基在中国大革命时期支持陈独秀，犯有右倾错误。大革命失败后，维经斯基调回苏联，从此脱离了共产国际的日常工作。

维经斯基离华后，仍然关注、同情和支持中国革命，为中国革命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九一八”事变和“七七”事变以后，维经斯基先后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声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维经斯基为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而欢呼。他一生撰写的几百篇学术论文和政治文章，对研究中国革命和东方革命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在共产国际代表中，维经斯基是极少数没有受到共产国际、联共（布）党内政治斗争冲

击的人之一。1953年，维经斯基在莫斯科病逝，终年60岁。

二、离华后，曾攻击中国共产党、歪曲中国革命历史的有1人

李德，德国人。1932年受共产国际派遣来华。在他担任红军军事顾问期间，由于指挥错误，造成了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长征初期的失利。李德在中国共产党内是一位极不受欢迎的国际代表。1939年，被中共中央送回苏联。

李德返回苏联后，受到共产国际的批评，不允许他再过问中国事务。在莫斯科的中共代表周恩来对李德提出了严肃的批评，但李德拒不接受批评。1949年，李德返回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中苏关系破裂后，李德在1964年发表了《毛泽东以谁的名义说话》等一系列反华文章，开始公开攻击中国共产党。1973年，李德出版了他的回忆录《中国纪事》，完全背离了共产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极力歪曲中国革命的历史，攻击和诽谤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毛泽东同志，并为自己在中国共产党革命中所犯的错误进行辩解。

1974年8月，李德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病死，终年74岁。

三、与共产国际分道扬镳的有2人

马林，荷兰人。1921年6月来华任共产国际代表。他对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和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都起过重要作用。1923年10月，奉命调回莫斯科。

马林回到莫斯科后，在共产国际东方部任职。由于他在一

些问题上与东方部意见不合，便于 1924 年 4 月辞职回到荷兰，担任荷兰共产党的领导工作。在共产国际反对托、季联盟的斗争中，马林日益同情托派，遂于 1927 年退出了荷兰共产党。1929 年，他建立了一个托派组织——社会革命党，公开与共产国际分道扬镳。但在 1938 年他又拒绝参加托洛茨基的第四国际。

在共产国际代表中，马林的最后归宿是最为悲壮的。1940 年德国占领荷兰后，马林即参加了反法西斯斗争，出版秘密报纸《斯巴达克》，从事抵抗运动。但不久不幸被捕，于 1942 年 4 月被德国法西斯杀害。

罗易，印度人。“四一二”政变前夕到中国担任共产国际驻华首席代表。在大革命的紧急关头，罗易未能拿出有力的措施挽救中国革命，却将共产国际的“五月指示”擅自送给汪精卫，使汪精卫找到了公开反共的借口。毛泽东曾就此事批评罗易是个“蠢货”。

1927 年 8 月，罗易回到莫斯科，曾要求与斯大林见面，遭到拒绝。在中共“六大”和共产国际“六大”上，罗易都受到了尖锐批评。罗易对国际“六大”的一系列决议持反对态度，并发表文章攻击共产国际。1929 年 12 月，罗易被共产国际开除。此后，罗易逐渐走上了反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背叛马列主义的道路。二战以后，更蜕变成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者，大肆攻击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1954 年 1 月，罗易在台拉登寓所病死。

四、在共产国际、联共（布）党内的政治斗争中丧生的有6人

越飞，苏俄政府派驻中国北京政府的全权代表，1922年8月来华。在促成第一次国共合作的过程中，越飞是一位重要人物。

1923年7月，越飞返回苏联，继续从事外交工作，但很快被卷入共产国际和联共（布）党内的纷争中。越飞因与托洛茨基关系密切，一直受到排挤和打击，被完全停止参加政治活动，甚至有病也得不到应有的治疗。1927年11月7日，托洛茨基组织了反对苏维埃政权的示威，遭到了联共（布）的严厉镇压。越飞感到自己的政治生命已经终结，加上日益难以忍耐的病痛，于16日凌晨自杀。

加拉罕，1923年7月，加拉罕接替越飞，担任与中国北京政府谈判的全权代表。他是中国北方革命活动的支持者，促成了冯玉祥的国民军与国民党的合作。1926年8月应召回国。

加拉罕回国后，从1928年到1934年担任副外交人民委员，负责发展苏联与东方各国关系的重要工作。因加拉罕早年是托洛茨基“区联派”的重要成员，1937年肃反运动开始后便遭逮捕，12月被公开判处死刑。直到苏共“二十大”后才恢复了名誉。

鲍罗廷，从1923年9月到1927年7月，他以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政治总顾问的身份参与了国民党改组、建立黄埔军校、进行北伐等重要活动。外国人称他是“中国革命的保姆”。鲍罗廷对蒋介石的反革命叛变曾采取妥协退让的政策，对大革命的失败负有一定责任。

大革命失败后，鲍罗廷奉命回国。他回国后，行动即受到限制，被停止了在共产国际中的工作，斯大林也拒绝见他。中共“六大”严厉批评了鲍罗廷，认为他对大革命的失败负有重要责任，共产国际还成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专门审查鲍罗廷的错误。

1923年9月，经斯大林批准，鲍罗廷担任了由美国进步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创办的英文报纸《莫斯科每月新闻》的编辑主任。这时的鲍罗廷，异常小心谨慎，尽量躲避派系之争。二战以后，苏美关系日趋紧张。1949年1月，苏联政府错误地指责斯特朗为“间谍”，并将她驱逐出境。这一错案也株连了鲍罗廷，使他被捕入狱。1951年5月，鲍罗廷在西伯利亚雅库茨克劳动集中营死去，终年67岁，直到1964年才恢复名誉。

加伦，1924年10月奉命到中国担任苏联驻华首席军事顾问，协助孙中山主持军务和改组国民革命军，制定了北伐计划，指挥了北伐战争，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叱咤风云的人物。1927年8月回国。

回国以后，加伦凭借自己杰出的军事、政治才能，活跃在苏联政坛上。他是苏共中央候补委员、最高苏维埃代表，历任苏联红军高级指挥职务。1929年11月“中东路事件”爆发后，加伦指挥苏联远东军，大败张学良东北军，并将1万多俘虏押到苏联境内开采金矿。1935年，加伦被授予元帅军衔。1938年1月，加伦又指挥哈桑湖战役，粉碎了日军的挑衅。

在1938年11月肃反运动中，加伦以“叛国罪”被秘密枪决，年仅48岁。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苏联政府为加伦平反昭雪。

罗明那兹，大革命失败后以共产国际代表身份来到中国，接替鲍罗廷、罗易。罗明那兹对中共“八七”会议的召开起了重要的作用，但他的“不断革命论”却导致了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的出现。他于广州起义前回国。

由于广州起义的失败，罗明那兹在共产国际“六大”上受到了严厉批评，并被排除在共产国际的领导机构之外。以后，罗明那兹在高加索负责经济工作。因为他不赞成斯大林的集体化政策，1930年底，被指控为组织反党集团，解除了党内外的一切领导职务。1934年12月，基洛夫被刺后不久，罗明那兹自杀身亡。同年底，被开除出党。

米夫，对于中国革命来说，米夫主要起的是消极作用。他一手把王明宗派集团扶上了台，造成了中国共产党内的第三次左倾冒险主义。

中共六届四中会议以后，米夫回到苏联，仍然与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工作上保持着密切联系。米夫一直是紧跟斯大林的。但不知什么原因，肃反运动也给他带来了灭顶之灾。1938年10月，米夫被秘密枪决，时年36岁。1976年才获平反。

（作者：延安革命纪念馆副书记；管理员）

延安时期的侨联与华侨

米世同

抗日战争时期，在延安成立的华侨救国联合会，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个华侨群众团体。抗战爆发后，海外侨胞，同仇敌忾，高举爱国旗帜，组织抗日救国团体，积极开展抗日救国活动。许多华侨青年，漂洋过海，汇聚在宝塔山下，学习革命理论，联络海外侨胞，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

一、心向延安

抗战时期，海外侨胞有 1000 多万，其中 90% 在东南亚。过去，由于种种原因，华侨社会也是分帮分派的，内部关系错综复杂。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隆隆的炮声震撼了中国大地，也震撼了海外侨胞的心灵。他们逐渐化解矛盾，消除分歧，在抗日救国的旗帜下团结起来，先后成立了 900 多个抗日救国团体，成为支援祖国抗战的一支重要力量。

1937 年 8 月，华侨领袖陈嘉庚发起成立了“马来西亚新加坡华侨筹赈祖国伤兵难民大会委员会”。菲律宾侨领李清泉，印尼侨领庄西言也先后组织成立了“菲律宾华侨援助抗敌委员会”和“巴达维亚（雅加达）华侨捐助祖国慈善事业委员会”。在此期间，缅甸、越南、泰国等地都成立了抗日救国团体。为

了统一领导南洋各地华侨组织，1938年10月，南洋各属华侨筹赈祖国难民会代表大会在新加坡召开，成立了“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推选陈嘉庚为主席，庄西言、李清泉为副主席，领导下属分支机构68个。著名侨领司徒美堂、邝炳舜等也在美洲、欧洲成立了华侨抗日救国团体。

在各地华侨团体的组织领导下，海外侨胞为支援祖国抗战，节衣缩食，捐款捐物，组织机工队、战地救护队和服务团回国参战，表现了强烈的爱国激情和对祖国的无比忠诚。1940年6月4日，延安《新华日报》发表了《华侨在抗战中的作用》的社论，对海外侨胞的爱国主义精神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和赞赏。抗战前期的五年中，华侨寄回国内的汇款达50多亿元，这对支撑战时的国民政府不至于垮台起了重要作用。以1939年为例，国民政府军费开支为18亿元，而同年侨汇和捐款就有11亿元。抗战初期，我们党在延安执行休养民力的经济政策，基本上不向群众征税或征很少的一点农业税，陕甘宁边区政府的财政来源主要是力争外援，其中海外侨胞和国内爱国人士的捐款占有相当一部分。1937年到1941年，边区政府共收到海外华侨和国内爱国人士捐款889.9万元，相当于1939年边区政府全年的财政收入（1939年边区政府全年财政收入为880余万元），有力地支援了边区军民的抗战。

延安是民主革命的圣地，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指导中心。抗战爆发后，华侨青年纷纷奔赴延安。那时，南洋华侨大部分由香港八路军办事处介绍，经武汉“八办”到西安“八办”再转赴陕北。仅1938年5月到8月，由西安“八办”介绍到延安的华侨青年就有78人。也有经重庆到西安再到延安的。从西安到延安，相距400公里，沿途还要通过国民党设在

耀县、铜官、洛川等地的关卡。菲律宾华侨白刃（电影《兵临城下》的作者）于1937年10月赴延安途中，在耀县遭到国民党军队和特务的阻拦，后来在他义正词严的驳斥和巧妙周旋下，终于到达了延安。也有的华侨青年在赴延途中，被欺骗、扣留甚至遭到杀害。越南华侨潘藻江，就是被特务关在集中营后被拷打致死的。印尼华侨陈文基，被打死装进棺材后又苏醒过来，几经辗转才到延安，但遍体鳞伤，已成残疾。

在奔赴延安的华侨青年中，有不少是富家子弟，从小就没有受过苦。从南洋到延安，远隔千山万水，加之陕北的自然环境和生活条件与南洋又是千差万别。但他们心向延安，不怕吃苦，曾发出“不到延安誓不休”的誓言。1938年春，一批华侨青年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联系去延安的事宜，罗炳辉同志热情地接见了他们并介绍了延安的情况。他说：“延安的气候很冷，住窑洞，吃小米，还要爬山路，你们怕不怕苦呢？”青年们回答说：“只要能到延安，任何艰苦都不怕。”有的说：“红军过雪山那么冷，并没有全冻死。只要有红军战士那样的坚强意志，寒冷算得了什么？”有的说：“我们不怕吃小米，小米不过比大米小一点，都一样吃饱干革命。”

一位马来亚华侨富商的独生子立志要到延安参加抗战，父亲说什么也不同意并设法加以阻拦。一天，这位吴姓华侨青年瞒过父亲，偷偷买了去香港的船票。父亲不见了儿子，立即乘飞机赶到香港。在码头上，父亲的劝说仍动摇不了他投奔延安的决心。父亲终于被儿子的爱国激情所感动，便给了他一笔钱，并嘱咐到延安后一定要给家里写信报个平安。与这位吴姓华侨青年相比，菲律宾华侨王唯真当年奔赴延安的经历就幸运地多了。王唯真曾说：“我能实现奔赴延安的愿望，很大程度

得助于我的父亲王雨亭。”王雨亭早年参加过辛亥革命，抗战爆发后受廖承志和成仿吾的委托，曾介绍百名华侨青年到延安参加八路军、新四军。1939年5月，一批新加坡司机服务团和几位华侨青年共30多人要回国参加八路军。王唯真向父亲讲了想去延安的心愿，父亲欣然同意，便把他交给香港“八办”连贯同志与服务团一起同行。后来经过云南、重庆、西安，于1939年12月到了延安。1949年王雨亭陪同陈嘉庚到北京参加筹备全国政协会议时，父子重逢，格外高兴。父亲对儿子说：“唯真，当年你选择奔赴延安的路走对了！”

二、侨联成立

抗日战争时期，大批华侨青年奔赴延安，这就为延安救国联合会的成立提供了客观条件。同时，这些华侨青年大多是海外华侨救国团体的成员和骨干，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革命激情，这是延安侨联成立的主观条件。

当年，在延安学习和工作过的华侨有600多人，一部分是由海外回国直奔延安的；一部分是在国内求学的华侨学生同国内的革命青年一起投奔延安的；还有一部分是早就参加革命的归侨在抗战前已到了延安。他们在延安学习后，约有300多人或去敌后或派到海外去工作，留在延安各机关单位工作的有200多人，在边区各县工作的有60多人。据延安侨联1942年6月的会员登记表统计，在册会员人数有280多人。其中新、马、泰华侨最多，印尼、越南次之。从成分看，学生和工人占多数；从祖籍看，广东、福建最多，祖籍广东的华侨就有103人。

抗战初期，华侨青年到延安后，大部分先在陕公、抗大和

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学习，然后分派工作。入陕北公学学习的华侨最多，先后有 200 多人。陕北公学成立于 1937 年 10 月，校长成仿吾。1938 年 7 月，在旬邑看花宫（今属宜君县）成立了陕公分校，校长李维汉。那时，陕公分校有华侨学员 100 多人。1938 年，毛泽东曾为陕北公学题词：“陕北公学是属于中华民族的，因为他为着抗日救亡而设，因为他容纳了全国乃至海外华侨的优秀儿女。”就在这一年年底，在看花宫成立了陕北公学华侨联谊会，印尼华侨张然和（又名张国坚）为主任，副主任是泰国华侨朱瘦林，秘书长是新加坡华侨廖冰。张然和在中央苏区参加了中央红军，长征到陕北，陕公分校成立时任政治部副主任。1939 年春，陕公总校与分校合并后任政治部主任，建国后他过早地病逝了。1941 年初到解放日报工作。建国后曾任中国科学院直属机关党委书记。陕北公学华侨联谊会是在陕甘宁边区成立的第一个华侨团体，它为延安侨联的成立起了组织和推动作用。

南洋华侨驻延办事处是继陕公华侨联谊会后在延安成立的又一个华侨团体。

1938 年 11 月，马来亚华侨彭士馨带领南洋司机回国服务团到延安。他们一行 13 人驾驶三辆汽车由香港经武汉、西安，跋涉 14000 余里，历时三个月。途经武汉时，给武汉八路军办事处留下一辆汽车转交新四军，所以到延安只有 11 个人和两辆救护车。他们到延安后，受到中央军委参谋长滕代远的接见，八路军总政治部还举行了欢迎晚会。不久，这一批服务团成员，有的去了前方，有的留在延安。彭士馨的弟弟彭士钦由于年纪小（年仅 12 岁）便入边区中学学习。建国后曾任陕西咸阳中级法院副院长、院长、陕西省侨联副主席等职。1939

年7月16日，留在延安的南洋华侨回国服务团在边区交际处成立了驻延办事处，推选服务团团长沙士馨为总干事，冯志坚（女）任秘书，下设宣传股、组织股、劝募股，分别由杨约、黄国光、李文观负责。出席成立大会的有40多人，中央统战部代表徐一新、边区政府秘书长曹力如到会祝贺。

南洋华侨驻延办事处成立以后，积极开展工作，加强留延华侨的联系，得到党中央重视，决定成立一个统一的、规模和影响较大的华侨群众团体。1940年9月5日，由南洋华侨驻延办事处发起，在杨家岭大礼堂（此礼堂于1940年冬失火烧毁，后来的大礼堂是在原址上重建的）召开全体留延华侨大会，到会华侨170余人，张闻天、吴玉章和中央统战部的领导出席了大会。大会决定成立延安华侨救国联合会，并通过简章，选举了执委。张闻天在大会上讲话指出，延安侨联的中心任务是：（一）努力学习准备将来工作；（二）研究侨胞所在地及各地侨胞的情形；（三）研究在华侨中我们的策略；（四）对外宣传与联络工作。大会选举延安华侨救国联合会第一届执委会，李介夫为主任，李介夫、谢生、冯志坚、余震、杨诚为执行。李介夫是1938年由马来亚来到延安的，在陕北公学毕业后留校工作，任李维汉校长办公室主任秘书。曾连任三届延安侨联执委会主任。1941年11月被选为边区第二届参议会议员。建国后曾任全国侨联顾问、湖南省侨联主席。

为加强党对华侨工作的领导，1940年2月28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成立华侨工作委员会，由饶漱石负责。当时，饶任东南局副书记，不在延安。1940年5月，朱德总司令回到延安后，中央决定朱德任侨委书记。9月27日，廖承志在香港八路军办事处致电延安侨委及在重庆的周恩来，建议加强对

海外华侨的宣传工作。此电文收录在《廖承志文集》中。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为加强国际统一战线和对海外华侨工作的领导，中央政治局在当天讨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时局时，决定成立海外工作委员会，并决定将侨委和中央调查研究局下属党务研究室的海外研究组并入海外工作委员会，由朱德任主任，黄华任秘书长，叶剑英、李初黎、何英、肖林、林仲等为委员。委员中还吸收了当年在延安的兄弟党的负责人参加，有日共的林哲（即冈野进），印尼共产党的王大才（即阿里阿罕），朝鲜劳动党的武亭。

海工委成立后，着重研究和讨论东南亚的局势和华侨抗日武装的问题。那时，在东南亚日军占领区的爱国华侨，纷纷要求我党派干部去协助他们组织抗日武装。因此，海工委决定从延安各机关、学校抽调了39名华侨干部成立学习班，经过培训后准备派去开展工作。学习班于1942年春成立，地址就在王家坪的后山上，由叶剑英参谋长亲自领导，何英任班主任，庄然任支部书记。学习班共编了7个组，第一组（马来亚组）组长彭光涵；第二组（泰国组）组长肖鲁；第三组（缅甸组）组长李光；第四组（朝鲜组）组长李天夫；第五组（印尼组）组长谢生；第六组（菲律宾组）组长庄然；第七组（越南组）组长肖林。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这一批干部没有派回原侨居地工作，两年后分配到延安有关单位和抗日根据地去工作。建国后，他们大多成为我党侨务工作的领导和骨干。

三、侨领访延

1939年冬，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第二次陇东事件，侵占了陕甘宁边区的宁县、镇原两座县城。消息传到海外，引起广

大爱国侨胞的不安，各地筹赈分会纷纷向南侨总会询问事件的真相。陈嘉庚先生对此事也很关心，决定组织“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回国考察。

1940年3月下旬，陈嘉庚慰劳团抵达重庆，国民党当局采取“吹”、“拉”、“骗”的手段，鼓吹蒋介石领导的抗战如何“伟大”，国民党如何“团结抗战”、“廉洁奉公”，诬蔑共产党“破坏团结抗战”，八路军、新四军“游而不击”。对慰劳团关怀备至，住豪华宾馆，一日数宴，极力拉拢。当他们得知陈嘉庚先生意欲访问延安时，便设法阻拦。他们越是阻挡，越是坚定了陈先生访延的决心。

1940年5月31日下午5时左右，陈嘉庚与南侨总会常委侯西反、总会秘书李铁民从西安抵达延安，受到边区军民的热烈欢迎，在南门大操场举行了欢迎大会。

欢迎大会由边区主席高自力主持，到会群众5000多人，留延华侨和闽南的同志举着欢迎横幅坐在群众队伍的最前边。当陈嘉庚用闽南语讲话时，不等李铁民翻译，华侨和闽南的同志就听懂了，带头热烈鼓掌，使会场的气氛十分活跃。随陈嘉庚一行到延安的，还有陕西省府的一位科长，名为陪同，实为监视。在陈嘉庚讲话后，他喊了两句带煽动性的口号：“蒋委员长万岁！”“陈嘉庚先生万岁！”他以为陈嘉庚是资本家，共产党是不会喊资本家万岁的。当时，在台上的我党负责同志洞察其奸，带领群众高呼了“陈嘉庚先生万岁”的口号。这位科长还自以为得计，其实他根本不懂得，在共产党人和边区军民的心中，主张团结抗战的爱国侨领陈嘉庚，比起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蒋介石来，更有资格呼其“万岁”。

6月1日上午，陈嘉庚一行到中国女子大学参观。女大在

王家坪西侧的半山坡上。朱总司令和康克清及学校领导早在山下迎候。朱总司令是5月26日从西安回延安的。在西安时朱总与陈嘉庚见过一面。当时，朱总曾邀请到他住的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叙谈，但被蒋鼎文、胡宗南借故阻止了，陈对此很是不满。这次，他们在延安再次见面，陈嘉庚向朱总说明缘由并表示歉意。朱总陪同陈嘉庚一行参观了女大学生在露天上上课的情景。那时，女大有学生1000多人，其中华侨女生有20多人。学生们住的土窑洞，虽是简陋，但很整洁，陈先生参观后感受颇深，不住地啧啧称赞。

6月1日下午，毛泽东在杨家岭接见了陈嘉庚和侯西反，朱老总作陪。因李铁民上午参观女大后上车时碰破了头住进中央医院，所以由在女大学习的华侨廖冰做翻译。在谈到国共两党关系问题时，由于国民党的造谣诬蔑，陈嘉庚对我党进行反摩擦斗争不理解，认为共产党应该多做让步，以求团结。毛主席耐心地向他作了解释，说明我党以斗争求团结的方针，并以事实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破坏团结抗战的真相。谈话后，毛主席留陈嘉庚共进晚餐。一张旧饭桌，没有桌布，上面铺着几张白麻纸。菜肴是以洋芋、粉条、豆腐等陕北农家菜为主，青菜、水萝卜也是从毛泽东自己种的菜地里拔来的，惟一的一只鸡还是几天前老乡送的。陈嘉庚看着这桌丰盛的“宴席”，十分感慨。因为在重庆蒋介石请他吃饭，生猛海鲜，山珍海味，以8万元巨款作为接待费用。后来，他常对人说：“一党之领袖其艰苦朴素有如此者，令人钦佩。”

6月2日下午，朱总司令陪同陈嘉庚到抗大三分校参观。那天，三分校举行大会，既是欢迎陈嘉庚的大会，也是抗大成立四周年纪念大会。朱总和陈嘉庚到东关三分校时，大会还未

开始，篮球场上正在进行球赛。一个学员看见朱总来了，跑过来要拉朱总上场打球。朱总向陈嘉庚打了个招呼就在球场上和学员们你争我夺，玩得热火朝天。陈嘉庚看到此情此景，感叹地对陪同他的边区交际处处长金城说：“如果不是今天亲眼看到，我是难以相信的。贵党上下平等，亲密无间能做到如此程度，实在令人钦佩。”

陈嘉庚很喜欢和华侨或闽南的青年交谈。一次，女大的两位华侨女学生到交际处来看望陈嘉庚，其中一位就是廖冰，她在新加坡时与李铁民的儿子是同班同学。她们谈了在女大的学习生活，也谈了到农村进行卫生宣传和帮助老百姓进行民主选举的情景。陈嘉庚带着疑惑的眼光问道：“老百姓不会写字怎么选呢？”她们告诉他，开选举会时，每个候选人身后放一个碗，老百姓想选谁就给谁的碗里放一粒豆子，谁碗里豆子多谁就当选。老百姓把这种办法叫“豆豆选”。陈嘉庚听了高兴地笑起来，说：“这种办法好，公道、民主，体现了共产党为老百姓办事的精神。”谈话不知不觉过了晚上10点，陈嘉庚担心两个女孩子黑夜回学校不安全，问她们怕不怕，要不要派人送一送。她们说：“陈先生放心吧，我们一个人走路都不怕，两个人就更不用操心了。”陈嘉庚惊喜地说：“真想不到，共产党领导下的地方，民风这样好，实在出乎我的意料。”

6月7日，李铁民秘书伤好出院，因阎锡山催得急，陈嘉庚决定离延。晚上，在中央大礼堂举行了欢送大会。6月8日，陈嘉庚一行离开延安，经宜川去了阎锡山的驻地克难坡。

延安之行，是陈嘉庚先生人生的重大转折。他回到重庆后，在“国民外交协会”作报告，讲了延安的真实情况，用事实揭露了国民党宣传媒体欺骗、造谣的伎俩。报告在重庆引起

了轰动，同时也引起蒋介石的不满。蒋一面派人暗中监视陈嘉庚，电令各省军政官员注意陈的言论，一面电令驻新加坡总领事向新加坡政府活动，不准陈回新加坡。陈嘉庚爱憎分明，不畏强权，他写信给蒋介石：“余一向讲话乃据所见所闻的事实，凭余良心与人格，不能指鹿为马，亦不会受人蒙蔽，请免派人来监视。”^①1940年12月，陈嘉庚回到新加坡，他在万人欢迎大会上讲话说：“我未往延安时，对中国前途甚为悲观，以为中国的救星尚未出世，或还在学校读书。其实此人已经四五十岁了，而且已做了很多大事了，此人现在已在延安，他就是毛泽东。”他把延安与重庆作了对比，结论是：“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四、延安岁月

延安是革命的大熔炉。抗日战争时期，数百名华侨青年来到延安，他们出身不同，经历各异，但都有颗赤诚的爱国心。在延安火热的战斗岁月中，他们努力学习，积极进取，有的奔赴抗日前线，驰骋疆场，成为英勇的抗日战士；有的留在延安，从事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项建设事业；有的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献出了年轻生命。

延安侨联成立后，便成为当年留延华侨的活动中心。侨联会址最初设在文化沟即今天的大砭沟内，那里原有两孔土窑洞，是热心的华侨青年自己动手挖的。以朱德为主任的中央海外工作委员会成立后，延安侨联于1942年春夏之间由文化沟迁到王家坪桃园旁的一排平房内，这里原是军委机关合作社和军人俱乐部。那时，房内的设备很是简陋，除有几张办公桌凳外，就是华侨喜爱的从海外邮来的书报杂志、乐器、棋类和体

育器材。每逢星期天，侨联俱乐部在桃园里举办舞会、开展体育比赛或举行形势报告会，由新到延安的华侨报告海外的情况。新来的或要去前方的华侨同志，侨联都为他们在这里举行欢迎会和欢送会。

1941年3月和10月，延安侨联举行了第二次、第三次大会，总结研究了侨联的工作。由于会员人数的不断增加，又先后成立了边府（南区）、桥儿沟（东区）和陇东华侨分会，负责人分别是余震（边府）、朱棠（桥儿沟）和谭岚（陇东），其中边府分会会员最多，有50余人。

在侨联二次大会上，朱总司令出席并讲话。他指出，延安侨联应努力做好两项工作，一是加强对海外侨胞的联络和宣传，二是组织华侨参加边区经济建设和兴办实业。1941年6月1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欢迎华侨来延兴办实业》的社论。

自二次大会后，延安侨联着手发起组建西北华侨实业公司。经过半年的筹备，1942年2月15日，该公司正式成立。由于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原定筹措500万元的资金一时不能集中，故先开办了华侨毛纺厂。厂长江涛，厂址在杜甫川，工人大多是在延安的华侨及其家属。建国后曾任《中苏友好》杂志主编的泰国华侨欧阳惠曾在该厂负责改进纺织机器等技术工作。延安华侨毛纺厂有资金百余万，产品销路还不错，与市场沟一家商号一次就签订了上万元毛线，数千条毛毯的合同。

越南华侨梁金生创办的光华制药厂，主要研制开发中草药，其中清胃散、退热散、八路军行军散、疟疾丸、调经丸、保婴丸等都是自己研制的特效药，很受边区军民的欢迎。厂址初设在延安城东的拐峁村，后迁移到新市场后沟。厂长梁金生

曾作第二届延安侨联执委，他与李介夫同被选为边区第二届参议会参议员。在二届参议会上，他们作为华侨代表，积极参政议政，提出的多项提案均被大会照原案审查通过。

延安洛杉矶托儿所原是中央托儿所，是党中央进驻延安后举办的，入托的孩子有毛泽东、贺子珍的女儿娇娇（李敏），谢觉哉、王定国的儿子谢定定，李维汉、金维映的儿子罗小金（李铁映），刘伯承、汪荣华的儿子刘太行，邓小平、卓琳的女儿邓琳，还有左权的女儿左太行、邓发的儿子邓北生等数十位中央领导和抗日前线将领的孩子。抗战爆发后，美国洛杉矶华侨李兆焕等响应宋庆龄的号召，为孩子们捐款捐物，几经辗转，运到延安。这些来自大洋彼岸的捐助，饱含了洛杉矶侨胞的一片深情。为感谢大洋彼岸的亲人和朋友，1942年春，中央决定将中央托儿所改名为洛杉矶托儿所，所址在兰家坪的山坡上。

当年，留在延安的华侨战斗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如在新华社、解放日报社和新华广播电台工作的有：美国归侨、《解放日报》总编辑余光生，印尼华侨沈建图、陈龙、丁拓，马来亚华侨沈光、曾艾狄，菲律宾华侨王唯真，新加坡华侨廖冰等。从事财经工作的有：印尼华侨余震，泰国华侨庄国英、日本华侨李永辉等。印尼华侨谢生曾在延安外宾招待所为美军驻延观察组当翻译，马来亚华侨郭戈奇在中央医院为毕道文大夫（印尼人）当翻译。当年在延安给毛主席开汽车的司机就是马来亚华侨梁国栋。

著名音乐家冼星海曾侨居新加坡、法国，1938年11月到延安，任鲁艺音乐系主任。1939年春，缅甸华侨张光年（光未然）到延安。他们一个作词，一个谱曲，合作的《黄河大合

唱》，从延安唱到重庆，唱遍全国，极大地鼓舞了全中国人民的抗战斗志。

当年，在延安的华侨有 300 多人从抗大、陕公等学习后或去敌后或被派回海外工作。泰国华侨陈子谷，1937 年 9 月到延安，在抗大学习后被派到新四军工作。1940 年他以叶挺军长秘书的身份回泰国募捐。他把募得的 6 万元和自己在泰国分得的 20 万元遗产一并献给新四军。叶挺军长称他：“富贵于我如浮云。”新加坡华侨钟萍，1938 年从抗大毕业后，参加了海外工作团。这个团有 20 多人，都是来延的华侨，团长蔡克明，副团长蔡白云。他们于 1938 年 9 月从延安出发，到东南亚华侨中开展救亡工作。钟萍的爱人、副团长蔡白云后来在越南牺牲。抗日女英雄李林，印尼华侨，1940 年 4 月在晋西北英勇牺牲，中央妇委在延安为她举行了追悼会。泰国华侨梁传，1938 年 7 月到延安，在鲁艺文学系学习后派到晋西北工作，1939 年底日军大扫荡时壮烈牺牲。泰国华侨叶驼，在三五九旅任连指导员，1944 年随王震旅长南下，1946 年中原突围时壮烈牺牲。马来亚华侨刘金宇，是延安兵工厂模具班班长，先进工作者。1944 年 6 月，为完成一项紧急任务加班加点，不幸被倒塌下来的屋梁砸死，延安华侨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延安交际处党支部教育干事古从军，南洋华侨，香港大学毕业。1939 年从抗大学习后到交际处联络科工作，本来让他当科长，他不当，就当了科员。一天晚上开党总支会，他外出办事，不幸从边府的山崖下掉下来牺牲了。那时他到交际处才三个月，所以交际处同志送的挽联上写着：“相离三分钟……何意你失足竟成千古恨？”“共事九十日……埋头默念慕平生。”

延安岁月，既是平凡的，又是绚丽多彩、撼人心魄的。数

百名华侨青年在延安，大家都是在平凡的岗位做着平凡的事。然而，延安的小米延河的水，养育了一批华侨精英。他们之中有的为民族解放战争英勇牺牲，名垂青史；有的建国后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奋斗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有的仍继续从事党的侨务工作。建国以后，有 30 多位曾到过延安的华侨担任全国和省市侨联主席、副主席职务或国务院侨务办公室的负责人。他们是：

陈嘉庚，新加坡华侨，1940 年到延安，全国侨联第一届委员会主席。

廖承志，日本归侨，1935 年长征到陕北，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主任，全国侨联二届委员会名誉主席。

李铁民，新加坡华侨，1940 年到延安，全国侨联第一届委员会副主席。

高明轩，菲律宾华侨，1938 年到延安，全国侨联第一届委员会副主席。

苏惠，泰国华侨，1940 年到延安，全国侨联第二届委员会副主席。

钟庆发（谢生），印尼华侨，1938 年到延安，全国侨联第二届委员会副主席兼秘书长。

陈明，马来亚华侨，1938 年到延安，全国侨联第三、四届委员会副主席。

黄登保，菲律宾华侨，1938 年到延安，全国侨联第三届委员会副主席。

廖冰，新加坡华侨，1938 年到延安，中国科学院侨联第一、二、三届委员会副主席。

陈沫，马来亚华侨，1938 年到延安，外交部侨联主席。

郑祥鹏，越南华侨，1944年到延安，中联部侨联主席。

王唯真，菲律宾华侨，1938年到延安，新华社侨联主席。

陈龙，印尼华侨，1938年到延安，新华社侨联名誉主席。

苗秋林，新加坡华侨，1942年到延安，铁道部侨联主席。

彭光涵，马来亚华侨，1942年到延安，国务院侨务办公室秘书长、副主任。

沈光，马来亚华侨，1939年到延安，上海市侨联副主席。

刘琪，泰国华侨，1939年到延安，山西省侨联主席。

蓝克良，马来亚华侨，1938年到延安，山西省侨联副主席。

田活农，泰国华侨，1938年到延安，辽宁省侨联第三届委员会主席。

林云峡，马来亚华侨，1937年到延安，辽宁省侨联第三届委员会副主席。

林兆星，泰国华侨，1938年到延安，黑龙江省侨联主席。

吴道真，菲律宾华侨，1938年到延安，黑龙江省侨联副主席。

曾昭生，马来亚华侨，1938年到延安，安徽省侨联主席。

王耀华，泰国华侨，1938年到延安，安徽省侨联第一届委员会副主席。

彭同福，印尼华侨，1938年到延安，江西省侨联主席。

陈正华，菲律宾华侨，1938年到延安，河南省侨联第三、四届委员会副主席。

张空凌，印尼华侨，1938年到延安，湖北省侨联主席。

李介夫，马来亚华侨，1938年到延安，湖南省侨联主席。

吴田夫，越南华侨，1940年到延安，广东省侨联副主席、

广州市侨联主席。

钟非，泰国华侨，1938年到延安，广州市侨联名誉主席。

赖松彬，泰国华侨，1938年到延安，四川省侨联主席。

郭戈奇，马来亚华侨，1940年到延安，四川省侨联副主席。

余洁，印尼华侨，1940年到延安，四川省侨联主席、副主席。

谭岚，泰国华侨，1938年到延安，陕西省侨联副主席。

彭士钦，马来亚华侨，1939年到延安，陕西省侨联副主席兼秘书长。

戴行伍，菲律宾华侨，1938年到延安，西安市侨联副主席。

延安侨联自1940年9月成立，到1947年7月离开延安，7年间做了大量工作，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1948年秋，延安侨联迁到西柏坡后改名为“中国解放区归国华侨联合会”。至此，延安侨联完成了光荣的历史使命。1956年10月，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在北京成立，侨联工作迈上了广阔前程。

注 释

①《陈嘉庚先生纪念册》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1961年编印，第28页。

（作者：延安革命纪念馆研究员）

随中央红军长征的三十名妇女干部

姬乃军 姬 睿

史无前例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是人类历史上一首雄浑悲壮的赞歌，也是中国共产党人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大无畏精神的生动体现。长征的胜利，使中国革命的航船从此驶入了壮阔的航程，也从此揭开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崭新篇章。在艰苦卓绝的长征路上，曾经走过了 1000 多名女战士。她们克服了自身生理素质的困难，和男同志一样爬雪山，过草地，吃草根，嚼树皮，穿越枪林弹雨，一步一步地走出困境，走向胜利。她们的英雄事迹，感天地，泣鬼神。她们的芳名应当永远铭刻在中国革命的光辉史册上。

随中央红军长征的妇女干部共 30 名。1937 年 5 月至 9 月，美国著名记者斯诺的夫人尼姆·威尔斯（即海伦·福斯特）曾对延安进行了一次颇具传奇色彩的访问。就在这次访问中，参加过长征的李伯钊向海伦提供了一份 30 名参加中央红军长征的妇女干部的名单。1939 年，海伦记录这次访问的专著《红色中国内幕》在美国纽约出版。之后，这部著作的中文译本以《续西行漫记》为名在中国出版。据海伦在《续西行漫记》（三联书店 1991 年 3 月第一版）中记载：“经历了长征的 30 位女领导人的姓名如下：‘刘群先、陈慧清（以上为无产阶级——原注，以下引文同），危拱之、刘英、李伯钊、钱希均、

周月华、吴仲莲、谢小眉、李建华、丘一涵（以上为学生），李坚真、危秀英、廖日华、吴胡莲、王乾元、钟玉林、刘彩香、李小红、康克清（以上为农民），郑玉、杨厚珍（以上为家庭妇女），金维映、贺子珍（以上为教员），蔡畅、邓颖超（以上为职业革命家），阿香（原籍广东）、廖似光、韩世英、邓六金（出身不详）。”这份名单中有些人名显然有误：周月华应为周越华；吴仲莲应为吴仲廉；谢小眉应为谢小梅；丘一涵应为邱一涵；吴胡莲应为吴富莲；王乾元应为王泉媛；钟玉林应为钟月林；阿香应为谢飞，又名琼香；韩世英应为甘世英，后名甘棠；郑玉应为曾玉；廖日华应为萧月华；李小红应为李桂英。

现将随中央红军长征的 30 名妇女干部介绍如下：

蔡畅（1900—1990）湖南省双峰县人。李富春夫人。1915 年进入长沙私立周南女子师范学校学习。次年，结业后留校任教。先后参加了反对袁世凯签订卖国条约的运动和五四运动。1919 年 10 月，与向警予一起，组织湖南女子留法勤工俭学会。同年 12 月，赴法勤工俭学。1922 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1923 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4 年，进入苏联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

1925 年 8 月，蔡畅回到国内，任中共两广区委妇委副书记，并任国民党中央妇女运动讲习所主任。北伐战争期间，先后任中共江西省委妇女部长、中共湖北省委妇女部长。大革命失败后，在上海任中共中央妇委委员。后到香港，在中共广东省委妇女部工作。1931 年底，进入中央苏区，先后任中共江西省委组织部部长、白区工作部部长兼妇女部部长，江西省工农检查委员会主席。1934 年 1 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

长征到达陕北后，蔡畅先后任中共陕甘宁省委统战部部长、组织部部长，中共庆阳中心县委书记，中共陕甘宁边区区委妇女部部长，中共中央妇委书记。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妇委书记、全国总工会常委兼女工部部长、第一届全国妇联主席，并先后当选为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理事、副主席。

建国以后，蔡畅先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第二、三届全国妇联主席，第四届全国妇联名誉主席，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四、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蔡畅是中共六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第七至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邓颖超（1904—1992） 原名邓文淑。周恩来夫人。祖籍河南光山县，生于广西南宁。幼年丧父，靠母亲杨振德行医和当家庭教师的收入来维持生活。1910年随母迁居天津。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中，组织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任执委兼演讲队队长，并和周恩来一起组织了进步团体觉悟社。1920年在天津从事妇女运动。1924年初，组织并参加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任特支宣传委员。1925年3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任中共天津地委妇女部部长。同年8月，调广州并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兼妇女部部长。1926年，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1927年冬，任中共中央妇委书记，1928年5月，赴莫斯科列席中共“六大”会议。同年10月，返回上海，任中共中央直属支部书记，从事党的秘密工作。

1932年5月，邓颖超进入中央苏区，先后任中共中央局

秘书长、中央政治局秘书、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中央机关总支书记等职。

长征到达陕北后，历任中央机要科科长、中央白区工作部秘书、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内务司法部秘书等职。抗日战争爆发以后，邓颖超先后担任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妇女组织员、中共中央长江局妇委委员、中共中央南方局委员兼妇委书记等职。并担任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常务理事、国民参政会中共方面参政员。1943年7月，邓颖超随周恩来返回延安，进入中央党校一部学习。1945年6月，任解放区妇联筹委会副主任。同年8月，任中共中央妇委副书记。

解放战争时期，邓颖超先后在重庆、南京任中共代表团成员。1947年3月后，任中共中央后方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妇委代理书记。1949年3月，任全国妇联副主席、党组书记。

建国以后，邓颖超曾任全国妇联副主席、党组书记、名誉主席，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委员会副主席，对外友协名誉会长，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名誉会长等职。邓颖超是中共第七届候补中央委员，八、九、十届中央委员，十一、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纪委第二书记。并曾担任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四、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六届全国政协主席等职。

康克清（1911—1992）江西万安人。朱德夫人。1925年在本乡从事妇女工作。1926年加入共青团。1927年任乡妇女协会常任秘书。1928年9月参加红军，上井冈山。1929年与朱德结婚。1931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先后任红军总司令部直属的女子义勇队队长、直属队政治指导员。1934年1

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候补执行委员。

长征途中，康克清先后任红军总司令部直属队政治指导员，红四方面党校总支书记。她与朱德一起，同张国焘的右倾分裂主义进行了坚决斗争。1936年11月，随朱德到达陕北保安（今志丹）县。1937年进入抗大学习。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康克清历任八路军总司令部直属队组织股长、政治处主任、党总支书记，晋东南妇女救国会名誉主任，中央妇委委员，解放区战时儿童保育会副主任、代主任等职。曾在中央党校学习。1949年，她先后出席了第一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和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

建国以后，康克清历任全国妇联第一、二届常委，第三届副主席，第四、五届主席，第六届名誉主席，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主席，中国福利会名誉主席，宋庆龄基金会主席，中国少年儿童基金会会长等职。

康克清是中共第七至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十一、十二届中央委员会委员，第一至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四、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二、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四届全国政协常委，第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贺子珍（1909—1984） 江西永新人。毛泽东夫人。1926年春起，在永新县禾川镇秀水小学任国文教师。同年加入共青团，任永新县团支部书记。1927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并任中共永新县委妇委书记。同年5月，任中共吉安特委委员兼特委妇委组织部部长。同年7月，参与组织永新暴动，随后来到井冈山，任宁冈县农民自卫军宣传队队长。1928年5月，毛泽东与贺子珍在井冈山茅坪结婚。贺子珍任井冈山前委秘书

长。1930年6月，任赣西南妇女工作团主任。1931年11月起，调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要科科长。

长征途中，贺子珍随干部休养连行军。1935年3月，因掩护伤员而不幸遭敌机轰炸受重伤。长征到达陕北后，贺子珍曾任中央印钞所所长。1937年1月，进入抗大学习。同年10月，她离开延安，前往苏联学习治病，于1938年1月抵达莫斯科。随后，进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47年底，贺子珍由苏联回到哈尔滨，先后任东北财委机关党总支书记、总工会干部学校政治教员。

建国以后，贺子珍先后任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虹口区委书记等职。从1979年6月起，贺子珍任全国政协委员。

刘英（1905—2002）原名郑杰，湖南长沙人。张闻天（洛甫）夫人。1925年加入共青团，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长沙师范学校支部书记、中共湖南省委妇女部部长等职。1929年前往苏联，先后在莫斯科中国劳动大学、国际无线电学校学习。1932年回国后，曾任共青团福建省委书记、中共中央局宣传部部长、组织部部长等职。在长征途中，任第一梯队政治部主任、中央纵队秘书长。

到达陕北后，于1935年11月与张闻天在瓦窑堡结为伴侣。后任共青团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共中央秘书处处长。解放战争时期，曾任中共合江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中共辽东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建国以后，历任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参赞，外交部部长助理、人事司司长、监察委员会书记。“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到严重迫害。1979年后，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

刘英是中共七大、八大代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

表，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

李坚真（1907—1992） 广东省丰顺县人。1926年5月，在彭湃的引导下参加农民运动。同年9月，加入共青团。1927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参加了广东东江地区武装起义和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先后任中共东江特委妇委书记，中共闽西特委妇女部部长、福建省委妇女部部长。1934年1月起，任中共中央局妇女部部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长征到达陕北后，先后任中共陕西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妇女部部长，中共中央妇女部部长。1935年12月，与当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临时政府西北办事处劳动部部长的邓振询（1904—1943）在瓦窑堡结为伴侣。

抗日战争爆发后，李坚真任陕甘宁边区妇女联合会筹备会主任，并任中共中央妇女委员会常委。1937年底，李坚真和邓振询奉命前往南方工作，先后任中共江西省委妇女部部长，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妇委书记、妇女部部长。解放战争时期，先后任中共中央华中分局民运部副部长，华东局妇委书记，山东分局妇委书记等职。1949年3月，当选为全国妇联执行委员。

建国以后，先后任山东省妇联主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妇委书记、中共粤中区委第一书记，中共广东省委常委、书记处书记兼临委书记，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到严重迫害。1977年以后，历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当时设第一书记）、广东省纪委书记、广东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等职。李坚真是中共第八届、第十一届中央候补委员。在党的十二大上，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她还当选为第一至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李伯钊（1911—1985） 笔名戈丽，重庆人。杨尚昆夫

人。1925年加入共青团。同年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并从事翻译工作。1930年回国，进入闽西苏区，任闽西军区政治部宣传科科长。1931年10月调入中央苏区，先后任瑞金红军学校政治教员、高尔基戏剧学校校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艺术局局长。

长征途中，李伯钊在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队工作。后随红四方面军南下。1936年11月到达陕北保安，随后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抗日战争时期，李伯钊曾任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编审委员会主任、中共中央北方局文委委员、北方局宣传科长、晋东南鲁艺校长等职。1940年11月回到延安，先后任中共中央文委地方文化科长、中央党校文艺工作研究室主任。参加了著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解放战争时期，曾任华北文联副主任、华北人民文工团团团长等职。

建国以后，李伯钊曾任北京市教育局副局长、中共北京市委文委书记、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副院长，中央戏剧学院副院长、顾问等职。并担任中国戏剧家协会第一、二届常务理事，第三届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第一、二届理事，中国文联第一、二、三、四届委员，全国妇联执委等职。李伯钊还是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常委。

李伯钊与人合作创作的歌剧《长征》，是较早反映长征的重要艺术作品。

危拱之（1905—1973）原名危立辰，曾化名林淑英、魏晨，河南信阳人。叶剑英夫人。1926年6月毕业于私立河南第一女子中学。在校期间，参加了声援“五卅”运动的斗争。1926年11月加入共青团。1927年2月，进入中央军事政治学

校武汉分校女生大队学习。同年4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之后，她参加了广州起义和海陆丰农民运动，曾任红军第四师政治部宣传员、中共东江特委党校团支部书记，海丰苏维埃政府文书等职。1928年7月，任中共河南省委妇女科科长。1929年6月，危拱之奉命前往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1931年1月，危拱之回到上海。1932年春，进入闽西革命根据地，任彭（湃）杨（殷）军事政治学校教员，并兼做闽赣军区政治部宣传科工作。随后，危拱之到达中央苏区，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办公厅秘书，并兼任机关俱乐部主任。危拱之还参加了创办中国工农红军军事政治学校的工作，组建了中央苏区的第一个剧团——“八一剧团”。1932年起，任工农剧社副社长。1934年2月，被调至高尔基艺术学校任教员。长征途中，危拱之曾任第一纵队、干部团队列科科长。

长征到达陕北后，危拱之任人民抗日剧社社长。西安事变爆发后，危拱之奉命随中共代表团前往西安，任红军联络处会计，并兼任中共陕西省委妇女部长。1937年5月，她回到延安，任红军家属学校校长。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危拱之先后任中共河南省委秘书长、中共豫南特委组织部部长、信阳挺进队政治部主任、中共豫鄂边特委组织部部长等职。1940年5月回到延安，在中共中央组织部地方科工作。1943年4月，进入中央党校一部学习。1945年4月，出席了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解放战争时期，危拱之先后任中共赤峰市委副书记、书记，中共中央冀察热辽分局妇女部长等职。

建国以后，危拱之因病长期休养。

谢飞（1913— ） 原名琼香，海南文昌人。刘少奇夫人。1927年加入共青团，同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曾任文昌县区妇女协会主任，后在中共广东省委从事秘密工作。1934年进入中央苏区，任国家政治保卫局机要员。

长征到达陕北后，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工农检查局工作。1935年11月，与刘少奇在瓦窑堡结婚。1936年1月，随刘少奇前往天津，在中共中央北方局工作。1937年回到延安，先后在中央党校、马列学院学习。1938年11月，随刘少奇离开延安，前往中原地区。先后任中共鄂豫皖区委委员、舒无地委组织部部长等职。1940年底，谢飞奉命到江南地区执行任务，任中共余上县委书记兼独立营政委。由于日军封锁长江，谢飞被隔断在江南，与刘少奇无法联络，遂与刘少奇分手。此后，谢飞历任浙东区妇联主任、华东妇联组织部部长等职。

建国以后，谢飞任中国人民大学专修部主任。1956年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研究生毕业。此后，曾任中央政法干部学校副校长，中国法学会第一届、第二届理事，北京市法学会第一届、第二届副会长。曾任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

邓六金（1911—2003） 福建上杭人。曾山夫人。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上杭县委妇女部部长、中共福建省委妇女部部长。

长征到达陕北后，曾任中共庆阳县委组织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妇委巡视员。后任中共中央东南局妇女部干事。解放战争时期，参加创办中共中央华东局机关保育院，任院长。

建国以后，历任政务院财经委员会人事处副处长、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办公室副主任等职。邓六金是第四届全国妇联执

委，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儿童和少年基金会理事。

吴仲廉（1908—1967） 湖南宜章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参加湘南起义，并随部队上井冈山。曾任红四军政治部文书、红一方面军女子义勇军指导员、红军医院政委等职。

长征到达陕北后，先后任红九军政治部敌工部副部长、安吴青训班女生队指导员等职。后任八路军山东纵队政治部组织部长兼秘书长、苏皖纵队政治部主任、第一纵队秘书长。1943年回延安，进入中央党校学习。解放战争时期，曾任中共辽东分局妇委书记，安东省委妇委书记等职。

建国以后，先后任中共浙江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妇委书记，浙江省监察委员会副书记，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等职。

吴仲廉还先后当选为中共七大、八大代表。

钱希均（1905—1989） 浙江诸暨人。毛泽民夫人。1922年进入上海平民女校学习。1924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曾任中共中央出版部发行科科长、交通员，中共顺直省委组织科科长、机要科科长，苏维埃国家银行会计、《红色中华》报发行科科长等职。

长征到达陕北后，曾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国民经济部秘书长。解放战争时期，曾任中共上海沪西、浦东区委组织部部长。参与领导了上海申新第九棉纺织厂工人罢工斗争。

建国以后，曾任轻工业部办公厅副主任等职。钱希均还是第四、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周越华（1904—1977） 湖北武穴人。贺诚夫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任湖北省妇女协会特派员。1927年

初，进入国民党中央军委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女生队学习，参加了北伐战争和广州起义。后任中共中央机关交通员、中央苏区红军卫生学校政治处主任等职。

长征到达陕北后，先后进入抗日军政大学、马列学院、中央党校学习。解放战争时期，曾任华北军区卫生部政治部主任。

建国以后，曾任卫生部计划检查局副局长、监察室主任等职。

陈慧清（1909—1983） 广东番禺人。邓发夫人。1925年参加省港大罢工，曾任省港织造工会常委。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中共广东省委交通员。参加了广州起义。1930年后，任中共闽赣省委妇委书记。

长征到达陕北后，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粮食部仓库主任，陕甘宁边区粮食调剂局主任等职。解放战争时期，出席了1948年在哈尔滨召开的第六次全国大会。

建国以后，先后任广东省民政厅副厅长、省总工会副主席等职。

刘群先（1907—1941） 江苏无锡人。秦邦宪夫人。中国共产党党员。大革命时期即投身工人运动。后前往苏联学习。1928年与秦邦宪在苏联结婚。1930年5月，与秦邦宪一同回到上海，在全国总工会工作。1933年初，进入中央苏区。

长征途中，刘群先担任中央纵队干部休养连负责人。长征到达陕北后，先后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西北执行局女工部部长、陕甘宁边区总工会执行委员等职。后与秦邦宪分手。1939年前往苏联治病疗养。1941年在苏联卫国战争中死于战乱之中。

邱一涵（1907—1956） 湖南平江人。1926年加入共青团。1930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曾任共青团万载县委书记、中共湘赣省委妇女部部长等职。

长征到达陕北后，曾任中共陇东特委妇女部部长。后任华东军政大学政治部主任等职。

建国以后，历任中共南京市委组织部部长、中共江苏省委监委书记。

金维映（1904—1941） 原名金爱卿，化名阿金，浙江岱山人。李维汉夫人。1919年在县立女子学校上学期间参加声援五四运动的宣传活动。毕业后任女校教员。曾组织女校师生响应上海“五卅”运动。1926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被选为舟山县总工会执行委员。“四一二”反革命事变后被捕，经营救释放后，到上海中华全国总工会工作，从事秘密工作。1929年6月任中共江苏省委妇委书记。1931年8月，和邓小平一起被派往中央苏区，随后他们结为夫妻。

金维映进入中央苏区后，先后任中共于都县县委书记和胜利县县委书记。1933年，金维映与邓小平离婚。此后，金维映曾任中共中央组织部组织科长、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武装动员部副部长等职。1934年1月，她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委员。此后，她与李维汉结为伴侣。

长征途中，金维映曾担任中央纵队干部休养连党支部书记。

长征到达陕北后，金维映先后任中共中央组织部组织科长、抗大第四大队女生区队区队长、抗大女生大队政治协理员、陕北公学生活指导委员会副主任等职。1938年春，前往苏联学习、治病。1941年苏联卫国战争开始后，死于战乱之

中。

廖似光（1911— ） 广东惠阳人。何克全（凯丰）夫人，叶挺的外甥女。1929年加入共青团，1934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长征到达陕北后，曾任陕甘宁边区总工会劳动部部长。后任两广纵队留守处政委，第三野战军、第四野战军后勤部政治处副主任。

建国以后，历任中共广州市委副书记、广东省工业厅厅长、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工业部副部长、中共广东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广东省第四、五届政协副主席等职。廖似光还曾当选为第一至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并担任过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危秀英（1910— ） 江西瑞金叶坪人。从6岁起即当童养媳。1930年参加工农红军。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江西兴国县苏维埃政府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主任。1932年调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妇女部工作。长征途中，曾竭力救助过陈慧清、邓六金等女战友。

长征到达陕北后，曾任中共陕西省委妇女部部长。后奉命前往南方工作，先后任中共江西省吉安中心县委组织部部长，中共赣粤边特委常委兼妇女部部长、中共赣南特委常委兼妇女部部长等。1940年回到延安，先后进入马列学院和中央党校学习。并作为正式代表出席了党的“七大”会议。解放战争时期，到东北工作，先后任中共吉林敦化县组织部部长、中共吉南地委组织部副部长、中共吉林省委妇委书记等职。

建国以后，先后任中共江西省委妇委书记、江西省妇联主任。全国妇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等职。1956年后，任华南农

垦总局副局长、广东省农垦厅副厅长等职。1970年离职休养。后任江西省政协常委。危秀英还是第一至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妇联第二、三届执委。

甘棠（1910—1971） 曾用名甘世英，四川南溪人。上海文治大学肄业。1926年加入共青团，同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曾任中共中央机关交通员、会计，中共中央苏区中央局妇女部秘书等职。

长征到达陕北后，在中共中央妇女部工作。后任中共四川省委妇委书记、中共川康特委妇委书记等职。1940年回到延安，先后进入马列学院、中央党校学习。1947年后，曾任石家庄市妇联主任。

建国以后，曾任全国总工会西南办事处女工部副部长、中共中央西南局妇委副书记、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等职。甘世英是第二届全国妇联执委、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吴富莲（？—1937） 福建上杭人。1930年参加革命，随即入党。曾任中共闽粤赣省委妇女部巡视员、省委妇女部长。在长征途中，吴富莲在湘赣交界处的一次战斗中，曾独自一人承担了掩护指战员撤退的阻击任务，并且胜利返回。

1936年10月，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组成西路军妇女先锋团，吴富莲任政委。在青海的一次作战中，吴富莲不幸被俘。在敌人的毒刑拷打面前，她坚贞不屈，英勇牺牲。

王泉媛 也写作王乾元，江西吉安人。王首道夫人。1930年3月参加革命。1934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少共中央局青年妇女工作干事、中共苏区中央局妇女部委员等职。长征途中，在遵义与时任中央纵队政治部主任的王首道结婚。

1936年10月，王泉媛任西路军妇女先锋团团长。在青海

的一次作战中，王泉媛与吴富莲同时被俘。在敌人的监狱中，王泉媛曾五次越狱，五次被抓回。她坚强不屈，第六次越狱成功，脱离魔掌。由于与部队无法联系，一个人沿路乞讨，回到江西吉安。但她的父母亲怀疑她是逃兵，竟不收留她。她只好隐姓埋名，来到泰和县的一个农村，当了一名普普通通的农民。

杨厚珍（1908—1977） 江西瑞金叶坪村人。罗炳辉夫人。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央机关合作社主任。杨厚珍是30名妇女干部中惟一一名曾裹过脚的小脚女人。在长征路上，她用一双小脚，坚强地走完了二万五千里的漫漫征程。建国以后，杨厚珍在解放军总政治部工作。

刘彩香 江西赣州人。毕占云夫人。中国共产党党员。曾任中共粤赣省委妇女部部长。

长征途中，刘彩香在遵义城与当时担任红九军团参谋长的毕占云结婚。到达延安后，她在一次男女混合跑步比赛中，曾取得三个第一名，成了远近闻名的跑步“女状元”。

萧月华（？—1983） 中共党员。曾任少共中央局干事。1934年，根据组织安排，与第三国际顾问李德结婚。长征到达陕北后，与李德分手。建国后曾长期在湖南工作。

李桂英 中国共产党党员。长征前曾任中共粤赣省委妇女部副部长。

李建华 中国共产党党员。长征途中，任军委二局报务员。

谢小梅 中国共产党党员。罗明夫人。曾任中共闽粤赣特委组织部干事。

钟月林 宋任穷夫人。长征前是中华苏维埃大学学员。长征到达陕北后，与宋任穷结为伴侣。

曾 玉 未被批准随部队转移，自己跟着丈夫随部队行进到遵义后，被编入干部休养连参加长征。

此外，董必武夫人陈碧英是广东人，随部队长征到达湖南后，根据组织决定前往广东从事秘密工作，后不幸牺牲。

30名妇女干部参加中央红军的长征，她们以自己的英雄气概，创造了人类历史的奇迹，也为自己赢得了光荣与辉煌。这篇文章只是抛砖引玉，期望能得到知情者和专家学者的指正补充，使她们的英勇事迹永远流传。

（作者：延安市文物研究所研究员）

红一、二、四方面军的由来 及为何没有红三方面军

齐佩良

“八七”会议后，共产党人在各地相继举行武装起义，红军部队纷纷建立并不断壮大。为了统一指挥，进一步扩大革命武装力量，1930年5月中旬，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了全国红军代表会议，各地红军代表向中央详细地汇报了自己的发展状况。会议讨论了红军的战略战术、党的工作、政治工作、政治委员制度、士兵委员会等问题，决定将各地红军分别集中合编为军团，即把活动于闽西和赣南、湘鄂西、湘鄂赣、鄂豫皖等革命根据地的各部红军，分别改编为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军团。并在这四个军团的基础上，继续扩大红军，然后再把它们编为四个方面军。会议结束后，中共中央又于5月20日至23日在上海召开了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会议，讨论了红军的组织和苏区建设等问题，提出猛烈扩大红军的主张。

1930年6月21日，中央特派员涂振农到达福建长汀，向正在召开的红四军前委和闽西特委联席会议传达了全国红军代表会议和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的精神，以及中央关于整编红军的指示。根据中央指示，会议决定将红四军、红六军（后改称红三军）、红十二军整编为红军第一路军（不久改称红军第一军团），全军团共2万余人，朱德任总指挥，毛泽东任政

治委员；同时成立中共红军第一路军总前敌委员会，毛泽东任书记。随后，由赣西南地方武装改编的红二十、二十二军也归属红一军团建制。红一军团成立后，使赣西、闽西战略区的红军进入集中组织、统一指挥的新阶段，开始由以游击战为主向以运动战为主的战略转变。

1930年7月4日，贺龙率领湘鄂西地区的红四军到达湖北公安县与周逸群等率领的红六军汇合，两支活动于湘鄂西的武装力量胜利会师。7月7日，两军召开联席会议，决定合编为红二军团，贺龙任总指挥，周逸群任总政治委员，孙德清任总参谋长。红四军番号改为红二军，贺龙兼军长，朱勉之任政治委员，部队编成第四师和一个警卫团。红六军以邝继勋任军长，部队编成第十六、第十七两个师。两个军共1万余人，5000余枝枪。并组成以周逸群为书记，贺龙等为委员的红二军团前敌委员会。

1930年6月6日，活动于湘鄂赣的红五军在湖北大冶召开扩大会议，听取出席全国红军代表会和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会的代表滕代远、何长工传达会议精神。扩大会议决定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由红五军和原红三军第五纵队扩编成的红八军组成。彭德怀为总指挥，滕代远为政治委员。红五军军长由彭德怀兼任，政治委员由滕代远兼任；红八军军长李灿（后何长工），政治委员何长工。不久，原红五军留在平江、浏阳一带坚持游击战的第一纵队等组成红十六军，也编入红三军团。红三军团前敌委员会书记由彭德怀担任。

鄂豫皖的红军当时尚未编成第四军团。

第一军团和第三军团组成后，按原定计划应迅速扩大，然后再分别编为第一方面军和第三方面军。但是，1930年8月

23日，第一、第三军团在湖南浏阳永和市会师，两军团前委举行联席会议，彭德怀根据中央关于统一军事指挥的精神，代表第三军团前委提议成立第一方面军及其前委，第三军团编进第一方面军建制。也就是说，红三军团不再扩编为第三方面军。彭德怀还说：“从战略方针来看，我赞成三军团编为第一方面军的建制，统一指挥，这是革命的需要。”一、三军团前委联席会议通过了三军团前委的这一提议，决定将红一、红三军团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简称红一方面军，共3万余人。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治委员，彭德怀任副总司令，滕代远任副总政治委员。中共第一方面军总前敌委员会书记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为委员。同时成立了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统一指挥红军与地方政权，毛泽东任主席，朱德、彭德怀等35人为委员。这样，第三方面军就没有成立。

1930年4月，活动于鄂豫皖边区的红十一军集中改编为红一军，并开辟了鄂豫皖根据地。1931年1月，红一军与红十五军在湖北麻城会师，两军根据中央决定，合编为红四军，共约12000余人。同年11月7日，红四军与活动于皖西的红二十五军在湖北黄安七里坪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全军共3万多人，徐向前为总指挥，陈昌浩为政治委员，张国焘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局书记兼军委主席。

1934年10月，任弼时、萧克、王震等领导的红六军团在贵州印江的木黄与贺龙、关向应等领导的红二军团会师，成立了贺龙、任弼时为首的二、六军团总指挥部。1935年11月，红二、六军团退出湘鄂川黔根据地，开始长征。1936年7月2日到达西康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之后，中央于7月5日发布命令，决定以红二、六军团及红三十二军（原为红一方面

军第九军团）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治委员，萧克任副总指挥，关向应任副政治委员。全军共约 16000 余人。

至此，中国工农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全部组建完毕，第三方面军则未组建。

1933 年秋，中央军委也曾有过把新成立的七、八、九、十这四个军团合编为第三方面军的计划，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由于这四个军团一部分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一部分跟随第一方面军参加长征，所以合编计划未能实现。

（作者：延安革命纪念馆副研究员）

我国授衔的惟一外籍将军——洪水

王晓莉 黄卉青

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实行军衔制。在授衔仪式上，一位外国人格外引人注目，那就是荣获三枚一级勋章的洪水少将。周恩来总理祝贺他时说：您是越南人民的优秀儿子，也是中国革命的功臣。我们将永远记住：您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全过程，是在我国从事革命斗争时间最长的国际主义战士。

洪水，原名武元博，1906年出生于越南河内，早年曾留学法国。1924年底同一些越南爱国青年来到了正处于中国大革命高潮的广州。而胡志明也受共产国际的委派，化名李瑞于此时代到达广州，两人由此结识。在广州，洪水参加了胡志明创办的“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训练班，并与前来讲课的刘少奇、彭湃、陈延年等中共党员结识。1926年3月，洪水由李富春、蔡畅等同志介绍，同刘志丹等人一起成为黄埔军校第四期的学员。

当时，孙中山创立的国民党正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洪水便加入了国民党。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洪水毅然脱离国民党，于1927年8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7年12月，洪水和在黄埔军校工作和学习的30名越南青年参加了广州起义。起义失败后，洪水随叶剑英、聂荣臻等人撤到香港。随后经叶剑英、聂荣臻同意，洪水离开香港，

前往泰国，在旅泰越侨中开展革命活动。

1928年春，时任广东省委军委书记的聂荣臻通过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同洪水取得联系，希望他再次到中国来参加武装斗争。当年6月，洪水第二次来到中国，经聂荣臻介绍，被派到由彭湃、古大存领导的东江游击队工作，先后担任连队指导员、团政委等职务。

1930年初，红十二军在福建成立，洪水从东江派到福建，先后担任红十二军三十四师团政委、师政治部主任。一次在攻打城阳镇前的誓师大会上他说：“现在敌人诬蔑咱们是洪水猛兽，好，我就一反到底，从此大家就叫本人洪水好了！”1932年，洪水又被调到江西瑞金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担任教员。1934年1月，经党中央提名，洪水参加了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当选为中华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之后，洪水被左倾机会主义领导人打成“高级特务”，并被开除了党籍。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离开瑞金开始长征，洪水所在的中央军事政治学校被编入中央干部团，洪水编入直属队，负责直属队在长征途中的宣传鼓动工作。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中央纵队党委撤消了对洪水的处分，恢复了他的党籍。后来洪水说：“遵义会议不仅挽救了红军的命运，挽救了中国的命运，也挽救了我的命运。”

红军一、四方面军会师后，洪水跟随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率领的左路军北上。在左路军北上途中，张国焘寻找种种借口反对北上，要率部南下。洪水坚持支持朱德、刘伯承的正确主张，同张国焘当面争论起来。张国焘恼羞成怒，将洪水打成“国际间谍”，再次开除党籍，甚至妄图将他杀害。多亏朱德、刘伯承的保护，才幸免于难。

在延安，党中央再次撤销了对他的处分，恢复了他的党籍。对此，洪水坦然地说：“这就是革命。如果一个人决心参加革命，就必须经受得住各种磨难和打击，包括被自己的同志误解，否则怎么能成为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呢？”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展开后，洪水调到山西五台县，担任五台县东冶镇四区区委书记。在发动群众、筹款措枪、镇反肃奸等方面，取得了成绩，但也受过颇大委屈。

四区是阎锡山的老家。这里的经济命脉，大都掌握在阎的父亲、岳父、内弟手中。这些人表面上高谈阔论，拥护抗日救亡。实际上既不出力，又不出钱，还扬言“土八路是兔尾巴长不了”。五台区群众气怒交集，纷纷要求洪水带领他们去阎家借钱借枪。阎锡山大为不满，借此再三对八路军施加压力，处处刁难。党中央为顾全抗战大局，撤去洪水的职务，给予留党察看处分。并要求他写出检查，刊登在《抗敌报》上，以免事态继续扩大。当时，党内党外好些人为洪水鸣不平，而他毫无怨言，在处分大会上真诚地表白：“在我党积极争取阎锡山抗日的关键时刻，如果固执己见，搞不好会因小失大。我完全接受党的处分决定。”

1938年3月，洪水又被调到晋察冀抗敌报社任社长。后来，《抗敌报》改为《晋察冀日报》，由邓拓、舒同接替洪水。邓拓十分敬佩洪水的战斗精神，特赋诗《赠洪水同志》一首，为洪水送行：

回首红军创痛深，人间从此任浮沉。
北来壮志龙仙运，南国诗情天下心。
十载风波三万里，千秋血泪一生吟。
东方望眼浪潮急，莫道飘蓬直到今。

在晋察冀，洪水遇见了白求恩医生。洪水会讲英语，两人能直接交谈。白求恩对洪水说：“你来中国已十几年，是老战士了，我才是新兵。”洪水则说：“要说当八路军，咱们都是新兵。”

1938年12月，洪水被调到设在河北省灵寿县的抗大二分校担任政治教育科长和政治教员。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侵略者占领了越南。1942年，越南共产党和胡志明提出希望在中国党和军队中工作的越南同志，能回国参加抗日战争。中共中央认真研究后，决定先调洪水回延安，在中央党校参加整风学习，经过一番休整后再回越南。洪水遂于1943年7月回到延安。

1945年越南八月革命前，洪水和其他即将回国的越南同志抓紧做好各方面准备。洪水还把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和《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等著作翻译成越南文。

临行前，洪水前去向毛泽东、周恩来辞行。洪水向毛泽东行了一个军礼后说：“报告主席，洪水同志即将返回越南，特来向您辞行，请您指示。”毛泽东紧握着洪水的手说：“小洪，我们只能同意你走，那里是你的祖国嘛。条件艰苦，就得艰苦奋斗。我们了解你，你是个好同志。可你到了越南，一定要和越南同志搞好团结。”周恩来也嘱咐说：“现在中国革命的条件一天天好起来，可你要走了。越南的条件仍然十分艰苦。从国外回到越南的干部有两种，一种是从欧洲、苏联回去的干部；二是穿过草鞋的、从中国回去的干部。你回去后要注意团结，注意解决问题的方式。”

洪水于1945年11月初回到河内，为适应越南的斗争和工作环境，洪水又改名阮山。

阮山被任命为越南南方抗战委员会主席。1947年初，又临危受命，到连接北南战场的四联区担任司令兼政委。在这里，他要完成两个使命，既要坚守越南中部的战略要地，又要承担支援全国抗战的重任。洪水虽在中国从事了20多年的武装斗争，有着丰富的经验，但他不是机械、盲目地照搬中国革命的理论词条，而是根据越南的国情和每个战役的特点，灵活地指挥作战。阮山还撰写了不少军事著作，特别是《战术》和《越南革命的战略力量——民兵》两部著作，为越南的革命军事理论奠定了基础。

1948年，阮山被胡志明授予少将军衔。

1950年1月，胡志明主席秘密访问中国，请求中方对越南的抗法战争提供支持。当时尽管新中国刚刚建立，百废待兴，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仍满足了胡志明的要求，决定向越南人民提供全面的援助，并派罗贵波作为中共中央的联络代表赴越工作，为援越事务做好准备。胡志明在会见罗贵波时提出，希望派洪水回中国，以加强越中两党、两国、两军的联络，更好地了解情况，协调援越抗法事宜。

1950年5月，洪水第三次来到中国。5月中旬，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了洪水，并请他住在中南海。不久，洪水被安排到中央统战部二处担任越南组负责人。1951年1月，洪水被调到南京军事学院基本系一期一班，进行正规、系统的学习。1954年夏，洪水以优异的成绩在南京军事学院毕业。起初在中央军委条令局任副局长，年底又调往解放军训练总监部直属《战斗训练》杂志社任社长兼总编辑。

这期间，每遇越南抗法战争的重大战役，中央领导常请洪

水去介绍情况，为中央的援越决策提供更全面的依据。每当中方派军事顾问团到越南工作前，中央也请洪水去给他们上课、介绍情况。

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实行军衔制。由于洪水是黄埔军校的学员，大革命时期入党，在评定军衔时，有关部门为洪水上报的军衔是中将。但由于他是越南同志，中方特征求了胡志明的意见。胡志明认为，洪水的军衔与级别仍以他在越南人民军中的军衔与级别一致为好，所以，洪水最后被定为少将。

1955年9月27日，洪水在接受少将军衔的同时，还被授予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洪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1000多位开国将帅中唯一的外籍将军。10月1日毛泽东在接见观礼的将帅时，询问洪水的授衔情况。当得知他被定为少将时，毛泽东对有关领导同志说：“这不合适，洪水同志是黄埔时期参加军队的，是否可以改为正军级？”于是，洪水被重新定为正军级少将。

1956年初，洪水突然咳嗽不止，经检查，确诊为晚期肺癌。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洪水只有一个愿望，就是回越南。周恩来亲自安排洪水回国事宜。他请国防部长彭德怀和副总参谋长黄克诚批给洪水3万元人民币现金。这在当时是一个不小的数目，有关同志向洪水表示，今后有什么困难，可以再同中方联系。

9月27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叶剑英、黄克诚等领导在政协礼堂为洪水送行。当身体虚弱的洪水身穿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服走进会客室时，毛泽东从座位上站起来迎上前去，紧紧握着洪水的手，请洪水坐在他和周恩来的中间。毛泽东说：“小洪，去年国庆节，我在天安门城楼上看见你的时候，

你还挺好，身体挺结实的，怎么现在出了毛病？我们没有照顾好你，没照顾好。”洪水连忙说：“哪里，主席和中央一直非常关心我，对我照顾得很好了。我和彭总、黄总经常见面。彭总还到家里探望过。叶帅是我的老领导，我们见面的机会就更多了。”谈话中，大家回忆了过去几十年的战斗岁月。毛泽东说：“小洪，你回去后要好好治病，病好了，我们希望你还回来。”

洪水动身前，彭德怀又亲自对护送洪水回国的韩守文秘书说：“洪水同志病了，你们把他送回去。见了胡志明主席，要汇报清楚，洪水同志对中国革命有很大贡献，是积劳成疾，中国人民永远感激他。”

当天，彭德怀、叶剑英、黄克诚、萧克、孙毅等 200 多人及越南驻华大使馆的官员聚集在前门火车站，为洪水送行。中方为他安排的是毛泽东和周恩来乘坐的专列。列车启动时，洪水用尽全身的力气，挥手向人们高呼：“再见了，战友们！中越友好万岁！”

1956 年 10 月 21 日，洪水在越苏友谊医院逝世，终年仅 50 岁。越方为洪水将军举行了隆重的追悼活动。

抗战期间，洪水在山西五台县认识了一位名叫陈玉英的妇女干部。通过工作接触，两人产生了感情。于 1938 年春节前夕在五台县东冶镇举行了婚礼。八路军干部马致远赠给新婚夫妇一首藏头诗：

洪浪汪洋灌台东，水萍邂逅话长征。

玉人素抱抗日志，英雄早怀游击心。

恋君单矛出安南，爱依双刀劈日本。

纪功统一思壮志，念念不忘八路军。

这首诗每句的头一个字连起来就是“洪水玉英恋爱纪念”。

根据洪水的意见，陈玉英改名陈剑戈。

1944年，陈剑戈在延安生下一个男孩，为纪念延安大生产运动的丰硕成果，洪水给孩子取名小丰。当时陈剑戈没有奶水，洪水便给朱总司令写了个报告，希望帮助解决这个困难。于是，朱总司令亲自批示，每天给小丰一瓶牛奶。1945年洪水回越南后几个月，陈剑戈又生下一个男孩。她给孩子取名小越，表示对丈夫的思念。

这期间，陈剑戈担任延安第二保育院的指导员。1947年胡宗南进攻延安时，她带着136个孩子辗转晋西北。就在这时，洪水托一位到中国来的越南同志给陈剑戈捎来一封信。这位越南同志没有见到陈剑戈和孩子，却不知从什么地方听说她们母子三人都被国民党的飞机炸死了。

在艰苦的战争环境里，为了照顾洪水的生活，越南的党组织考虑要为洪水重建一个家庭。1948年夏，洪水在抗法战争的丛林中，同22岁的女青年黎恒熏结婚。

1950年洪水来到北京后才知道，陈剑戈和两个孩子都还活着。他带着极为复杂和愧疚的心情，接连两天把在“六一幼儿园”工作的陈剑戈和孩子们接到中南海。但陈剑戈除了哭泣和静静地坐着，一句话也说不出。她思想斗争极为激烈。从感情上说，她自然不愿意把一个好端端的家庭拆散。但她知道洪水已在越南重新组织了家庭，而且已经有了孩子。陈剑戈最后做出决定，牺牲自己成全对方。她带着孩子返回“六一幼儿园”。后来洪水又去看望陈剑戈和孩子们几次，但在陈剑戈的要求下，洪水在中国的几年，未能再见到陈剑戈和孩子们。

后来洪水曾对他的越南妻子黎恒熏说：“我对得起六万万中国人民，却对不起一个中国妇女。”

陈剑戈同洪水分手后，她忍受着巨大的心灵伤痛，把全部精力扑在工作和抚养两个孩子身上。50年代至60年代，陈剑戈先后担任“六一幼儿园”副院长兼党支部书记、北京市教育局科长兼办公室主任、市妇联常委、市机关党委委员。“文化大革命”中，陈剑戈被打成“叛徒”，遭到多次批斗，直到1981年1月才恢复工作，任北京市教育局副局长。

黎恒熏于1926年生于河内市，是一个温柔、善良的越南女性。婚后生有三男一女。1950年黎恒熏和孩子们来到中国，与洪水一起先后在北京和南京度过了6年安稳、美好的时光。1991年，黎恒熏因患胃癌去世，时年65岁。

洪水将军离开我们虽已40多年，但中越两党和两国人民并没有忘记他为两国革命事业和两国友谊所做出的贡献。中国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叶剑英等到越南访问时，都到洪水墓前凭吊。中国政府对洪水的两个孩子非常照顾，小丰和小越18岁以前，一直享受政府给予烈士子女的生活补贴。每逢过年、过节，历任越南驻华大使都要代表越南政府邀请陈剑戈一家到大使馆共同欢聚。来中国访问的越南领导人，也要在越南驻华大使馆会见陈剑戈一家。

1995年8月，越南劳动出版社出版了回忆录《阮山将军》，当年6月，洪水的大儿子陈寒枫应越南国防部的邀请，对越南进行了5天的友好访问。1998年3月，陈剑戈和两个儿子、儿媳访问了越南，受到了非常热烈的欢迎和十分周到的接待。陈剑戈和两国的孩子们终于在越南女儿阮清霞的家里举行了一次大聚会。

2000年，当代出版社出版了84岁的陈剑戈老人的长篇回忆录《黄河恋、红河情——我与两国将军洪水》。2003年初，

为纪念中越两国建交 53 周年，云南省委宣传部、越南电视台、越南河内广播电视台和云南红河电视台联合摄制了大型纪录片《两国将军》，全面介绍了洪水将军在中国和越南的戎马生涯，以及他对中越友好事业所做出的重大贡献。

（作者：延安革命纪念馆副研究员；馆员）

群众领袖 民族英雄

——纪念刘志丹诞辰 100 周年

刘 滢

延安人民永远不会忘记那个令人心碎的日子。1936 年 4 月 14 日，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西北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刘志丹同志，在率部东征攻打山西中阳县三交镇战斗中不幸牺牲，年仅 34 岁。他为了中华民族的成立、自由、解放，为了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捐躯疆场，流尽了最后一滴血。毛泽东特为他题写了“群众领袖 民族英雄”的挽词。

刘志丹，名景桂，字志丹，1903 年 10 月 4 日出生于陕西省保安县金汤镇一户比较富裕的家庭。父亲刘培基为清末秀才，曾在金汤镇任小学教师。他思想开明，重视对子女的文化教育，使刘志丹从小就有一个好的学习、生活环境，并为其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1922 年，时值五四运动之后，新文化、新思潮的影响波及陕北，刘志丹也于这一年考上陕北二十三县联合创立的榆林中学。在这里，他受魏野畴、李子洲等老师的影响，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由一个爱国主义者转变为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1925 年，刘志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开始了他艰苦曲折的革命生涯。1926 年受党指派，志丹入黄埔军校第四期

步兵科学习军事，毕业后被派往国民联军第四路军马鸿逵部，任党代表兼政治处处长。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反革命的屠刀使中国共产党人明白了一个道理：中国革命要成功，必须用革命武装反抗反革命武装，“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于是，开始了创建革命武装——工农红军的新阶段。南昌起义的枪声，井冈山上的红旗，在茫茫黑夜中点燃了火炬，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希望，“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迅速燃遍了全国。西北红军和根据地的创建也因此有了方向和榜样。先后爆发的清涧起义、渭华起义、旬邑起义等虽然都失败了，但锻炼了干部，教育了群众，使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马明方、阎红彦、马文瑞等一批领导骨干在斗争中成长起来。他们没有悲观失望，而是不断地总结经验教训，寻找新的途径和斗争方式，为红星照耀西北而艰苦探索、英勇奋斗。1928年冬，刘志丹受陕西省委派遣，到陕北特委所在地——榆林参加特委工作，曾代理特委书记。1929年秋，刘志丹又离开特委，以主要精力在国民党驻陕杂牌军中搞兵运工作。1934年5月，几经挫折，正式成立了陕甘边革命军事委员会，刘志丹任军委主席。陕甘边与陕北根据地统一后，志丹为西北工委委员，主要负责西北军委工作。为了培训军政干部，曾成立了红军干部学校，刘志丹任校长。1935年9月，红25军到达陕北后，在永坪镇与西北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1936年2月，红军东征抗日时，刘志丹任红二十八军军长与北线总指挥。

今年10月，是刘志丹诞辰100周年。岁月的流逝并没有淡漠英雄在这块红色土地上创建的伟业和人民对他的深切怀

念，他的优秀品质将永远是激励我们建设好大西北的强大精神动力和广大干部学习的光辉榜样。

刘志丹同志有坚定的革命性，虽在斗争中屡遭失败，但他对认定的奋斗目标，毫不动摇，百折不回。如在皖北、渭华搞暴动均失败，后在驻陕杂牌军谭世林、苏雨生等部从事兵运工作，亦遇许多困难、曲折，几次被反动派打散。特别是在邠县，被苏雨生逮捕，严刑拷打，几乎被杀头。但刘志丹硬是有那么一股“明知征途有艰险，越是艰险越向前”的顽强拼搏精神。1932年终于在陕甘边区树起了武装斗争的红旗。红军创立后，由于外部敌人的“围剿”与内部机会主义路线的干扰，也曾受到重大损失。特别是在杜衡把持红二十六军领导时，搞冒险主义，远离根据地，南下关中平原，使红军在终南山遭到最令人痛心的失败。辛苦聚集的部队人员死的死、伤的伤、散的散，就是在这种身临绝境的情况下，渴饮山泉，饥食野果、南瓜，死里逃生的刘志丹依然百折不挠，信心百倍，会同王世泰等几个主要干部，化装闯关，历尽艰险，返回陕甘边，重整二十六军，继续开展创建根据地的斗争，终于开创了新的局面。如果说对革命的前途没有坚定的信念，是不会有如此顽强的斗争精神的。

刘志丹同志能密切联系群众，作风正派，谦虚诚恳，处处以一个普通一兵的身份在战士、群众中出现，他无论走到哪里，都像冬天的一盆火，群众总是紧紧地围在他的周围。他被称为群众领袖是当之无愧的。他处处把自己看作是人民的儿子，把为人民谋利益当做自己的天职。他每到一地就立即深入群众，把百姓的疾苦随时记在小笔记本上。一次部队驻扎在一个村子里，刘志丹的住处立刻挤满了来看望的群众。一位 70

多岁双目失明的老大娘拄着拐棍，跌跌撞撞地来看老刘。老乡们笑着说：“大娘！你咋能看见咱老刘啊！”她说：“我看不见，还摸不着吗？”刘志丹立即站到老人面前，拉着大娘的手，亲切地说：“大娘，我就是刘志丹。”老人把他从头摸到脚，又从脚摸到头，激动地流着泪，说：“你领咱穷人打白狗子，你是咱老百姓的救命恩人啊！”在场的好多人都感动得流下了热泪。

尽管刘志丹在人民群众和红军中有崇高的威望，正如人们常说的“天旱望云霓，人民盼志丹”。但他始终有清醒的头脑，人民对他愈信任他愈是谦虚谨慎，愈是紧密依靠人民群众；战士对他愈是尊敬、热爱，他愈感到自己肩上担子的沉重，愈是处处注意同战士同甘共苦。他从来都不喜欢人们称他的职务，所以，无论是老乡还是战士，都亲切地称他为“老刘”。他虽为领导干部，既没有秘书，也没有勤务，身边只有一个传令、送信的通讯员。一切能自己干的，决不让别人代劳。

刘志丹同志善于动脑筋，独立思考，自觉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不断总结经验，提高自己的领导水平。陕甘地处偏远山区，交通不便，消息闭塞，因此党中央的文件指示很难及时看到，他便处处注意从陕甘的实际情况出发，在实践中摸索出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策略原则：在军事上，他从敌大我小的现实出发，十分注意保存、扩大红军的力量，自觉地执行了战略上以少胜多，战术上以多胜少的原则；坚持不打无把握之仗，与敌作战，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上山，钻梢林；对不易夺取的敌据点，很少采用强攻手段，一时不能得手，就等条件成熟再相机夺取之。在政治上，他从陕甘的特殊情况出发，巧妙地利用各种社会矛盾，尽量缩小打击面，扩大团结面，如对当时的土匪如何看，他就有自己一套独

到的见解。他对这些因生活所迫而被逼上梁山的土匪，采取了团结争取、教育改造的方针。事实证明这个方针是正确的。陕甘游击队就是在争取贾生财、赵二娃、杨培胜等绿林武装的基础上搞起来的。对暂时不能收编的土匪武装，则采取互不侵犯，保持中立的友好态度，如对夏老吆武装。他为把盘踞在黄龙山上的“山大王”郭宝珊争取过来，曾亲自派人去做工作。他的诚意使郭宝珊深为感动，情愿归顺，将其所部编为义勇军，任命郭宝珊为司令。在斗争中，义勇军成了一支英勇善战的革命武装。他信任郭宝珊，郭宝珊也把他看成最可信赖的朋友、兄长。肃反时郭宝珊也被抓，审讯时问他是什么党，他说刘志丹是什么党，我就是什么党。在陕甘地区，带有封建迷信色彩的哥老会组织有相当势力，在社会、群众中很有影响。为了发动群众，利用哥老会的力量和影响，刘志丹还与哥老会的龙头大爷马海旺结拜为兄弟，成了哥老会的头目，使这个组织为革命武装的发展壮大提供了许多方便。刘志丹在军事、政治指挥才能上的迅速提高与日益成熟，同他注意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思想方法是分不开的。而在当时错综复杂，各方面的干扰纷至沓来的境遇中，在远离党中央，得不到具体指导的情况下，刘志丹能自觉地学习，掌握马列主义的策略原则，时时处处从当地的实际出发，巧妙地将理论与实际结合起来，走井冈山之路，实在是难能可贵的。

刘志丹同志襟怀坦白，有高度的党性修养，为了顾全大局，他忍辱负重，经受了特殊的考验。对一个真正的革命者来说，在战场上、敌人的刑场上是一种考验，某些时候即错误路线时期，受自己同志的误解、甚至遭受诬陷，被强加上种种“莫须有”的罪名直至关押杀头是一种严峻的考验。对于后一

种考验，刘志丹不止一次地经受过。最严重的是 1935 年秋在陕北根据地和红军内部发生的错误肃反。王明路线的执行者们抡起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大棒，硬是要把创建了这块根据地的一批领导同志打下去。刘志丹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一方面坚持原则同他们做了必要的斗争，劝他们不要干亲者痛、仇者快的傻事，另一方面他服从党的组织纪律，为了不使红军发生内讧，把一个完整的西北根据地交给党中央，当他看到逮捕自己的命令后，不动声色，不怕杀头，单枪匹马来到瓦窑堡束手就擒。一个没有坚强党性原则的人，要做到这一点是不可能的。在“左”字号的牢房里，他被戴上沉重的脚镣手铐，受尽折磨而没有怨言。1935 年 10 月，党中央、毛主席率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当了解到错误肃反的有关情况后，立即下达“停止捕人”、“刀下留人”的指示，采取了紧急营救措施。当王首道的中央保卫局接管西北保卫局，找他谈话了解情况时，他不但不喊冤叫屈，怨恨错误路线的执行人，而是诚恳地作了自我批评。他说：“我们远离中央，许多指示文件看不到，只能根据我们自己的理解去做，因此工作中是有缺点错误的。”对他自己的问题，没有什么辩解，只表示他相信党中央会搞清楚的。在召开的被释放同志的座谈会上，有的同志言词激烈，严厉批评错误肃反的执行人。刘志丹又出面做工作，说这些同志也是为了革命，应该以大局为重不计前嫌，加强团结，搞好工作。他这种宽阔的胸怀，光明磊落的气度使大家深受感动。周总理曾不止一次地对大家说：“刘志丹同志对党忠贞不贰，很谦虚，最守纪律，他是一个真正具有共产主义品质的党员。”

刘志丹同志的牺牲是中国革命的一大损失。毛泽东为志丹陵亲笔题词中写道：“我到陕北和刘志丹只见过一面，就知道

他是一个很好的共产党员。他的英勇牺牲，出于意外，但他的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精神永远留在人民中间，不会磨灭的。”同时题词赞誉他为“群众领袖 民族英雄”。

在纪念刘志丹同志诞辰 100 周年的时候，我们缅怀烈士，追忆他的生平，学习他的崇高精神和品质，是想告诉后来者：有的人活着，在人民眼中他却死了；有的人死了，在人民的心里他却永远活着。刘志丹就是这样一个永远活在全国人民心里的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共产主义战士、人民的好儿子。

“正月里来是新年，陕北出了个刘志丹。刘志丹来真勇敢，他带着队伍上横山，一心闹共产……”流传至今的刘志丹的许多革命故事和颂歌，正是历史和人民给予这位杰出革命家的最公正的评价！

上下五千年
英雄万万千
人民的英雄
要数刘志丹

1943 年，周恩来为新落成的志丹陵的题词，代表了党和人民的心声。

延安自然科学学院对陕甘宁 边区经济建设的贡献

刘卫平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共产党在延安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进行了长达13年的艰苦卓绝的斗争。特别是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面对极其严重的生存危机，中国共产党领导着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军民，自己动手，艰苦创业，逐渐建立了自己独立的经济体系，不仅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对边区的经济封锁，而且为夺取革命胜利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及精神基础。而在独立自主经济体系的建立中，延安自然科学学院做出了十分显著的贡献。如今，回顾延安自然科学学院这段光辉历史，就是要学习自然科学学院不畏困难、艰苦创业的精神，以弘扬光大中华民族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

一、延安自然科学学院的创立

1938年10月，日军侵占广州、武汉后，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军把主要力量转移到了解放区战场。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后，掀起了新的反共高潮。国民党在不断制造军事摩擦的同时，对陕甘宁边区进行了全面的经济封锁，给边区的财政经济和人民生活造成了空前困难。诚如毛泽东所说的，边区几乎到了“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

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的严重地步。为了粉碎国民党的封锁，建立边区独立自主的财经体系，1939年5月，中央决定成立延安自然科学学院（创办初期称延安自然科学研究院）。这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理工科大学，李富春、徐特立、陈康白、李强先后任院长至1945年11月迁移张家口。延安自然科学学院在延安六年多的时间里，学院师生因陋就简，因地制宜，克服重重困难，一边教学，一边生产，一边研究探索，为边区的经济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

延安自然科学学院的成立，开启了中国共产党重视和发展自然科学的序幕。在中央的关怀与努力下，自然科学学院几乎汇集了边区全部科技精英，像屈伯川、陈康白都是留德化学博士。第二任院长徐特立更是一位资深望重的教育家。在极端艰难困苦战争的环境下，他们同甘共苦，齐心协力，为边区的经济建设付出了艰辛的劳动。

自然科学学院设大学、预科和补习班。大学部设有化学系（后改为化学工程系）、物理系（后改为机械工程系）、生物系（后改为农业系）、地矿系（1944年并入化学工程系）四系，在校人数曾达300多名。学院后来并入延安大学，院址也曾迁过两次，但自然科学学院始终如一地走在经济建设的最前沿。

二、发明马兰草纸，党的声音传四方

1939年1月起，由于纸张的短缺，党的方针政策的宣传，文件的印发，中央机关和各学校的办公学习都遇到了很大困难。边区仅有的一家造纸厂——振华造纸厂因原料短缺只能维持很低的产量，根本无法满足边区用纸的需要。1939年9月，自然科学学院（时称自然科学研究院）派出华寿俊前往位于安塞

县的振华造纸厂展开研制工作。

振华造纸厂一直用麻为原料生产纸张，国民党的封锁使纸厂几乎断了生产原料，华寿俊的首要任务就是找到一种在边区有丰富资源的新的造纸原料。经过初步考察研究，他把注意力放在了长得漫山遍野的马兰草上，并立即开始了试制工作。他把马兰草切成一寸长的短节后放进蒸煮锅用碱法分解纤维，再经过打浆抄纸试验，历时两个多月，终于试制出了马兰草纸。接着，华寿俊一鼓作气，又经过反复试验和改进，逐步完善了生产工艺，为马兰草纸的生产铺平了道路。这一成功发明使这种牛羊也不吃的马兰草顿时变成了宝贵资源。边区群众被迅速发动起来，纷纷上山割草，成捆的马兰草被源源不断地运往造纸厂。

由于缺乏机器设备，生产只能依靠手工作业。正式生产时，已是寒冷的冬季，在厂长刘成的主持下，华寿俊和工人一起迎着刺骨的寒风，破冰洗浆。在生产实践中，华寿俊鼓励工人大胆创新，涌现出了刘福学、陈树铭、刘安治、杨双成等一批优秀技术工人。由于工艺得到了改进，原料供应充足，大家的生产积极性高涨，纸产量迅速由过去每人每天生产 500 张四开麻纸提高到生产 1000 张对开马兰草纸。在生产实践中，大批技术工人迅速成长起来，一年后产量即达到原来的好几倍，为《解放日报》和整风文件及“七大”会议文件的印刷提供了充足的纸张。后来，振华造纸厂又建了一座规模为总厂两倍的分厂，从而满足了边区机关学校和普通民众的用纸需要。1942 年，朱德巡视南泥湾时作得一首诗中曾说：“农场牛羊肥，马兰造纸俏。”

三、研制钞票纸，经济基础获保障

继马兰草纸成功发明后，钞票纸的研制生产，使边区独立自主经济体系的建立得到了最基本的保障。

1940年10月，自然科学院成立了以华寿俊为负责人的钞票纸研制小组。

与普通纸相比，钞票纸要求两面光洁，经久耐磨，便于套印。这种特殊需求，使得制造钞票纸的原料必须具有纤维长、强度大、韧性好，既细又柔的特性。华寿俊先后用短棉、碎布、绳头、线麻、苕麻做过试验。鉴于苕麻具有上述特性，在边区产量也大，民间又有种植、剥麻、浸麻的悠久历史，华寿俊决定以苕麻为原料试制钞票纸。他和参与工作的同志自制切麻机、滚纸机，借来打浆机，一步一步地试验，一关一关地突破，经过艰苦的探索努力，终于试制出了钞票纸。随之，边区银行决定在延川县永坪建立钞票纸厂。

自然科学院立刻派武可元、陈少丹带领一批青年学生编制生产程序，并进行钞票纸厂的勘测设计与施工。他们昼夜拼搏，筑坝凿渠，安装设备，修建厂房，以水为能源，通过水轮牵引机器转动，成功生产出了钞票纸。生产第一天，厂里热闹非凡，在水流的狂吼声，机器的转动声，蒸煮锅的沸腾声，震天响的锣鼓声中，滚纸机压出一张张洁白平整的钞票纸。它意味着边区实现自给自足的经济向前迈出了最坚实的一步。

四、改进打盐工艺，边区盐业焕新姿

三边盐池地处毛乌素沙漠，唐朝即开始出盐，开采历史十分悠久。盐池包括北大池、沟池、奥包池、莲花池、汉滩池、

红岩池、盐场堡、滥泥池、花马池、娃娃池等十个盐池。这十个盐池犹如镶嵌在茫茫荒漠上十颗璀璨夺目的明珠。然而，由于开采方法落后，经营不善，盐产量很低，无法满足边区军民的需要。为了解决盐荒，中央决定改进打盐技术，扩大食盐产量。

1940年8月，自然科学院副院长陈康白博士带领陈宝诚、华寿俊奔赴三边。他们首先来到盐池之一的花马池。从盐民那里，他们听到了关于“海眼”的传说。盐民告诉他们，“海眼”一直通向大海，人一旦陷进去，便会葬身大海之中。这引起了陈康白他们的注意。第二天，他们即来到花马池旁的沙滩上寻找类似盐池里的“海眼”，同时，勘测盐池纵深和盐壳的厚度。两三天后，他们找到了几处“海眼”。经过仔细观察分析，他们揭开了“海眼”的秘密。原来，“海眼”是盐壳下面水液的出气孔，是由水气冲开沙子形成的。为了测量“海眼”的深度，他们将木花杆一根接一根地捅下去，一连捅了八九根都未探到“海眼”底，松开手时，木花杆旋即从“海眼”冒了上来。这说明“海眼”中盐水的浓度很大。陈康白立即展开工作。他组织盐民把“海眼”挖成水井口般大的口径，又修建了十余处一亩一块的盐田，然后用吊桶从“海眼”中取出水倒进盐田。次日，满地的黑水变得透彻清亮，白色的盐花在水中不停地翻滚。又过了一天，洁白的盐花全部沉积到水底，白雪般的精盐结了厚厚一层。把这些精盐送到晒盐场“老化”，两天后即成成品盐。

祖祖辈辈靠打盐为生的盐民从来没有见过如此新鲜的打盐方法和如此好的精盐，这极大地鼓舞了盐民的生产积极性。在陈康白、陈宝诚、华寿俊的精心组织和指导下，盐田规模迅速

扩大，三个月产盐即达数万斤。接着他们又制定了简要的生产程序，拟定了沙漠变盐田的生产计划，这时，华寿俊回延安汇报工作，陈康白和陈宝诚留下来继续组织指导生产。

中央闻讯三边打盐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后，立即调集近卫军300余人，开赴盐池帮助生产。由于采用了科学的新方法，平均每年只打两次盐的历史成为过去。三边打盐在严寒的冬季开展的轰轰烈烈。边区政府迅速成立了盐场。这标志着边区盐业开始了新的发展历程。

五、组织森林考察，献计献策党中央

森林考察是由生物系组织实施的。

1940年6月14日至7月30日，由乐天宇、郝笑天、曹达、林山等6人组成的森林考察团，途经甘泉、延安县、富县、合水、华池、曲子、志丹、靖边、安定、安塞、绥德、清涧、延长、延川、固临等15县，经过历时46天的考察，初步掌握了边区林区分布情况及森林环境对陕北气候和农业的影响，并采集了2000余件标本，回延后据此编写了《陕甘宁边区植物志》。

这次考察的一个重要收获是为南泥湾的开发找到了依据。在考察中，队员发现南泥湾的荒山荒地非常适宜于农业种植，于是返回延安后，考察队即写了开发南泥湾的建议方案，呈送中央。这个方案引起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毛泽东亲自找乐天宇探讨南泥湾的开发问题，并派王首道赴南泥湾实地考察。至秋天，朱德又与乐天宇及生物系同学去南泥湾作进一步考察。不久，南泥湾垦殖处成立，三五九旅开进南泥湾。通过一年的开荒屯田，就把南泥湾建成了“陕北江南”。

1941年5月和1942年，乐天宇带领生物系全体师生分别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森林考察。通过这两次考察，考察队掌握了陕北林业兴衰变迁的历史，同时，帮助一些居住在林区深处的群众解决了卫生饮水问题。在考察中，老师学生把书本知识、教学与实际有机地联系起来，效果颇为明显。

根据考察所掌握的情况，立足服务人民生活，1944年，农业系（即原生物系）成立植棉小组，开荒种地，实现了粮食蔬菜的自给自足。1945年，农业系又在子长县杨家园则建立了实验农场，种植的糖萝卜丰收后，农业系师生经过三个多月的日夜奋战，用土法制造出了8000斤红砂糖，使边区人民吃上了自己生产的红糖。

六、开展地质勘探，矿产开采有依据

对边区地矿所开展的勘探主要是由延安地矿学会组织实施的。1941年9月18日至10月9日，地矿学会在会长武衡（自然科学院地矿系老师）的带领下，对延长、延川、安定、清涧等地的地质构造、矿藏资源进行了22天考察。考察队回延安后于29日在自然科学院科学馆召开了总结座谈会。徐特立在会上讲了话，他在肯定考察的学术价值时指出：“今后应更加努力工作，在各机关政府帮助下，使地矿学会能多多做实地考察工作，且帮助政府解决一切工业原料问题。”座谈会最后决定由武衡、汪鹏、英汉组成考察团，重点解决煤和铁的原料问题。

考察团于11月28日由延安出发，前往关中一带进行了历时70天的考察，行程达1000公里。武衡据此撰写了《关中分区的地质及矿产》的考察报告，就考察区域的地理状况、地质

历史、地质构造、矿产资源作了较为详细的论述。

这次考察的成果集中在衣食村一带，探明可开采煤 2 万万公吨及储量较丰的赤铁矿和褐铁矿、石灰石。虽然当时因为客观环境所限未能依此建厂，但这次考察对地质人才的成长和解放后的社会主义建设仍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此前的 1940 年冬，汪鹏曾赴延长进行油井的勘察与选位。在大量收集资料的基础上，他在七里村选定了五口井位。在油厂厂长陈振夏领导下于 1943 年 7 月打出一口喷井，1944 年 1 月打出第二口喷井，满足了边区石油供应。

自然科学院除参加地矿学会开展的地质勘探外，自己也组织过独立的地质勘探队。1942 年秋天，这支勘探队首先对桥儿沟煤矿进行了考察，查明了该矿的地质情况，并获取了一些重要数据。然后又到城东的四十里铺实地考察，通过钻探查清了地质情况，采集到主要数据后又对两地间的大地进行测量，再进一步观测地层走向后绘制出该地区的地形地质图。通过比较分析，勘探队得出四十里铺地下有可开采煤层的结论，并推算出煤层距地面的大致距离，为煤矿的开发提供了有力的理论依据。时任中央军委军工局局长的李强听取勘探队的汇报后，做出了开发四十里铺煤炭资源的决定。

七、全面兴办企业，工业体系建立

机械实习工厂是自然科学院兴办的第一个工厂。1940 年春，自然科学院接收了当时仅有几个人的油灯厂，将其改造成为学院的实习工厂。由于机器设备的缺乏和工具的稀缺破旧，工厂在一段时期内只能生产煤油灯和为其他工厂修配零件。1942 年起，条件有了改善。工厂先后设立了金工、锻工、钳

工、木工，产品也变得丰富多样起来，有大批量的铸铜扣子，有煤油灯头、洗脸盆等日用品，还有曲轴、螺钉、螺帽等机器配件以及铜模具、钢模具和各种证章。值得一提的是，工厂为振华造纸厂生产的大蒸锅，直径达3米，高达4~5米，容量达万斤。这一大型设备的生产制造为振华造纸厂扩大生产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3年11月，学院迁至桥儿沟后，机械实习工厂移交给了难民工厂。1944年6月，学院迁至文化沟后又新建了机械实习工厂。这时，工厂的生产技术有了明显提高，他们为棉装生产的10万颗铜扣，美观大方，坚固耐用，受到朱德的嘉奖。其他产品也趋于精细化，他们生产的医用器械，如止血钳、手术刀、各种型号的镊子等，既美观，又实用，值得一提的是，这些质量要求较高的器械基本上靠手工生产，像制造镊子，就是将道轨截成小片后再用手锉成各种型号，再用熨锡的方法防锈。这些今天看来十分简单的产品，在当时都是在克服许许多多困难后完成的。

化学实习工厂是自然科学学院创立不久建立的又一个工厂。该厂先后制成肥皂、火柴、砂糖、玻璃等产品，成果颇丰。以该厂为辐射中心，酒精厂、玻璃厂、高炉炼铁厂陆续建成。化学系的师生以化学实习工厂为基地，在简陋的木棚里，制造硫酸、硝酸，从煤焦油里提炼甲苯，进行TNT的硝化实验，将分馏得到的苯硝化成苦味酸（即黄色炸药）；用蓖麻油和石灰合成钙皂，再从钙皂中提取甘油。这些产品都是当时急需的军工产品，有力地支援了八路军的抗战。玻璃厂制造出了针管、疫苗管、瓶子等医用仪器，还生产出了灯罩以及供化学工业使用的一些玻璃器皿。这些产业的兴起为边区建立起较为完整的

工业经济体系起到了切实有力的推动作用。

总之，提到边区工业体系的建立，就无法抛开自然科学学院，那些由边区政府或中央机关负责建设的工厂，绝大部分与自然科学学院有难以割裂的联系。新华化学厂厂长由屈伯川兼任，玻璃厂厂长是林华等。除此之外，自然科学学院的老师经常去工厂帮助解决技术问题，指导工厂生产；学员也经常去工厂参加生产劳动，同时也参加一些新厂的建设。他们具有多重身份，集老师、学生、工程师、技术员、工人于一身，在不同的领域中创造着一个又一个辉煌。他们制造了陕北第一台水车，设计修筑了陕北第一大坝，研制了日晷，这一系列的成就至今仍闪耀着科学的光芒。

八、回顾历史，再铸辉煌

陕甘宁边区独立自主、自给自足经济体系的建立，是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战争环境下进行的，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展的一次成效颇丰的艰苦创业历程。在这一奋斗过程中，延安自然科学高擎科学技术的旗帜，以服务抗战、服务民生为己任，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开辟了一片视野无比广阔的崭新天地，并为新中国积累了一大批科技人才。如今，这所诞生于延安黄土坡上的高等院校，经过几十年的建设，已矗立在首都北京，并以其宏大的气势和勃勃生机展现在世人面前。那些当年在延安奋战过的自然科学学院的师生员工，在为新中国的科技事业倾力奉献之后，或已进入耄耋之年，或已谢离人世，但他们的名字将和自然科学学院一样是不朽的。

今天我们所从事的经济建设，不仅有和平安定的社会环境，更有现代科学技术的支持，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征途

中，如何恢复和发扬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的优良作风，不仅是党也是整个中华民族面临的严峻课题。延安自然科学学院艰苦奋斗的历史无疑能给我们许多启示。

（作者：延安革命纪念馆馆员）

转战陕北中的西北野战军

栾锦萍

国民党在做好对解放区全面进攻的准备后，于1946年6月以大举围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先后向山东、冀中、晋南等解放区发起了全面进攻，挑起了规模空前的反革命内战。

解放区军民以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善于斗争，善于胜利的气概对来犯之敌以迎头痛击，从1946年7月—1947年2月的8个月中，我军平均每月歼敌8个旅，共歼敌71万人。这使国民党的兵力大为减少，士气日益下降，进攻能力锐减，被迫停止了全面进攻。

蒋介石在全面进攻失败以后，从1947年3月开始，改为对我陕甘宁边区和山东解放区实行重点进攻，企图挽救他的军事失败。

1947年3月13日，蒋介石令胡宗南指挥23万兵力，向党中央所在地延安进犯，逼迫党中央退出西北，然后调动兵力进攻华北，以达到其各个击破的目的。其具体部署为：以胡宗南部的南线突击集团为主攻，用7个旅组成右翼兵团从宜川向延安突击，用8个旅组成左翼兵团从洛川向延安突击；另以10个旅从西南，以两个旅从北面，分别配合南面胡宗南集团夺取延安，力图消灭中共中央党政军首脑机关或将其逐过黄河以东。当时，西北野战军在陕甘宁边区只有2万多人，中共中

央根据敌我态势决定：先诱敌深入，适时放弃延安，在延安以北的山区创造战机，逐步消灭国民党军有生力量。

3月13日，国民党军南线部队从宜川、洛川分两路向延安发动进攻，先以飞机轮番轰炸延安及陕北一些城镇，然后在猛烈炮火下实施多路进攻，企图在3天内攻占延安。西北野战军决心依靠牢固的群众基础及有利地形，在延安以南组织运动防御，以迟滞、消耗国民党军队，掩护党中央及机关、学校、群众安全转移。具体部署为：以教导旅等部3个团5000余人的兵力，在郃县（富县）临镇以北设置两道防御地带：第一纵队及新编第四旅为战役预备队在郃县西南待机，第二纵队在延安以东地区随时准备实施机动作战。西北野战军第一线防御部队依托第一、第二防御阵地交替掩护，节节抗击来犯之敌，延属军分区独立团和民兵游击队的地雷战、游击战密切配合作战。国民党军队在付出了巨大代价后于3月15日通过了第一线防御阵地。西北野战军随即将战役预备队展开，继续对敌人进行抗击。至3月18日，中共中央及延安的各机关、学校已转移完毕，西北野战军于3月19日主动撤出延安。这次战役，共歼敌5000余人，打击了进攻延安之国民党军的气焰，成功地掩护了机关、学校安全撤离，为此后打击敌人创造了条件。

撤出延安后，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继续留在陕北。同时，为了工作上的便利，成立了以刘少奇为书记、朱德和其他一部分中央委员组成的中央工作委员会，经晋绥解放区进入晋察冀解放区，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党中央和毛泽东仍留在陕北这个事实，极大地鼓舞和增强了解放区军民的战斗意志和胜利信心。

1947年3月16日，中共中央决定以第一纵队、第二纵

队、教导旅、新编第四旅组成西北野战军，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习仲勋为副政治委员。20日，西北野战军指挥机关在延安梁村正式成立，张文舟任参谋长，王明柱任副参谋长，徐元清任政治部主任，刘景范任后勤司令。

敌人占领延安以后，西北野战军在彭德怀、习仲勋率领下，依靠边区地形复杂、群众条件好、回旋余地大等有利条件，采用“蘑菇”战术，时南时北，忽东忽西，不断与敌人周旋，拖得敌人筋疲力尽，然后集中优势兵力予以歼灭。

西北野战军撤离延安后，集结隐蔽在延安东北的青化砭一带。而以一个营（三五八旅二团二营）的兵力，摆成要决战的样子与敌保持接触，边打边退，将敌主力诱至延安西北的安塞地区。敌人占领延安后，为保侧翼安全，派三十一旅沿咸榆公路北进；3月25日进入我军伏击圈。我军以6个旅2万余人的绝对优势兵力，将敌拦头截尾，两面夹击，经过一个多小时激战全歼敌三十一旅旅部和一营，共2993人，活捉旅长李纪云。首战告捷，狠狠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

青化砭战斗后，敌人发觉我军主力在延安东北便调头东进，用11个旅的兵力与我军决战。敌人采用“密集平推”战术，不走大道走山梁，以免被我各个歼灭。这时，西北野战军主力集结在蟠龙西北地区捕捉战机，而以小部兵力在地方游击队的配合下，牵着敌人的鼻子“蘑菇”，依靠山头摆出阻击架势，常常是等敌人摆好了阵势，我军就撤出了战斗。敌主力经延长、延川、清涧到瓦窑堡，一趟武装大游行，走了200公里，历时13天，拖得既疲劳又缺粮，仍未发现我军主力，便留一三五旅守备瓦窑堡，主力南下蟠龙补给。敌人分散兵力为我军提供了战机。西北野战军获悉敌要赶我北上的企图，便以

三五八旅、新四旅两个旅的兵力节节抗击，将敌主力牵向瓦窑堡西南方向，主力埋伏在瓦窑堡以南的羊马河地区待机歼敌。4月14日，敌一三五旅南下配合主力作战，路经羊马河地区时，该旅4700人被我军包围歼灭，敌代旅长麦宗禹被活捉。

7月15日，毛泽东在安塞县王家湾发出《关于西北战场的作战方针》的指示，指出继续坚持“蘑菇”战术，是我军最后战胜敌人的必经之路。

西北野战军遵照毛泽东的命令，撤至瓦窑堡至清涧大道以南地区，隐蔽待机，并投合敌人急于赶我北上过黄河的意图，由三五九旅扮成整个西北野战军，旅部扮成西野司令部，摆出仓皇北上、东渡黄河的样子，将敌主力9个旅诱至绥德。5月2日，西北野战军以4倍于敌的优势兵力，向敌重要补给站蟠龙发起攻击。广大指战员英勇奋战，经过两天三夜激战，于4日攻克蟠龙，全歼守敌一六七旅6752人，敌旅长李昆岗被俘，并缴获山炮1门、军衣40000余套、面粉12000余袋、骡马1000多匹，大大地补充了我军，挫败了敌人的锐气。当敌主力得知后方告急，从绥德折回蟠龙救援时，我军已撤至安塞地区休整了7天。当时新华社有一首讽刺胡匪惨败的打油诗：“胡蛮胡蛮不中用，咸榆公路打不通。丢了蟠龙弃绥德，一趟游行两头空。六千官兵当俘虏，九个半旅像狗熊。”

在我军撤离延安后的40多天里，毛泽东以胸中自有雄兵百万的伟大气魄，指挥西北野战军三战三捷，歼敌15000多人，给蒋胡匪军以沉重打击。

蟠龙战役后，胡宗南发现我军主力在延安以北地区，便放弃守绥德，援晋南，企图配合清剿关中之敌与宁夏东犯之敌，聚歼我军于安塞境内。为了粉碎胡宗南的阴谋，5月到7月，

西北野战军突袭陇东，收复了三边失地，取得了重大胜利。

8月上旬，为了策应晋冀鲁豫解放军，陈赓兵团南渡黄河，挺进豫西，配合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毛泽东命令西北野战军佯攻榆林，调胡宗南主力北上。敌人兵分两路增援榆林，东路刘戡率二十九军和第一军九十师共7个旅，沿咸榆公路向北进至佳县地区。西路敌军钟松率三十六师经志丹、吴旗、横山，沿长城绕到榆林背后，妄图夹击我军于榆林。而我军集结于米脂沙家店地区，捕捉战机。为了诱惑敌人，西北野战军以小部队掩护后方机关东渡黄河。敌人误认为我军仓皇东渡，胡宗南便下了“迅速追击，勿失此千载良机”的命令，于是两路敌军争向佳县进犯，妄图将我军主力压缩于佳县西北地区，迫我东下，以收半渡而击之效。敌三十六师援榆扑空后，钟松自以为援榆有功，异常骄傲，故远离大部队，孤军南犯，被西北野战军以4倍于敌之兵力分割包围于沙家店以东至常高山之间20华里的地区。敌东路主力也被西北野战军阻击于佳县乌龙堡以南地区，使敌东西两路主力不能照应。8月20日下午，毛泽东在佳县梁家岔亲自用电话指挥我军对敌三十六师发起总攻，全歼该师6000余人。沙家店战役是西北战场的伟大转折点。这次战役彻底粉碎了蒋介石对陕甘宁边区的“重点进攻”，我军由防御转入战略进攻。沙家店战役胜利后，毛泽东又一次为彭德怀题写了“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的赠诗。

1947年末—1948年初，胡宗南为确保对延安的占领和阻止西北野战军南下，将整编二十九军所辖整编第二十七、九十、七十六师，分驻洛川、黄陵、宜川、韩城等地。西北野战军决心集中5个纵队发起宜川战役，并确定采取围城打援的战术，即以一部兵力围攻宜川城之守敌，诱使敌整编二十九军主

力来援；以一部兵力进入适当区域，待机歼灭敌援军。1948年2月12日，第一、第三、第四、第六纵队分别自志丹、绥德、米脂等地出发，于16日进至甘谷驿、延长等地进行战役准备。20日，彭德怀发出宜川战役命令。22日，担负围攻宜川守敌的第三、第六纵队向宜川城攻击前进，至27日突破敌外围防御，将敌压缩于城内。24日，第一、第四纵队进至宜川城以西、瓦子街以北地域，待机增援。16日，第二纵队由禹门口强渡黄河，向宜川城南之圪台街地区开进。胡宗南得知宜川城被围，急令刘戡率4个旅由洛川、宜君出发向宜川驰援。2月24日，我军猛攻宜川，守敌告急。27日，刘戡率部沿洛宜公路进至瓦子街以西地区，怕中我军伏击，停滞不前。这时我军又猛攻宜川，守敌再次告急，胡宗南坚令刘戡驰援，不得迟误。28日，刘戡部24000余人到达瓦子街时，被我军包围并全部歼灭。3月3日，我军攻克宜川城，歼守敌5000余人。宜川、瓦子街战役歼敌28563人，刘戡也毙命于战场。

宜、瓦战役后，西北野战军进至黄龙山区，连克10县，延安成为孤城。4月20日，胡宗南向何文鼎下达撤离延安的命令，敌两个旅连夜弃城，狼狈逃窜。22日，西北野战军光复延安，胡宗南占领仅一年一月零三天后，延安又回到了人民的怀抱。

转战陕北历时一年零五天，毛泽东与中央机关行程2000余华里，领导西北野战军以少胜多，歼敌近10万人，粉碎了敌人的“重点进攻”，有力地支援了其他各个战场。

宜、瓦战役后，西北野战军开始了外线反攻，全国战局也发生了根本变化。为了组织战略决战，加速解放战争胜利的进程，1948年3月23日，党中央及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

东渡黄河，前往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

（作者：延安革命纪念馆馆员）

萧三及其撰写的《毛泽东传》

江 林 高慧玲

萧三，是第一个为毛泽东写传的中国人。其一生颇具传奇色彩。

他出生于与湘潭相邻的湘乡县，和毛泽东是同乡，又是中学时代的同学，比毛泽东小3岁。在学校时他们一起组织了著名的进步社团“新民学会”，1918年8月同赴北京，1919年7月回湖南，又一起创办《湘江评论》，曾一同上街卖报。1920年5月毛泽东在上海送萧三等人去法国勤工俭学，临行前两人同去拜见过孙中山和廖仲恺。1922年萧三在法国经胡志明介绍加入了法国共产党。以后在延安，在西柏坡，萧三和毛泽东都保持了亲密的接触，私交很好。萧三对毛泽东的身世，尤其是青少年时代的情况很熟悉，这对他日后撰写《毛泽东传》是个非常有利的条件。

萧三于1927年到1939年在苏联生活了12年，从1930年起他担任中国左翼作家联盟驻莫斯科的代表，经我党批准他加入了苏联共产党，历任两届苏联作家协会党委委员，并出席了高尔基主持的第一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作家上台发言。中国现代文学馆至今保存着他这份登在苏联报刊上发言的俄文讲演稿的剪报原件，并附有他的头像。

1936年，斯诺进入陕北苏区，采访了毛泽东，并将采访

记在伦敦《亚细亚》杂志上以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发表。这就是日后《西行漫记》中的毛泽东自述部分，又称《毛泽东自传》。同年11月，《毛泽东自传》由汪衡翻译在上海黎明书局出版。不久，萧三在完全不知道斯诺的《毛泽东自传》的情况下，在莫斯科用俄文撰写了《毛泽东传》，并在1939年回国前，先后两次发表。这是中国人撰写的第一个毛泽东传。以后，萧三一直想在俄文版基础上用中文创作一部正规的《毛泽东传》。1939年刚回到延安，他就直接向毛泽东提出要求，约在方便的时候谈谈，以便增补、修改。1943年，为庆祝毛泽东50岁生日，任弼时要求萧三继续写作《毛泽东传》，作为祝寿的礼物。为此，萧三多次找毛泽东交谈，并走访了几十位老同志，写出了初稿，转呈毛泽东审阅。无奈毛泽东坚决反对做寿，主张以后再出版。1946年萧三在晋察冀《时代青年》上发表了其中毛泽东的“儿童时代”和“青年时代”两章。1947年萧三到西柏坡后，又补充访问了许多知情的老同志，将修改稿交中央领导审读，广泛征求了他们的意见。1948年毛泽东到达西柏坡之后，萧三遂以《毛泽东同志·儿童时代·青年时代与初期革命活动》为题正式出版了这部传记，简称《毛泽东同志》。1949年3月，萧三将书名正式改为《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交新华书店出版。共109页，竖排。此外，1946年7月1日在中国共产党成立25周年之际，萧三在张家口《北方文化》上发表过一篇题为《毛泽东同志略传》的文章，约6400字，是一篇非常有概括性的传记文章。其有四个特点：一，也属于出现最早的毛泽东传略；二，由1893年写到1946年，涵盖时间较长；三，评价比较到位，而且充满了革命激情；四，行文严谨，考究、正规。

萧三是一支热情的“革命号角”，他的诗，他的译作，他在国际文坛上的活动，他的《毛泽东传》和《毛泽东略传》，都是他奏出的时代最强音。

（作者：延安革命纪念馆馆员）

浅谈周恩来延安时期 对统一战线的重大贡献

董玉梅

周恩来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先驱，是民主革命时期统一战线的倡导者和组织者，是新中国统一战线事业的卓越领导人。长期致力于统战工作的周恩来，在延安时期，不仅成功地完成了对中国革命具有历史意义的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重大历史使命，而且从理论上比较系统、科学地总结了他在统一战线工作中长期积累的丰富经验，使之成为一个完整的体系，成为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革命的过程中克敌制胜的三大法宝之一。

—

红军长征以来，国内外的政治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客观形势的迅猛发展，迫切要求中国共产党对变化的形势有一个科学的分析，制定出一个正确的政治路线和策略来。因此，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根据马克思主义策略思想和共产国际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精神，认真讨论了民族统一战线、抗日联军和国防政府等问题，详细分析了当时政治形势的基本特点和中国社会各阶级在新形势下的政治动向，阐明了建立广

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可能性。25日，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和《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会议还决定设立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周恩来为书记，叶剑英为副书记。这次会议是中共中央继遵义会议之后召开的又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也是中共中央初到陕北仅两个多月，随着根据地局面的初步稳定，所召开的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瓦窑堡会议不失时机地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使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即将到来时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动权。它表明，中国共产党在总结革命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已经成熟起来，并且能够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创造性地进行工作。

那么，为什么中共中央刚到陕北仅两个来月，就要设立东北军工作委员会这个机构呢？笔者认为原因有两个：一是红军到达陕北后，集结在陕甘苏区周围的国民党军队众多，有东北军（60个团）、十七路军（20个团）及宁夏马鸿逵等部队。这些部队离红军防线距离最近的主要是东北军，而东北军自从“九一八”事变后，深受家乡沦陷之痛苦，已不再愿意同主张抗日的红军作战。部队的这种情绪，十分有利于我方开展统战工作。另外一个原因是初到陕北落脚的红军，急需巩固和稳定陕甘苏区这块根据地，以养精蓄锐，抗击日本侵略者。因此，中共中央决定设立东北军工作委员会，把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重点先放在东北军和十七路军身上。而这项工作的具体开展由周恩来负责是比较合适的。因为早在旅欧期间，周恩来就已从事国共两党合作的统战工作，并积累了极其丰富的经验，党中央很重视周恩来从事此工作的经验，并赋予重任。

东北军工作委员会设立以来，随着红军与东北军之间联络

往来，关系逐步密切，两军在前线的对垒关系也开始逐步得到缓解，并很快成为友好邻居。毛泽东对周恩来领导下的东北军统战工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称赞它“可为很好的模范”。并指出，由于这方面工作的进展，党的整个工作部署应该相应地改变，把联合战线的扩大放在第一位。^①

二

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人们关注着事变的发展趋势，而中国共产党自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来，这还是第一次以公开合法的身份出现在苏区以外的中国政治舞台上。面对错综复杂、瞬息万变的政治局势，中共中央决定派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前往西安，协助张、杨妥善处理西安事变。这是一项非常艰巨重大的历史使命。

12月19日，中共中央召开西安事变发生后的第二次政治局会议。对如何处理西安事变及采取什么样的方针政策进行了讨论。毛泽东在会上强调指出：目前问题主要是抗日问题，不是对蒋个人的问题，我们主要是消弭内战与不使内战延长。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的任务的指示》，提出“反对新的内战，主张南京与西安间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②

在此期间，周恩来专门在西京招待所接见中共地下党负责人宋黎、谢华、徐彬如等，阐明中共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指出民族矛盾已上升为主要矛盾，要大家全力以赴地实现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经过60天艰难曲折的斗争，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终于成功地完成党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

重大历史使命。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不仅结束了十年内战，开始了国共合作的新时期，形成和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的伟大和正确。

1937年6月23日，周恩来在会见美国学者T.A. 彼森时，曾谈了自己对当前统一战线的一些看法。他说：中国的统一战线同欧洲或美洲的人民阵线从形式到内容都很不同，国共两党的合作只能逐步地实现，要先准备抗战，然后争取民主共和国的运动。周恩来把国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有机地结合起来，不仅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声望和地位，而且赢得了国际反法西斯联合阵线的道义和物质援助，加速了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进程。

三

1938年9月29日，中共中央在延安桥儿沟召开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这是中共“六大”以来出席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会议，也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重要会议。9月30日下午，周恩来以中共中央代表团的名义作了关于统一战线工作的报告，详细叙述了六届五中全会以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和发展的历史过程。他认为，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的原则应该包括：坚持抗战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战；坚持党在政治上的独立性，信仰共产主义，认定国民党为主要合作对象，不是削弱国民党，而是推动国民党进步；坚持民众的动员；坚持国内民主；坚持国际和平阵线；坚持反对汉奸、托派，发展我们的力量，扩大和巩固统一战线等。^③由于日军正以强大兵力开始向武汉进攻，局势日趋危急，周恩来在会上作完报告后即离开

延安赴武汉。六届六中全会阐明了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基本政策，基本上克服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初步统一了全党的认识。毛泽东后来在“七大”上说：“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

由于政治局势的大幅度逆转，国内阶级关系发生深刻变动等因素，需要党中央对统一战线问题再一次作出总体性估计，以便采取正确的对策。1939年8月初，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会议。周恩来在这次会上作了长篇报告。他引用大量的历史资料，论述抗日战争爆发以来时局的演变过程和阶段性，详细剖析这个时期的国际形势、日本侵略者动向和中国在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实际情况，指出：“中途妥协与内部分裂是目前的两大主要危险”，“克服危险的主要任务便是坚持抗战到底，反对妥协投降；坚持全国团结，反对内部分裂；力求全国进步，反对向后倒退。”为保证这三大任务的实现，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边区的巩固与发展。周恩来根据两年来国共合作的实践，对统一战线问题从理论上进行了初步总结。他分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性质和特点，认为中国的统一战线既是民族的、民主的，也是社会的。但这三方面的特点是不平衡的。过去一个时期统一战线没有向好的方面发展，而是处在逆转中，目前虽有变化，但还不是逆转的中止。因为蒋介石的思想基本是反共的，这就决定了中国的统一战线不仅是不平等的，而且也不是公开法定的，它只是在不得已的默认中形成，在习惯中发展，不仅今天如此，就是时局再有进步，也仍然会如此。^④

周恩来系统地总结出一套科学的统一战线的策略、方法和守则，这些策略非常切合当时的实际，符合党的统一战线的正

确方针，既有坚定的原则性，又有其灵活性。它对以后的统一战线工作以至整个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1945年4月23日，经过很长时间准备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4月30日，周恩来在“七大”会上作了《论统一战线》的发言。他在发言中，系统地阐述了国共两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并把“九一八”以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分为五个阶段。他说：第一个阶段，从“九一八”到西安事变，有五年多时间。国共两党之间斗争的中心，是抵抗日本侵略，还是不抵抗日本侵略。第二个阶段，从西安事变到“七七”抗战，大概有半年多。争论的中心，是真正准备抗战，还是空谈准备抗战。第三个阶段，从“七七”抗战到武汉撤退，大概有一年半时间。斗争的中心是全面抗战还是片面抗战。第四个阶段，从1939年国民党五中全会到1944年国民参政会时国共两党公开谈判为止，时间有六年之久。争论的中心，是坚持抗战、团结、进步，还是要妥协、分裂、倒退。第五个阶段，从“联合政府”口号的提出到现在，这个谈判有一个中心，就是我们提出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而国民党要继续一党专制的政府。^⑤周恩来的这个报告包含了丰富的历史经验，全面地发挥了毛泽东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思想，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革命同盟军思想的理论增加了新的内容。

回顾历史，深入探讨和研究周恩来在延安时期的统一战线实践活动，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周恩来的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而且对更好地掌握与运用周恩来的统战思想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注 释

①③《周恩来》（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383、523 页。

②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419 页。

④《周恩来年谱》（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455—456 页。

⑤《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191 页。

（作者：延安革命纪念馆馆员）

浅谈毛泽东党建理论与实践的发展

石晓丽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但是，面对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条件，如何建设一个具有广泛代表性的、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先进政党，是我们党首先面临和必须解决的问题。毛泽东党的建设理论与实践，正是从这里起步，开始探索和发展的。

一、加强党的思想建设

高度重视党的思想建设，始终把思想建设放在党的建设的首位，是毛泽东党的建设理论与实践的一大特色。1929年12月毛泽东发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批评了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主观主义、个人主义等非无产阶级思想，提出有计划地进行党内教育，纠正过去无计划的听其自然的状态，是党的重要任务之一。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为了使中国共产党担负起领导伟大的抗日战争的历史责任，毛泽东再一次向全党提出了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的任务。同年9月，他发表《反对自由主义》一文，列举了革命集体组织中自由主义的11种表现，深入分析了其根源，提出了通过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达到党内和革命团结的主张。1945年党的“七大”确立了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制定了正确的路

线、方针和政策，使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达到空前统一。在“七大”报告里毛泽东提出，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1949年3月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是中国共产党从农村走向城市并成为执政党前夕召开的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了我们党在成为执政党以后，如何继续坚持从思想上建设党，防止在歌舞升平的和平年代里自我解除思想武装的严肃课题。建国以后，毛泽东在党的思想建设方面一直警钟长鸣。1959年以后，他又根据长期观察，提出了如何防止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问题。

毛泽东高度重视从世界观和方法论上，从思想根源上解决问题。问题的核心，是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这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上，他始终不放松。早在从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变时期，毛泽东撰写了《实践论》和《矛盾论》，目的就是为了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观点去揭露党内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错误。建国以后，每当他察觉到一些问题、着手纠正错误的时候，也总是从唯物辩证法和认识论的角度来阐述问题。

二、加强党的作风建设

党的作风，体现着党的性质和宗旨，是党的世界观在党的行动中的客观表现和形象反映。毛泽东一贯高度重视党的作风建设。在长期的斗争中，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这就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

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是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党的作风建设上的集中体现。在民主革命时期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共产党内曾经严重地存在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和共产国际的指示神圣化、教条化的倾向，给中国革命带来过多次危害。其中最严重的是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内长达四年的统治。毛泽东在这方面的最大贡献，是把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贯穿到群众路线之中，把马克思主义唯物观中关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原理渗透到党的工作作风中去，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优良传统。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为制定正确的土地政策和工商业政策，对乡村和城镇进行过系统调查。20世纪60年代初，为了克服“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造成的严重困难，毛泽东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并且派出调查组分赴各地农村，进行深入调查，为制定《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提供了客观依据。

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也是衡量一切工作的标尺。毛泽东一贯强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能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就是我们的出发点。密切联系群众，是中国共产党人根本的工作方法。毛泽东要求每一个共产党员特别是党的干部，要热爱人民群众，细心倾听群众的呼声，每到一地，就要和那里的群众打成一片。密切联系群众作风的理论基石是群众路线。必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实行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毛泽东还把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进一步概括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是弄清思想是非、加强党内团结

的根本保证。党内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是在系统地纠正和防止左倾错误的过程中，在正确开展党内积极的思想斗争的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毛泽东早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里就提出了正确开展党内批评的问题。他指出，党一方面必须对错误思想进行严肃的斗争，另一方面又必须充分地给犯错误的同志留有自己觉悟的机会。抗日战争中期，为了从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系统地整顿党的作风，毛泽东和我们党创造了整风运动这样一种马克思主义的自我教育的好形式。

毛泽东对党的三大优良作风的科学概括，是中国共产党党的建设长期实践的理论升华和经验总结，也是毛泽东党的建设理论和实践中最可宝贵的财富。

三、加强党的干部队伍建设

毛泽东曾精辟地概括过一句名言：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高度重视干部队伍建设，形成一整套正确的干部路线和政策，是毛泽东党的建设理论和实践的又一特色，也是毛泽东的历史功绩。

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确立的干部路线和政策，归根结底就是任人唯贤、德才兼备的干部路线和政策。任人唯贤，要求党的干部能够坚决地执行党的路线，服从党的纪律，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有独立的工作能力，积极肯干，不谋私利。德才兼备，要求党的干部应当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

培养和造就一大批懂得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去解决各种复

杂实际问题的干部队伍，是干部路线的中心任务。毛泽东提出，必须善于识别干部、使用干部和爱护干部。善于识别干部，就是不但要看干部的一时一事，而且要看干部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这是识别干部的主要方法；善于使用干部，就是要根据干部的特点、特长，把他们的智慧和力量最大限度地调动、发挥出来；善于爱护干部，就是要指导和帮助他们，使他们在理论上和在工作能力上不断提高，在党组织的监督、检查和帮助下，及时纠正缺点和错误，不断进步。这些重要思想对形成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的干部队伍起到了重要的奠基作用。

毛泽东党的建设理论与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在中国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在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发展过程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仍在继续，并且有了很大发展。然而，不论时代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党的性质和宗旨不能变。跨入新世纪，我们只有进一步解放思想，大胆进行理论创新，坚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才能把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继续推向前进。

刘志丹兵运活动初探

米晓蓉

刘志丹是西北红军和西北革命根据地最早的创始人之一。他为创建西北红军，曾出生入死历经数年的兵运活动，有成功有失败，失败多于成功；有经验有教训，教训比经验更为宝贵。值此刘志丹诞辰百周年之际，本文仅就他的兵运活动作一粗浅的探索，以为纪念。

从黄埔军校说起

我们党从 1921 年成立到 1924 年的三四年间，还不懂得组织军队和进行武装斗争的重要性。从 1924 年参加举办黄埔军校开始，才懂得了军事的重要性。以后经过北伐战争，党已掌握了一部分军队，即以叶挺为首的独立团。大革命的失败，得到了惨痛的教训。于是有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从此进入了创建红军的新时期。这是我们党对于军队重要性从不认识到认识的大致过程。这个认识过程，是毛泽东当年在延安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讲过的。^①

刘志丹对于兵运活动的认识和实践，还得从他参加黄埔军校说起。

黄埔军校是孙中山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于 1924 年在广州创办的。它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产物，周恩来

曾任军校政治部主任。刘志丹是由陕西党组织决定选派去黄埔军校学习的。1925年秋，刘志丹由陕北动身，是年冬到广州，翌年初进入黄埔第四期步兵科学习，1926年秋毕业。通过学习，他懂得了如何改造旧军队，如何在军队中开展政治工作，这使他后来开展兵运活动和创建红军具有了正确的思想基础。

1926年冬，刘志丹被派到冯玉祥的国民革命军工作，在冯部马鸿逵的第四路军任党代表兼政治处处长。这是一支旧式军队，有着浓厚的民族主义和军阀主义。刘志丹说服了马鸿逵，用他在黄埔军校学习的一套新思想新方法训练军队，按军校教导团的办法，逐级建立政治工作制度，取得一定的成效。1927年7月，国民党反共“清党”，刘志丹被“礼送”出冯军，但他在这支部队中结交了不少朋友，比如当年在第四路军任营长的韩练成将军，在刘志丹的影响帮助下，同情革命，要求进步，还加入了共青团。韩是宁夏固原人，长期在国民党军队中工作，曾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高级参谋，在重庆与我党多次进行接触。解放战争中，为我华东野战军几次重大战役的胜利做出了贡献。建国后曾任甘肃省副省长、兰州军区副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1965年病逝前，对前往看望他的汪锋说：“刘志丹为咱西北培养了大批人才，是他引我走上革命道路的。”就连后来追随蒋介石逃到台湾，客死他乡的马鸿逵在临死前也说：“我没有听刘志丹的话，落到这样的结果，一言难尽……”

刘志丹在冯玉祥部工作的这一段，还不能看作是他搞兵运活动的开始。那时还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他从黄埔军校毕业刚刚走上社会，在主观上还没有认识到要建立自己的革命武装，只是认为要把旧军队改造成国民革命军罢了。

兵运活动的起始

刘志丹的革命生涯中，从事兵运活动是他革命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一些回忆文章和他的年谱里，都说刘志丹从事兵运活动是从1929年春竞选保安民团团总开始的，事实上应该从1928年渭华起义算起。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党的“八七”会议提出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总方针。中共陕西省委“九二六”会议做出的《军事运动决议案》中指出：“党到国民党军队中去，加紧培植革命的军事基础。”随后，省委决定加强党在许权中旅和李象九旅的工作，以在适当时机举行起义和暴动。1928年1月，刘志丹、唐澍、谢子长等一批党员先后派到许权中旅担任重要工作。

许权中旅是1927年7月以西安中山军事学院和国民联军驻陕总部政治部保卫队的成员为骨干组建的，是党领导的一支革命武装。大革命失败后，归属李虎臣部下，编为新编第三旅。是年底，进驻商洛地区。刘志丹到许旅后任旅参谋部主任，唐澍任旅参谋长，谢子长任营特派员。全旅的党员人数由原来的53人增加到165人，党支部由5个分支发展到18个。根据党中央和陕西省委的指示精神，许权中旅于1928年5月参加了渭华起义，成立了西北工农革命军。刘志丹任军委会主席，唐澍任西北工农革命军总司令，许权中任军事顾问。

渭华起义失败了，唐澍壮烈牺牲，刘志丹、谢子长等离开部队回陕北工作，许权中带领余部暂寄陕军刘文伯师，编为第九旅，后在河南邓县被打散。刘志丹在总结失败原因时指出了以下几点：1. 光杆斗争；2. 军事冒险；3. 脱离群众；4. 烧杀

政策。他还严肃地指出，起义中领导决策上的一些“左”的错误，教训是惨痛的。许权中是部队的实际指挥者，对起义有不同意见，认为渭华地区距西安太近，敌强我弱，打不赢，提出把部队拉到韩城、白水一带去，先保存实力再找时机举行起义。那时，根据上级指示，军委会没有接受许权中的意见，反而开除了他的党籍，取消了指挥权，只保留了一个顾问职务，领导一个骑兵团。刘志丹后来对人说，他对不住许权中同志，“权中年龄比我大，长期指挥打仗，有经验。我当时也考虑到他的意见，但更多的是从政治上考虑，盲动成分大，还要服从上级决定，就这样，我做错了。事后我要向权中同志道歉，但在敌人的追赶下，我们分散了，没有机会了，真遗憾。”^②后来，许权中恢复了党籍，1943年被国民党特务暗杀。

刘志丹在许权中旅工作的几个月，是他兵运活动的开始。因为那时从中央到陕西省委都已明确提出了开展兵运工作的主张，要求共产党员“到国民党军队中去，”做艰苦的工作，争取国民党军队起义、倒戈、哗变，“培植革命的军事基础”，实现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总方针。但由于受“左”的盲动主义错误的影响，起义大多失败了。渭华起义就是如此。后来，刘志丹回到保安，对王子宜讲到渭华起义失败的经验教训时说：“我的任务是做军运工作的，可是在历次的经验中告诉我们，没有坚强的党的组织和群众基础，单纯的军事行动，是一定会失败的。”^③

几种策略

1928年秋，中共陕西省委派刘志丹回陕北工作，任陕北军委特委书记。从1929年到1931年间，是刘志丹深入开展兵

运活动的时期。

那时候，陕甘宁三省交界的地区，是个“三不管”的地方，军阀统治比较薄弱，地方势力矛盾重重，不少土匪拉几杆枪占山为王，帮会组织在这里也占有地盘。刘志丹说，连土匪都可以在这地方称“山大王”，弄得军阀无可奈何，为什么我们共产党人不能在这里闹革命呢？

1929年1月，中共陕西省委在富平美原镇召开第四次扩大会议，传达中共六大会议精神，总结了左倾盲动主义失败的教训，要求组织党团员和进步青年到白军中去，深入开展兵运工作。同年夏初，中共陕北特委在榆林红石峡召开二次扩大会议，传达省委四次扩大会议精神。会议由刘志丹主持，提出采取白色、灰色、红色三种方式进行武装斗争，白是派党团员到国民党部队中去，灰是做土匪工作，红是建立自己的武装——红军。刘志丹说，我们的政策是打进去，还要拉出来。对那些现在能抓过来的武装，坚决抓过来；对那些现在还不能抓过来的，就派人进去，做下层士兵工作，等条件成熟了，就举行起义。

当年，刘志丹深入开展兵运活动采取的策略，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种：

1. 合法斗争

进行合法斗争，就是利用党的基层组织或党员个人在国民党政权中取得的合法地位，开展兵运活动。1929年春，刘志丹回到故乡后，与当年榆林中学的同学、保安县党组织负责人王子宜和皖北暴动失败后回到家乡闹革命的曹力如一起，研究决定通过合法斗争争取民团武装。那时，王子宜的公开身份是保安县教育科督办，曹力如是县民政科长，他俩与县长都是师

生关系。他们一面联络地方绅士，争取赞成改选民团，一面鼓动群众揭露和状告团总路仰之欺压百姓的罪行。县长迫于群众的压力答应改选民团团总。选举结果，刘志丹、曹力如当选为正副团总。刘志丹到任后，对民团进行了整顿，又抽调一批党团员和进步青年安插到县民团和五个区分团中去，改变了民团的成分，对后来的工作起了很大的作用。

2. 深入虎穴

刘志丹常说，搞兵运，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他利用各种社会关系，抓住有利时机，打入白军中去，开展兵运工作。1929年冬到1930年春，宁夏苏雨生想把他的骑兵第四师扩充为军，在平罗招兵买马。刘志丹、谢子长认为这是一个好机会，便利用社会关系打入苏雨生部。谢任苏部第十旅旅长，刘任九旅十六团副团长。他们在军阀营垒里，秘密建立党的组织，成立学兵队，做争取群众的工作。不久，苏雨生部调往甘肃陇东。那时，西北地区是封建军阀割据的局面，甘肃五马（马鸿逵、马鸿宾、马步芳、马步青、马步宛）哪容得下外来的新发户苏雨生。1930年2月间，苏马交战，苏雨生败走下马关，后为杨虎城编为警备骑兵旅，驻陕西彬县。

苏马开战前，刘志丹、谢子长召集在苏部搞兵运的30多名党员开会，分析了当时的形势，特别是苏与五马之间的矛盾，决定苏马一旦开战，党所控制的部队即搬回陕北或陇东。刘志丹说，我们搞兵运，是为了将来建红军，绝不是为军阀之间的争夺流血卖命。

3. 相互利用

刘志丹是黄埔毕业生，这块金字招牌在西北很有名气，一些军阀和地方势力派很想利用他的牌子扩张自己的势力。对刘

志丹来说，在当时西北还没有建立红军的情况下，即使拉出少数队伍，还须利用对方的牌子做掩护，以便发展和建立自己的武装，这就是相互利用。

1930年夏，刘志丹回到保安不久，谢子长又来到刘家。他说陇东民团军司令谭世麟为扩张势力，正在招兵买马拉队伍，谁能拉起一个连，他就是连长；谁能招来一团人，就给他个团长，而且还给防地、给番号、给装备。刘、谢研究后认为，这是个好机会，他想利用我们，我们就利用他，像抓保安民团一样，把陇东民团也抓过来。于是，刘志丹组织动员了一批党团员和青年农民，又从保安民团中抽了一部分人和枪，加上从苏雨生部带回来的一些人，共有100多人，编为一个营。谢子长协助李力果、阎红彦从宜川后九殿寨杨庚武部拉出了周维祺营，300多人，编为另一个营。刘志丹到庆阳与谭世麟交涉，编为一个团。志丹推荐子长任团长，他任副团长兼一个营的营长，以庆阳与吴旗交界的三道川为防地，团部住在三道川蔺家砭。不久，由于张廷芝制造了“三道川事件”，使这支新组建的武装遭到了失败。

4. 广交朋友

刘志丹常说：“革命是从没有人到有人，再发展成千千万万大军。我们多团结一个人，敌人就少一个人。有了大团结，就能取得大胜利。”搞兵运工作，就要广交朋友，不仅要去做国民党军队的工作，也要做绿林帮会的工作。他认为那些闯荡江湖、占山为王的人，大多数是穷苦人，受地主老财的剥削欺压，无法生活才逼上梁山的。除少数残害百姓的坏人外，大多数是可以教育改造成革命者的。

1930年10月，刘志丹在绥德参加陕北特委第五次扩大会

后回到永宁山，搞了个“太白收枪”，组织起 100 多人的武装，活动在保安、安塞、合水一带。在合水，刘志丹又先后联合了赵二娃、唐青山、贾生财三股土匪武装。赵二娃是保安人，雇农出身，迫于生活，外出占山为王，有 70—80 人，30 多枝枪。唐青山，合水人，有 200 多人，十几枝枪。贾生财，原籍神木，早年逃荒到合水，有 30—40 人，十几枝枪。赵、唐、贾对志丹非常敬重，早有投靠之意，特别是赵二娃与刘志丹又是同乡关系。1931 年 1 月，这几支武装在合水古城会合，推举刘志丹为总指挥，但未进行统一编制。刚刚联合起来的队伍，转移到宁县张皮原时，就被陇东军阀陈国璋的部队打散了。后来，刘志丹带原来的百十人到了旬邑职田镇，编为苏雨生的补充团。

5. 利用矛盾

利用矛盾，保存自己，图谋发展，这是刘志丹在兵运活动实践中运用的又一个策略。当年，在军阀混战的极其复杂的社会环境下，刘志丹和他的战友们，机智勇敢，坚忍不拔，利用矛盾，图存发展，闯过道道难关，把兵运活动搞得有声有色。

1931 年春，刘志丹利用同苏雨生的旧有关系，经派人联络后编为苏部补充团，刘任团长，驻防旬邑县职田镇。在职田，得到省委指示，扩大队伍，准备起义，不慎暴露，被当地豪绅告发，志丹被捕关押在彬县，后经党组织和南汉宸、杜斌丞营救出狱。

刘志丹获释后，奉省委指示，利用地方军阀之间的矛盾，又打进平凉甘军新编十三师陈国璋部。陈国璋虽为师长，在平凉要统治陇东 14 县却困难重重，处在四面楚歌之中。镇原有毕梅轩旅，静宁有张应坤旅，固原有杨万清旅，庆阳以东有张

廷芝匪部，宁县有李培霄 1000 多人武装，这些军阀和土匪时刻都在和陈国璋争夺陇东地盘。陈国璋想利用刘志丹收编李培霄，牵制张廷芝和彬县的苏雨生，以便集中兵力对付北线的毕、张、杨。刘志丹便以陈国璋的名义和防地，在宁县组建队伍，号称十一旅，自任旅长。

1931 年 7 月间，陈国璋受杨虎城之命，下令刘志丹旅、高广仁旅和刘宝堂的特务二团，在宁县、早胜镇一线堵歼欲退宁夏的苏雨生部。此时，高广仁又叛离陈国璋，在早胜镇收缴了刘志丹、刘宝堂的枪，挟持二刘北上。到合水时，高广仁又被陈国璋部的刘庆祥旅打败，刘志丹连夜出走，只身回到南梁地区。不久，刘志丹与赵二娃、贾生财、杨丕胜等人取得联系，集合了部分失散了的战士，逐渐发展成一支 200 多人的武装。10 月，刘志丹与晋西游击队在林锦庙会合。

利用矛盾，保存自己，谋图发展。这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策略原则的，但并不是创建革命武装的根本办法，正如刘志丹后来所总结的：“利用军阀是暂时的，利用军阀的公开名义是搞不成的，准备好了条件，我们就单独出去搞。”

几句结语

刘志丹在世只有 34 岁，从事革命活动 14 年，其中搞兵运就是 4 年。这 4 年间，他出生入死，被关押，遭追杀，百折不回，矢志不移，表现了对党赤胆忠心，对人民无限忠诚，对敌人英勇斗争的高贵品质。

刘志丹在兵运活动中广交朋友，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上有军官，下有士兵，还有绿林江湖中人，只要对革命事业有利，他就去团结，去争取。他胸怀宽广，性情豁达，处处以革

命大局为重，从不计较个人得失荣辱。

刘志丹搞兵运，为创建西北红军和西北革命根据地培养了人才，锻炼了干部，积累了经验，他曾对习仲勋讲过：“几年来，陕甘地区先后举行过大大小小 70 多次兵变，都失败了。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军事运动没有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没有建立起革命根据地。如果我们像毛泽东同志那样，以井冈山为依托，搞武装斗争，建立根据地，逐步发展壮大游击区，即使严重的局面到来，我们也有站脚的地方和回旋的余地。”^④这是他 1932 年对西北兵运活动作的正确总结，反映了他思想认识的日渐成熟。

刘志丹搞兵运，是在 20 世纪上半叶的中国西部地区进行的。落后、封闭和复杂的社会环境，以及中国共产党发展的曲折历史，这是他在探索的前进道路上不可能超越的历史条件，成功与失败，正确与失误，都必须放在历史发展的全过程中去考察，只有这样才能给予这位“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做出公正的评价。

注 释

①毛泽东：《战争与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535—536 页。

②马文瑞：《群众领袖，革命楷模》，《纪念刘志丹》第 102 页。

③王子宜：《记志丹同志二三事》，《纪念刘志丹》第 235 页。

④习仲勋：《纪念志丹同志 90 诞辰》，《人民日报》1993 年 10 月 7 日。

（作者：延安革命纪念馆馆员）

《沁园春·雪》的发表 及其引发的文坛大论战

齐佩良 刘金林

《沁园春·雪》是毛泽东诗词中最重要和最有影响的代表作。毛泽东作为杰出诗人为世人所知，即始于这首词的传出，它奠定了毛泽东在当代词坛的地位。这首词当年在重庆被一家民营报刊发表后，曾引发了一场文坛及政坛大论战，堪称中国近现代政治史和文学史上的一大奇观。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到达重庆，同蒋介石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8月30日，柳亚子、沈钧儒、王昆仑等到毛泽东住地拜访。柳亚子回来后，心情激动，夜不成寐而做诗一首：

阔别羊城十九秋，
重逢握手喜渝州。
弥天大勇诚能格，
遍地劳民战尚休。

霖雨苍生新建国，
云雷青史旧同舟。
中山卡尔双源合，
一笑昆仑顶上头。

柳亚子和毛泽东是故交，柳亚子说：“余识润之，在1926年5月广州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二中全会会议席上，时润之方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也，及1945年重昭渝州，握手怅然，不胜陵谷沧桑之感。”所以有“阔别羊城十九秋”等语。

9月2日，柳先生的这首诗以《赠毛润之老友》为题在《新华日报》上刊登了出来。9月6日，毛泽东和周恩来、王若飞等人专程到沙坪坝南开中学津南村回访柳亚子先生。因柳先生要选编一本诗选，所以请毛泽东校正一下其《七律·长征》诗，毛泽东不但订正了传抄过程中的错字，而且于10月7日还抄了《沁园春·雪》给柳先生。这首词是毛泽东1936年2月率红军东征渡黄河前夕在清涧县袁家沟所写，毛泽东在附信中说：“初到陕北看见大雪时，填过一首词，似与先生诗格略近，录呈审正。”

书赠柳亚子的这首词，毛泽东共写了两份，一份写在“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的信笺上，另一份写在柳先生的纪念册上，并加上了“亚子先生教正”的上款和“毛泽东”的落款。笔锋雄劲，堪称一副上乘的书法作品。这首后人熟悉的名篇全文是：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毛泽东这首《沁园春·雪》，气势博大恢弘，与古往今来中国文学史上众多的咏雪诗词相比较，无论是在构思立意上，还

是在气魄力度上都有天壤之别。精于诗词的柳亚子看后，连呼“大作，大作”。他反复吟诵，情不能抑，诗兴激扬，在10月22日“次韵润之之咏雪作”填词《沁园春》一首为和：

廿载重逢，一阕新词，意共云飘。叹青梅酒滞，余怀惘惘；黄河流浊，举世滔滔。邻笛山阳，伯仁由我，拔剑难平块垒高。伤心甚，哭无双国土，绝代妖娆。

才华信美多娇，看千古词人共折腰。算黄州太守，犹输气概；稼轩居士，只解牢骚。更笑胡儿，纳兰容若，艳想浓情着意雕。君与我，要上下天地，把握今朝。

柳亚子做出这首和词后，连同毛泽东原词一同送到《新华日报》要求发表。此时周恩来在重庆领导中共代表团，出于某些考虑，他和其他一些同志不同意发表毛泽东的词稿，只安排发表了柳的和词。对此，柳亚子在随后为毛泽东的《沁园春·雪》所写的跋文中说明了其中原委：

毛润之《沁园春》一阕，余推为千古绝唱，虽东坡、幼安，犹瞠乎其后，更无论南唐小令，南宋慢词矣！中共诸子，禁余流传，讳莫如深，殆以词中类似帝王口吻，虑为意者攻讦之资；实则小节出入，何伤日月之明。固哉高叟，暇当与润之详论之。余意润之豁达大度，决不以此自歉，否则又何必写与余哉。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恩来殆犹不免自郅下之讥欤？余词坛跋扈，不自讳其狂，技痒效颦，以视润之，始逊一筹，殊自愧汗耳！

在这篇跋文中，柳亚子说明“中共诸子”担心有人会以“类似帝王口吻”为由对毛泽东的词攻击中伤。柳亚子却认为不必如此顾虑，毛泽东既然愿意把词写给他，就不应禁止发表。大概出于这种观点，这首词的原文让王昆仑等友人传抄去

了。

11月11日，中国共产党在重庆的《新华日报》发表了柳亚子对毛泽东所作《沁园春·雪》的和词，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报上有“和词”，却见不到所和对象，有兴趣者便急于找到未发表的原词欣赏。不少人向《新华日报》询问索要，答复均是未经作者同意不便公开。这种委婉的拒绝，反倒更助长了众人的好奇感。

当时，吴祖光正在重庆《新民报晚刊》副刊《西方夜谭》任编辑，他反复打听，终于抄到两份此词稿，不过其中有缺漏之处。他很快又从自己的朋友、画家黄苗子处抄到一份毛泽东的词稿。据黄说，这是从“小民革”负责人王昆仑处抄到的。吴祖光将三稿相对，终于得到一篇完整的词稿。

吴祖光看到这首词后说：“从风格上的涵浑奔放来看，颇近苏辛词派，但是找遍苏辛词亦找不出任何一首这样大气磅礴的词作；真可谓睥睨六合，气雄万古，一空倚傍，自铸伟词。”他认为：“这样的稿件是可遇难求的稿件，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放弃的稿件啊！”

在国民党独裁统治下，一家民营报刊公开发表毛泽东的词稿并附加赞语，毕竟需要些勇气，吴祖光却全无畏惧。此时也有人从另一种角度劝吴祖光，说毛泽东本人不愿意让别人知道他写旧体诗词，《新华日报》正是为此只发表柳亚子的和词而不刊登原词。吴祖光却表示，《新华日报》是中共党报，当然要受党的主席约束，而自己编的是一家民营报纸，发表这首词又有何妨？于是，吴祖光以《毛词·沁园春》为题，于11月14日在该报副刊显著地位发表了此词，并加“按语”云：“毛润之先生能诗词，似鲜为人知。客有抄得其《沁园春·雪》一

词者，风调独绝，文情并茂，而气魄之大乃不可及。据毛氏自称则游戏之作，殊不足为青年效法，尤不足为外人道也。”

《新民报晚刊》上登载出毛泽东的词，立刻轰动山城。全国各大城市许多民营报纸争相转载，广为流传。如同一石激起千层浪，一时间和词、论文、乃至其他样式的文章纷至沓来，涌现于不同性质的各种报刊，衷心赞颂与恶意中伤相交，笔枪舌剑针锋相对。

当年只要略懂些诗词的人，都能看出《沁园春·雪》是以词咏志抒怀，说明在“如此多娇”的神州大地上，只有共产党人是“今朝”真正的“风流人物”，对以往的帝王将相以至国民党政权都是极大的蔑视。

蒋介石精于权谋，从不会写诗词，对抗毛泽东的诗词只有责令御用文人出马。他指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立即召开会议，要求步毛词原韵以和词的方式批驳，中心意思是要说明毛泽东此番来重庆并非是想谈判和平，而是要“争当帝王”。具体负责组织稿件的《中央日报》主笔兼副刊编辑王新民化名“东鲁词人”，在12月4日的《中央日报》的副刊头条发表了所作的一首“和词”。

抗战军新，受命立功，拥纛东飘。当徘徊歧道，中夜惘惘；惊心怵目，举世狂潮。寇患方深，阅墙难再，回首中原烽火高。却倒戈，看杀人掠地，自炫天骄。

山河美丽多娇，笑草莽英雄亦折腰。想翼王投笔，本矜才藻；押司题壁，夙擅风骚。惜误旁门，终虚正果，勒马悬崖着意雕。时未晚，要屠刀放下，成佛今朝。

这首词一面咒骂中共在抗战期间“却倒戈”“杀人掠地”，又妄劝什么“屠刀放下，成佛今朝”。词中以翼王石达开，《水

浒传》里的押司宋江比附毛泽东，更不伦不类。

这篇“和词”发表后，《中央日报》将“和词”任务交给中央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办的《和平日报》（原为围剿红军时的《扫荡报》），继续向一批反共文人约稿，发表类似的“和词”。其中易君左和词虽攻击毛泽东和人民革命，也对国民党政权的前途感到忧伤。全文是：

国脉如丝，叶落花飞，梗断蓬飘。痛纷纷万象，徒呼负负；茫茫百感，对此滔滔。杀吏黄巢，坑兵白起，几见降魔道愈高？明神霄，忍支离破碎，葬送妖娆。

黄金难贮阿娇，任冶态妖容学细腰。看大漠孤烟，生擒颞利；美人香草，死剩《离骚》。一念参差，千秋功罪，青史无私细细雕。才天亮，又漫漫长夜，更待明朝。

这首词，虽将共产党比作杀人如麻的唐末黄巢、秦将白起，却也哀叹此时的“道”已难以“降魔”，即使像汉武帝对皇后陈阿娇那样“金屋藏娇”也无济于事，反映了一派衰败破亡的情绪。

反动文人们奉命攻击毛泽东的词作时，有的文章还连带攻击了柳亚子的和词，说他是“奉和圣制”，是“封建余孽的抬头”。其实，柳亚子本人的和词不仅出于自愿，发表过程还违背中共负责人的意见。国民党报刊上的文人叫嚣，倒真是“奉和圣制”，是蒋家王朝的御用诗作。

国民党当局组织对《沁园春·雪》进行攻击时，恰好毛泽东患病。1945年11月间，毛泽东身体状况越来越糟，有时躺在床上，全身发抖，手脚痉挛，冷汗不止，不能成眠，不得不脱离工作休养。当时他对往来的电文都很少看，发生在重庆的诗词之战自然也无涉入。

当时在重庆的进步文化人士中，一些人面对国民党当局组织围攻毛泽东词作，自发地奋起用和词回击，郭沫若就是一个突出代表。12月11日，《新民报晚刊》刊登了郭沫若的《沁园春·和毛主席韵》一首，词云：

国步维艰，寒暑相推，风雨所飘。念九夷入寇，神州鼎沸；八年抗战，血浪滔滔。遍野哀鸿，排空鸣鹏，海样仇深日样高。和平到，望肃清敌伪，解除苛娆。

西方彼美多娇，振千仞金衣裹细腰。把残钢废铁，前输外寇；飞机大炮，后引中骚。一手遮天，神圣托付，欲把生民力尽雕。堪笑甚，学狙公茅赋，四暮三朝。

在这首词中，郭沫若谴责了美国当权者挥舞原子弹，并支持国民党打内战的行径。随后他又发表了第二首和词：

说甚帝王，道甚英雄，皮相轻飘。看古今成败，片言狱折；恭宽信敏，无器民滔。岂等沛风？还殊易水，气度雍容格调高。开生面，是堂堂大雅，谢绝妖娆。

传声鹦鹉翻娇，又款摆扬州闲话腰。说红船满载，王师大捷；黄巾再起，蛾贼群骚。叹尔能言，不离飞鸟，朽木之材未可雕。何足道！纵漫天迷雾，无损晴朝。

此和词在“又款摆扬州闲话腰”后面注：“某无耻文人亦和韵，但反唇相讥，极端反动。”这里指的“某无耻文人”，就是那个因写《扬州闲话》引起过公愤的易君左。当年易君左曾胡说古诗所云“烟花三月下扬州”是指当地多出烟花女子，引出扬州人士公愤。

1945年12月下旬，毛泽东病势好转恢复工作，马上对自己的词作在重庆发表及引起的反响十分关注。王若飞当时将报刊上刊登的各种正反和词寄到延安，毛泽东看后，于12月29

日致王若飞岳父黄齐生先生的信中说：“若飞寄来报载诸件附上一阅，阅后乞予退还。其国民党骂人之作，鸦鸣蝉噪，可以喷饭，并付一观。”

著名进步教育家陶行知和邓初民主办的《民主星期刊》，也参加了反击国民党御用文人的斗争。1946年1月25日该刊第16期刊登了署名“圣徒”的一首《沁园春·读润之、亚子两先生唱和有感而作》：

放眼西南，千家鬼嚎，万户魂飘。叹民间老少，饥寒累累；朝中上下，罪恶滔滔。惟我独尊，至高无上，莫道道高魔更高。君不见，入美人怀抱，更觉妖娆。

任他百媚千娇，俺怒目横眉不折腰。我工农大众，只求生活；青年学子，不解牢骚。休想独裁，还我民主，朽木之材不可雕。去你的，看人民胜利，定在今朝。

文坛的这场诗词交锋，也传到各解放区。在华东解放区任新四军代军长的陈毅得悉这场唱和战，一时也诗兴大发。1946年初，他一挥而就三首和词，其中的《沁园春·斥国民党御用文人》这样写道：

毛柳新词，投向吟坛，革命狂飙。看御用文人，谤言喋喋；权门食客，谗语滔滔。燕处危巢，鸿飞寥廓，方寸岑楼怎比高？叹尔辈，真根深奴性，玷辱风骚。

自来媚骨虚娇，为五斗纷纷竞折腰。尽阿谀独夫，颂扬暴政；流长飞短，作怪兴妖。革面洗心，迷途知返，大众仍将好意招。不如是，看所天倾覆，殉葬崇朝。

以《沁园春》词牌为唱和形式进行的这场文坛大战，堪称中国近现代政治史和文学史上的一大奇观。当年国共之间的军事、政治斗争，还扩展到文坛之上。当时共产党方面的军事实

力比国民党逊色一筹，在心理上却取得了巨大优势。蒋介石统治之腐朽，其文化颓废没落，在诗词咏唱上也居于下风。中国革命力量政治上的生机勃勃和欣欣向荣，在这场诗词大战中表现为意气风发，赢得了大多数知识分子的向往，预示着不久将天下归心。

（作者：延安革命纪念馆副研究员：助理馆员）

延安茶坊兵工厂

刘卫平

抗日战争时期，延安茶坊是陕甘宁边区重要的兵工基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茶坊兵工厂克服重重困难，通过自力更生和艰苦拼搏，陆续建立了复装子弹、机器制造、枪械修造、火炸药制造、手榴弹及掷弹筒制造等一套较为完整的兵工生产体系，为民族解放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

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随军抵达陕北的14名兵工工人与红十五军团兵工厂合并组建为红军兵工厂，厂址在瓦窑堡城外的十里铺。后经历两次迁建后于1937年春迁到延安柳树店，主要任务是修理枪械。1938年2月初，上海利用五金厂的沈鸿带领7名工人及一批重要机器设备来到延安。这些机器设备有：车床、钻床等11部机器，电动机、发电机等9部设备，千分尺等47种计194件工具，砂轮等122件材料及131支钻头和一些其他工具。^①这些机器设备为边区兵工实现较大规模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军工局及时提出了“先做设备，后大量做步枪”的生产方针，并决定把红军兵工厂搬迁到延安以北70公里的安塞县茶坊镇。红军兵工厂于3月开始搬迁，5月初搬迁完毕，并开始正式生产，命名为陕甘宁边区机器厂。内部则习惯称之为茶坊兵工厂。

茶坊兵工厂隶属中央军委军事工业局，初创时约有职工200人。周鉴祥任厂长，曹光华任政委，赵发生任总支书记，贺瑞林任工会主席。工厂分为东厂和西厂两部分。东厂为枪械修理部，负责人刘贵福，政治指导员陈海清，以修枪和造手榴弹为主；西厂为机器制造部，负责人黄海霖，政治指导员闵跃亭，以机器制造为主，下设机工班（2个）、钳工班、锻工班、翻砂股（附设木型班），后来还成立了引擎班、铆工班和冶金班。

尽管面临重重困难，但茶坊兵工厂仍然迅速展开生产。东厂在确保枪械修理和手榴弹制造外，充分发挥自身的技术优势，创造性地开展工作。1938年11月20日，延安遭受日本飞机空袭后，东厂的刘贵福等人经过六个通宵的苦战，成功地将两挺马克沁机枪改装成高射机枪，成为延安最早的防空武器。与此同时，西厂则依照军工局的既定方针，积极开展生产步枪设备的制造工作。这是一项全新的工作。除从太原兵工厂来的几名工人使用过造枪设备外，兵工厂没有任何人见过这些设备。然而，就是在如此困难的情况下，沈鸿根据从太原兵工厂来的工人对造枪设备型式、作用和性能要求的详细描述，以及对仅有的一本《万有文库》中关于“军械制造”部分的研究，设计绘制出了草图。最后又和技术工人倾心协作，反复修改，很快制造出拉来复线机、枪管定中心机、枪管校直机、枪管钻眼机、机筒拉槽机、枪栓双头立铣机等制造步枪的专用设备，从而为步枪的生产制造扫除了障碍。同年12月，东厂开始设计新枪，且进展顺利，于是，军工局决定以东厂为基础建立步枪制造厂。1939年4月初，东厂在周鉴祥带领下迁往保安（今志丹县）何家岔，命名为陕甘宁边区机器厂第二厂，习

惯称之为何家岔兵工二厂。原属东厂的枪械修理则在马家沟另设修械所，而制造手榴弹的部分则组建为陕甘宁边区机器厂第三厂，习惯称之为茶坊兵工三厂。此时，西厂改称陕甘宁边区机器厂第一厂，习惯称之为茶坊兵工一厂，仍以机器制造为主。

就在何家岔兵工二厂建立的同时，军工局也开始了火、炸药厂的筹建。1939年初，紫芳沟化学厂在钱志道负责下开始了紧张的建设工作。为了保密，军工局将该厂命名为陕甘宁边区机器厂第四厂。至此，茶坊兵工厂已发展为四个分厂和一个修械所。边区的军事工业体系初步形成。

经过一系列的调整扩建后，沈鸿担任了一厂厂长。作为“母厂”，一厂在沈鸿主持下，集中力量为三厂及化学厂制造生产设备。先后为三厂制造的设备有：碾片机、立式冲床、手板弹头紧口机、底火冲床、装弹头机、底火压药机、手榴弹木柄车床等。和这些东西相比，为化学厂制造生产设备通常具有一些特殊要求，如耐压、耐腐蚀、耐高温等，但沈鸿和钱志道紧密配合，通过潜心钻研，反复实验，不断改进，终于攻克一道道技术难关，成功地制造出了酒精分馏塔、乙醚制造设备、三酸（硫酸、硝酸、盐酸）制造设备、蒸汽锅炉、脱脂锅、离心脱水机、切断机、打浆机、碾片机、光石墨辊筒机等化工生产的机械设备。本着坚持服务抗战的原则，沈鸿还耗时半年为前线部队设计了一批小型金属切削机及利用畜力作动力的牛力机。这些设备轻巧灵便、简单实用，适合随军携带，适宜在艰苦的农村环境下使用，因此受到前线修械工人的普遍欢迎。

1939年4月25日，经过刘贵福、孙云龙等五个月的研制，三厂终于试制出第一支步枪，命名为“无名式马步枪”。这支枪采用了捷克式马步枪的样子，枪身带有三角刺刀，具有

重量轻、体积小、式样精巧、携带方便、易于制造的特点。5月1日，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工业展览会在延安举办，“无名式马步枪”荣获一等奖，沈鸿、刘贵福、孙云龙等荣获劳动英雄称号，一厂以其杰出成绩而获得特等奖。

同年7月，“无名式马步枪”正式投入生产，首批生产新枪30支。为此，中共中央给二厂颁发了“劳动创造一切”的大红缎子奖旗。^②不久，朱德、徐特立、陆定一亲赴何家岔，视察二厂，鼓励工人尽可能多的生产步枪。

由于国民党的严密封锁，边区物资极度匮乏，造枪用钢开始依赖延长油矿遗弃的废钻杆及少量废旧钢材，后来就主要靠部队从敌占区扒运过来的路轨。加之设备有限，生产中除枪管等大件用机床加工外，其余零件大多靠钳工手工完成，但二厂依然保持了每月生产新枪30至40支的数量。至1942年3月，二厂生产新枪总数达1000余支，有力地支援了抗战。

就在这年的7月，军工局组建了一个工人行军营开赴晋东南，支援这里的兵工建设。工人行军营营长为罗云，教导员为叶桂生，下辖三个连：第一连以马家沟修械所的钳工为主，连长曹家仪；第二连以茶坊兵工一厂为主，连长胡瑞琪，指导员陈海清；第三连以何家岔兵工二厂的机工为主，连长刘贵福，指导员封域中。全营人数约300名，包括郑汉涛、陆达、唐成议、刘先惠、陈廷栋等优秀技术人才。

三厂在发展中经历了两个阶段。1939年5月至1940年5月为第一阶段，这一时期以手榴弹制造为主，下设两个股，一股为冲压机加股，二股负责生产雷管、底火、拉火及弹药装配。另外，还设有直属生产管理员管理的生产班、木工班和酿酒班。酿造白酒是三厂的一项特殊任务，它们酿造的白酒清亮

醇香、甘绵爽口，当时中央宴请重要客人用的就是三厂酿造的白酒。

1940年5月至1942年底可以说是三厂发展的第二阶段。1940年5月，三厂增设了子弹股，开始复装子弹。从这时起，工厂生产条件得到了较大完善。1940年后半年，三厂新增了二英尺半小车床、六英尺车床、碾压机、砂轮机、木材圆锯机、木柄车床、手扳压力机、底火压药机、汽车引擎等20部机器设备。随着生产条件的逐步改善，复装子弹的数量大幅增加，很快由刚开始每天复装子弹300发到400发增加到1000多发。

火药与炸药是兵工生产中重要的基础物资之一。军工局成立之初，即设想修建火、炸药厂。1939年，柴芳沟化学厂在钱志道负责下开始建设。这是一场十分艰难的创业过程。在建设过程中，化学厂本着精打细算、自己动手、就地取材、因地制宜、因陋就简的原则，并且充分发扬了团结一致、齐心协力、无私奉献的高尚品质。沈鸿和钱志道潜心研究，攻克一道道技术难关，成功制造出了生产设备。那么，这些设备安装在哪里呢？和其他工厂一样，化学厂充分利用了旧的石窑洞。硫酸浓缩、火硝精制、脱脂棉烘干、酒精蒸馏，还有像乙醚、硝化甘油、氯酸钾的制造设备都安装在石窑洞里。生产稀硫酸和硝酸的设备则安装在露天的院子里。自来水系统所用动力则是马，当时，技术员将一辆汽车的后牙包改制成一部马拉抽水机，将水抽到高处的池子里，便建成了自来水系统。照明问题则是将一台小型电动机改装成发电机解决的。1941年，化学厂基本建成。这期间，由于钱志道还担任三厂厂长，因此，化学厂设主任一职，负责生产管理和政治工作，首任主任为况步才。以

后担任此职的还有詹石、丁长合、彭光伟等。另外，工厂还设有兼职的党支部书记和工会主席。

1941年初，军工局将茶坊兵工一、三、四厂统一命名为陕甘宁边区工艺实习厂，任命毛远耀为厂长，彭光伟为总支书记，沈鸿为机械总工程师，钱志道为化学总工程师。这时，原兵工一、三、四厂分别称为工艺实习一分厂、三分厂、四分厂。

这时，中共中央对兵工生产又采取了新的措施。1941年4月23日，中央军委发布了《关于军队中吸收和对待专门家的政策指示》，强调对专门家在物质上给予特殊优待，使他们及其家属生活无顾虑。7月31日，周恩来在《解放日报》发表文章指出：“我们一切服从于国防生产，健全国防工业的领导机构，动员一切人力、物力、财力，增加国防工业的生产。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的准备起我们的反攻力量，才能保障我们最后的战胜敌人。”^③1942年春，边区农具厂改建为兵工厂，称为温家沟兵工厂，也叫八路军留守兵团兵工厂，但对外仍称为边区农具厂。

温家沟兵工厂以生产手榴弹、复装子弹、制造掷弹筒、修理步枪和机枪为主，同时也制造少量步枪（每月生产40至50支），受军工局和八路军留守兵团双重领导，徐驰任厂长，干戈（杨长春）任总书记。温家沟兵工厂成立不久，马家沟修械所即并入该厂。同年6月，何家岔兵工二厂并入温家沟兵工厂。年底，三分厂又并入该厂。抗战中后期，温家沟兵工厂在确保八路军留守兵团和边区部队枪械修理的同时，每月还生产10多万发子弹、6000余枚手榴弹。特别是1943年，生产手榴弹达10万枚，为保卫边区和支援抗战做出突出贡献。

在生产劳动中，温家沟兵工厂涌现出了以赵占魁为代表的模范工人。赵占魁是一名翻砂工人，他不怕脏不怕累，始终如一地辛勤劳动，爱厂如家，表现出崇高的主人翁思想和不畏艰苦的奋斗精神。1942年9月11日，边区总工会发出了《关于开展赵占魁运动的通知》，同日《解放日报》发表了《向模范工人赵占魁学习》的社论。12月，边区总工会主席高长久发表了《继续开展赵占魁运动》的文章。1943年5月，邓发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在公营企业中如何开展赵占魁运动》的文章。学习赵占魁运动在陕甘宁边区和各根据地公营企业中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

为了适应新的形势，1943年6月，军工局在原三分厂的旧址上又新建了新的三分厂，专门生产六〇掷弹筒。10月，大砭沟铁厂炼出了第一炉合格的铁。这标志着以茶坊为基地的边区兵工业形成了较为稳定的体系。随着兵工生产的快速发展，一大批劳动英雄涌现出来。1944年5月1日，陕甘宁边区工厂厂长暨职工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兵工战线上的李强、沈鸿、钱志道、赵占魁荣获特等劳动英雄；华寿俊、黄海霖、王河海、孙云龙、郝希英、周鉴祥、许云峰、张洪让、范阴谦、刘清和、张庆森等荣获甲等劳动英雄。5月26日，西北局和边区政府举行技术人员座谈会；11月1日，军工局召开劳动与模范工作者大会；年底，边区群英大会开幕。这一系列的会议总结了经验，凝聚了人心，鼓舞了干劲，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劳动竞赛热潮，强有力地推动了边区的兵工生产，为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5年8月15日，抗日战争胜利，国际国内形式发生重大改变，中共中央立即对兵工生产进行新的调整。8月下旬，

兵工系统第一批工人随军开赴东北。不久，李强、沈鸿亦先后离开延安前往东北，军工局局长由吴生秀接任。1946年6月，乐少华、钱志道等一大批同志赴东北开辟新区，工艺实习厂厂长由肖彩凤接任。10月，温家沟兵工厂转移至瓦窑堡的十里铺，同时改名为工艺实习三厂，厂长王元一，该厂子弹股则另在桃元建立枪弹厂，定名为工艺实习四厂，厂长龚家宏。不久，留在茶坊的一、三、四厂坚壁清野，随军撤离。

1947年3月，军工局组成第二支队、独立第十三大队随军转移。第二支队队长吴生秀，政委白士俊，参谋长雷恩俊。独立第十三大队队长李颀伯，副队长武肃，参谋长隐希文，下辖5个中队、地方工作队、独立一中队和独立二中队共8个队432人，并配备有8门小炮，228支步枪，4挺机关枪。其中二中队由温家沟兵工厂组成，王元一、罗智任正副队长；三中队由工艺实习一分厂、四分厂组成，郭凤林、满福山任正副队长。至7月，这支队伍陆续东渡黄河，在晋绥组建新的兵工厂。而留下来的工艺实习厂三分厂则于6月成立了3个修械组随军修械，并于7月东渡黄河组建为晋绥兵工十厂。1949年5月20日西安解放后，十厂又西渡黄河进驻西安，定名为西北军区修械一厂，7月，奉命接管西安机械厂，并改名为西安农业机械厂。

总之，茶坊兵工厂是中共中央领导下自力更生创建的人民兵工厂。在抗战中发展起来的茶坊兵工厂，为新中国的军事工业在人才和组织上作了广泛的积累，奠定了深厚的基础。茶坊兵工厂在建设和生产中形成的自力更生、艰苦创业、齐心协力、无私奉献的精神和尊重知识、重视人才的优良传统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注 释

①②《兵工史料》第3辑，第114、70页。

③周恩来：《“七七”四年》，延安《解放日报》1941年7月31日第1版。

（作者：延安革命纪念馆馆员）

“双拥”是延安时代密切军民关系的基本政策

张 娴

延安时代是我党 80 多年历史中所度过的最光辉的时期之一。在这一时期，我们党在党的建设、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及繁荣经济和发展文化教育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正确处理军民关系上也开创了富有特色的新路子，这便是拥政爱民、拥军优属。今天，在加强两个文明建设中，继承发扬“双拥”优良传统，对于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加强军队建设，转变党的作风，密切同人民群众鱼水相依、水乳交融的关系，仍有极大的现实意义。

一、“双拥”政策的提出

抗日战争爆发后，八路军出师抗日。为了保卫陕甘宁边区，中央军委从八路军的三个师中各抽调一部分兵力组成了留守兵团。边区相对和平安定的环境，使留守兵团中一部分同志不安心后方工作，争着要上前线。这种情绪干扰了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以致出现了侵犯群众利益，不尊重地方政府的军阀作风，地方和群众对军队产生不满，军队官兵也对群众多有埋怨。毛泽东得悉后，决定召集部队领导开一个座谈会。

1940 年秋的一天上午，毛泽东在延安杨家岭会见了萧劲

光、阎红彦、贺晋年、文年生、莫文骅、甘渭汉、周仁杰、刘遂春、李赤然等十多位部队领导同志，与大家就军民关系问题进行了座谈。由于部队对群众怨气很大，座谈中大家都争着发言。这个说：“杨桥畔的老百姓凶得很，不给我们住房子，让部队住在院子里。”那个说：“群众睡在炕上，我们睡在地下，真不像话。”有的说：“老百姓动不动就要拉我们见毛主席和朱总司令……”毛泽东耐心地听完大家的发言后说：“开天辟地以来，老百姓见了军队就跑，只有军管民。现在老百姓敢批评军队，这是大好事。这说明我们边区的民主深入到群众中去了。你们谁懂得历史？说一说是不是这样？”大家听了，细细一想，茅塞顿开。便心悦诚服地说：“我们对部队教育太差了，证明我们还有军阀主义残余。”毛泽东又说：“我看这里是咱边区政府民主建设工作做得有成绩，我们军队有广大群众当老师了，你们搞军队工作的才不会犯大错误。边区大有希望。”毛泽东没有直接批评部队同志，只说是老百姓民主精神好，思想觉悟高，实际是一种巧妙的批评。经毛泽东开导，大家对人民军队的本质加深了理解，消解了怨气，提高了对搞好军民关系的认识。座谈会之后，留守兵团便开展了拥政爱民的教育，检讨了军阀主义思想，认真纠正了违反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坏作风，从而改善了军政军民关系。

此后，毛泽东不断教育军队干部要爱护人民，接受群众监督。同时，毛泽东还多次给地方同志做工作，要他们拥护军队，充分认识军队的重要性。党中央、毛泽东关于军爱民，民拥军的教导，促进了军民关系的改善。

为了增进民与军的牢固团结，1941年3月5日，边区民政厅在给各县发出的指示中指出要优待抗日军人家属，使

“抗属生活不低于一般人民”，并制定了代耕原则。

5月1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在颁布的《施政纲领》中规定：必须“加强优待抗日军人家属的工作，彻底实施优抗条例，务使八路军及一切友军在边区的家属得到物质上的保障与精神上的安慰。”^①5月26日，边区民政厅又发出指示信，指出：“边区军队，是保卫边区的主要支柱。没有军队，边区的存在是不堪设想的。同时，边区军队是人民的武装，也是武装起来的人民。军民是血肉相连的。”^②

在上述工作的基础上，1942年底，边区政府正式做出了《陕甘宁边区政府关于拥护军队的决定》，并修改补充了边区优待抗日军人家属条例。与此同时，军队方面也做出了《留守兵团司令部及政治部关于拥护政府爱护人民的决定》。决定指出：“边区政府是边区人民和边区军队自己选出来的政府，它的一切措施，均是为人民，为了抗战利益的，所以它是一个模范的民主政府。在边区物质极困难的情况下，边区政府领导人民积极生产，征收救国公粮，帮助军队解决粮食衣服困难，支持前方抗战。边区部队之所以能够发展与巩固，是有赖于边区政府的扶植和领导的。……边区军队与边区人民像鱼和水一样是分不开的。”“边区政府是革命政府，边区人民是很好的人民，我们军队应该拥护它，保卫它，爱护它。拥护政府，拥护人民，是我们革命军队的任务。”^③以上两个决定的制订，标志着拥军优属和拥政爱民政策正式提出。之后，地方政府又颁布了《调整军民关系维护革命》、《抗属离婚处理办法》、《抗日军人抚恤条例》、《优待抗日军人家属办法》等各种条例；军队方面也发出了关于开展拥政爱民的各种指示。1943年春节，陕甘宁边区以延安为中心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双拥”活动，从而把

密切军民关系推向高潮。

1943年10月1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中，总结了几年来开展“双拥”运动的经验，指示每年阴历正月都要进行一次拥政爱民和拥军优抗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使“双拥”成为密切党群、军民关系的一项基本政策。

二、“双拥”政策的切实执行

“双拥”政策空前深入和广泛扎实的贯彻执行，收到了军民团结一条心，共同建设新边区的巨大成果。

留守兵团（后改为联防司令部）对部队进行经常性的政策法规教育；对政府的号召、指示认真执行；对于地方各级政府负责人，均以本部队首长同样看待；各连队把做群众工作定为制度，每年都帮助当地群众春耕秋收，冬季训练民兵、自卫军；为减轻政府和人民的负担，开展生产自给运动，自己动手解决粮食、被服及日常需要。三五九旅屯垦南泥湾，成为执行党中央“屯田政策”的典范。1940年4月，中央书记处与警卫团一齐动手给枣园乡人民挖了一条长6公里的水渠，可浇地1400亩，给当地人民带来幸福，人民称其为“幸福渠”。有计划地帮助地方兴办学校教育、民众教育；部队卫生机关经常下乡巡回医疗，为人民医治疾病，并利用各种方式，向人民讲解卫生常识；尊重民情风俗，时时处处为人民做好事。部队调动时坚持与当地党政民机关开联席会议，检讨军政民关系，虚心听取地方机关与人民的意见；对于部队中违反纪律的人员随时给予批评教育，严重的则予以纪律制裁甚至惩办；对于拥政爱民的典型则树为模范，大力宣传。张思德同志牺牲后，在追悼

会上，毛泽东发表了《为人民服务》的讲演，号召每个共产党员都要向他学习。

地方政府与人民群众每年到年关则采用“慰问、闹秧歌、开军民联欢会等各种方式掀起热烈的拥军运动”，“以县或区推举代表组织慰劳团，有组织地分别去前线和伤兵医院劳军”。各级政府“在各乡各村召开大小型的干部、群众、军属、退伍残废军人等座谈会，展开对过去优待工作的检讨，发现问题随时解决”。^④在军队与敌人作战时，各级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紧密配合，想尽一切办法“帮助军队带路、救护伤病员、备粮草、组织担架运输、挑水送饭、洗补衣服等，以减少军队疲劳，提高杀敌勇气，战胜敌人”。^⑤如1948年8月份沙家店战役前夕，西北野战军原计划打这一仗需要一周时间，全体指战员有4万多人，每人一天按一斤粮食计算，此次战役共需粮食28万斤。在考虑到当地群众的实际困难时，毛泽东曾讲：如果筹粮问题解决不了，宁可不打。当周恩来找到年轻的佳县县委书记张俊贤，问到筹粮问题能否解决时，这位县委书记一口应承，并讲了三条办法，即：第一，把群众手里及坚壁的粮食全部集中起来；第二，把山上已成熟作物抢收回来；第三，上两项凑不足，就宰杀全部牲畜补充。当地政府和人民这种不惜一切支援子弟兵的精神，深深感动了干部和战士，极大地鼓舞了军队士气。战役打响后，个个奋勇杀敌，很快就取得了沙家店战役的重大胜利。对于军属、烈属，地方政府则根据《陕甘宁边区优待革命军人、烈士家属条例》中的规定予以优待。

正是由于在延安时期认真的而不是草率的、深入的而不是表面的、持久的而不是短暂的、切实的而不是空洞地开展了“双拥”活动，真正做到了军政一致、军民一致，所以在党的

正确领导下，我军才得以“广泛地开展了抗日游击战争，扩大了抗日武装力量”，“以至于能够抗击了日寇侵华军队的百分之五十八，伪军的百分之九十，以至于能够击破敌伪军无数次的反复的残酷的扫荡”，并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和人民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

三、新时期仍要发扬“双拥”的光荣传统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坚持和发扬“双拥”的优良传统，这是由人民军队的性质、作用和现代化建设的艰巨任务所决定的。今天，虽然处于和平环境，然而要维持国内的安定，人民的安宁，保证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仍需要人民军队的保卫，以至在祖国和人民需要时献出血肉之躯。现在许多干部战士缺乏对战争年代军民鱼水关系的切身感受，因此拥政爱民观念淡薄。针对这种情况，要密切军民关系，必须大力发扬延安时期“双拥”的光荣传统。第一、必须深入持久地进行“双拥”运动的传统教育，增强干部战士的群众观念；第二、严格军队纪律，军队各级干部必须带头遵守国家及各级政府的法令、政策，维护群众利益，违者应从严处理；发挥人民群众的监督作用，定期或不定期地让地方政府和人民群众对军队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批评意见。

在中国共产党执政 80 年，人民军队创建 70 多年之际，江泽民深刻总结了党的建设的经验，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新时期党和人民军队的建设指出了新的方向。我们要在新世纪实现新的奋斗目标，必须发扬和借鉴延安时代“双拥”运动的优良传统和宝贵经验，加强执政党的作风建设，恢复干群一致、军民同心的良好关系，早日把我国建成一个富强、民

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

注 释

①② 《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第1辑，第85、102页。

③ 《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9册，第139页。

④⑤ 《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第3辑，第213—214、235页。

（延安革命纪念馆馆员）

延安时期党领导 边区金融的成功经验

杨 健

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银行在中共中央和西北局的领导下，为筹集资金，支援战争，调剂金融，促进生产，维护根据地的经济独立和新民主主义的金融秩序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天，回顾延安时期党领导金融工作的成功经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陕甘宁边区创立了符合中国国情的独立自主的银行国有化道路

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前，陕甘边和陕北革命根据地就在建立红色政权的同时，建立了自己的苏维埃银行，后统一为陕甘晋苏维埃银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随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到陕北后改名为国家银行西北分行，陕甘晋苏维埃银行并入西北分行。1937年第二次国共合作实现后，根据协议陕甘宁边区不设立银行，不发行货币。我党主动停发了“苏票”，流通国民党法币。苏维埃国家银行改名为陕甘宁边区银行后，没有公开，主要经营光华商店和领取国民党发给的军饷，实际是个财政支付机关。这样既维护了统一战线，又为独立自主地开展金融工作保存了机构，积蓄了力量。当国民

党发给的经费只给主币不给辅币时，边区银行就以光华商店的名义发行代价券。国民党停发经费后，党中央断然决定停用法币，授权边区银行发行独立自主的货币，以克服财政困难和抗议国民党停发经费的行径。边区党政军多次发出训令、快邮代电、万万火急密电等，一再重申畅流边钞、禁用法币的政策和办法，使边币牢固地占领了边区市场。在党中央和西北局、边区政府的领导下，边区银行发展成为组建中国人民银行的基础之一，成为国家银行，成为共和国的经济支柱。

毛主席为边区金融指明了方向，他说：“金融问题的出路在于发展生产”

1941年3月边币投入市场，五六月间便发生了金融物价大动荡。时任边区银行行长的朱理治，为避免通货膨胀和金融波动，写信给毛主席，提出了减少“财政拖累”的问题，却被有些人指责为金融本位主义。他们说：“我们有政治保障，可以大量发行。”“要渡过财政困难，适应革命需要，不能不再发行。”“物价涨了，筹码不够，因此不能不随着物价上涨速度而增加发行。”也有一些人相反，认为已经超过饱和点，再不能发行了，甚至质问银行为什么发那么多票子，使边区银行的处境相当困难。

1941年8月，中央开会讨论金融问题，争论也很多。毛泽东作结论时指出：“边区的问题，基本上不是金融的问题，而是经济与财政的矛盾。”他说：“金融问题的出路在于发展生产，这个矛盾只有通过发展生产加以解决。”毛泽东认为朱理治关于陕甘宁边区金融情况的报告“很有些价值”，要西北局起草财经纲领时参考。根据毛泽东指示，中央财经委员会做出

坚持不超过现行发行额，尽一切可能收缩通货的决定。所以1942年上半年，除中央与西北局批准发行的外，再未增加发行。公营经济的放款收回，财政放款减少，币值基本保持在提高和平稳阶段。

金融是经济的窗口，问题在金融，根子在经济。金融混乱是经济混乱的集中表现。1942年12月，毛泽东同志在边区高干会上所作的《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报告，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思想，提出了著名的“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总方针。在这一方针指引下，边区经济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也为建国后的财经工作指明了方向。

“银行的发行，绝不能用在财政上的透支，而应使银行的发行主要是为着经济的发展”

陕甘宁边区银行成立初期，归中共中央财经部领导，后划归边区政府领导。1941年皖南事变后，边区财政极为困难，几乎弄到没有饭吃，没有衣穿的地步。光华商店存有几万匹布都被一些单位瓜分了，只得靠发行边币来解决问题。但因银行无准备金，发行很困难，关中、三边等地边币很快倒流回来。边币与法市的比价由1:1下跌到2:1。市场呆滞了，商业投机产生。贸易上需要货物进来，又不敢让它进来，因为没有法币兑出去。财政厅要银行发票子，银行不敢发，就此发生了矛盾。以后又不准商人使用法币，实行外汇管理。兑换法币要银行批准，但实际上没有法币可兑换，就迫使把光华商店的货物抛出去搞平价。然而事与愿违，物价继续涨，黑市更猖狂，财政与银行的矛盾日益加深。

当时有人认为财政是会计，银行是保管，是出纳。在这一

思想支配下，1943年5月边区政府做出边区银行归财政厅领导的决定。银行发行基本上多用于财政开支。1943年下半年生产与贸易放款增长3倍多，财政放款则增长了8倍。银行三分之二的贷款用于消耗性的财政开支上，引起物价金融空前大波动。年底，延安物价指数比1942年底增长24倍，边币与法币的比价由上半年的2:1，跌至10:1左右，陇东高达18:1。由于银行无法币支持兑换，金融波动，财政预算不断突破，债权债务关系陷入相当纷乱的状态。这一情况迫使财政厅的领导不得不承认犯了如“叫花子拾金”，盲目乐观的毛病。

1943年12月，边区政府检讨了财政贸易和金融工作出现的问题，决定停发票子和三个月经费。统一领导公营商店使之支持边币，财政由支持政策改为临时周转，这样才使边区金融和经济有了新的转机。

1943年边区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粮食、棉花等均获得大幅度增产，公营企业、合作社都有了进一步发展。然而为什么边区会发生金融物价大动荡呢？1944年中共中央西北局召开的第二次高干会议指出：“盲目的用银行的发行来满足财政上的开支，不根据财政的可能收入与必要的节约，防止浪费，以求得财政上的收支平衡。……同时银行变成了财政厅的发行机关，而放弃了扶助边区经济发展的任务。”根据陕甘宁边区的经验，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于1946年4月为中央起草的《关于解放区经济建设和财政金融贸易的基本方针》一文中指出：“银行可以操纵经济命脉，……惟今后银行的发行，绝不能用在财政上的透支，而应使银行的发行主要是为着经济发展上的投资，扶助工农商业和合作事业的发展。”

继承延安时期党领导金融工作的经验是历史的必然和现实的需要

现实是历史的发展。今天的改革开放是无数革命先辈抛头颅洒热血，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换来的。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就可把握历史发展变化的规律。以史为鉴，是我们做好工作必须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现在环境形势虽都发生了变化，但我们不能割断历史，不能忘记过去，否则在新形势下也会出现老问题。

以银行发行为例，1958年大跃进由于指导思想的错误，银行无力顶住滚滚而来的潮流，三年大跃进就拿出480亿元贷款，换来的结果是1962年财政报销“三清”损失320亿元。致使票子增发，信用膨胀，通货贬值，物价上涨，经济比例严重失调。改革开放后，1988年出现的通货膨胀，波及全国的抢购风，也正是在财政赤字向银行透支或借款的情况下，片面追求产值、产量，把经济发展速度放在首要地位，而忽视货币稳定，进而迫使银行大量发行。1983年至1987年，五年平均每年增发货币203亿元，年增长幅度为41%。1988年增发货币更多，达到679.6亿元。很显然货币发行过量，导致社会总需求大于社会总供给。引发出1988年的通货膨胀，对社会的稳定，经济的发展，金融的正常运行都带来了影响，这一情景人们都是记忆犹新的。

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之所以成为民主抗日的模范根据地，有政治的、军事的原因，同样有经济的原因。拓宽延安精神的研究领域，继承和弘扬延安时期党领导金融和经济工作的经验，是历史赋予我们的光荣任务，也是现代化建设的需要。陕甘宁边区经济建设的成就是巨大的，只要我们认真挖掘和研

究，可以借鉴的经验也是极其丰富的。继承和弘扬延安时期党领导金融和经济工作的经验，就可以使我们少走弯路，加快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

（作者：延安革命纪念馆助理馆员）

毛泽东三调陈龙

霍静廉

毛泽东曾三次提名调陈龙到身边工作，三次都未能如愿。这在毛泽东的用人史上还是独一无二的。

陈龙，原名刘汉兴，1910年10月出生于辽宁抚顺，母亲早逝，早年读私塾，后投奔东北军二十一旅六五九团当兵。因表现出色，被选送入吉林陆军军官教练处学习，毕业后升任连长。1931年率部投入抗日救国军，升任军副参谋长。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赴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陈潭秋将其名改为陈龙。1938年经新疆来到延安，分配到中央社会部工作。先后任中央社会部治安科科长，三室副主任、主任。在中央社会部工作期间，他积极参与清理审查反革命嫌疑分子工作。因他重实据，注意调查研究，把一大批捕风捉影、主观臆断的“嫌疑分子”予以否定，并重新安排了工作。1942年，康生发动了“抢救运动”，许多好同志一夜之间成了“特务”、“红旗党”分子。陈龙无力改变其做法，但他头脑清醒，态度鲜明，坚决反对刑讯逼供，并积极投入甄别工作，及时为冤枉的同志平反。1945年8月，毛泽东赴重庆谈判，亲自点将陈龙以秘书名义去重庆负责安全保卫工作。在为去重庆作准备期间，陈龙一面利用各方面的地下情报组织，掌握敌情，布置快速传递途径，一面又起早贪黑练习枪法，使原本就是著名

神枪手的他更能百发百中。临行前，他向首长保证：“就是抛头颅，洒热血，豁出命也要保卫主席的人身安全，毛主席回来，我也回来，毛主席回不来，我也不回来，始终要同毛主席在一起，保护到底。”他说到做到。在重庆的45个日日夜夜里，白天他寸步不离地守护在主席身旁，主席参加酒宴，他接杯代饮；各国记者蜂拥主席身边，他奋力保护；主席出门专访，他探路开道。晚上，看着主席休息后，他又汇集各方情报，布置第二天的警卫路线，不清楚的必须亲自前往现场勘察。不论敌人施展什么招术都是刚刚孕育出笼，就被我情报人员掌握并转告陈龙。陈龙与周恩来及时制订方案，各个击破，最终安全地将主席接回延安。正是有了这43天的朝夕相处，使毛泽东从心底喜欢上这个智勇双全的卫士长。为表达他的心愿，主席一改往日不送礼的习惯，特送给陈龙一块欧米加手表和“忠心耿耿”四个大字，还提出将陈龙调到身边工作。陈龙一听，激动地说：“我愿为毛主席洒热血，抛头颅。”当时，能调到主席身边工作是一种莫大的荣幸，更何况是主席亲自点将。陈龙又惊又喜。但他在细细的思考如何在主席身边干好工作的时候，想到自己的暴躁脾气，又担忧起来：我陈龙去了，能做好吗。另外，他一直想回东北和那些与他生死与共的战友一起保卫故土。他把想回东北不去主席身边工作的想法告诉了领导，心里又忐忑不安起来：“主席这么信任我器重我，提出要调自己到他身边工作，不去会不会惹主席生气？”想到这里，他决定直接向主席请求。当他将自己想回东北的请求告诉主席时，主席听了感到有点意外，还是同意了陈龙的请求，并希望他到东北后能做出好成绩。接着主席又满怀惜别之情将他与陈龙在重庆九龙坡机场的照片，主席在“七大”会上讲话时的照

片，还有主席和江青、李讷的生活照共三张送给陈龙，留作纪念。陈龙看到主席同意了他的请求，心里非常感动，很快告别延安，带领 30 多名干部回到东北。

陈龙回到东北后，先后任北满分局社会部长、吉黑军区保卫部长、哈尔滨市社会部长及公安局长、沈阳市公安局长。当时的东北，苏联红军刚刚撤离，国民党军、土匪、恶霸、流氓、特务、伪警混杂一起，到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陈龙就任后，首先实行大搜捕，一夜之间出动上万人将日本特务机关、日本宪兵队、北满地下军、国民党党部骨干分子、第四军特务队一网打净，狠狠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嚣张气焰，帮助新政权站稳了脚跟。接着又派人深入虎穴，挖出一个个披着各种伪装的间谍特务及国民党东北地下先遣军头目和美国情报机构培训的职业杀手，镇压了多起反革命暴动，将东北治理的秩序井然。当全国解放的号角即将吹响的时候，东北的侦破技术和社会治安工作已总结出了一套经验开始向全国推广。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刚刚进驻北京，党和国家的内务、外事活动日趋频繁。刚解放的北京城各种残渣余孽，还不断制造破坏、颠覆事件，中央领导人的安全警卫就更为重要，毛泽东第二次提出调陈龙到北京工作。陈龙听到这个消息，又是一阵激动，但他又一次反复斟酌自己的短处和长处：自己脾气暴烈，生性好动，只有全身心地投入到最激烈最紧张的战斗中，才适合自己的特性。更主要的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安全的最大威胁是来自即将崩溃的国民党特务组织和海外帝国主义分子。这些不甘灭亡的敌对势力，通过各种手段派遣特务间谍进行暗杀、爆破等恐怖活动，妄图颠覆刚刚诞生的人民共和国。经过这十几年的反复较量，他已有了洞悉这些阴谋的办法，掌握了

对付这些形形色色敌人的手段。能直接和这些暗藏在国内的敌人作斗争，比他坐在办公室里听汇报、开会、接电话的作用大得多，而且会对党和国家领袖的安全起到更大的保护作用。想到这些，他立即写了一封长信，托李克农部长转达，坦率地谈了对中央领导人安全保卫工作的看法，希望毛泽东能谅解。不久，李克农部长告诉陈龙，信已代转，劝陈龙改变想法，去面见毛泽东。因为毛泽东看过信后，心情不快地说：“人家不愿意来，就算了。”陈龙了解毛泽东的性格，他对任何事情轻易不决断，一旦决断从不轻易改变，大到指挥千军万马，小到吃饭散步，更何况这是选定身边的卫士长。从延安到沈阳四年间，他两次回绝毛泽东的提议，这在党内恐怕是罕见的。当晚，他一夜未合眼。他认为自己是从整个公安保卫战线的大角度来看中央首长的安全保卫工作，如果不把敌人派遣的根子挖出来，把每条派遣的渠道堵死，就是有千百个警卫也防不胜防，他相信这个角度是正确的。第二天，他打电话给汪东兴，想直接向主席说明，毛泽东主席很快就答应了。当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陈龙。毛泽东还是那样热情、开朗、亲切。他询问陈龙这几年的工作情况，陈龙一一作了汇报。接着陈龙说起国内外敌人正在施展的种种阴谋，及对中央首长安全保卫工作和侦察工作的看法。毛泽东仔细听着，不时点点头。显然，主席已理解了陈龙的心愿，并爽朗地告诉陈龙：“罗瑞卿已调到公安部当部长，希望陈龙予以合作，能将东北的侦察工作经验推广。”一颗悬着的心终于落地，陈龙一阵欣慰，毛泽东终于理解了自己。随后组织又调陈龙任南京市公安局长。1950年7月，公安部准备召开全国第一次侦察会议，电令陈龙赴京主持筹备会议，并在大会上发言。在全国第一次侦察工

作会上，陈龙的发言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赞扬。11月，海外帝国主义势力和国民党特务机关借朝鲜战争爆发之机，大肆对大陆进行派遣破坏活动，国内的潜伏特务蠢蠢欲动。为加强敌特侦查工作，中央决定调陈龙任公安部政治保卫局局长，1952年4月又任命陈龙为公安部副部长兼政保局局长。到北京后，他集全国各地的情报系统于政保局统一指挥下，形成一个大网和重拳，给敌人以迎头痛击。先后破获台湾、美国多次派遣的特务组织，东北边境的多次敌特渗透，又筹备召开了全国第二次侦察工作会议。这期间，陈龙因在东北一次煤气中毒中伤了肝脏，加之忘我工作，心脏病日趋严重，经常发作，有几次心脏病发作疼得他几乎昏厥过去。

1954年中央外事越来越繁忙，党和国家领导人出访，外国领导人来访，安全保卫任务越来越重，加之获悉台湾从美国培训了一批职业杀手，要派遣回国，从事暗杀破坏活动，毛泽东再次提出把陈龙调过来。罗瑞卿部长亲赴陈龙家转达毛泽东、周恩来的指示。陈龙听后欣慰、激动、内疚交织一起，想不到时隔这么多年，毛泽东还想念他。这是毛泽东第三次提出要他去身边当卫士长了，可见毛泽东对他的感情是何等深厚啊！一串激动的泪水挂上两颊，但他当时的病情已经加重到不能天天上班了。周恩来得知陈龙病得厉害，立即指示到苏联去治疗。陈龙不想去，但禁不住总理和部领导的一再相劝，还是去了苏联。两个月后，又回到大连疗养。尽管领袖和部领导为他的病想尽办法，终因病情过重，于1958年10月4日不幸逝世。

陈龙是党的优秀儿女，是一位鲜为人知的英雄。无论是在残酷的游击战争中，还是在血与火的隐蔽战线里，或是在同国

内外邪恶势力的较量中，他都善于运用灵活的战略战术，掌握其斗争规律，机智、勇敢、顽强地与之斗争到底，直至取得胜利，体现了超常的大智大勇和无私奉献。因此，毛泽东非常欣赏他的才智和忠诚，三次亲自点将要调他在身边任卫士长。陈龙三次都未接任，毛泽东不仅没有怨他，而是通过三次坦诚的谈话更进一步地了解了这位优秀儿女对党、对人民、对领袖的无限忠诚和崇高品德，更加深了对他的深厚情谊和无限信赖。他与主席的这份情谊也成了一段千古佳话，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后来人。

（作者：延安革命纪念馆副馆长、研究员）

《论持久战》的第一个英译本

齐佩良 李 鑫

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作了《论持久战》的著名讲演。这是抗日战争进行10个多月后，毛泽东对全国抗战经验的初步总结和分析，也是针对“亡国论”和“速胜论”的错误观点，阐明党的持久抗战的方针。7月1日，解放周刊社在第43、44期合订本《解放》上作了全文刊载，题为《论持久战——论抗日战争为什么是持久战与最后胜利为什么是中国的及怎样进行持久战与怎样争取最后的胜利》，共5万余字，120节，分为20个问题和最后的结论。前9个问题中心说明抗日战争为什么是持久战，为什么说最后胜利是中国的，后12个问题主要论述怎样进行持久战和争取最后胜利。

《论持久战》公开发表后，在国内外引起了巨大轰动。苏联及共产国际大加赞扬，蒋介石也批示他的高级将领要认真研读《论持久战》，英国的埃利得奥特·贝特曼指出：“几个世纪以来，我们西方国家看到许多没有政治见解的军事家。过去25年中，我们看到的几乎是没有军事知识的政治冒险家。现在我们有了一位既是伟大的政治家，又是最伟大的军事家，他就是政治军事天才毛泽东。这种天才演变成一种万古长存的思想，开始对历史的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就连日本天皇

也叹息道：大日本皇军虽武功赫赫，但没有一个人像毛泽东，把军事理论问题讲得那样透彻。

为了让世界上更多的国家和人民了解中国抗战的重要性、艰巨性以及长期性，上海的党组织决定将《论持久战》迅速译成英文，传播到国外去。几经研究，这项重要任务交到了一位名叫杨刚的女地下党员手中。杨刚时年仅 20 多岁，精通英语，言辞犀利，是一位才华横溢的才女。

杨刚接受任务后，迅速作了准备，为安全起见，求助于其好友——美国女作家埃米利·哈恩。哈恩是美国著名幽默杂志《纽约人》的特约撰稿人，1935 年来到上海。当她得知好友杨刚将冒着生命危险，去翻译一部中共最高领导人关于抗日的著作时，她不假思索地决定让出自己那幢花园洋房楼上的一间小屋，作为杨刚的工作室和卧室。相对安全的空间，使她能够安心地翻译。为了保证译文的准确性，杨刚常与哈恩的爱侣、粗通英文的邵洵美一起研读原著，斟酌字句，切磋译文。邵洵美在协助杨刚翻译的同时，认真地阅读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全文，并深深地为之折服。他在自己主编的《自由谭》杂志上撰文赞叹道：“这本《论持久战》的小册子，洋洋数万言，讨论的范围不能说不广，研究的技术不能说不精，含蓄的意识不能说不高，但是写得‘浅近’，人人能了解，人人能欣赏。万人传诵，中外称颂，绝不是偶然事也。”这应该是国统区最早评论《论持久战》的文字，弥足珍贵。邵洵美还特地在《自由谭》上刊出专门介绍游击战的文章，并配发了有关延安军民抗战生活的一组照片。此外，在《自由谭》英文版上公开连载杨刚所译《论持久战》译文，在寓居上海的外国人中间首先传播开来，反响极大。当时，毛泽东还专门为外国读者写了一篇名

为《抗战与外援的关系》（发表于《八路军军政杂志》），亦由杨刚一并翻译。

杨刚夜以继日伏案工作，不久便完成了《论持久战》的翻译和定稿。杨刚向地下党汇报后，党组织决定把译稿的印刷和发行工作，郑重地托付邵洵美！他毫不犹豫地挑起了重担。为此，杨刚专门在英译本的后记里，写下了感谢邵洵美的话语。

邵洵美接受任务以后，深感责任重大。他和挚友王永禄（时任上海时代图书公司总务）几经考察后，决定将译稿秘密交给与时代图书公司素有业务往来的一家印刷厂印刷。于是，邵洵美和王永禄推掉了许多社交应酬，整天呆在厂里看稿，为书稿的出版而废寝忘食。1938年10月，500册书终于完成印刷装订。书为32开本，封面白底红字，印着英文书名《论持久战》以及著作者“毛泽东”几个字，朴素大方。

书秘密出版了，但如何发行呢？经过周密布置，决定杨刚承担一部分，所余部分则由邵洵美和王永禄合作“暗销”。每当清晨和深夜之际，邵洵美驾驶豪华轿车，在上海西区外国人聚居的僻静马路上开来开去。不知情的人还以为是公子哥儿在兜风，谁都不在意。而他们的眼睛则警惕地注视着四周的动静，等到周围没有人时，邵洵美迅速停车，王永禄敏捷地跳下车，飞奔到公寓门前，往每个信箱中塞进一本书后，立即返身上车。

凭借着机智和无畏，热情与真诚，《论持久战》这部伟大著作，被不断地辗转传播，走出国门，传到了世界各地。引起了世界上热爱和平人士的高度关注，从而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杨刚完成《论持久战》翻译任务一年后，于1939年9月

就任香港《大公报》的《文艺》和《学生界》副刊主编。她利用此便利条件，编发了许多赞颂共产党人的文章、诗歌，并不惧威胁地刊登延安文学作品。据不完全统计，她所编发的延安文学作品及其评论多达 70 余篇。其中有何其芳的《老百姓和军队》、严文井的《三个人》、吴伯箫的《路罗镇》、郭小川的《母子短曲》、丁玲的《我是怎样来陕北的》等等。香港沦陷后，杨刚来到重庆，主持重庆版和桂林版的《文艺》副刊，同时兼任《大公报》的外交记者。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她利用《大公报》编辑和记者的公开身份，同美国驻华使馆人员和美国记者广泛联系，从事国际统战工作，做出了卓有成效的成绩。1944 年 3 月，杨刚到美国哈佛大学女子学院留学，并兼任《大公报》驻美特派记者，活跃在美国新闻界。1946 年，她还给杜鲁门总统写过一封长信，劝说美国政府放弃支持蒋介石打内战的政策。1948 年回国后，继续在《大公报》工作。后来，她到了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受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接见，研究了解放后天津《大公报》的处理问题。天津解放后，天津版《大公报》被改组为《进步日报》，她任党组书记、主笔等职。不久，上海解放，她又成为《大公报》上海版的军代表、副主编，主持其工作。

（作者：延安革命纪念馆副研究员；馆员）

对独立自主、自力更生 原则的理论思考

刘 滢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贯穿于中国革命与建设过程中的一条基本原则。过去，我们靠它获得了独立、自由、解放；今天，仍然要依靠它去绘制富强、民主、文明的宏伟蓝图。在我们即将告别 20 世纪，步入 21 世纪之际，总结历史经验，对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进行深入的理论思考，对于实现党的“十五大”制定的三大步的奋斗目标，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原则的确立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在中共党内的确立，曾经历了一个十分艰难曲折的探索过程，付出了昂贵的代价。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就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依靠人民群众进行革命和建设。从理论上讲，它不仅是处理国家关系、党派关系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根本方法和指导原则，而且包含了一般哲学方法的深刻含义。首先，世界上万事万物的存在，是相互依存性和各自独立性的对立统一。事物的独立性，就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客观基础。其次，它体现了事物发展是“自己运动”的辩证法的核心。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万事万

物之所以能够“自主”与“更生”，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变化，不是依靠外力的推动，而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斗争。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就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核心的本质体现。因此，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必须把注意力放在自然界“自己运动”的源泉上。从历史上看，一个民族如果丧失自主、自信力，不能依靠本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繁荣富强而不懈地斗争，这个民族只能是弱肉强食，任人宰割；同样，一个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如果丧失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也就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已经反复证明了的真理。考察我们党的全部实践活动和理论思考，考察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各个组成部分，都贯穿、渗透着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但是一个真理要为人们所发现、认识是不容易的，往往要付出相当大的代价。

影响中国共产党认识、掌握这个原则的主要原因，一是来自共产国际的干扰；二是国民党的破坏；三是党内机会主义领导的存在；四是党处于幼年，党员理论水平和认识能力的普遍低下。在经历了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战争的失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批共产党人成了开路先锋。他们始终不脱开中国这个地盘，把马列主义的革命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不断总结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教训中，逐步发现了真理，在党内确立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

1930年5月，在中共党内把马列主义教条化和把共产国际指示与苏联经验神圣化的历史条件下，毛泽东写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指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①这是毛泽东对独立自主思想最初的表述。

1935年1月长征途中的遵义会议，由于毛泽东为代表的

党中央新领导的确立，使党进入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新时期。同年12月，毛泽东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发表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讲演，提出了自力更生的原则以及自力更生与国际援助的关系。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内和平初步实现。1937年1月13日，党中央由保安移驻延安。在环境相对稳定的情况下，为迎接抗日战争新局面的到来，有必要对中国革命的经验给以科学的总结，特别是对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在中国革命中的重大作用从理论上给予深刻论述，提高到基本原则的高度。1937年七八月间，毛泽东在延安凤凰山麓的窑洞里写成的《实践论》《矛盾论》，就是这一总结的代表作。

在《实践论》中，毛泽东着重阐明了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人的认识发展的基本来源。指出了人民群众是社会实践的主体，强调要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所谓实践论，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实质上也就是群众路线。这样就把中国革命的前途，寄托于千百万人民群众自力更生的革命实践。

《矛盾论》中，毛泽东对自力更生及它同外援的关系作了理论上的说明。指出：“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任何事物内部都有这种矛盾性，因此引起了事物的运动和发展。”^②“唯物辩证法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③在这里，毛泽东不仅从世界观的高度精辟地论述了事物发展原因，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因与外因关系作了辩证的阐述，而且，紧密联系中国革命的实践，指出两次大的失败，其原因主要是共产党内部的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造成

的，从而为确立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找到了理论基础和客观依据。可以说，《实践论》，《矛盾论》的发表，标志着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原则在党内的真正确立。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成功运用

实践证明，当真理正确地运用于实践时，必然会获得极大的成功。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原则，在抗日战争中全面展开、运用于各条战线。在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我党始终坚持了政治上的独立性，并通过六届六中全会，克服了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在国民党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如果不强调坚持独立自主，必然会丧失主动权，甚至被国民党吃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党的威望的提高、力量的增强，正是坚持独立自主原则的结果；为了培养组织大批开创抗日新局面的干部，党中央在延安开办了 20 多所干部学校，一大批政治军事技术专业人才源源不断地开赴抗日疆场，成为支撑抗日大厦的栋梁；在军事上制定了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在敌后展开了空前广泛的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使抗战胜利建立在人民武装力量发展壮大的基础上；经济上，在抗战处于难关时，我党用领导军民“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开展大生产运动的方式，解决了严重的物质困难；思想上经过延安整风，打碎了教条主义的精神枷锁，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思想上的统一和组织上的团结巩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充分显示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原则的无比正确和强大威力。

解放战争时期，在严重的内战危机中，党保持了清醒的头脑，不怕帝国主义的恐吓，不受蒋介石反动派的欺骗，不顾

苏联党的劝告，继续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原则，以求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其结果我们胜利了，新中国诞生了。我们好心的朋友面对事实，也不得不承认：“我们错了，正确的是中国同志，而不是我们。”^④

建国初，面对着帝国主义反动势力对我进行的孤立、封锁和武装干涉，我们没有动摇过对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原则的信念，依靠人民的力量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迅速恢复了战争创伤，在一张白纸上写下了最新最美的文字，绘出了最新最美的图画。帝国主义的预言家们遭到了可耻的失败。

60年代初，在我遇到严重的经济困难时，“老大哥”乘机“卡脖子”、撕合同、撤专家、索贷款，逼着我们服从他“老子党”的地位。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硬是克服了由于“大跃进”的失误和自然灾害带来的严重困难，顶住了苏联赫鲁晓夫集团的重重压力，使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初步走上了繁荣昌盛的道路。

当然，宇宙间的事情是十分复杂的，人们的认识也往往会出失误。在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上，由于我们还没有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便以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经验为蓝本，照抄照搬，很快就暴露出了脱离中国实际的弊病。在挫折中，使党认识到必须突破苏联的框框，独立自主地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道路。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以苏联经验为借鉴，初步总结了我国的经验，提出必须处理好农、轻、重的关系，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强调了学习外国要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要提高民族自信心。1958年6月，毛泽东在《李富春第二个五年计划要点报告》的批语中，对于社会主义建设如何正确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原则，作了全

面论述。他指出：“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⑤

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初步胜利，使党内产生了一种骄傲自满情绪，对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原则强调到了不适当的程度，实际上变成了闭关自守、夜郎自大的同义语。六七十年代，正是国际上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时期，而我们则关起门来搞“运动群众”，搞过火的“党内斗争”，使灾难性的“内战”延续十年之久。“四人帮”一伙更是把学习外国先进经验、引进先进技术和发展对外贸易攻击为“里通外国”、“崇洋媚外”、“卖国主义”，使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缘。中国一些本来已接近于世界水平的距离大大地拉开了。我们说，在我们四面受围、被封锁、孤立的环境没有改变前，强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对的。但是一旦当这种环境改变后，仍然自以为是，我行我素，老子天下第一，只能是自欺欺人，甘愿落后。为了显示我们这种闭关自守的政策并没有使中国孤立，甚至用高价买别国和兄弟党的“好话”，以说明“我们的朋友遍天下”。粉碎“四人帮”后，一些人出国转了一圈，如刘姥姥进了大观园——看傻眼啦，又由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似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传统过时了，一切都应该依赖外国的援助。

80年代，一些所谓的“民族精英”，大肆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看自己这也丑陋，那也落后，有意无意地充当了西方世界“分化”、“西化”中国的同盟军和应声虫，否定了不该否定的东西，肯定了不该肯定的东西，造成了极大的思想混乱，从而对政治上的安定团结、经济上的健康发展带来了严重的损

害。

总结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经验教训，必须克服两种倾向：一种是闭关自守、夜郎自大、孤立奋斗；一种是崇洋媚外、卑躬屈节、依赖外援。只有这样，这个由鲜血换得的原则才能正确运用，才能成为我国革命和建设的立足点。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在新时期的发展

一个正确的革命原则是时代的产物，必然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原则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有效地克服两种倾向，在建设四个现代化的历史新时期获得进一步发展。

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党十分重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原则在政治、经济、外交等各个领域的贯彻落实。在党的十二大上，邓小平指出：“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中国人民珍惜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友谊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而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⑥这就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原则在新时期如何发展指出了方向。

其一，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不能按一个模式。因为各国的情况千差万别，人民觉悟高低不同，生产力发展水平、自然资源、科技水平、文化教育条件各异，各个国家都应从本国的实际出发，采取适合本国国情的道路、方式和一系列方针政策，决不可用固定的公式去硬套。

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必须从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出发。中国的国情是什么？确切说就是：地域辽阔，但经济发展很不平衡；人口众多，人力资源丰富，但文化技术素质低，给社会经济带来负担和困难；资源总量丰富，但人均资源少，地下资源西富东贫，智力资源，西贫东富；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已经具有相当的规模，但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科学技术水平比较落后，特别是基础设施不足，能源紧张，资金短缺；先进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市场经济制度已经建立，但还需要继续完善，多年来形成的经济体制的弊端和经济的封闭性，仍有巨大的惯性，需要锐意改革；对外开放使我们可以借鉴外国的经验，利用外国的资金技术和市场，但也会受到来自资本主义的限制、阻挠以及腐朽思想的侵蚀；改革开放给我们的民族带来了新的觉醒，党的领导得到了改善，但是党风和社会风气仍未从根本上好转，对中央统一决策的落实和人民积极性的发挥仍有一定的影响。这七个特点，就决定了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有它的特殊性和艰巨性。“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⑦

其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把立足点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

列宁说：“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的群众摆脱压迫和专横的真正解放，不是这些群众自己进行独立、英勇、自觉斗争的结果。”^⑧《国际歌》也唱道：“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中国人民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有着深刻

的体会。

我们强调自力更生，就是要充分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确信人民群众是有志气有能力克服困难的。虽然搞现代化建设，我们经验不足、基础差、底子薄，但只要把 10 亿人民的聪明才智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集中起来，就没有过不了的“火焰山”。任何时候我们都应该确信：“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⑨

客观上说，外援对我们这样一个 12 亿人口的大国，只能是一种补充，起辅助的作用。我们引进必不可少的资金、设备，其目的仍是为了增强自力更生的能力。如果我们不顾及偿还能力，而一味地借债，超过一定限度，经济上的自主权就会丢失，进而政治上的独立也会失去保障。这无异于把绳子的一头套在自己的脖子上，却把另一头交给别人，让人家牵着走。另外，资本主义国家是惟利是图的，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不可能真心实意地帮助我们搞现代化。他们总希望你不要赶上和超过他，总想保持我们与他们拉开的距离，以便保持他们经济大国的地位，从发展中国家捞取更多的利益。这也就要求我们只能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邓小平一针见血地指出：“从发达国家取得资金和先进技术不是容易的事情。有那么一些人还是老殖民主义的头脑，他们企图卡我们穷国的脖子，不愿我们得到发展。所以……必须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争取外援，主要依靠自己的艰苦奋斗。”^⑩

其三，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是我们坚定不移的战略方针。

独立自主并不是闭关自守，自力更生也不是盲目排外。科学技术是人类共同创造的财富，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大胆地

实行对外开放，放手利用国外一切可以为我所用的先进科学技术，迅速地提高和发展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对加速四个现代化建设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必不可少的。正如邓小平所说：“技术问题是科学，生产管理是科学，在任何社会，对任何国家都是有用的。我们学习先进的技术、先进的科学、先进的管理来为社会主义服务，而这些东西本身并没有阶级性。”^⑪

马克思主义历来认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是国际性的事业，一切革命斗争和正义事业都是互相支援的，任何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都不能离开别国人民的帮助和支援。我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有利于加强同各国人民的交往，可以使更多的国家和人民了解我们，从而提高我们的国际地位，扩大社会主义事业在全世界的影响。

当然，随着对外开放，必然会带进来一些副产品，诸如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的滋长和蔓延，但这并没有什么可怕。世界上绝对纯净的东西是不存在的，正如我们吃饭一样，既吃进了维持生命所必需的各种营养，但也吸收了一些有害的微生物。可是我们并没有因饮食不纯而拒绝吃饭，重要的是我们要有抵抗各种微生物侵蚀的能力，可怕的是我们失去应有的警觉，掉以轻心，忘乎所以。

总之，依靠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是党坚定不移的方针；主次不容颠倒，也不能只要第一，丢了第二。“我们一方面实行开放政策，另一方面仍坚持建国以来毛泽东主席一贯倡导的自力更生的方针。”^⑫这就是我们的选择。

2000年的钟声已经敲响，我们已站在21世纪的门口。回顾既往，展望前程，只有正确地总结历史，才能更好地走向未来。江泽民同志在《二〇〇〇年贺词》中指出：“面对新的世

纪之交和千年之交，每个国家有远见的政治家都应从历史的高度思考：未来的世界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应该为实现这样一个世界做出什么样的贡献。”每个公民特别是理论工作者应该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论述，科学地总结过去，说明现在，揭示将来。只要坚定不移地贯彻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开拓进取的既定方针，就会突破一个又一个必然王国而不断实现向自由王国的飞跃，在建国一百周年时圆中华腾飞的美梦。

注 释

①②③⑨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15、301、302、161页。

④ 《铁托传》（下），第118页。

⑤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第273页。

⑥⑦ 《邓小平文选》第372页。

⑧ 《列宁全集》第17卷，第72页。

⑩⑪⑫ 《邓小平文选》第360—361、310、361页。

（作者：延安革命纪念馆馆员）

浅谈“抗大”教育的特点

齐 辙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延安时期是一个非常光辉的时期，是干部教育事业大发展的时期。当时，中央非常重视干部教育，把对干部的教育摆到了重要的位置上。从1935年到1948年，在延安及其周围，党中央、中央军委和边区政府就先后创办了党校、军政学校、战时短训班、文学艺术、医药卫生、农业纺织等30余所院校，培养出了成千上万的优秀干部，创造和积累了许多干部教育的宝贵经验。既有明确的指导思想，又有具体的实施办法；既有共同的特点，又有各自不同的情况。

在这些众多院校中最突出、最典型、最能代表延安时期办学特点的则是“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简称为抗大）它曾获得“国防教育的模范”的声誉，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是延安精神的生动体现，是我党干部教育的光辉榜样。在我国干部教育史上谱写了光辉的一页。当时毛泽东曾称赞抗大是“最革命、最进步、最能为民族解放与社会解放而斗争”的学校，^①“是千百万中华民族优秀儿女的旗帜，是民族解放胜利的旗帜，是创造未来的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的旗帜。”^②

今天，我们步入了新的历史时期，延安的革命传统需要继承和发扬，抗大干部教育的宝贵经验需要吸取。本文试就抗大

教育的特点谈一下粗浅的认识。

一、保证有力

抗大是中国共产党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教育和“培养抗日战争中军事、政治的领导干部为目的”^③的一所大学。是在党的绝对领导下，在政治工作的保证下，组织实施教育的。

当时的抗大是直接受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领导，而且，当时的中央领导同志和我军的高级将领都曾先后担任过抗大领导。如：毛泽东（1937年任抗大第一期教育委员会主席），林彪（第一期校长），罗瑞卿（抗大第三期副校长），还有刘伯承、滕代远、何长工等。同时，他们还亲自给抗大学员讲课，毛泽东曾给抗大第五期学员讲授过题为《被敌人反对是好事而不是坏事》和《辩证法唯物论》等课。而且，毛泽东抗日战争时期的许多重要著作，如《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1月）、《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1938年5月）、《论持久战》（1938年5月）、《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等被作为抗大学员的政治课本；刘少奇同志也曾给抗大学员作过《共产主义事业是人类历史上空前伟大而艰苦的事业》的报告；陈云同志也作过《论干部政策》。所有这些，对抗大学员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和贯彻执行党的正确思想路线起了重要作用，大大提高了学员的思想水平和工作能力。

“与党领导下的其他武装队伍一样，从它创立与发展以来，即有政治工作制度及传统的建立。”^④而且，抗大的政治工作是很出色的。这主要表现在：建立党的组织，开展党的政治工作，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保证了党对培养干部事业的领导；努力提高全体人员的政治觉悟，忠诚的工作和学习热忱，

保证了教学制度的完善与确立，以及教学内容的正确、教学方式的改善；强化观念，提高了党性和加强了思想意识的锻炼；直接进行政治工作与党的建设的教育，充实了教育内容。

由于抗大坚持了党的领导，充分发挥了政治工作的保证作用，抗大是越办越大，培养出了既有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又能很好地掌握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军事干部和政治干部。

二、目的明确

教育的目的是为了让学员认识社会，知道社会的发展规律，而担负起改造社会的责任。抗大创建于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转变的关头。是“中国共产党为着把自己全部政策的转变贯彻于党的全体干部，为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迅速形成，以争取对日作战。也为着抗日战争发动后，中国共产党能够担负起自己应有的职责”。^⑤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就需要大批的能掌握党的统战政策，忠诚于党的事业的干部。因此，重视教育干部，把干部提高一步的问题，也就提到了中国共产党的议事日程之上了。也正是出于这一目的，抗大始终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贯穿于整个教育中，始终以建立抗日统一战线，为夺取抗战胜利为立足点，以理论来解释现实问题，真正做到教育与实际结构，“教学做”合一为出发点。

也正因为抗大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学校，所以，它的全部教育内容，都充分体现了抗日，始终反映着为实现党的路线，为抗战胜利服务的内容。如中国问题（统一战线与中国革命基本问题）、三民主义、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政治工作、民众运动、持久战略与进攻战法等。并且，发动学生接近社会，进行群众活动，以实际问题和实践精神来充实教育。这

样，使得学员在毕业后，即能奔赴前线，引进工作，从而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自己的贡献。

三、校风优良

《抗日军政大学校规》总则中，明确规定抗大的校风是：团结、活泼、紧张、严肃。这是全校教职学员工作、学习和生活的准则。这八个字，渗透到每个人的灵魂，表现在多个方面，具体来说就是：团结友爱、亲密无间，政治上平等、生活上互爱，紧张战斗的生活。抗大的生活是完全战斗化的。为培养良好的军人姿态和严格的组织纪律性，入学两个月就按照实践的需要进行训练，并且，一面学习，一面生产；严肃认真，坚持原则，对工作人员严格要求，对学员定有校规，并且特别强调工作人员的模范作用；生动活泼，生活丰富，抗大的物质条件是十分艰苦的，但大家的精神生活却是丰富多彩的。为了培养教职员工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和崇高的情操，抗大广泛而又经常地开展“革命竞赛”，办墙报、唱新歌、演新戏、搞体育比赛以及社会活动。这样，在抗大既有思想的自由、政治的民主，也有团结互助、上下如一，既是欢乐的、幸福的，也是严格的、紧张的。抗大的这种校风完全体现了无产阶级的高尚情操和作风，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至今仍是我们培养革命军人良好作风的准则。

四、方法灵活

抗大在教学方法和学习方法上，依据自己的教育方针、教育对象和战时环境，摸索出许多切合实际和灵活的方法，总结出许多宝贵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和吸取。

抗大的教学方法特别重视理论与实际联系的原则，强调教学方法的原则化、通俗化、具体化、中国化；少而精的原则，对课程的选择采用“堆栈”式，而不是“百货店”的方式，并特别注意课与课之间的联系，注意现在与过去的联系；示范教育的原则，实地教育，以身作则，注重提高学员组织能力与工作方法，并坚决反对那种华而不实，爱多不爱精，爱数量不爱质量，形式主义的教育方式。这些教学方法和原则是符合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的。这对干部能迅速掌握党的政策，提高马列水平和军事素质起到了重要作用。

由于遵循和采取了这样的教育原则和方法，在抗大也就产生了相应的学习方法。这就是：

1. 集体研究，互帮互学。理论问题一起探讨，现实问题一道分析。这样，不但使学员政治文化、军事技术的水平平均发展，共同提高，而且还可以解决很多难以解决的实际问题，提高学员的学习兴趣。

2. 小组讨论，交流思想。对于教员提出的讨论题以及现实生活中带有争论的问题，开展小组讨论，各抒己见，统一认识。这种方法，一方面帮助了问题较多的同学，另一方面也训练了口头表达能力。

3. 开展竞赛，集体光荣。这种方法是在互相帮助、互相发展的原则上建立起来的，目的是在竞赛中巩固所学知识，在实践中重新学习。从抗大的组织系统看，抗大有5个大队、39个分队，因此，在大队与大队、分队与分队、班与班、个人与个人之间，提出一定时期的竞赛条件，开展学习、工作、生活的革命竞赛，使得全校的学员在紧张空气中学习，增强了集体荣誉感。

注 释

- ① 《毛泽东在抗大三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
- ② 李逸民：《抗大五周年》，1939年。
- ③ 《抗日军政大学招生简章》。
- ④ 张际春：《抗大政治工作几个基本问题》。
- ⑤ 罗瑞卿：《抗大的过去与现在》，1938年8月8日。

（作者：北京外语学院学生）

群众艺术的先驱——杨醉乡

刘卫平

1944年10月11日，历时36天的陕甘宁边区文教代表大会在延安参议会礼堂召开。毛泽东、朱德、徐特立、李维汉、林伯渠、李鼎铭等先后在大会上发表讲演。在11月16日闭幕式上，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副主席李鼎铭向模范人员及团体发奖，抗战剧团团长杨醉乡获得了一张写有“群众艺术的先驱”的奖状。

杨醉乡原名杨增菱，陕西延川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陕甘宁边区老戏剧艺术家。从列宁剧团到抗战剧团近八年时间里，杨醉乡始终是剧团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同时他还兼导演、编剧、演员，为大众化的革命文艺做了大量工作。

从列宁剧团到工农剧社

杨醉乡自小喜欢红火热闹，是闹秧歌、演节目的行家里手。1927年入党后，在党组织的领导下，深入城乡搞宣传，他扮演的“老婆”远近闻名，日子久了，同乡好友及地下党的同志都亲切地叫他“杨老婆”。

1935年春，“列宁剧团”成立，隶属党的西北工委。同年夏，杨醉乡加入“列宁剧团”，不久即接任剧团团长兼党支部

书记。7月，清涧剧团并入后，演员由原来的十几名增加到20多名。

由于当时环境所限，“列宁剧团”的主要工作是协助延安、安定（子长）、延川、清涧等地方政府组织儿童团、妇女会、工会等群众组织；动员青年参加红军；发动广大妇女群众做军鞋、缝衣服；给儿童、青年和学生教进步歌曲、讲革命故事。“列宁剧团”存在的几个月里，剧团只演了《穷人的出路》等3部话剧，影响却十分广泛。一次在延川永坪镇演出《穷人的出路》时，成千群众顶着盛夏的烈日，从四面八方赶来看戏。演出进行到一半时，突然响起了防空警报，演员来不及卸装，与群众一起躲避敌机轰炸。敌机盘旋几圈，扔下几颗炸弹飞走后，几千群众立即回到台前。在热烈的掌声中，杨醉乡组织演员继续登台演出。

1935年11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瓦窑堡后，接管了“列宁剧团”，并改名为“工农剧社”，隶属中央宣传部和教育部，危拱之任主任，剧社人数近40名，分为戏剧和舞蹈两个班，杨醉乡任戏剧班班长。充实后的“工农剧社”，演出形式多种多样，有秦腔、眉户、道情、快板剧等，表演生动活泼，深受工农群众和士兵们的欢迎。杨醉乡自编自演了《消灭汉奸》、《三姐妹》、《劝妻》，还在《小先生》、《死亡线上》等剧中扮演老婆角色。他演的老婆逼真独到，赢得一片赞许，群众都说他“演的老婆像扎啦”。

“工农剧社”仅存在了两个月，剧团除去保安（志丹）县慰问红军演出外，主要演出都在中央所在地瓦窑堡。在瓦窑堡演出时，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徐特立、张闻天等中央领导常常和广大群众坐在一起看戏，宣传部长吴亮平则亲自帮助

维持秩序。台上台下，从中央领导到普通百姓，大家平等相处，亲如一家。

从“列宁剧团”到“工农剧社”，不到一年时间，剧团却有了长足发展，为随后成立的人民抗日剧社开展广泛的群众艺术活动做了良好铺垫。

在人民抗日剧社

1936年1月，根据形势的发展，党中央将“工农剧社”改名为“人民抗日剧社”。“七七”事变后，又更名为“抗战剧团”。“人民抗日剧社”的演出活动进行了一年零七个月。杨醉乡是剧社主要负责之一，他与危拱之、刘保林以一颗火热的心，带领演出人员奔甘肃，越沙漠，为红军官兵，为人民群众，为国外友人，为友军进行了大量的文艺演出。

1936年初夏的一天下午，“人民抗日剧社”在保安（志丹）进行演出。简陋的舞台布置的朴素而庄严，有关团结抗日、支援前线、建设边区的标语贴满戏台，台前红绸布上书写的“人民抗日剧社”六个大字尤为引人注目。毛泽东和斯诺就坐在台下观看演出。当《侵略》一剧演到日军强盗把中国人当椅子坐，还侮辱妇女时，斯诺与数千名观众一起高喊“打死日本强盗！”“打倒杀害中国人民的凶手！”等口号。演出休息时，斯诺还唱了一首《荡秋千的人》。这场演出对斯诺触动很大，在《西行漫记》一书中，他写道：“在共产主义运动中，没有比红军剧社更有力的宣传武器了，也没有更巧妙的武器。”这本书前所附的6张演出剧照，就是斯诺在这次演出后拍摄的。

此后不久，剧社即赴安塞为东北军宣传演出。去杨家沟前夕，周恩来嘱咐杨醉乡他们，一定要在东北军撤下“中国人不

打中国人”的种子，让演出开联合友军之花，结共同抗日之果。

杨家沟地处红区与白区交界处，当时红军和东北军已结束敌对状态，演出时，观众既有红军战士和苏区群众，也有大量东北军战士。因此，演出影响十分广泛。当东北军战士在《亡国恨》一剧中看见日本鬼子蹂躏东北，杀人放火，掠夺资源的罪恶行径后，有的泣不成声，有的情绪激动，一遍遍地高喊“打回老家去，收复东三省！”这时，红军战士和苏区群众即高呼“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欢迎友军一致抗日！”等口号。台上的演出和台下的口号声交相辉映，把演出推向一个又一个高潮。

20多天的演出，深刻揭露了日本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有力地宣传了党的统战政策，感化教育了许许多多友军。

1936年10月，“人民抗日剧社”又奔赴内蒙古三段地。他们背着背包，脚穿草鞋，忍饥受饿，连续行军20多天，艰难地穿越毛乌素沙漠，在三段地为西征红军和内蒙古游击队进行了两场慰问演出。刚返回定边，他们又迎着刺骨的寒风，夜宿昼行，经过几天急行军，赶到甘肃洪德，为红一、二、四方面军胜利会师进行祝贺演出。这次，杨醉乡他们见到了朱德和康克清。康克清特意把小演员们请到司令部，优待他们，吃了一顿糜子糊糊加羊肉。康克清端了几个大盆子，亲切地招呼孩子们要吃得饱饱的。她抚摸着孩子们的头说：“好娃儿，像个红军小战士！”

11月的甘肃已是天寒地冻，演出时舞台下点起了一堆堆篝火，红军驻地像过节一样热闹。周恩来、朱德等领导和战士们坐在一起观看演出。《红军会师活报剧》、《歌唱红军英雄汉》

等节目赢得了广大官兵经久不息的掌声。

1937年1月，“人民抗日剧社”随党中央进驻延安，危拱之调离，黄直接任主任，杨醉乡改任剧社党支部书记。随着大批知识分子来到延安，剧社队伍得到了发展壮大，成员发展到200人。3月7日，人民抗日剧社总社成立。此时无论是剧本质量还是表演形式，都取得了长足进步。同年夏，剧社与中央、平凡、战号三剧团联合演出《阿Q正传》，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观看时，不时地为之鼓掌喝彩。这是第一部鲁迅作品，赵品山扮演阿Q，廖承志扮演王胡，杨醉乡和董芳梅扮演小尼姑，演出非常成功。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全面抗战开始，为了适应抗战形势，8月，“人民抗日剧社”更名为抗战剧团。

在抗战剧团

“抗战剧团”成立后，人数增加到200多名，组织机构也作了相应调整，叶石任主任，杨醉乡和李柯任副主任，下设三个大队，杨醉乡兼任一大队队长，任务是到关中统战区演出。

1937年春节过后，“抗战剧团”一大队70多名演员，在杨醉乡带领下分乘两辆汽车，经过一天半的路途颠簸，抵达三原县。

三原县城战略位置重要，国民党防范严密，但在驻防部队即杨虎城十七路军十七师五十一旅旅长耿景惠的有力支持下，杨醉乡带团顺利进入县城。一进城，杨醉乡便组织70多名演员分头行动，很快将抗日标语、传单、画报贴满全城。红军剧团要在县城演戏的消息迅速传开，好多人携儿带女前来观看演出。《放下你的鞭子》、《亡国恨》等剧引起了观众强烈共鸣，

演出进行到高潮时，受尽欺压的贫苦农民泣不成声，观看演出的十七路军战士不由自主地振臂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还我中华河山！”等口号。为期一周的演出大获全胜。剧团离开三原县城时，耿景惠旅长把43块银元和募捐人员花名册亲自递到杨醉乡手里，对剧团演出表示感谢。

三原演出后，剧团又在泾阳、富平、蒲城、合阳、韩城等县进行两个多月的巡回演出。每到一地，国民党当地政府都寻衅闹事，用种种卑劣手段破坏演出，但在友军的有力协助下，演出不仅获得成功，而且引起了轰动。许多救亡团体、学校和友军还给剧团募捐献款，并主动请小演员到学校、部队教唱抗日歌曲，农民还吆着骡马大车，拉剧团到乡下巡回公演。不少学生，教员还要求参加剧团，或请求带他们去延安。

剧团到西安后，受到了林伯渠的接见。他们在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和附近小学演出几场后，由于局势紧张，杨醉乡带领戏剧班返回延安，歌舞班的20多名小孩子，更名为“孩子流亡剧团”，在八路军办事处和“青年救国会”的秘密领导和掩护下，由团长樊锦秋带领，在渭南进行宣传演出。由于形势所迫，1938年7月1日前夕，“孩子流亡剧团”连夜返回西安。10月上旬，杨醉乡带领戏剧班再次南下，于月底到达三原，与北上的“孩子流亡剧团”会合后，赴泾阳县云阳镇、淳化进行了一周多的演出宣传。11月上旬，剧团到达旬邑县，演出时与潜藏在观众中的特务发生了冲突。

在第一场演出中，《消灭汉奸》一剧演出正在紧张进行，突然，潜伏在观众中的特务跳出来疯狂地破坏演出。这时，杨醉乡登上戏台，对台下上千观众说：“老乡们，顽固派和亲日派极力反对抗日，我们打在汉奸身上，痛在他们心上，所以，

他们千方百计地进行破坏和捣乱。今后，我们抓住这样的坏人在台上公审他，好不好？”“好！”观众群情激昂，齐声回答。特务见状赶紧溜出了人群。就这样，杨醉乡与敌人针锋相对地斗争，保证了演出顺利进行。

12月，杨醉乡又带团赴新正一带连续演出了半年之久，于1939年6月返回延安。为了充实与巩固剧团，中央对剧团进行了整顿。整顿后，杨醉乡任团长，张子春任指导员。全团随之进鲁艺学习。半年后，剧团恢复工作，成员为64人，在杨醉乡带领下，剧团走遍陕甘宁边区各县，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演出宣传工作。

1941年春，剧团返回延安后，又进入鲁艺学习。半年后，剧团又开始演出活动，演出约进行了半年。1942年3月，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决定在“抗战剧团”的基础上创办陕甘宁边区艺术学校。“边艺”于5月1日开学，同日，发布《抗战剧团结束启事》。至此，“抗战剧团”宣告结束。杨醉乡由于长年奔走四方，身体极度虚弱，在组织的安排下回家休养。毛泽东发表《讲话》不久，刚刚恢复工作的杨醉乡受毛泽东之邀，与柯仲平、马健翎等来到杨家岭毛泽东住处。谈话中，毛泽东鼓励他们做大众文化的先锋。

1944年11月16日，在陕甘宁边区文教大会闭幕式上，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向杨醉乡颁发了奖状，对杨醉乡长期深入工农，积极开展群众艺术活动给予了充分肯定。

这张奖状为长方形，白色平布，套色石印，长44.8厘米，宽35厘米，上方正中为毛泽东头像，头像上方两侧是两面国民党党旗。从毛泽东头像两边延伸出由宽2.9厘米红黄相间图案围成的一个长26.4厘米，宽18.6厘米的长方形。奖状正中

是黄色镂空呈圆形状的“奖状”二字，直径为9.7厘米。彩色花边长方形内从右到左依次用毛笔写有“陕甘宁边区奖状”、“杨醉乡同志”、“群众艺术的先驱”、“主席林伯渠”、“副主席李鼎铭”、“中华民国三十三年十一月十六日”。林伯渠和李鼎铭的名字为蓝色印章所盖。目前，这张奖状珍藏在延安革命纪念馆，为国家一级文物。

（作者：延安革命纪念馆馆员）

浅谈延安整风运动

董玉梅

延安整风运动是从 1942 年春天开始的，历经三年多的时间，最终以全党空前团结的形势结束。

那么，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在抗日战争十分紧张的情况下，以这样大的力量和这样长的时间来进行这场整风运动呢？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在它成立以来的 20 多年历史中，经历过巨大的胜利和严重的失败，出现过“左”的和右的机会主义错误，其中给党带来危害最大的是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错误。遵义会议和六届六中全会，分别纠正了王明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的左倾错误和抗日战争初期的右倾错误，但由于没有来得及对党的历史经验进行系统的总结，特别是没有从思想路线的高度对党内历次错误的根源进行深刻的总结，所以，党内在指导思想上仍存在一些分歧。这些分歧，从根本上说，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按具体情况办事，还是主观主义地凭“想当然”或照着某些“本本”办事。这个问题如果不能得到很好的解决，就谈不上党内思想上政治上的统一和行动上的一致，就谈不上同心同德地夺取抗战的胜利。还有一个原因是，中国共产党这时已发展成拥有 80 万党员的大党，其中 90% 以上是抗战以后入党的新党员。毛泽东认为，这些干部“如不提高一步，就不能掌握将来的新局面”。^①

延安整风运动是从中央一级的高级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研究党的历史上的路线问题开始的。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强调指出：“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他还指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队伍中存在着的一些严重的错误，是应该认真地克服的。”^②这里所说的“一些严重的错误”，其实就是指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错误。

六届六中全会以后，毛泽东把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作为“有头等重要的意义”的工作来抓^③，从1939年开始有组织地掀起了一个学习运动。2月，中央特设干部教育部，以洛甫（张闻天）同志为部长，罗迈（李维汉）同志为副部长。5月20日，在陕北公学大礼堂召开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到会的有延安机关学校等团体的代表1000多人。毛泽东出席大会并发表了演讲。他说，我们要建设一个大党，一个独立的有战斗力的党，就要有大批的有学问的干部做骨干，就非学习不可。现在中央设了干部教育部，建立起学习制度，要在全国共产党力所能及的地方造成一个热烈的学习高潮。也就是在这次会上，毛泽东讲了学习碰到困难怎么办？“工作忙就要‘挤’，看不懂就要‘钻’，用这两个法子来对付它。”毛泽东号召全党同志研究学问，把全党变成一个大学校。大家听了毛泽东的报告很受鼓舞。在延安参加学习的达四千多人。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都带头成立了学习小组。陈云同志领导的组织

部学哲学小组坚持了五年，影响较大。1940年这一年，中央关于干部教育先后发出了七个指示性文件，初步建立和健全了一套干部理论学习的制度和办法。^④

为了改变党内理论脱离实际的状况，从1941年3月开始，毛泽东连续采取了一些重要措施来解决理论教育如何联系中国社会和革命实际的问题。

首先，毛泽东决定出版在1937年10月就已编好的《农村调查》一书。毛泽东为这本书写了序和跋。他申明：“出版这个参考材料的主要目的，在于指出一个如何了解下层情况的方法，而不是要同志们去记那些具体材料及其结论。”主要“是为了帮助同志们找一个研究问题的方法”。^⑤接着，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中央宣传干部学习会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实际上，这是整风学习的动员。报告尖锐地批评了理论脱离实际的倾向，指出“这种反科学、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大敌当前，我们有打倒它的必要。”^⑥毛泽东讲话用语之辛辣，讽刺之深刻，情绪之激动，都是许多同志在此前从未感受过的。^⑦

1941年9月26日，中央发出经毛泽东修改审定的《关于高级学习组的决定》。通知指出成立高级学习组是“为提高党内高级干部的理论水平”。通知规定高级组的设置在军队是到师、军区或纵队一级；在地方是到区党委或省委一级。延安及各地高级学习组统归中央学习组管理和指导，中央学习组即思想方法学习研究组，以中央委员为范围，毛泽东任组长，王稼祥任副组长。各地在接到中央通知后，即开始积极筹备。譬如，重庆南方局很快建立了以周恩来为组长、董必武为副组

长，包括 25 人的重庆高级学习组，向延安索取材料展开整风学习。

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和精心布置下，从 1942 年春开始，全国各地党的高级干部的整风学习普遍发动起来了。毛泽东领导整风运动的思路是：从号召加强马列主义理论的学习入手，联系历史和现实的实际，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整风对象先是党的高级干部，后是一般干部和普通党员；整风内容由以讨论党的政治路线为主转变为以整顿思想方法和思想作风为主。他认为，犯思想病最顽固的是高级干部，只要将他们的思想打通，把他们教育好了，下级干部的进步就快了。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认真学习理论，对于提高全党的政治思想水平和执政能力极其重要。毛泽东曾经说过：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认真回顾和总结延安时期整风运动的成功经验，对于我们今天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也有许多重要启示。

注 释

①毛泽东致彭德怀的电报，1942 年。

②《毛泽东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534 页。

③1939 年 6 月 10 日，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的《反投降提纲》报告。

④⑦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 1994 年 9 月版，第 190、192 页。

⑤⑥《毛泽东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789、800 页。

（作者：延安革命纪念馆馆员）

浅析延安时期民主政治 对新中国政治建设的影响

孙麦才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经过了长达28年的浴血奋战，千百万革命先烈前仆后继，英勇奋斗，其目的就是为了推翻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专制统治，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民主的国家制度。中国共产党是完全彻底地为人民服务，是为人民争取民主而奋斗的。正像毛泽东同志所说：“历史给予我们的任务，中心的本质的东西是争取民主。”当然这又是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土地革命时期根据地的苏维埃代表大会是一个历史阶段，抗日战争时期的参议会是社会主义民主的前身和雏形，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则是它的继续和发展。

所谓文明，在广义上讲，是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各种成果和财富的总和。人类在政治领域中创造的财富，主要表现为社会政治制度和政治生活的进步即政治文明。延安时期民主政治建设是这一时期历史发展的最高点。以陕甘宁边区“普遍、自由、直接、平等”的选举制度、“三三制”的政权建设原则、“参议会制度”为典范的民主政治建设在我们国家民主政治史上具有极其光辉的意义，为新中国民主政治建设写下了令人骄傲的篇章。

“普遍、自由、直接、平等”的选举制度是民主政治建设的基础。在陕甘宁边区，建立新民主主义政权的第一步，就是由人民选举自己的代表组成政权机关，从选举制度上保证边区政府不是由少数人统治，而是人民大众的代表机关。

普遍，或称广泛，是指选举的资格。《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第三条规定：“凡居住在边区境内的人民，年满十八岁，不分阶级、党派、职业、男女、宗教、民族、财产和文化程度的差别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有三种人没有选举和被选举权：①有卖国行为，经政府通缉在案者；②经法院判决有罪，剥夺公民权尚未恢复者；③有神经病者。这样，参加民主选举的群众很广泛，每次参加选举的选民一般在80%左右，有的达到90%以上，许多平日足不出户的小脚老太太骑着毛驴翻山越岭参加选举的情形也司空见惯。

自由。选举人想选谁就选谁。在选票上不记选举人姓名，只填写被选举人姓名。在选举方法上，除了在有一定文化的选民中实行票选外，在选民识字不多的场合采用“画圈法”、“画杠法”和“画点法”；在选民不识字的场合采用“投豆法”、“烙票法”和“投纸团法”等多种形式。

直接。这是指选民直接选出被选举人，当场填写选票，当场统计公布选举结果，而不像有些国家先由选民选出选举人，再由选举人去选议员或政府官员。

平等。在选举中，选民的地位平等、权利义务平等。任何选民的投票，其效力都是一样的。

在中共中央的直接关怀下，陕甘宁边区政府根据边区实际，创造性地组织了边区的选举活动，保证了陕甘宁边区政权的社会性质，通过普选建立了与人民血肉相连、鱼水相依，真

正代表民意的人民自己的革命政权组织。

“三三制”是民主政权建设的最佳组织形式。毛泽东在《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的党内指示中指出：“在抗日时期，我们所建立的政权性质，是民族统一战线的。这种政权，是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民的政权，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汉奸和反动派的民主专政。它是和地主阶级的反革命专政有区别的，也和土地革命时期的工农民主专政有区别。”在政权问题上，采取党中央所决定的“三三制”，不论是在政府人员还是在民意机关中，“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他们代表无产阶级和贫农；左派分子占三分之一，他们代表小资产阶级；中间分子及其他分子占1/3，他们代表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人士。”这充分表明，中国共产党所坚持的统一战线是有名有形的统一战线，主张建立的抗日民主政权，是实实在在的民主政权。抗战时期，我们党实行的“三三制”政权形式，是党的统一战线理论的光辉实践，是党坚持抗战、坚持民主的生动体现。实行这种政权形式，调节了根据地各阶级的关系，增强了我党领导下的各抗日阶级的团结，有力地推动了全国的民主化进程，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壮大了人民革命力量，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因此，实行“三三制”的政权形式，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民主政权的最佳选择。

边区参议会制度是民主政治建设的组织保证。边区参议会不仅是民意机关或人民代表机关，而且是边区的权力机关。《陕甘宁边区各级参议会组织条例》中规定边区参议会有权选举、罢免边区政府长官及高等法院院长；有权监督弹劾边区各级政府、司法机关的公务员；有权创制、复决边区的各种单行法规；有权审议边区政府的财政预算、决算及各项建设计划等

广泛权力。边区参议会的这种性质和职能从组织上保证了民主政治建设的健康发展。

抗日战争时期，“普遍、自由、直接、平等”的选举制度，“三三制”的政策、“参议会制度”为全国人民民主政权的建立奠定了基础、提供了经验。这些民主政治的形式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的最好形式，这是被历史证明了的。抗日战争时期的民主政治建设的形式，具有抗战时期的历史特点，但是它的基本精神在于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政权机关，必须吸收党外人士参加，不能由党包办，这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抗日战争结束后，这些制度在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继续得到巩固和发展。新中国诞生后在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机关吸收党外人士参政议政，一大批民主人士进入政府工作并担任领导职务。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后，共产党同民主党派和其他党外人士，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旗帜鲜明地坚持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的政治协商制度。这无疑是对延安时期党的民主政治制度的继承和发展。

江泽民在“5.31”重要讲话中明确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党的十六大报告也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确定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个重要目标。“十六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在总纲里也写进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奋斗目标。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要着重加强制度建设。实践证明，制度带有根本性、全面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才能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和兴

旺发达。

“十六大”报告围绕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这个目标，对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做出了具体部署，强调重点做好几个方面的工作，即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改革和完善决策机制；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维护社会稳定。这几个方面的建设和改革，可以说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相统一的具体化，也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的着力点。我们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心，努力做好这几个方面的工作，完成“十六大”提出的任务。

参考资料

- [1]《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雏形》，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 [2]江泽民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作者：延安革命纪念馆副书记）

新时期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亟须大力弘扬延安精神

王晓瑛

延安精神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建国以来，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同志都曾反复强调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的问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正确认识和深刻理解延安精神的思想内涵，准确把握其精神实质，坚持用延安精神教育广大干部群众，不断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和精神境界，无疑是思想政治工作面临的一项重要课题。认真研究和深入探讨这个问题，对于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一步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党的宗旨教育和艰苦奋斗精神教育，切实搞好思想政治工作，推动西部开发和特色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这也是思想政治工作者的一项重要职责。

一、延安精神的思想内涵

延安精神是党在延安时期那种极其艰苦的环境中，领导边区人民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伟大斗争中，培育和形成的一种革命精神。它的思想内涵包括以下八个方面：一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即不动摇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和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中国，实现民族独立和祖国统一的奋斗目标；二是压倒一切敌人和困难，而决不被敌人和困难

所屈服的大无畏英雄气概和百折不挠，埋头苦干，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革命拼命精神；三是紧紧依靠自己的力量，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奋斗不息的革命精神；四是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相信和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奉献精神；五是大公无私，吃苦耐劳，舍己为人，无私无畏的赤胆忠心和自我牺牲精神；六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不信神、不信邪的彻底唯物主义精神以及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七是勇于批评与自我批评，敢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勇气和不断开拓进取、革故鼎新的创业精神；八是意志统一，团结一心，严守纪律，服从全局的集体主义精神。

以上八个方面构成了延安精神的科学体系和丰富的思想内涵，是延安精神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每一条在延安时期都有充分的体现。例如，整风运动，集中体现了勇于批评与自我批评，敢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和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大生产运动，集中体现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依靠自己的力量战胜困难的决心和勇气；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集中体现了共产党人大公无私，不计前嫌，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全局精神和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坚持八年抗战，体现了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精神；动员和组织广大群众实行人民战争，体现了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政治路线；“七大”的胜利召开，标志着党的领导核心和指导思想的形成，体现了全党意志的统一和空前的团结。应该说，在整个延安时期的所有斗争中，无不体现出坚定的理想信念，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奉献精神和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以及革命的自我牺牲精神。

二、延安精神对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的启迪

作为一种精神，延安精神并不因时间的转移而过时，而是具有永恒意义的精神财富，只能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而不断赋予新的内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学习和弘扬延安精神，对我们最有启迪意义的，也是最有现实针对性的，主要有两条：

第一，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最崇高、最神圣的政治信仰和奋斗目标，是最重要的精神支柱和价值追求。当年，面对穷凶极恶的日本帝国主义的猖狂进攻和残酷扫荡，面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面对延安和解放区土地瘠薄、物产匮乏、给养奇缺的现实，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克服困难，坚持斗争，直到最后的胜利，靠的是什么？就是神圣的不可动摇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这是延安精神的核心和灵魂，是支撑延安精神最强大的柱石和动力。延安精神的一切内容都是这一理想信念与当时当地具体条件相结合的产物，都是这一理想信念在共产党人身上的具体体现。如“气死牛”郝树才、劳动英雄杨步浩、工人标兵赵占魁、优秀厂长陈振夏、模范工程师沈鸿、钱志道等等，他们都具有坚定的革命信念，克服了种种困难，创造出了当时的许多奇迹。

然而，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的历史时期，一部分党员干部，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甚至一些高级干部，经不起执政和改革开放的考验，经不起金钱美色的诱惑，政治上蜕化变质，生活上腐化堕落。有的对科学理论不学习、不研究，是非难辨，立场摇摆；有的把权力视为满足个人私欲的工具，不择手段的聚敛钱财，为家庭和个人铺垫所谓“后

路”；有的意志衰退，思想空虚，沉湎于花天酒地，欣赏和追求低级趣味，挖空心思往低级龌龊场所里钻，整日离宴口馋，远色心烦；有的“主仆错位”，高高在上，当官做老爷，把为群众办事当成是自己的恩赐。从这许多年和最近揭露出来的一些大案要案来看，简直到了利令智昏、无法无天的地步。胡长青、成克杰从党的高级干部堕落为腐败分子，固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背弃了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由于他们位高权重，不为共产主义奋斗，不为人民群众谋利益，那么以权谋私就成为逻辑的必然。

从历史到现实，从正面和反面的情况来看，共产党人如果牢固树立了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就能前仆后继，舍生取义，就能抵制诱惑，拒腐防变。如果背弃了共产主义理想信念，面临生死考验则贪生怕死，面临执政考验则可能腐败变质。所以江泽民强调，理想信念教育是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核心内容。我们一定要充分运用正反两个方面的典型，紧紧抓住理想信念教育这个根本，进一步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教育，努力提高党员干部的理论素质和政治觉悟，教育党员干部不断加强党性修养和世界观的改造，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信仰和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只要把这个问题抓住了、解决了，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就会大大加强，党的凝聚力、战斗力就会大大提高，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就会阔步前进。

第二，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是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职能。试想当年，中央到达陕北后，红军的力量不足3万人，根据地面积不到全国的1%，物质条件和物质基础更是贫乏到了极点。但是，面对国民党反动派武装到牙齿的几百万正规军，面对敌人雄厚的物质基础和精良装备，面对蒋介石

掌握着政权和舆论工具的强大优势，面对日本侵略者的猖狂进攻，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党中央、毛主席领导人民军队和解放区人民，最大限度地发挥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或者说把人的主观能动性发挥到了极限。因而创造了无数可歌可泣的人间奇迹，充分显示了信仰、信念和精神的巨大威力，显示了意志、团结和纪律的强大力量。

然而，近年来，自上而下普遍地轻视、忽视甚至完全抹杀人的主观能动作用，片面追求和讲究物质条件的倾向越来越突出。譬如现在的开会，都要住在宾馆招待所，吃上七碟子八碗，材料印上一大摞，各路车队浩浩荡荡，花费少则几千，多则几万、几十万甚至几百万的会议屡见不鲜。安排一项任务，哪怕是一项临时性的工作，都要自上而下，成立机构，任命领导，解决编制、人员、经费、办公用房和车辆等问题，似乎不这样做就等于不重视。还有，过分强调物质刺激，滥发奖金、奖牌。有的文明单位，奖牌、锦旗堆积如山，群众却怨声载道。总之，没有专车就走不成路，没有官衔就搞不成工作，没有金钱就办不成事，似乎天经地义，理所当然。而人的主观能动性、创造性和精神力量，则越来越淡化，越来越萎缩，越来越丧失殆尽。当然，我们承认物质利益原则，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各方面的条件都应该得到改善。但问题是在财力极度困难的情况下，讲排场，比阔气，惟条件，等靠要，忘记了艰苦奋斗的精神，丢掉了勤俭节约的传统，抹杀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忽视了人的精神力量，必然导致追求享受，贪图安逸，不思进取，自私狭隘，散漫懒惰等一系列问题。可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一定要着眼于提高人的素质，调动人的积极性，开发人的聪明才智，发挥人的创造力，培育人的意志、信念和精

神，努力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做到了这一点，再加上一定的物质条件，威力可就大了。

如果通过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使广大干部群众首先是党员领导干部，都能够从理论上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上树立马克思主义信仰，政治上确立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同时在行动上能够率先垂范，身体力行，忠实地实践和弘扬延安精神，努力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具有良好的精神状态，永远保持延安时期那么一股干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股拼命精神，就一定能够大大增强党的战斗力，大大提高工作效率；就一定能够克服一切困难，排除各种干扰，全面推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并顺利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

（作者：延安革命纪念馆馆员）

用整风精神开展思想教育

冉春曼

—

1942年，中共中央在延安开展了在全党范围内普遍进行的整顿作风的运动，简称“延安整风”。延安整风是我们党在历史转折关头，为了提高广大党员和干部的马列主义水平，为了加强党的建设，争取抗日战争胜利而在全党开展的一次普遍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运动。

土地革命战争结束后，党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全国范围的，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都已巩固的马列主义政党。但是，党内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即：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左倾错误，特别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还没有能够从思想根源上彻底清算；党的高级干部对党史上的一些重要问题在认识上还不完全一致；作为小资产阶级思想作风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及其表现形式的党八股，虽不占统治地位，却广泛地存在着。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党内无产阶级的思想作风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作风及世界观产生了矛盾和斗争。党必须以无产阶级的思想作风克服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作风，以无产阶级世界观改造小资产阶级世界观，只有这样，才能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得到统一，才能领导人民克服重重困难，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为

此，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进行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就成为十分必要的事。这时候，党已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集体和一大批久经考验的革命骨干，加上当时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党已在广大解放区战场站稳了脚跟，这就具备了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的主、客观条件。

全党普遍整风的大体过程和步骤是：1938年10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做出关于学习问题的决议，会后毛泽东同志领导全党进行了大量的理论研究。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并组织高级干部进行路线学习，为全党普遍开展整风运动作了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充分准备。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同志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了《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标志着整风运动正式开始。延安整风运动开始后，广大党员干部首先认真学习中央规定的毛泽东同志的《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刘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陈云同志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等22篇整风运动的基本文件，整顿思想方法和思想作风。6月，全党整风学习普遍开始。整风经历了普遍发动、学风学习、党风学习、文风学习和学习思想小结等五个阶段。1943年10月转入党的高级干部进行路线学习，总结党的历史经验。1945年4月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整风运动结束。

二

延安整风运动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集中克服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作风，端正党的思想路线、组织路线和

文风。

首先，反对主观主义，特别是反对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是全党整风运动的中心。整顿学风，使我们懂得了用什么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那就是坚持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革命的、科学的态度。

其次，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根本目的是解决组织路线问题。正确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必须要有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组织路线问题较广，其中心的问题是党的统一领导。宗派主义的特点就是危害党的统一领导，它可以表现为党与非党的关系；党内这一部分人与那一部分人的关系；个人与组织的关系等问题；还有本位主义和闹独立性问题；自由主义和极端民主化问题；以及纪律和民主的问题等等，这都是危害党的统一领导的。这许多问题都是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作风，都叫做小资产阶级的“尾巴”，其表现为不是全心全意而是“半心半意”、“三心二意”地干革命。整顿党风，要求每个党员自觉联系个人实际，进行检查纠正，这叫“脱裤子割尾巴”，也就是解决全心全意而不是“半心半意”或“三心二意”干革命的问题。

再次，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着重解决在各种工作中的形式主义，特别是在写文章、作报告、作决议中的党八股作风。

延安整风运动之所以取得伟大成绩，是由于党采取并始终坚持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以及根据这一方针所采取的基本方法。整风运动的基本方法是：认真学习 22 个整风文件，紧密联系实际，领会文件的精神实质，以文件精神为镜子对照检查自己的思想、工作和历史，辨别正确与错误，写

出个人的学习思想小结。这当中，自觉性是基本的，但不排除互相间的批评帮助；批评帮助也是为了进一步提高自觉性。有了自觉性就能严格要求自己、解剖自己，提高思想觉悟。

延安整风运动集中起来，有如下几点：

1. 理论联系实际，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是延安整风运动中形成的党的优良作风，也是共产党员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态度

理论联系实际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就是要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中国国情，解决革命实践中提出的问题。要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就必须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领会其精神实质，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不改造主观世界就不可能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延安整风运动，学习了党的整风文件，总结了经验教训，懂得了用党的观点来规范自己的行为，加强了组织性纪律性和党性修养，改造了世界观，使许多普通学生、士兵、农民逐步成为工人阶级的先锋战士和党的领导干部。

2. 群众路线是实现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根本工作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密切联系群众是实现党的群众路线所必须具备的优良作风

延安整风运动的重要成果之一就是使大家树立起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念和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这使广大领导在以后的几十年当中，经受了战争的考验，胜利的考验，执政地位的考验以及像“文化大革命”那样严重挫折的考验，始终坚定不移地同党和人民站在一起的重要的力量源泉。

3. 正确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我们党成熟的标志之一，

是延安整风运动取得的重要成绩经验之一

整风运动中确立的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针和原则，是党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贯穿整风运动的始终，这一方针概括为“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体现了整风运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由于正确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使广大党员干部认识了整风运动的重要性。同时，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对一个执政党的每一个党员来说，更为重要，它是抗腐防变的重要武器。

三

近年来，由于西方资本主义推行的“和平演变”战略连连得逞，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社会主义处于低潮，加上国内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影响，党内消极腐败现象和各种不正之风引起人民群众的不满，我们所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我们共产党员的责任异常重大。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发展经济的同时，着力于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加强对党员和干部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倡导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用整风精神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提高党员和干部素质，防止“和平演变”的重要一环。但是，近几年来，有不少党员和干部不学习，更不用整风的精神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是一些党员和干部素质降低，受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或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方式影响被“演变过去”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是党风难于根本好转的重要原因之一。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党员和干部的头脑，提高他们的素质，就可以增强抵御和平演变的能力。使党风根本好转，关键在于把整风精神

和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活动普及和深化并长久地发展下去。

当前，继承和发扬整风精神，着力于恢复党的三大作风，特别是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显得特别重要。党的三大作风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是我们党的传家宝。但近年来，一些党员干部滋长了官僚主义，少数人不惜损公肥私、以权谋私、贪污腐化，败坏了党的声誉。陈云同志讲：“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已为国内外触目惊心的事件所印证。现在最可怕、最危险的是我们党内的腐败现象和不正之风。正如十三届六中全会指出的：“如果听任腐败现象蔓延，党就有走向自我毁灭的危险。”因此，我们希望恢复党几十年来行之有效的整风的办法，用以教育干部，并促进党的三大作风的恢复和发扬。我们相信，在党中央领导下，坚持改革开放政策，我们一定能克服贪污腐败等不正之风，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做出应有的贡献。

清正廉洁是执政党的立党之本

党政军 李晓剑

延安时期，我们党形成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和清正廉洁等一系列优良作风。几十年来，党中央时刻关注着廉政建设。为了适应新的形势，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把清正廉洁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作风建设的主要任务之一。文件指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的，是党的作风建设的根本目的。党员干部廉洁从政，直接关系到人心向背和党的执政地位的巩固。”这就是说，坚持清正廉洁，不仅是对每个党员特别是党员干部最基本的要求，而且也是我们党作为执政党的立党之本。

一、坚持清正廉洁是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的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党除了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之外，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党在任何时候都是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毛泽东同志指出：“因为我们党是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所以全党同志的一切工作都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都是为了实现好，发展好和维护好人民的利益，任何脱离群众、任何违反群众意

愿和危害群众利益的行为，都是不允许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明确规定，党员干部要正确行使人民赋予的权力，清正廉洁，勤政为民，以身作则，艰苦朴素，密切联系群众，坚持党的群众路线，自觉接受党和群众的批评和监督，反对官僚主义，反对任何滥用职权、谋求私利的不正之风。显然，这一规定是党员特别是党员干部的必备条件。只有具备这一条件，才能完成党赋予的各项任务，才能不辜负人民的期望。

我们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形成的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艰苦奋斗、谦虚谨慎、清正廉洁的作风，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优良作风的集中表现。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由于党的执政地位，决定了每一个党员必须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保持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古人讲：“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要实现党的宏伟目标，不仅需要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而且更需要全体党员通过自己的模范行为去组织群众，宣传群众，教育群众，影响群众并带领群众去贯彻落实党的一系列路线、方针和政策。因此，党员能否坚持清正廉洁，不仅关系到党员的自身形象，而且关系到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程度以及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态度。大量事实证明，群众的热情高不高、工作开展得好不好，与党员特别是党员干部能不能坚持清正廉洁是密切相关的。广大人民群众既看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否符合他们的利益，更看他们身边的党员是否行得正、立得直，真正为他们谋利益，办实事，并以此来观察整个党的作风，评价党员的优劣。所以，实现党的根本宗旨，要靠党员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要教育并带领群众去贯彻落实党的基本路线，完成党的各项任务，也要靠党员清正廉

洁，无私奉献。

二、坚持清正廉洁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必然要求

清正廉洁，勤政为民，是工人阶级政党领导的政权的本质体现。早在巴黎公社刚刚创立时，马克思就提出了必须防止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由人民的公仆变为人民的主人。后来恩格斯又指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必须坚决防止国家工作人员去追求当官发财，而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的主人。”列宁也要求苏维埃政权和工作人员要正确地使用人民赋予的权力，不要使权力特殊化。中国革命胜利前夕，当有人问到共产党人能否保持艰苦奋斗、清正廉洁的作风，能否跳出历史上朝代由盛而衰的周期率时，毛泽东同志满怀信心地回答：“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率，我们决不当李自成！”为此，他告诫全党同志尤其是党的各级干部，要经得起执政的考验，不管当多大的“官”，不管做什么工作，都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永远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决不能让贪图享乐的思想抬头。50多年过去了，巩固人民政权的任务不仅没有减轻，而且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显得越来越艰巨复杂。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有些党员特别是党员干部经受不住金钱和美色的诱惑，经受不住资产阶级、封建主义没落腐朽思想的侵蚀，腐化堕落了。国内外敌对势力也力图用资产阶级意识征服我们，并利用少数党员的腐败行为挑起人民群众的不满情绪，企图否定共产党的领导，颠覆社会主义制度，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江泽民同志尖锐地指出：“腐败现象的蔓延，严重破坏了党和群众的关系，而且成为国内外敌对势力颠覆我党的借口。反腐败斗争是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历史和现实告诫我们，执政党的党员是

否清正廉洁，关系到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盛衰兴亡。因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共产党员坚持清正廉洁，不仅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而且也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惟一选择。只有党员坚持清正廉洁，党风端正了，政府清明了，我们的国家才有希望，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才能不动摇。

三、坚持清正廉洁是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要条件

20多年来，我们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之所以能够健康发展，就是因为我们坚持了社会主义方向，坚持了党的领导，坚持了清正廉洁、艰苦奋斗的作风。然而，我们也不能不看到，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我们党内出现了贪污受贿以及其他一些消极腐败现象，这些现象虽然只发生在少数党员身上，但是对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构成了现实的威胁。如果搞不好廉政建设，任由消极腐败现象滋生蔓延，就会葬送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葬送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这是党和人民绝对不能允许的。邓小平同志曾强调指出：“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这就十分清楚地讲明了一个道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能否取得成功，既取决于党的路线方针是否正确，又取决于党员特别是党员干部能否坚持清正廉洁，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如果党员干部不能坚持清正廉洁，不仅会影响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削弱党的领导，而且会严重阻碍改革开放的深化和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难以贯彻执行，使正确的改革措施在落实中走样变形，使正常的经济秩序和公平的竞争环境遭到破坏，发展下去甚至会改变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方向。因此，要保证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积极性，全体党员就必须永远保持清正廉洁、艰苦奋斗的作风。

（作者：延安革命纪念馆助理馆员）

发扬延安精神 实践“三个代表”

王晓瑛

延安精神作为党的优良传统和工作作风，对夺取中国革命胜利和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产生过而且继续产生着巨大的作用。在新世纪里，如何把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紧密结合起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

要把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紧密结合起来，首先要正确认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内涵与延安精神实质的一致性。延安精神包含了以下几个方面的主要内容：

第一，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是延安精神的灵魂。我们党从成立起，就非常重视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进行广泛而深入的共产主义理想教育。特别是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坚持不懈地对广大党员和革命军民进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新民主主义革命路线政策教育，把实现最高纲领和实现最低纲领有机地结合起来，使理想信念教育更加理论化、系统化。经过理想教育，使崇高理想所体现的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激励着中国共产党在复杂的斗争环境中始终保持了无产阶

级先锋队的纯洁面貌；使崇高理想所具有的巨大凝聚作用，吸引着成千上万的热血青年和广大人民献身民族和人民解放事业；使崇高理想所蕴含的强大精神力量，鼓舞着革命军民战胜千难万险，夺取了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赢得了解放战争的决胜性胜利。

第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延安精神的核心。为人民谋幸福，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和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中，把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中国化，在延安时期为我党我军确立的一项根本的政治原则。这一宗旨全面付诸实践，极大地加强了党的建设和军队建设，也赢得了广大群众的拥护与支持。在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感召下，无数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纷纷投入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洪流，使革命队伍不断发展壮大；在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感召下，广大人民群众自觉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使革命事业不断胜利发展；在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感召下，广大人民群众热烈拥军优属，积极支援前线，使我军奠定了克敌制胜的深厚基础。正是党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作为自己的行动准则，才使延安时期成为我们党历史上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军民关系最好的时期。

第三，实事求是延安精神的精髓。实事求是，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延安时期，党中央在解决了政治路线之后，着手端正思想路线。毛泽东《实践论》、《矛盾论》的发表，为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通过延安整风运动，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逐步被全党所接受，调查研究蔚然成风，实事求是的精神得到普遍发扬，从而形成了党的三大优良作风。在整风基础上召开的党的“七大”，正

式把实事求是确立为党的思想路线，成为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一条根本指导原则。

第四，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延安精神的特征。我们党在延安时期培育形成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之升华，是我党我军的政治本色之体现和优良传统之结晶。我们党和军队就是在同国内外敌人和各种艰难困苦的斗争中发展壮大起来的。延安时期，这种精神表现得尤为突出。依靠人民，排除万难，坚持和推进革命事业不断向前发展，是延安时期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的集中体现；开拓进取，奋勇前进，争创一流工作成绩，并在实践中培养大批治党、治国、治军的英才，是延安广大革命干部和军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的真实写照；联系群众，艰苦朴素，永葆无产阶级的政治本色，是延安时期艰苦奋斗精神的显著特征。延安岁月能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而彪炳千秋，关键是领袖们的积极倡导和率先垂范起到了积极作用。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刻揭示出我们党的内在本质，这就是，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的忠实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忠实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江泽民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内涵作了全面深刻的论述。其基本点是：“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就是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必须努力符合生产力发展的规律，体现不断推动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的要求，尤其要体现推动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通过发展生产力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就是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

针、政策和各项工作，必须努力体现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要求，促进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不断提高，为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就是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必须坚持把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归宿，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在社会不断发展进步的基础上，使人民群众不断获得切实的经济、政治、文化利益。”由此可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内涵和延安精神的概念含义在精神实质上是一致的，一脉相承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包含了延安精神的全部内容，又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

二

我国已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时代的要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是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可缺少的精神动力。但在新形势下，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也出现了许多不容忽视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社会环境和历史条件的深刻变化，使一些人在认识上产生误区，导致了对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缺乏自觉性。延安精神产生于半个世纪以前的战争年代，而我国已长期处于和平环境。因此，一些人对新形势下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产生了困惑：一是承认延安精神的历史地位，怀疑延安精神的时代价

值。这些人感到，延安精神是“战争年代形成的，和平时期还灵不灵；艰苦环境下形成的，生活富裕后还行不行；封闭条件下形成的，改革开放后还管不管用”，对延安精神的永恒性产生怀疑。二是机械模仿延安精神的外在表现形式，缺乏对延安精神科学含义的正确把握。一些人往往把延安精神理解为过苦日子，甚至等同于住窑洞、吃小米、纺线线。这种肤浅、片面的认识，曲解了延安精神的科学含义，在实践中产生了某些负效应。三是感情上认同延安精神，实践上排斥延安精神。这些人怀念延安岁月，敬仰延安时期的领袖人物，但缺乏实践延安精神的自觉意识，甚至认为当今“谁讲延安精神谁犯傻，谁讲延安精神谁吃亏”。

第二，市场经济大潮的负面影响，使一些人的精神支柱发生偏移，动摇了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的坚定性。一方面，把延安精神与市场经济对立起来。片面认为，讲对外开放，就不宜提倡自力更生；讲物质利益，就不宜提倡集体主义等。另一方面，把消极腐败现象与市场经济挂起钩来。认为，市场经济的逐利性，必然滋生利己主义；实行等价交换，就会诱发权钱交易；强调竞争，就可能出现政治和经济生活中的投机钻营，加之现实中确实存在消极腐败现象，特别是有的领导干部嘴上讲“延安”，心中想“沿海”；台上讲奉献，台下想“捞钱”；公开讲奋斗，暗中搞享乐，个别人甚至背离崇高理想，走上犯罪道路。这使一些人丧失了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的信心。

第三，政治上的变化和导向上的偏差，使一些人在实践中感到迷惘，影响了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的有效性。一些人形象地说，“文化大革命”期间极左思潮泛滥，延安精神被神化；80年代受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影响，延安精神受冷落；90年代

初期受拜金主义的冲击，延安精神遭贬值。因受“左”的思想舆论的误导，许多凝聚了延安精神的革命口号被曲解，如，把倡导艰苦奋斗同改善人民生活对立起来；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同闭关自守等同起来；把“愚公移山”同盲目蛮干混淆起来等。同时，也有一些人走向另一个极端，甚至公然批判艰苦奋斗，崇尚能挣会花，否定奉献精神，宣传功利思想。

江泽民同志的“七一”重要讲话，为我们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促进“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贯彻落实提供了良好机遇，指明了正确的方向。我们的思路和对策应是：

第一，要始终把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作为新形势下加强思想文化建设的一个重大课题。江泽民把培养新一代“四有”公民，提高到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根本任务的高度。这个看法是极有远见的。今天的青少年，就是明天祖国的建设者和保卫者，用延安精神培育青少年，这是关系到我们党、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的大事。我们要从战略的高度看待这个问题，统一协调、动员全社会的舆论宣传和教育力量，广泛开展不同层次、不同形式的学习教育活动，积极创造青少年自觉接受延安精神教育的良好条件和氛围。要进一步抓好延安等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建设，充分发挥基地的功能与作用。

第二，要创造一定的形式和载体把学习实践延安精神具体化、经常化。要解决这个问题，各级领导必须形成共识，真正把继承延安精神作为一项长期任务，常抓不懈，并从实际出发，创造便于开展和坚持的活动载体。应该坚信，在新世纪，只要正确把握历史与现实的交汇点，只要正确把握继承与创新的形式，只要正确把握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点，紧随形势任务的发展变化，增加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延安精神必将放射出

新的光芒。

第三，要把领导干部特别是高中级干部带头实践延安精神作为重点。人们普遍认为，延安精神之所以具有巨大的感召力，关键就在于延安时期党的各级领导人身体力行，带头实践党的宗旨。这一民意告诉我们，新形势下抓延安精神学习实践，决不能抓下不抓上，必须把领导干部作为重点。在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热潮中，领导干部带头学习实践延安精神，特别要重视从群众反响最强烈的问题入手，运用延安精神，下决心解决政治品质不纯、跑官要官、贪污受贿、走私贩私、生活奢靡等腐败现象；要严守法纪，加大执法力度，对严重违法乱纪的腐败分子，不论职务多高，资历多老，贡献多大，都要坚决惩处，决不姑息迁就。只有领导干部带头恢复和发扬延安精神，必将对全社会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产生不可估量的带动和促进作用。

三

延安精神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形成的一种崇高而伟大的革命精神。半个世纪的实践充分证明，延安精神始终是我们党克敌制胜、战胜困难、勇往直前的精神动力，是我们党和国家独有的精神财富，是永远不可抛弃的传家宝。今天，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对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仍然有着重大的意义。

第一，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有助于我们更加坚定地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江泽民“延安精神永放光芒”的亲笔题词，是历史的结论，是时代的声音，是未来的召唤。深刻学习领会江泽民关于延安精神的一系列精辟论述和论断，既能坚

定我们弘扬延安精神的信心，更有助于我们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决心。

第二，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更加自觉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实事求是延安精神的理论基础，也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虽然我们今天面临的形势和任务与延安时期相比发生了根本变化，但实事求是作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精髓和基石，仍然是我们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继承、丰富和发展，闪耀着实事求是的灿烂光辉。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就是要坚持我们党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打破本本主义、教条主义的羁绊以及各种不切实际的空想，处理任何问题，都要充分考虑我国的基本国情和面临的现实，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准则，分析认识事物，判断是非得失，把大家的思想统一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上来。

第三，继承发扬延安精神，有助于增强人们艰苦创业、锐意进取、战胜困难的信心。江泽民指出：“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还处在艰巨的创业时期，伟大的创业实际，需要伟大的创业精神来支持和鼓舞。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积极探索，勇于创新，艰苦奋斗，知难而进，学习外国，自强不息，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同心同德，顾全大局，勤俭节约，清正廉洁，励精图治，无私奉献，这些都应该成为新时期我们推进现代化建设，所要大力提倡和发扬的创业精神。”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树立强烈的忧患意识，奋斗意识，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第四，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有助于弘扬主旋律，在全社会形成共同理想和精神支柱。江泽民在“七一”讲话中指出：“必须认识到，如果只讲物质利益，只讲金钱，不讲理想，不讲道德，人们就会失去共同的奋斗目标，失去行为的正确规范。要把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结合起来，为社会保持良好的秩序和风尚，营造高尚的道德基础。”延安精神作为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结晶和共产党人革命精神的集中体现，既是民族精神的现代形态，也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致的，发扬延安精神，能够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精神动力、价值导向和良好的道德环境；反过来，发展市场经济又对发扬延安精神起着推动作用。当前我国正处在深化改革和经济转轨的关键时期，腐朽思想文化的侵蚀不容忽视，贪污受贿、奢侈浪费、以权谋私等腐败问题大量存在，社会丑恶现象沉渣泛起。继承发扬延安精神，对于加强“两个文明”建设，防止抵制腐朽文化和各种错误思想观点对人们的侵蚀，逐步缩小和剔除它们借以滋生的土壤，就显得尤为重要。

（作者：延安革命纪念馆馆员）

延安革命纪念馆任弼时 宣传与研究情况综述

霍静廉

任弼时是我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杰出代表。他具有很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高度的政治原则和党性修养，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21岁即担任团中央总书记，23岁当选为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34岁出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负责人，39岁成为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重要成员。任弼时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理论和组织建设，为民主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做出了伟大的贡献。1950年10月，正当人们沉浸在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周年的喜庆气氛的时候，他却积劳成疾，突发脑溢血逝世，年仅46岁。

在任弼时近30年的革命斗争生涯中，在延安就有12年。他先后任八路军政治部主任和军委总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1938年，任弼时被派往苏联，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1940年初回延安后参与了党的许多重要的方针政策的制定和组织实施；组织、参加、领导了全党的整风运动、大生产运动和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他在延安整风前夕写的《关于增强党性问题的报告大纲》，深刻阐述了毛泽东建党思想，对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他主持起草的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促进全党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团结，起了重要作用。

解放战争中，他与毛泽东、周恩来一起制定了解放战争的战略方针，并一同转战陕北，协助毛泽东指挥西北和全国的解放战争，直至推翻蒋家王朝，建立新中国。

任弼时把自己毕生的精力奉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他旗帜鲜明、坚定不移地拥护毛泽东思想，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他竭尽全力、夜以继日地为党工作，是我们全党的楷模。

延安革命纪念馆作为宣传和研究毛、刘、周、朱、任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陕北 13 年的重要阵地，50 多年来，进行了多方面、多渠道的宣传和研究。现围绕任弼时在延安的光辉业绩，从旧址维修到对外开放，从文物征集到举办展览，从史料研究到专题宣传所做的工作综述如下：

1. 从旧址维修到对外开放

革命旧址是宣传老一辈革命家的历史依托和现实教材。延安革命纪念馆从建馆起就十分重视革命旧址的保护和维修。任弼时先后在杨家岭、枣园、侯家沟、南泥湾、凤凰山等六处地方居住过，目前保存完好的有杨家岭、枣园、南泥湾三处旧址。1953 年，在党中央和各级政府的关怀下，首先将这些旧居划为公有，由延安革命纪念馆接管，并按原样进行了保护性维修。1956 年，杨家岭和枣园的旧居相继对外开放。任弼时在杨家岭的旧居，毛泽东也曾居住过较长的时间，所以，旧址的开放以毛泽东旧居陈设为主，而将任弼时在中央办公厅楼内的办公室维修开放。任弼时在枣园居住的三孔窑洞完全按原样修复开放。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因窑顶渗水，引起窑内脱皮掉泥，为此，对窑顶进行了三次大翻修。同时，将任弼时旧居

旁塌陷的石台阶也进行了大面积修补。1994年任弼时旧居窑后的围墙和护坡由于雨水的冲刷，大面积土坯下塌危及窑洞安全，国家文物局和省文物局又拨专款，重新打了围墙，并对4米多高的护坡用石块进行了加固。1996年，任弼时旧居地下返潮，室内四季潮湿使墙体泥皮脱落。报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将地下湿土全部翻出，用白灰、沙子夯实，水泥罩面，再按原样青砖铺地，既保持了原样，又根除了返潮现象。2001年，为保护任弼时院落的原貌，又将院子边缘的护坡进行了加固。任弼时在南泥湾的旧居是土窑洞，窑口的挑檐是土木瓦结构，几乎两三年就要进行一次维修和更换，几十年来，维修更换木檐从未间断，始终保持原貌且整洁如初。杨家岭中央办公厅二楼是任弼时的办公室，地板、楼梯全是木质结构，由于参观者的踩踏，油漆和主要参观线木板就会脱落裂缝，几乎每年都要更换维修。

半个世纪来，对任弼时旧址维修加固30余次，所用资金约100多万元，30%是延安革命纪念馆从事业经费中挤出来的。

自1956年开放以来，枣园、杨家岭、南泥湾的任弼时旧址，每年接待观众三四十万人次。“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受“左”的影响，除毛泽东旧居外，其他旧居先后关闭。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又陆续恢复开放，共约接待观众3000多万人次。

2. 从文物征集到陈列展览

文物是革命遗址和纪念馆陈列宣传的重要实物依据。延安革命纪念馆在成立之初，就把老一辈革命家在延安时期的文物征集列入重要议事日程，作为长期任务来抓，上至馆长、下至

普通职工，人人定时间定任务，按指标完成革命文物征集任务。1958年，还掀起一个革命文物征集大跃进，全馆职工人人都是征集员，仅北京一地，就派出文物征集人员上百人次。任弼时的文物征集工作，我们先后八次走访了陈琮英、叶子龙、任远志等40多人，有些当事人是多次登门拜访，以求得支持和帮助。1964年陈琮英同志将任弼时在延安读过的《进一步，退两步》共70本书籍及任弼时在延安用过的马褡子、茶缸、墨盒、砚台、木箱、眼镜、照片等捐赠给延安革命纪念馆。现延安革命纪念馆征集收藏的任弼时的文物81件。这些文物充分反映了任弼时无限忠诚党的事业，为共产主义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崇高品质和伟大精神。

1956年延安革命纪念馆即根据调查走访情况进行任弼时旧居陈列。为使陈列真实而富有生活气息，1956年、1965年、1969年、1976年，延安革命纪念馆先后多次请回任弼时的警卫员、秘书、工作人员20多名进行现场回忆，实地考察。根据多次反复考证基本确定了室内陈列。1983年，延安革命纪念馆特邀了任弼时的夫人陈琮英回延安，对任弼时旧居内的陈设，如墙上挂的，地下放的等一一进行考证。根据陈琮英的回忆，任弼时在工作之余，喜好打猎，墙上挂一枝猎枪。对于任弼时在延安时期撰写的大量具有指导意义的文章和书籍，则设专柜予以陈列，并按照陈琮英的意见，将任弼时大生产时纺线用过的纺车，从苏联带回的蓝花被等都进行了重新陈列和调整。陈列调整后的任弼时旧居陈列既反映了领导人为中国革命废寝忘食的伟大精神，又体现了艰苦奋斗的本色；既突出了个人不同的个性和嗜好，又增加了真实感和生活气息，深为观众赞赏。

除旧居陈列外，延安革命纪念馆还在延安革命史基本陈列和临时或专题展览中大量宣传任弼时的革命风范和高尚品德。我馆举办的《延安革命文物展览》、《延安精神》展览、《红军长征六省文物联展》、《南泥湾大生产》展览、《延安精神永放光芒》、《毛泽东在延安》、《国际友人在延安》等40多个展览，先后在北京、上海、南京、武汉、广州、深圳、天津等各大城市巡回展览，累计展出任弼时的照片约1000余张，文物200余件，以不同的专题和展览形式，宣传任弼时坚持真理，维护团结，密切联系群众以及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崇高品质和对革命事业的伟大贡献。

3. 从史料研究到专题宣传

在近半个世纪的调查研究和学习宣传中，延安革命纪念馆整理了数十册关于任弼时的史料档案并将这些资料一一分类，编写成书籍、画册、明信片、讲演稿，用多种方式宣传任弼时、歌颂任弼时。我馆编撰的《圣地延安》、《圣地风云录》、《光辉的十三年》、《延安革命旧址介绍》、《杨家岭晨报》、《圣地》季刊等20多种书籍、杂志中，收集了研究宣传任弼时的文章约40多篇30余万字，还编辑了《革命圣地——延安》、《延安革命史画卷》、《延安大生产运动》、《延安旅游指南》、《延安观览》等大型画册，选登任弼时在延安时期的照片80余张。广泛宣传任弼时在延安时期对中国革命所做的贡献。

20世纪80年代我馆组建了延安精神宣讲团，用讲、唱、跳相结合的方式宣传老一辈革命家的丰功伟绩，先后编写了歌颂任弼时的《党的骆驼——任弼时》、《纺线能手》等14篇讲演稿，配合以图片在全国各地巡回讲演，收到了十分显著的效果。我馆研究人员还将调查访问资料整理成生动具体的故事，

到中小学校宣讲，如《火烧张国焘的反动决议》、《半根皮带》、《这个传统不能丢》、《青年领袖——任弼时》、《金驼岭的传说与任弼时》等等，都是给小学生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精彩故事，使广大师生对任弼时有了更多更深的了解。

在用书籍、画册、故事和宣讲方式宣传任弼时的同时，为使全国人民对任弼时有较系统、较全面的了解，我馆在任弼时旧居的窑洞里增加了《任弼时生平大事记》专版。在任弼时旧居旁工作人员窑洞里举办了《人民的骆驼——任弼时》专题展览，将他一生的巨大贡献及领袖风范系统全面地展现给观众。1994年，在任弼时诞辰92周年之际，我们配合其子女举办了《任弼时生平书画展》，展出照片、书画260余幅，展线近百米。在展出一个月的期间内，观众络绎不绝。随后又在西安、郑州、广州等地巡回展出，观众达40多万人次。这充分体现了人们对任弼时同志的敬仰和爱戴。

总结50年来延安革命纪念馆宣传研究任弼时的工作，主要有这样几个特点：一是注重于任弼时生平的宣传研究。因为任弼时去世早，建国后成长起来的人对他还是陌生或者说不熟悉的，所以需要对他短暂而光辉的一生作系统介绍。枣园旧居内的生平图片展，就是出于这样一种考虑。其二是抓住任弼时一生中的几个亮点进行重点宣传和研究。如长征途中同张国焘分裂活动的斗争；红军改编后因取消了政治委员制，放松了对战士的思想政治工作，从而使新军阀主义抬头，是任弼时首先发现了问题的严重性，并与朱德、彭德怀联名向中央打报告，主张恢复部队中的政治委员制度，加强政治思想工作；1938年3月被派到共产国际工作后，挽回了由王明主观主义造成的恶劣影响，如实向共产国际报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斗争史

和毛泽东的突出贡献，使共产国际很快改变了观点，承认了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和政治路线；在康生搞的抢救运动和土地改革中，任弼时大胆纠错，表现了对同志对人民高度负责的品质；在大生产运动和延安整风运动中的身体力行，严于律己；筹备党的“七大”付出的辛劳；转战陕北中留在陕北黄土地上的那一串串闪光的脚印等等。其三对于任弼时为何能较早地成为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中的核心成员以及他不怕苦和累，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骆驼精神”等进行了广泛研究宣传，使任弼时一生为中国人民的伟大贡献，更加广为流传，深入人心。

尽管我馆在宣传研究任弼时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与他对中国革命的伟大贡献相比，宣传研究的广度、深度还远远不够。主要是两多两少：对生平介绍的多，思想研究的少；历史过程介绍的多，现实作用联系少，加之研究力量有限，研究、宣传的力度还赶不上形势的要求。

当前，我们应如何抓住机遇，把宣传和研究赶上去，这需要在深入思考的基础上制订一个切实可行的规划，组织力量实施。为将任弼时的革命事迹向社会进行全方位、多渠道的宣传，为纪念任弼时诞辰 100 周年，我馆初步设想了下面几个方案：

其一，在两年内举办一个“任弼时在延安”的大型专题展览，全面展示任弼时在延安的光辉业绩。除在枣园搞一个固定展外，还可将主要内容制作成活动板面，到外地进行流动展览。

其二，办好两个会。一是“任弼时的‘骆驼精神’演讲会”，利用我馆宣讲团的力量，采用讲、唱、跳相结合的生动

活泼的形式，编写一组颂扬任弼时高尚品质和优良作风的演讲稿，深入到机关、厂矿、学校、军营进行讲演，每场不超过 1 个半小时；二是由我馆牵头，联合湖南任弼时纪念馆、西柏坡纪念馆、延安陕甘宁根据地史研究会、延安市委党史研究室、市委党校等单位，召开一次理论研讨会，从多角度研讨任弼时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及其精神的时代意义。

其三，编写两本书。一是将研讨会的论文精选结集出版；二是编写一册《任弼时在延安》的专著，从领导二方面军长征到转战陕北协助毛泽东指挥全国解放战争，按时间顺序列 10 个左右的专题，全面系统深刻阐述任弼时在延安的光辉业绩。

为了完成这一工程，除动员我们自己的力量外，还要组织社会上的研究力量，并特邀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央党史研究室的专家指导，取得他们的帮助。

我们相信，通过一系列的纪念活动，任弼时的革命精神必将在新时期获得广泛深入的发扬。

（作者：延安革命纪念馆副馆长、研究员）

延安时期翻译工作发展简介

齐 辙

延安时期，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及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在政治、军事等方面的交流越来越频繁。因此，翻译活动的重要性也就日益凸现出来。笔者主要想就以下三个方面向读者进行简要介绍。

一、抗战时期延安的主要翻译机构设置及主要人物简介

抗战时期延安主要的翻译机构有四个：（1）中共中央军委编译处：主要从事军事方面的编译工作；（2）鲁艺编译处：主要从事文化艺术方面的编译工作；（3）中央研究院（前身是马列主义学院）：主要从事马列主义著作方面的编译；（4）新华社英文部：除编发每日新闻外，还创办英文刊物《中国通讯》，并出版一些重要的翻译本，如国共谈判文件，毛泽东演讲等，《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曾被新华社英文部和中央研究院翻译成外文版本。

以上四个翻译机构中的部分编译人员，后来成了我国杰出的翻译家或外交家，以下笔者将这些主要译员进行逐一介绍。

柯柏年（1904—1985），原名李春蕃，笔名马丽英、丽英、福音等，广东潮州人。1920年在上海沪江大学中学部学习时，

即开始试译美国共产党《工人日报》等报纸上的文章。1923年在上海大学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翻译恩格斯名著《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翌年，在北伐军政治部任职。1936年赴延安，一直在马列学院（后称中央研究院）任职并编译马列主义著作。1946年在北平军调部担任共产党方的翻译处处长。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在外交部、外交学会等机构担任领导职务，还曾担任过我国驻罗马尼亚和丹麦的全权大使。他不仅是一位杰出的马列主义著作翻译家和国际问题专家，还是一位优秀的外交家。

何思敬（1896—1968），著名法学家，翻译学家，浙江余杭人。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担任抗大教员，并在中央军委编译处工作，后任延安大学法律系主任，中央党校研究室研究员。

周立波（1908—1979），著名作家，翻译家，湖南益阳人。1934年加入左联，同年入党，曾任八路军华北前线战地记者，翻译。1939年奔赴延安，任鲁艺编译处处长，翻译了大批文化、艺术方面的作品。

曹葆华（1906—1978），著名诗人，翻译家，四川乐山人。193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研究院，1937年赴延安，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鲁艺编译室主任，抗大文学教员，解放后曾任中宣部俄文翻译室主任，中国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室研究员。

天蓝（1912—1984），江西南昌人，文学翻译家。曾任鲁艺编译科科长，译著颇丰。解放后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王实味（1906—1947），河南潢川人。北京大学毕业，

1937年到延安，任鲁艺教员，后调入中央研究院任特别研究员，从事马列主义著作的翻译工作，是一个有成就的翻译家。延安整风后被打成五人反党集团之一，1943年被逮捕，1947年被秘密处决。1991年2月7日公安部为其彻底平反。

沈建图（1915—1955），新加坡华侨，香港大学肄业。1938年到延安后，一直在新华社英文部工作，英文水平很高。解放后于1955年随中国记者团赴印度尼西亚参加万隆亚非会议途中，因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被炸弹炸毁不幸罹难。

二、中央领袖外事活动中口译情况简介

随着战争的继续，中共领袖毛泽东等人的外事活动也日益频繁。在向其他国家宣传、介绍我方政策，加强沟通，争取支持等方面，延安的口译工作者们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高度负责的态度，娴熟的业务素质，高尚的译德译风，无私的奉献精神赢得了各国朋友的交口称赞，为我国口译事业的发展留下了宝贵财富。在这些译员中，不得不提的一位著名翻译家就是师哲。

师哲，生于1905年6月30日，陕西韩城人。1919年入陕西省立第一师范，1925年投笔从戎，参加国民二军，同年被选送苏联基辅军官联合学校学习。1938年秋在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任弼时的秘书，1940年春，随周恩来、任弼时回国后，长期在延安中共中央办公厅、社会部任职。1945年任中央办公室主任，1949年兼任中央编译局局长，俄语学院院长，外文出版社社长。1957年1月任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他曾长期在毛泽东接待外宾时担任翻译，也在周恩来、刘少奇访苏时，为他们进行俄汉语之间的同声传译。因此对于师

哲丰富的译事活动，我们顺便花费较多的笔墨说明。

师哲在 1928 年毕业于苏联基辅军官联合学校后，便留校担任中国排排长，并兼任翻译工作。1938 年任弼时赴苏接替王稼祥担任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团长后，师哲便开始担任其政治秘书兼翻译。为了向苏联及世界人民宣传中共历史、抗日战争形势及现行政策，师哲常将中共领袖的重要著作译为俄文，例如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等。1939 年周恩来赴苏疗伤住院期间起草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国备忘录》，总计 55000 字，全由师哲译为俄文，转交斯大林及共产国际执委们阅读。周恩来在向共产国际口头汇报中国问题时，师哲每天翻译的时间长达八九个小时。后来，周恩来报告的文稿，由师哲翻译，以《中国抗战的严重时机和目前任务》发表在《共产国际》杂志上。1940 年 3 月，师哲随周恩来一行返回延安，并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自此，他便一直留在延安，担任毛泽东与任弼时二人的翻译。

1942 年，苏联派遣孙平（原名彼得·巴菲诺维奇·弗拉基米洛夫）来华负责苏军对日情报组工作，毛泽东对此十分关心，经常通过师哲翻译与孙平交谈，向他介绍了中共发展简史，当前的路线、方针与政策等方面情况。利用翻译之机，使长期远离祖国的师哲也系统地获得了中共党史的知识，为他日后的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中共举行“七大”时，毛泽东准许孙平列席会议，并指示师哲为他翻译。后来，孙平向苏联通报中国与中共的革命现状与各项政策，赢得苏联的充分支持。此后，毛泽东还与许多苏联军官、友人有过多次交谈，例如苏联派至延安的阿洛夫医生（原名安德烈·雅柯夫列维奇·奥尔洛夫），都是由师哲为毛泽东担任翻译。

综上所述，从1940年至新中国成立，在中共领导人从事的无数外交活动中，主要是由师哲担任俄语口译的工作。他以对党的忠诚及纯熟的俄语，出色地完成了多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口译任务，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除师哲外，还有几位重要的口译人员：王光美、龚澎、吴亮平。

王光美（1921— ），天津人，出生于一个富裕而有文化的家庭，父亲王槐青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母亲董洁如受教育于北洋女子师范大学。王光美1946年在北京辅仁大学物理系获硕士学位后，放弃留美机会，奔赴延安工作，后经人介绍结识刘少奇并为其担任外事口译工作，后与刘少奇结合。

龚 澎（1914—1970），祖籍安徽合肥，生于日本横滨。1937年大学毕业，翌年，取道武汉赴延安，先后入陕北公学、马列学院学习，期间担任毛泽东外事英语翻译。1940年冬，调往重庆，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开展国际统一战线和宣传活动，同时担任大量口译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部长助理，多次随周恩来出访。

吴亮平。如果说师哲是毛泽东的专职俄语翻译，那么吴亮平则充当了毛泽东的专职英语翻译。1936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应邀访问保安，在他与毛泽东的多次会晤中，一直是由吴亮平来做翻译，并且带着斯诺到前线访问。可以说斯诺在《西行漫记》一书中正确报道中共领导下的红军，是与这次前线访问分不开的。因此，吴亮平不仅是一名出色的翻译，而且对斯诺做了很好的宣传工作。后来在斯诺与毛泽东对其谈话记录整理并译成英文稿时，吴亮平又反复地进行了英文与中文之间的双向笔译。斯诺成为第一个赴苏区采访并客观报道的西方记者，并以其《西行漫记》一书而闻名世界。吴亮平出色的翻译

工作所作的贡献是功不可没的。除此之外，吴亮平还笔译了《反杜林论》等书，毛泽东给予了他极高的评价，称他“功盖群儒”。

三、其他翻译人员与翻译活动简介

除本文前两部分所介绍的这些专职翻译机构及译员，还有一些其他的兼职翻译人员和翻译活动，也曾在延安时期对外交活动中起到过重要的作用，如黄华、成仿吾、林迈克（英）、李效黎、马海德（美）、蒲焕人、朱仲芷、刘晓等人曾参加过抗战时美军观察组与中共之间的翻译及中外记者团访问延安各界的翻译，外国援华抗日的友人如加拿大的白求恩、印度的柯棣华、苏联的阿洛夫工作生活翻译和其他各项涉外工作的翻译活动。

随着中国革命的不断发展和中国第一代共产党人高级干部的女儿们逐渐长大，他们大都在苏联受到了正规的高等教育，如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瞿秋白的女儿瞿独伊等等。他们个个精通俄语，返回延安后被抽调担任一些兼职翻译工作。例如毛泽东在重庆谈判后，劳累异常，返回延安便重病缠身，应中共要求，苏联向延安派遣了一名内科医生，一名外科医生，毛岸英也随机返回祖国，并充当起父亲与二位医生间的临时翻译。当时美军观察组包瑞德等人也在延安，毛岸英的到来，引起了他们极大的关注。每次周末舞会包瑞德必到场，他知道毛岸英会英语，总喜欢拉住他谈个不完。因此，包瑞德等美国人与其他中央干部谈话时，有时毛岸英会充当临时翻译。

而瞿秋白之女瞿独伊，是1928年随母亲杨之华赴苏的，1941年回国在新疆遭逮捕，直至1946年才抵达延安。她被分

配在新华社工作，有时会担任中共干部与苏联军官之间的临时口译工作。此外，马振武、韩叙与董越千三人曾在耿飏护送美军观察组到晋察冀根据地的途中，担任随军临时口译员。美国女作家、记者史沫特莱在延安访问期间与中共主要领导人之间的谈话大都由当时延安《新剧》剧团演员、上海人吴莉莉担任翻译。后来史沫特莱所著的《伟大的道路》和斯诺所著的《西行漫记》一样，都是有关中国革命史的名著。

1946年8月毛泽东与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谈话是由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担任翻译的。此次谈话后来被编入《毛泽东选集》。斯特朗曾著有《中国的黎明》、《中国人征服中国》等书。

综上所述，延安时期各翻译机构、教育机构的建立及各位翻译工作者的辛勤工作不仅为革命培养了大批优秀的专业翻译人才，在对外交流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且也在中国翻译史上写下了壮丽的诗篇，为我们研究翻译提供了翔实的史料和宝贵的财富。

（作者：北外学生）

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历程中的翻译工作

齐 辙

在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历程中，无可避免地会涉及两个重要方面的问题：政治与军事。由于其主要对手是国民党及其军队，因此，国共两党、两军都会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及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发生种种关系，而这些联系就要借助于语言与文字的交流。所以在政治工作与军事工作中，有时就必须依靠笔译或口译活动作为交流的桥梁。

当然我们必须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在早期革命历程中的笔译与口译活动是十分丰富多彩，非花大力气是难尽其功的，笔者只是想向读者简略介绍中国共产党在政治工作中涉及的主要口译人员及其口译活动。下面，笔者将就 1920—1927 年和 1927—1935 年两个时间段来分别介绍有关情况。

在 1920—1927 年这段时期里，我们所要涉及的几个主要翻译工作者分别是：杨明斋、张太雷、赵世炎和秦邦宪（博古）四人。

杨明斋，山东平度人，早年由山东入东北后辗转进入俄国做劳工，成为早期俄国华侨之一，后加入俄国共产党。1920年初，共产国际遵照列宁关于要支持中国革命的指示，派遣以维经斯基为负责人的工作组来华帮助建党，杨明斋为成员并担任翻译。他陪同维经斯基来到北京大学与李大钊会谈，经过几

次融洽的会谈，取得了建党的共识。同年5月，杨明斋持李大钊写的介绍信，陪同维经斯基抵达上海，会见陈独秀、戴季陶、李达等人，会谈时均由杨明斋来做俄汉、汉俄双向口译和笔译。8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宣告成立。此时杨明斋出任中俄通读社社长，负责随时向莫斯科通报北京、上海两地建党活动。9月，共产主义小组计划选派一批革命青年赴苏学习，于是决定成立自己的外国语学社，杨明斋为社长。湖南的刘少奇、任弼时与萧劲光等，安徽的蒋允慈、柯庆施等先后进入外国语学社学习，并从这里被派遣至莫斯科学习。外国语学社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自己创建的第一所外国语学校，也是培养出第一批担当翻译人才的学校。因此，杨明斋既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位俄汉翻译人员，又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所外语学校的创办人之一，他为早期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的沟通，做出了重要贡献。

张太雷（1898—1927），江苏常州人，早年入常州府中学堂求学，与瞿秋白同班，后毕业于天津北洋大学法政科。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赴苏留学。他不仅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一位杰出领袖，理论家，也是一位杰出的国际活动家和翻译家。建党初期，他多次担任口译工作，为我党的建设与早期国际交流做出了重要的贡献。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先后在上海与嘉兴召开，正式宣告成立中国共产党。与会期间，共产国际派遣马林与尼可尔斯基二人参加。马林是由张太雷陪同来华的，在代表大会召开前，张太雷为大会筹备组翻译了《中国共产党宣言》，提交马林修改，并在会议期间担任马林与尼可尔斯基的口译工作。1921年9月，中国共产党首任书记陈独秀从广州到上海，在与马林会晤讨论中国

共产党的归属问题时，张太雷担任了翻译。1923年，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商讨国共两党合作问题，马林出席了会议，张太雷担任其翻译。不久，张太雷又陪同马林会见孙中山，促进并实现了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的第一次合作，会见时依然由张太雷任翻译。综上所述，在共产党建党初期，党内重要的对外交流工作一直是由张太雷来担任翻译工作的。他本着对工作认真负责的态度，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为早期党的建设、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赵世炎（1901—1927），四川酉阳人，是五四运动和上海工人武装起义领导人之一。1920年5月赴法国勤工俭学前，赵世炎已熟练掌握了英语和法语，赴法后，他又学习了德语。1923年3月18日，赵世炎与王若飞、陈延年等一行13人从巴黎出发，转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在这次赴苏途中，他便充当起翻译，路上一切交涉事宜都由他负责。在苏联期间，又很快学会并掌握了俄语，并翻译了不少俄文资料，寄往国内刊物发表。1924年，他先后列席了共产国际五次代表大会和赤色职工国际大会。因为他精通英、法、德、俄四国外语，与会期间，他以多种语言为与会代表做了精彩的翻译工作，受到了一致赞赏。1924年秋，赵世炎回国担任中共北京地委书记。1925年，苏联驻华使馆举行记者招待会，他与李大钊应邀出席。会上他先后担任了苏、英、法等国朋友讲话的同声传译。由于言辞清晰、语言生动、深深吸引了所有听众，代表们对他出色的语言翻译能力纷纷予以称赞。可以说赵世炎是中国共产党建党后，第一个具备多语种交替翻译的杰出人才。

秦邦宪（博古）（1907—1946），1926年底，第二期留苏学生到达莫斯科中山大学，其中包括秦邦宪、杨尚昆、张仲实

等人。学校规定，入校学生均得取一俄文名字。“博古诺夫”就是秦邦宪的俄文名字。回国后，因革命需要，所取化名即为“博古”。赴苏后他进入中山大学习，同时，也担任一些口译工作。1927年底，莫斯科召开世界劳工大会，向忠发受中国共产党派遣率代表团前往参加。中国代表团的多数成员既不懂英语又不懂俄语，于是需从中山大学寻找一些留学生，协助为大会担任翻译工作。当时，秦邦宪便担任代表团的生活翻译。大会结束后，秦邦宪又随代表团去苏联南部休养，仍担任代表团的翻译。此次经历，使他日后回国工作时得到了极大的便利。他可以与共产国际代表李德自由地以俄语交流，有时在会上讨论问题时，担任李德的翻译。

从1927年到1935年这段时间，笔者将着重介绍“八七”会议与遵义会议的一些翻译情况及瞿秋白的翻译成就。1927年8月7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在汉口举行紧急会议，史称“八七”会议。与会期间，坚决批判并纠正了陈独秀的右倾路线，撤销了其党内一切职务。共产国际派遣代表罗明纳兹出席“八七”会议，瞿秋白亲自为其担任翻译。“八七”会议上，选出了以瞿秋白为首的新的临时中央政治局。

瞿秋白（1899—1935），江苏常州人。1917年考入北京俄文专修馆学习，因此熟练掌握俄语。五四运动中他积极领导该校的爱国学生运动。1920年，以《北京晨报》记者身份访苏报道，所写报道文集《赤都心史》、《俄方纪程》，是中国首次翔实报道十月革命后苏俄实况的重要文献，对中国人民及时了解十月革命发挥过重要影响。除作家、革命家外，他也是我党的一位杰出的翻译家与翻译理论家。在其早期学俄语时，便开始翻译普希金、果戈理等人的名著，随后了又翻译了大量马克

思主义理论译著。瞿秋白还与鲁迅在通讯中多次交流翻译理论方面的内容，为我国翻译理论留下了重要的遗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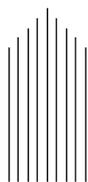
1935年1月，中国共产党在贵州遵义举行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对长征初期占据领导地位的三人军事小组中的博古与李德进行了严肃的斗争，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会上由后来成为中国译协主席的伍修权担任了李德的翻译。

综上所述，翻译工作曾在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历程中发挥过重大的作用。各位翻译工作者既是译者又是革命者。他们大都在中国长大又留学外国（尤其是苏联）。因此，他们不仅熟悉外语和别国国情，也能充分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他们引进苏联革命中先进的理论，又能充分与我国现实结合起来。他们本着默默无闻的奉献精神，用辛勤的汗水，在中国革命的道路上谱写下了壮丽篇章！

参考文献

《延安情》、《鲁迅全集》、《中国口译史》、《翻译论集》、《中国翻译史》、《中国翻译》杂志、《西行漫记》中英文版、《纵横》杂志、《瞿秋白自传》、《张太雷传》、师哲回忆录《在历史巨人身边》、《鲁迅与瞿秋白关于翻译的通讯》、《胡济邦：一位传奇的女外交家》、《在苏联长大的红色后代》。

（作者：北外学生）



YANAN BOYUAN

● 延安岁月 ●

延安博苑

劳动英雄杨步浩

刘 煜

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思想。共产党人要打破官贵民贱的观念，真正确立人民群众是上帝，是历史的主人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仅靠宣传是不够的，需要身居高位的领导同志拿出切实的行动。

在延安，广泛流传着毛泽东、朱德和农民杨步浩交往的佳话。要弄清这件事，先得从“代耕”说起。

代 耕

在延安的大生产运动中。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都以普通一兵的身份，参加生产，而且要完成一定的任务。这事被延安县川口区六乡石家畔农民杨步浩知道后，主动要求为毛主席、朱总司令代耕，每年代他们交一石小麦（300斤）。杨步浩为什么要为他们代耕呢？

杨步浩老家是陕北横山县，民国18年（1929年）陕北遭了大旱灾，为了活命，全家背井离乡逃荒讨饭到延安县石家畔落户。父亲和两个女儿被活活饿死了，为葬父又背上了地主的驴打滚债，一家人挣扎在死亡线上。盼星星盼月亮，盼着受苦人能解放。1935年，共产党来了，红军来了，毛泽东来到了陕北。杨步浩在土改中分了地，分了窑，废除了债务，彻底翻

了身，光景一年好似一年。他从心里无限热爱共产党，感激毛泽东。为了多打粮食，为抗战多出一份力量，他起早贪黑，精耕细作，每垧地总比别人多收二斗粮。1943年被评为延安县劳动模范。正月十五他去南泥湾慰劳三五九旅指战员时，听王震旅长说：毛主席、朱总司令也有生产任务，也同战士们一样开荒种地。杨步浩不禁心里“咯噔”一下，寻思：毛主席、朱总司令为咱受苦人操碎了心，他们的生产任务，我咋不能代他们完成呢？由于杨步浩的坚决请求，县委同意了，并报告给毛主席。毛主席对他拥护党和政府的心意，表示感谢。

第二年麦收后，杨步浩吆喝着三头毛驴将晒干扬净的一石新麦送到杨家岭。毛泽东、朱德亲切会见了，亲自端水、敬烟。当问他为什么要为自己代耕时，杨步浩讲自己的苦难身世，最后说：“吃米不忘种谷人，穿青不忘种靛人。我过上了幸福生活，不能忘了共产党和您的恩情呀！”毛泽东拉着他满是厚茧的手，不住地夸赞说：“谢谢你，这才是无产阶级闹革命啊！”

从此，他们间的来往频繁起来，像亲戚一样。代耕一直坚持到1947年。杨步浩在毛主席、朱总司令的关怀鼓励下，生产劲头更足了。他不仅生产搞得好，年年多打粮多交救国公粮，而且热心公益事业。领导全村搞变工互助，打井抗旱、办冬学扫盲识字、发展牲畜、组织妇女纺线、植树造林、节约备荒、安置移难民等。在他的带动下，川口区六乡成了模范乡。1945年，杨步浩出席了边区群英会，被评为陕甘宁边区甲等劳动英雄，受到奖励。

献 匾

1946年春节，在杨步浩的提议下，决定以延安县川口区六乡人民的名义，给毛泽东敬献一块大红金字匾。匾上写什么字呢？经大家热烈讨论，从自己的切身体会中认识到：共产党、毛泽东是咱受苦人的大救星，一致同意写上“人民救星”四个大字。杨步浩又是找能工巧匠做匾牌，又是跑延安城找书法家毕光斗写字，忙活了几天，一块5尺长、3尺5寸宽的匾终于做好了。

正月十五元宵节，各路秧歌队齐集延安会演，杨步浩也带领六乡的秧歌队给党中央拜年，给毛泽东献匾来了。一路上吹吹打打，从边区政府门口一直扭到王家坪军委驻地。

毛主席走出军委大门口迎接，他紧紧地握着杨步浩的手一同步入桃园的平场上。锣鼓、唢呐声停了，杨步浩激动地说：“您是咱人民的大救星。今天，向您献匾，是我们川口六乡群众的一片心意。祝贺您身体健康。”

毛泽东微笑着接过匾后，兴奋地说：“延安川口区六乡的530户，2400多口人，经常和咱们中央机关来来往往，像亲戚一样。今天又送来了金字匾，对中央和政府这样关切。我感谢六乡的全体人民，祝贺六乡人民今年夺得大丰收。”

锣鼓声又起，扭了一阵子陕北大秧歌后，又演出了几个小节目。杨步浩同毛泽东坐在一起，把节目名称、表演者一一介绍给毛主席。演出结束后，毛泽东同杨步浩等一起合影，并在军委礼堂请大家吃饭。席间，毛主席一再劝老乡们吃好喝好。

话 别

1946年7月，全面内战爆发了，胡宗南军队向边区步步逼近。延安各机关学校开始疏散，边区政府动员群众做好坚壁清野工作。

川口区六乡在杨步浩的带动下，不但将公粮全部提早送交政府，而且开展了拥军热潮，大人小孩齐动手，4天就完成了做军鞋任务，所有的青壮年都参加了民兵和游击队。在坚壁清野中，他们还发明了用地窖藏粮的办法，可使藏粮两年不霉烂。

1946年12月23日，杨步浩去枣园给毛主席汇报了他们搞备战的情况。毛泽东听了用地窖坚壁藏粮食的办法后很高兴，当即要他示范一下。杨步浩就在枣园一株梨树旁，很快挖成一个圆圆的地窖，又把谷草一把把拧好围在窖周围，底下垫谷叶，上面又用谷草封口，再盖上层黄土。

毛泽东看了，觉得这办法确实好，又经济又保险，便要杨步浩到边区政府正在召开的治安保卫会上介绍经验。这时，正有一批中外记者来延安，要了解边区群众对胡宗南进攻的反应。毛主席就派杨步浩去回答记者的问题。他对记者说：“胡儿子要进攻延安，我们欢迎。全边区男男女女齐动员，老老少少都武装，叫他来一个死一个，来两个死一双，让他的几十万人马都埋葬在边区。”毛主席称赞他回答得好，长了边区人民的志气，灭了敌人的威风。

1947年春节刚过，毛主席就把杨步浩请去，关切地问他：“我们要撤离延安了，你是跟我们一起走，还是上游击队呢？你是劳动英雄，有点名气，敌人来不会放过你的，不能留

在村子里。”杨步浩表示要扛起枪上游击队去，用实际行动保卫党中央、保卫边区、保卫毛主席。

从此，他们就分手了。

重 逢

全国解放后，虽然毛主席、朱总司令进了北京，同延安远隔千山万水，但是领袖同一位农民朋友在战争年代建立起来的情谊并未中断。杨步浩曾三次进京，老朋友两次重逢。

1952年杨步浩作为延安老区的代表去北京参观国营农场时，写信给中央办公厅，要求见见毛主席。很快，毛泽东就派人接到家里，对多年不见的老朋友给予热情招待。毛主席同他坐在一起，拉着他的手详细地询问了胡宗南占了延安后的破坏情况，这几年延安的建设情况，老区人民的生产生活情况等，要他代向延安人民问候。临走，给杨步浩换了身崭新的灰布棉衣，又送给他充足的路费。

1954年，杨步浩的一只胳膊骨折了，组织上安排他到延安县种子公司工作。

1961年困难时期，毛主席工作繁忙，仍惦记故人，不知延安人民的生活如何？杨步浩如何？便托人给杨步浩捎来几斤白糖和两瓶酒，朱德委员长给杨步浩寄了几块布料。见物更思人，又燃起了杨步浩再次进京的强烈愿望。他先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说：“主席，我很想念您，想去北京看看您，不知您有空没有？”不久，毛主席就回信说：我同意，你跟地方上商量一下，只要地方上同意，我没有意见。

杨步浩的愿望得到了延安县政府的支持。他高兴得几夜没睡好，同老伴精心缝制了几个白布小口袋，装上了延安最好的

小米、炒面、绿豆、红枣、干菜等，于9月底赶到北京。

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亲切地会见了老朋友，并把他介绍给观礼的外国友人。之后，又同他长时间交谈，了解询问延安的许多情况，要他向延安县委表达自己对老区人民的怀念和感谢。

“文化大革命”中，杨步浩作为延安历史的见证人，又调到延安革命纪念馆工作。他在王家坪军委和总部旧址一遍又一遍地向观众介绍自己同毛主席、朱总司令、王震旅长的交往，介绍毛主席送儿子毛岸英上“劳动大学”的情景，常常声泪俱下，使参观者从中受到深刻的教育。

1973年6月9日，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回到了延安。在参观纪念馆时，周总理在接待室代表毛主席、朱德委员长会见了老英雄，并合影留念。告别时，杨步浩托总理问候毛主席、朱委员长。

1975年，当杨步浩得知毛主席、周总理病情加重的消息后，心急如焚，说什么也要进京再见一面。中央办公厅的同志接待了老英雄，只是因毛主席、周总理均住院治疗，不便会客，不好安排他们见面。毛主席、周总理在病床上知道老朋友来京探视，也很激动，但医生的意见又不好不听，便分别委托朱德委员长和王震副总理代为接待。

朱德、王震在家里热情款待杨步浩，长时间促膝交谈，并合影留念，而且分别在杨步浩的笔记本上亲笔题词，勉励他要发扬光大毛主席培育的延安精神。

1976年1月、7月、9月，中国革命史上的三颗巨星相继陨落了。杨步浩声音一次次哭哑，眼睛一次次红肿，他多么希望老朋友能再次重逢啊！在组织老区人民代表团进京吊唁时，

杨步浩受延安人民的重托去了。当他看到日夜思念的毛主席安详地躺在水晶棺里时，扑上去失声痛哭。他有多少心里话要给毛主席说啊！可是这一天永远不会有了。

1977年7月6日，杨步浩在延安发生的特大水灾中不幸遇难，而这一天正巧是朱德委员长逝世一周年纪念。人们悲痛又欣慰地说，是延安时代的老朋友请他去叙旧了。

一代历史人物虽然相继去世了，但是领袖同一位普通农民间的交往和彼此建立起来的深厚情谊，将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中。

（作者：延安革命纪念馆研究员）

赵占魁运动的前前后后

姬乃军

赵占魁运动，又叫新的劳动态度运动。

赵占魁是山西定襄人。他从12岁起就开始当工人，受尽欺凌和压榨。1938年3月，他进入中国共产党在泾阳县安吴堡创办的西北青救会训练班职工大队学习。同年7月，到达延安，进入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职工队（即抗大二大队）学习。1939年5月，进入延安工人学校铁工部。同年7月，到设在延安温家沟（今属延安市宝塔区枣园镇）的陕甘宁边区农具厂当翻砂工人，并先后担任翻砂股副股长、股长。他先后被陕甘宁边区政府和农具厂评为模范工人，并于1941年当选为边区参议会候补议员。赵占魁在工作中爱护工厂财产，关心群众的利益，急公好义，认真负责，任劳任怨，大公无私，深受全厂职工的尊敬和爱戴。

1942年9月11日，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向模范工人赵占魁学习》。社论指出：“赵占魁在执行生产任务上、爱护革命财产上、照顾工厂生产上、关心群众利益上、遵守劳动纪律上、团结全厂职工上、热心公益事业上，所有这些表现出来的精神，都是我们边区国营工厂工人的模范。在他的工作作风中，所一贯表现出来的——始终如一、积极负责、老老实实、埋头苦干、大公无私、自我牺牲的精神，也正

是我们新民主主义地区国营工厂工人所应有的新的劳动态度，这种新的劳动态度是值得宝贵的，值得大大发扬的，值得我们来学习的。我们希望全边区有千个万个像赵占魁一样的模范工人涌现出来。”

10月10日，边区总工会发出《关于开展赵占魁运动的通知》，号召全边区工人学习赵占魁勤劳作、始终如一的精神，及其新的劳动态度，以掀起一个广泛的运动。“通知”要求：

一、认识这一运动不同过去各次普遍的生产竞赛，而是一个深入的思想教育工作，借以克服少数工人中经济主义、平均主义、不安心工作等现象，以达到提高工人政治觉悟，稳定生产情绪，激发劳动热忱，增加生产质量，改造工会工作的目的。

二、这是工厂整风学习中具体的材料，因此应配合整风学习作为目前的中心工作，把9月11日《解放日报》社论“向模范工人赵占魁学习”，作为学习文件之一，收集有关材料与本厂实际问题，组织传达讨论，在工人中形成一个热潮。

三、为达到上述目的，应根据各厂现实情况找出模范例子来。因此，必须事先进行调查研究，了解工友们的生产情绪和工厂中存在的问题，经过酝酿准备，然后有条件的有目标的发动。

四、在这一运动中必然会涌现出大批像赵占魁一样的模范工人，各厂应详细定出评判标准和奖励办法，发扬好的，批评坏的，以建立严格的奖惩制度。

五、必须协同党政共同研究讨论，防止及纠正轻视或过急等偏向，并希望党政工作同志踊跃参加推动这一工作，使赵占魁运动在各工厂热烈地开展起来。

中共中央和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十分重视赵占魁运动的开展。1942年12月，毛泽东在向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所作的《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长篇报告中，提出要求：“应改善职工会的工作，发展赵占魁运动于各厂。”1943年5月9日，张闻天致函边区难民纺织厂的墙报《工先报》的编辑，并随函寄上了他帮助该厂几位工人制定的个人生产计划。张闻天在信中指出：“我希望在这些计划的制定与执行中，发动个人与个人间、小组与小组间、部门与部门间的竞赛，使赵占魁运动在本厂内开展起来。”邓发于1943年2月7日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题为《响应生产号召，开展赵占魁运动》的文章。同年5月7日，他又在《解放日报》发表文章《在公营工厂中如何开展赵占魁运动》。邓发还亲自指导了中央印刷厂和边区农具厂赵占魁运动的开展。他分别召集了两个工厂的中共党组织、行政（厂长）、工会负责人和积极分子讨论，听取意见和建议，并将他们参加赵占魁运动的个人计划和向兄弟工厂提出的挑战书等，陆续在报上发表，引起了各工厂的重视，推动了赵占魁运动的深入开展。

边区总工会在发出《关于开展赵占魁运动的通知》后，即派出机关干部赴各工厂传达开展赵占魁运动的决定，报告赵占魁的模范事迹。1943年4月8日，边区总工会主任高长久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题为《继续开展赵占魁运动》的文章。高长久在文章中，代表边区总工会提出了开展赵占魁运动中每个职工奋斗的目标：“一、爱护工厂，严守纪律；二、积极工作，始终如一；三、数量最多，质量最好；四、爱惜工具，节省资料；五、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六、努力学习，帮助别人；七、克己奉公，团结群众。”

赵占魁所在的边区农具厂，于1942年9月26日，召开了奖励模范工人赵占魁大会。1943年4月7日，该厂职工会代表全厂职工向全边区的工厂工人提议开展竞赛。该厂提出的竞赛条件是：

一、创造一批——赵占魁式的工人、学徒、工厂技术工作者，工厂行政事务工作者。

二、自4月份起，在改进质量的前提下，生产品的数量再比过去增加百分之二十。

三、严格建立生产、供给、保管、教育制度。

四、教育工作目标，要克服不安心工作现象，提高每个职工“我就是工厂主人”的认识，彻底清除经济主义等不良倾向，做到全厂职工及家属都分别参加文化、技术及整风学习。

五、在现有条件下，进一步地改善工人物质生活与活跃俱乐部生活。

六、厉行节约，做到不浪费全厂的一份人力、财力、物力。

七、从4月份起绝对不发现违反群众利益及政府法令等行

为。

在赵占魁运动深入开展的情况下，赵占魁也向全边区工厂工友提出开展生产竞赛的条件。赵占魁制定的生产计划是：

（一）我是翻砂股长，因此生产上要办到：1. 提高化铜罐子化铜次数（从四次提高到六次）；2. 提麻钱铜，原来麻钱铜未提过，不会用；3. 培养本股学徒李有贵，到十月革命节能单独看炉化铁，能代替自己工作；4. 原来没有退火炉，帮助完成退火炉的修造，与处理铜的退火问题；5. 我是工厂农业生产指导员，要在技术上保证完成本年农业生产菜10万斤，

肉类 7000 斤。

（二）意识修养和工作态度：1. 把过去用自己所节省的工资购买的 4 口猪、11 只羊（共储 5000 元），交公家经营，以百分之五十生利归工厂工人作为文化娱乐之用；2. 凡有对工人损失的地方，如有些浪费，少数消极怠工，不遵守厂规等，从 4 月份起，要规劝说服他们，并要积极向行政提出意见与办法；3. 我是劳动保护委员，要做到：A. 保证伙房按时开饭，不误上工时间，并检查厨房清洁卫生与注意克服浪费；B. 帮助工会在“五一”前把俱乐部旧剧的铜锣铜钹做起来；C. 把大小便厕所建立起来，并经常保持清洁；D. 保证本厂工人及学徒病时的伙食及医药照管及问候。

（三）学习态度：我过去识字很少，今年十月革命节，我要达到能看《群众报》和写简短信件，讨论会议上要积极发言，对不正确意见要批评。

赵占魁运动的深入开展，促进了边区工业生产的迅速发展，使边区国营工厂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各工厂在生产上做到了数量增加，质量提高，原料节省，成本降低。如难民纺织厂，在 1942 年 10 月 24 日，就为了响应赵占魁运动而提出了开展节约活动。该厂每月用机油，由原来的 200 斤减少到 70 斤；每天的废纱由原来的 20 至 25 斤，减少到 1 至 7 斤，而且在两个月内，共节省办公费用 7000 元（边币）。从 1943 年 5 月起，该厂产品数量逐月增加：5 月份，共生产土毛布 552 匹；6 月份，生产 650 匹；7 月份，生产 908 匹；8 月份，生产 1006 匹。该厂个人生产效率也明显提高，铁机平均每日织布由 20.3 码增加到 26.3 码，提高了 30%；木机织布由平均每日织布 11.7 码增加到 16 码，提高 36%。新华化学厂的

肥皂生产，如果将 1942 年 1 月的产量作为 100，则 1943 年 4 月为 145；5 月为 146；6 月为 151；7 月为 183；8 月为 224。在产量增加的同时，参加生产的人员反而逐渐减少，1943 年 8 月，比同年 5 月减少生产人员 25%。肥皂成本费也由原来 100 条折小米 1.24 石减少到 0.92 石。八路军印刷厂年度生产量，平均增加了 30% 至 50%。中央印刷厂排字部生产率提高了 30%，机器部则提高了 59%。该厂用纸，由过去每印 1000 张要损坏 8 至 10 张，减少为 1.5 到 3 张。仅 1943 年第二季度，该厂就节省纸张 1.8 万张，值 8 万元（边币）。

赵占魁运动的开展，还促进了职工劳动态度的转变，和各工厂中的行政（厂长）、中共党组织和工会三方领导的进一步紧密配合，围绕着生产这一中心任务，充分发挥各自的职能，使边区工厂出现了新的面貌，新的气象。赵占魁运动的开展，激发了工人的生产热情和主人翁精神，涌现出一大批赵占魁式的劳动英雄，如袁广发、孙云龙、贾国兴、苟在朝、王河海、杨双庆、王国初、张宪武、柳云贵、李凤莲等。

赵占魁运动的开展，还促进了各个解放区新的劳动运动的开展，如晋冀鲁豫边区的甄荣典运动，晋绥边区的张秋凤运动。赵占魁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面旗帜。

1944 年 5 月，边区工厂职工代表大会发表《宣言》，提出：“要发扬与坚持赵占魁运动。赵占魁运动也就是劳动英雄运动，其目的是建立职工新的劳动态度，发挥创造，提高技术，发扬阶级的团结互助，为产量高、质量好、成本低，完成工业建设任务奋斗。”“我们要学习所有的劳动英雄，展开革命竞赛，把赵占魁运动提高一步，创造模范部门、模范工厂和培养无数的赵占魁式的劳动英雄。”在此之后，赵占魁运动得到

了更加广泛的开展。同时，这一运动也成为陕甘宁边区和各解放区国营企业中长期开展群众生产运动的一个十分有效的形式，为工会领导职工生产建设摸索出了比较系统的办法，使根据地的生产竞赛，工会工作和企业管理等，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作者：延安市文物研究所研究员）

中共中央贺寿徐特立

刘卫平

一贺徐特立

1937年1月31日（农历十二月十九日），是徐特立六十大寿的日子，延安各界纷纷致信祝贺。徐特立收到私人祝词条幅（诗、词、文章、散文等）1000余幅，团体贺联亦达100余幅。1月30日，《新中华报》在头版头条以粗黑体大字刊登了新华社恭祝徐特立的贺词“恭祝徐教育部长特立同志六十寿辰”。2月1日，延安各界为徐特立60寿辰举行了庆祝大会。前一天，即徐特立寿辰当日，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写信祝贺。

朱德的贺信风趣幽默，以独特别致的语言概括了徐特立几十年的革命生涯。朱德贺信的题目是《你是一个老怪物》。贺信说：“徐老头，你是一个职业的革命家，你是一个老共产党员，又是一个教育家。你一生能勤工俭学，能吃苦耐劳，反抗社会不平制度，并要征服自然，你是一个百折不屈的老革命家。你是封闭社会里生长的人，从小就有背叛封建社会的习惯，就染着了资本主义革命习气，嗜好民主自由平等的味道，参加了中国一贯的民族革命。”“你为得要看穿资本主义的西洋镜，曾跑到了最标式的欧洲巴黎等地勤工俭学，仍是不合你的

脾胃。毕竟你是一个老怪物，一直跑到了共产主义的营垒来，做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的老战士，你才算死心塌地地做下去。”“你的耐劳耐苦的模范，更振奋了红色指战员及一般的同志。就是那些悲观失望，想掉队落伍的人们，想起我们徐老头的样子，也就起来跑了。”“你是革命模范的人，你是革命前进的人。不管革命历史车轮转得好快，你总是推着他前进的。”

徐特立是在大革命失败，情况异常严重的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入党时年已50岁。随后又以57岁的高龄走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他身体力行，越困难越有精神，用行动写了一本比什么书都好的教科书。1月30日《新中华报》一版《做寿》一文写道：“在困难战争中一切个人的、集体的、领袖的、群众的，有模范作用的例子，无论大小，都值得提出来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奖励之。”“我们在亡国灭种的紧急关头，我们用不着悲哀哭泣，要有愉快的积极精神……在亡国灭种的紧急关头替徐同志祝寿演剧、会餐，来表示我们的快乐，也就是我们历史上的积极精神。”

在2月1日的庆祝大会上，邓颖超亲自给徐特立系上一条红领巾，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徐特立作了答词，他说：“我会继续站在战争的最前为民族为世界的和平而斗争。”

二贺徐特立

1947年1月10日（农历十二月十九日），中共中央办公厅、陕甘宁边区政府于下午4时在中央大礼堂设宴庆祝徐特立七十大寿，并于晚上举行了联欢晚会。除延安各界隆重庆祝外，各解放区如华东局、山东军区、晋冀鲁豫边区政府、热河

文化界等纷纷向徐特立发来贺电。

祝寿前，徐特立已带领中央宣传部教育研究室的部分同志奉令撤居绥德。当得知中共中央要为他祝寿时，即刻动身返回延安，住在杨家岭的窑洞里。

寿辰的前一天晚上，毛泽东和朱德等中央领导来到他的住处，按照延安的风俗习惯，亲切地为徐特立“暖寿”，一起吃了一顿长寿面。毛泽东还为徐特立做了一个寿糕，并在寿糕的盒子上亲笔写了“坚强的老战士”六个字，送到徐老手中。徐特立既激动又高兴，马上切开蛋糕，和大家分享。

1月10日的延安，天寒地冻，纷纷扬扬的大雪飘洒在延安的沟沟岔岔，在一片银装素裹中，延安各界人士聚集在中央大礼堂。下午，在祝寿典礼开始时，朱德登台致词，他说：“徐老从中国封建社会到革命时代的七十年生活中，使他锻炼成为一位模范的革命教育家和科学家，早在江西老区时，他就和工农兵打成一片，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与作风，我们要以不断学习徐老的优良作风来庆祝他的七十大寿。”晚上的联欢会上，演出了平剧《独木关》，中央管弦乐团演奏了《祝寿花鼓》等，为祝寿典礼增添了喜庆祥和的气氛。

《解放日报》为徐特立七十大寿出版了特刊，刊登了毛泽东的题词“坚强的老战士”；周恩来的题词“人民之光，我党之荣”；朱德的题词“当今一圣人”；刘少奇的题词“中国共产党的光荣”；彭德怀的题词“徐老是人民的教育家”；吴玉章的贺词“七十更强歌战士，万方救难赖人师”；林伯渠的贺诗“徐老初逢七十岁，健康精力古来稀。门墙多士空前杰，瀛海求书苦未迟。早识船山宏大义，记从章水订交期。长途漫说老牛笨，却异骅骝任所之”，以及黄炎培、续范亭、谢觉哉、田

汉的贺诗，陆定一、熊瑾玎的贺文。同时还刊登了中共中央委员会的贺信和徐特立的《七十客绥，哀吕梁灾民并自寿》。

陆定一在《人民教育家——祝徐老七十大寿》的贺文中全面回顾了徐特立的革命生涯和艰苦朴素的优良生活作风，说“他对于反动派的愤怒比什么人都深，对于胜利的信心比什么人都高。他哪里像七十岁的人？简直是一个青年革命家的气概”。并说“他的一生就是一部教科书”。陆定一的祝词称徐特立“在困难和挫折时是铁打的硬汉，对于人民是慈爱的导师”。

1947年1月，正是中共中央撤离延安，转战陕北的前夕，战事十分紧迫，中共中央为徐特立祝寿，为稳定军心、民心，缓解紧张的战争气氛，具有非常重要的政治意义。

徐特立生于1877年2月1日（农历十二月十九日），中共中央两次为他祝寿的时间较为有趣：1937年2月1日祝寿时，中共中央刚刚进驻延安19天。1947年1月10日祝寿时，则距党中央撤离延安仅差67天。

据有关资料记载，1958年，朱德和谢觉哉等曾筹划为徐特立祝贺八十大寿，但徐特立为了免却祝贺，于寿辰前夕离开北京去长沙。可是一到长沙，他的学生们即准备为他设宴，他婉言谢绝了，说：“去年全国遭受严重水旱灾害，人民生活还很困难，中央正大力提倡增产节约，勤俭建国，我们怎可为了个人的生日，浪费人民的财物呢？”最后，徐特立又连夜离开长沙，在餐车上吃了一顿长寿面以示庆贺。

（作者：延安革命纪念馆馆员）

寻找“四八”烈士遗体经过

齐 轍 惠 蓉

1946年4月8日，中共政协代表王若飞、秦邦宪，因国民党推翻政协决议，从重庆乘飞机回延安向党中央汇报请示工作。同机的还有出狱不久的叶挺及其夫人李秀文、女儿叶扬眉、幼子阿九和保姆高琼，出席世界职工大会的解放区职工代表邓发，王若飞的舅父、贵州老教育家黄齐生和黄齐生的孙子黄晓庄。此外还有随行人员十八集团军参谋李少华、副官魏万吉、赵登俊等，共13人。为了迎接他们，中央准备了盛大的欢迎仪式。毛泽东、朱德、任弼时及秦邦宪夫人张越霞和子女、邓发夫人陈慧清和子女、叶挺的儿子叶正明、叶华明与延安各界群众上万人冒雨聚集在延安飞机场，翘首仰望天空，祈盼飞机的到来。

这是一架由兰奇上尉为首的4名美军驾驶的C47型飞机。该机离开重庆后，就与驻延美军观察组的电台取得了联系。在西安加油后再次起飞，30分钟后，即12时25分，又与延安美军观察组电台作过一次联络，根据情况判断，当时它的位置应在甘泉上空。人们在蒙蒙细雨中隐约听到了飞机的轰鸣声，然而，飞机却迟迟不见出现。随着时间一分一秒地消逝，人们等待的心情也越来越紧张，大家不约而同地谈起糟糕的阴雨天气。这架飞机究竟是因为云雨弥漫、能见度低，不能着陆而被

迫返航了？还是迷失了降落方位？人们伫立在寒风冷雨里，胡乱猜测着。到下午4时，主持人宣布“各单位暂回，待查明情况后另行通知”。人们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离开机场，返回驻地。

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回到王家坪八路军总部驻地，立即布置军委机要部门拍发加急电报，向西安、重庆查询该机去向。但重庆南方局和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经过紧急查证，于9日凌晨先后复电报告，该机并未返航。这一令人惊骇的答复到来之后，人们的心情更加沉重了。中央立即电令陕甘宁、晋绥边区各个党政军机关从速组织力量进行查找，要重庆方面从速向美军驻华机构通报情况，请他们派出空军，协助查寻。

在4月9日至11日的三天当中，陕甘宁、晋绥边区数以万计的军民，进行了严密搜寻。美国驻华空军和中国航空委员会也各派出两架飞机，在渝延航线和边区境内多方寻觅，仍无结果。直到11日晚10时得到晋西北电讯，称该机在山西兴县东南40公里的黑茶山发现，人员均已遇难。

4月8日下午，黑茶山地区的居民发现有架飞机撞毁在黑茶山上。他们开始以为是国民党的飞机，就向当地的区委书记作了汇报。区委书记得到报告后，于第二天早晨带领民兵赶到现场，发现了一张乘机人员名单，上面有王若飞、秦邦宪、邓发等我党中央领导人的名字，还有新四军军长叶挺的名字。这才知道是我党领导人乘坐的飞机出了事，立即携带名单和部分遗物，急行40公里，于当天夜里赶到晋绥边区首府兴县，向中共中央晋绥分局书记兼晋绥军区政委李井泉、分局社会部部长兼边区公安总局局长谭政文报告了这一紧急情况。李井泉当即指示谭政文率领公安总局一室主任金昭典，兴县地委组织部

部长苗逢澍和部分政法、医务人员，于10日早晨前往现场查证情况。李井泉随后也偕同晋绥边区行署、兴县专署的负责人赶到了黑茶山。

4月10日下午，谭政文一行赶到黑茶山的出事现场。他们首先查看了飞机撞毁处，查明飞机不是撞在山的主峰上，而是撞在山顶南坡的一块巨石上，撞的痕迹清晰可见。如果飞机略飞得高一些，是会飞过去的。

经过一番紧张工作，他们比较顺利地将秦邦宪、王若飞、邓发和叶挺同志的遗体找到，运到房内。这4位烈士的遗体都较完整，面部的表情呈现出十分惊讶的样子。王若飞同志的面部皮肉有些破裂，邓发、叶挺和秦邦宪同志的四肢有骨折情况。这些遗体全部散落在飞机残骸左右几十米处的杂树丛中，是被甩出最远的。大概当时他们是坐在一起的。

4月11日，公安总局的同志们继续寻找、识别其他烈士遗体。叶挺夫人李秀文和女儿、保姆的遗体很不完整。叶挺小儿子的上身被火烧得焦黄，遗体一部分挂在飞机残骸周围的树枝上，一部分散落在杂树丛中，看起来他们这4人是坐在一起的。

在飞机前部的驾驶室里，4名美方驾驶员的遗体全部挤得粉碎，大部分散落在机头附近。这次遇难人员共17人，我方13人，美方4人。

全部罹难者的遗体，由医务人员清洗、缝合、整容、防腐处理，放进当地设立的灵堂。李井泉率领晋绥边区干部群众举行了祭奠。同时，他们赶拟了简报，后又是详报的两个加急电报，于11日夜里，先后发到了延安。

毛泽东、党中央获悉噩耗后，一面指示晋绥边区对所有遇

难者的遗体做好妥善处置，为转移到延安做好准备；一面于当夜和第二天以中央委员会和驻渝代表团的名义，从延安和重庆分别发出了两则讣告。4月13日，以毛泽东为首的26名党内外著名人士组成的治丧委员会在延安宣告成立。委员会决定：为“四八”烈士修建灵坛、墓地，隆重举行迎灵、殡葬仪式。又电告重庆中共中央南方局，要他们对烈士亲属来延安奔丧，做好安排。

经过一昼夜的紧张工作，李井泉主持的送灵准备工作，终于安排就绪。4月12日早晨，由兴县地区专员康世恩率领的精壮民兵组成的送灵队伍，抬着死难烈士的遗体，离开黑茶山，走向遥远的岚县机场。沿途所到各地，村村搭起牌楼，处处焚香祭奠，接替抬灵的民兵争先恐后。送灵队伍，马不停蹄地日夜向前赶路。13日深夜，送灵队伍走进了回回山的险峻隘道。在两人不能并行的情况下，民兵们匍匐爬行，用他们宽厚的脊背托起担架，通过险境。15日凌晨，送灵队伍到达岚县。在寒风中伫立的数千群众，把烈士遗体迎进场院，上香进供，恭读祭文，举行了最后一次哀悼祭奠。从黑茶山到岚县150多里的行程里，兴、岚两县沿途1000余名青年民兵轮番抬灵，数万群众昼夜迎送。

4月18日，运载烈士的两架飞机，由谭政文等同志护送从岚县机场起飞，于下午1时飞抵延安。朱德、刘少奇、任弼时、林伯渠等中央领导，王若飞夫人李佩云、黄齐生夫人王守瑜及秦邦宪、邓发夫人，叶挺的两个儿子等烈士遗属，延安各界群众1万余人，云集机场接灵。两架飞机在哀乐声中徐徐着陆，烈士遗体在持枪仪仗队的护卫下，由停机坪运至祭坛灵堂。朱德、刘少奇、任弼时、林伯渠等主持入殓。延安、重庆

两地，同时举行追悼大会。在延安参加追悼会的还有贺龙、李鼎铭、蔡畅，来自各解放区的代表——新四军副军长张云逸，山东省政府主席黎玉，晋冀鲁豫军区副政委薄一波、华中军区政委邓子恢，晋绥边区参议会副议长刘少白，晋察冀军区参谋长唐延杰等。庄严肃穆的灵坛中央，悬挂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坛前挂着一块匾额，上写“变悲痛为力量”。花圈挽联丛中安放着烈士灵柩，灵柩上方摆放着烈士遗像。

毛泽东从重庆谈判回到延安后，就一直有病，“四八”烈士遇难后又深深地刺激了他，同时，东北的紧张形势也令他牵挂，一连数日不得安睡。他参加追悼会的要求遭到了医生的坚决反对，只好派人送来了“为人民而死，虽死犹荣”的挽联。

追悼会在 24 响礼炮声中由烈士亲属依次登上祭坛献花、进香，继由主持人林伯渠报告烈士生平，主祭人朱德致祭词。叶挺的老战友张云逸和 68 岁的黄齐生夫人王守瑜接着登台致词。这时，接美军 4 位飞行员遗体的两架飞机，在前往重庆途中飞临延安。飞机在会场上空盘旋一周，以示悼念。我方与会者也向空中挥手致意。

追悼会结束，灵柩依次移出祭坛，朱德、刘少奇等亲手执绋，走向烈士墓地。又在 24 响礼炮声中，烈士灵柩徐徐落下墓穴。

（作者：北京外语学院学生；延安革命纪念馆馆员）

丰 碑

王晓莉

在延安城南 20 公里处的劳山地段，有一座普通的纪念碑。碑的周围没有鲜花，没有苍松翠柏，但它却常常吸引途经此处的行人停下脚步，久久地观看碑文。因为，在这里曾经发生过一场惊心动魄的生死较量，记载着一代伟人与一位普通战士的深情厚谊。

1937 年 4 月 25 日，周恩来副主席率领我党代表团准备去南京同国民党谈判。上午 9 时，周恩来和他的随从副官陈有才、红军副总参谋长张云逸及记者、警卫等 25 人，同前来送行的中央领导和同志们一一告别后，便乘坐一辆卡车，向西安奔去。

战士们因为有幸与周副主席一起出行，感到非常兴奋，他们在车上又说又笑，有的还唱起了革命歌曲。惟有身着西装、头戴礼帽、脚踩长筒马靴的陈有才，紧靠在驾驶室的车厢里，一言不发。

这时，一个小战士好奇地问道：“陈副官，你咋穿得这么阔气？”陈有才幽默地说：“这是外交工作的需要。”

说话间，汽车驶到了地势险要的劳山地段。发动机的轰鸣声划破了寂静的山林。突然，枪声大作，密集的子弹从三面向汽车袭来。原来，他们遭到一股政治土匪的袭击。这些土匪有

200多人，他们有机枪、步枪，而我们只有射程有限的手枪和手榴弹。情况十分危急。周恩来立即组织大家还击，并让司机加大油门，冲出埋伏圈。然而，随着一阵机枪扫射，汽车轮胎被打破了，司机也中弹牺牲。周恩来立即跃出驾驶室，伏在汽车前轮后，沉着地观察敌情。陈有才为了不暴露周恩来的身份，他大声喊道：“不要管我，你们赶快转移！”

这时，居高临下的敌人发现陈有才身着不凡，镇定指挥，便误以为他就是周恩来，就集中火力疯狂地向他扫射。战士们急切地喊道：“陈副官，你快下车！快下车！”然而，陈有才不但没有下车，反而手扶车厢，站起来还击。他把自己完全暴露在敌人面前，吸引火力，以拖延时间。就在敌人把全部火力集中在陈有才身上时，周恩来及其他同志得以安全转移。敌人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后冲到大卡车旁。当他们从陈有才的口袋里搜出“周恩来”字样的名片时，竟惨无人道地在他身上连刺二十几刀。陈有才壮烈地牺牲了，年仅23岁。

中共中央及边区政府为陈有才等21位烈士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并把他们安葬在延河之滨的宝塔山下。

1970年邓颖超回到延安，她首先提出要代表总理去祭奠牺牲在劳山的陈有才等烈士。当她得知，由于1947年胡宗南飞机的轰炸，陈有才烈士的坟墓已经找不到时，她哭了。临行前她再三叮嘱延安地委领导，一定要找到烈士的坟墓，以慰烈士在天之灵。

1973年6月9日，周恩来回延安看望老区人民。当天中午，他冒着酷暑，登上了宝塔山。周恩来顾不上擦去脸上的汗水，就急切地问起陈有才坟墓的寻找情况。当得知坟墓至今还未找到时，他慢慢地转过身，面对着劳山方向，默默地站着。

微风吹起了老人家鬓角的白发，他眼睛湿润了。接着，他走上前去紧紧地握住地委书记土金璋的手说：“友才是替我牺牲的，那年他才23岁！我个人托咐你们再想办法找找，如果能找到的话，我一定回来亲自祭奠他……”

周恩来一生都没有忘记这位普通的战士。1976年，周恩来逝世后，警卫员从他的内衣口袋里拿出来一张已经发黄的照片，照片是周恩来、陈有才和其他几位同志的合影，照片的背面写着“劳山遇险，仅存四人”。

几十年过去了，虽然陈有才烈士的坟墓至今还未找到，但是，周恩来劳山遇险处这块普通的纪念碑却永远地屹立在那里，与天地共存，与日月同辉。它是我们心中一座永恒的历史丰碑。

（作者：延安革命纪念馆副研究员）

大生产运动中的三五九旅

栾锦萍

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以后，党中央和毛泽东预见到边区的财政经济将会遇到越来越多的困难，而这种困难只有靠自己的努力才能加以克服，于是便决定把边区部队以改善生活为目的的局部性农副业生产，发展为整个边区的以逐步实现经济自给为目的的生产运动。大生产运动的整个过程，可以说是一个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即发动和组织劳动大军的过程。

大生产运动初步发展阶段

1938年，留守兵团的一部分部队在战斗和训练之余，从事农副业生产，种菜、养猪、打柴、做鞋袜等，从而改善了部队的生活。毛泽东当时对这一做法就予以肯定，要求推广到留守兵团的所有部队。从1938年12月到1939年上半年，毛泽东在一些会议和公开场合中，曾多次反复阐述了必须通过“自己动手”来克服物质困难的道理。他说：武汉、广州失陷以后，敌人还要继续进攻。我们现在还有一点钱，还有小米饭，但以后会有那样一天，没有钱，粮食困难，那怎么办呢？第一个办法是饿死，第二个办法是解散回家，这两个办法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第三个方案，就是靠我们自己动手”，“党政军民学大家一齐动手，衣食住都由自己来解决”。他指出：开展

生产运动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第一个根据是人类几十万年来都是自己搞饭吃，全中国的农民都是用自己的手来解决吃饭问题，我们同样是人，为什么不能靠自己的双手解决衣食住行问题呢？况且，就部队来说，全体都是劳动者，年富力强，怎么还会有饿饭的事情呢？第二个根据是留守兵团的农副业生产取得了成绩，既然部分的生产运动有成绩，为什么普遍的就不能搞呢？第三个根据是边区地广人稀，荒地很多，只要降一点雨下来，就可以耕种。他对抗大的干部说：“我们种田、生产粮食，是农民；做桌子、造房子，是工人；办合作社是商人；读书、研究学问，是学生；懂军事、会打仗，是军人。这就叫做农工商学兵一齐联合起来。”

1939年2月20日，中共中央召开生产动员大会，在中央财政经济部部长李富春同志作《加强生产、坚持抗战》的报告后，毛泽东发表讲话，号召边区党政军民学开展一个“伟大的经济战线上的斗争”，以此来解决边区全体人民的生活问题，并且“用实际行动作为全国的榜样”。6月10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报告及结论（即《反投降提纲》），进一步号召：“一切可能地方，一切可能时机，一切可能种类，必须发展人民的与机关部队学校的农业、工业、合作社运动，用自己动手的方法，解决吃饭、穿衣、住屋、用品问题之全部或一部。”他并明确提出了“自力更生，克服困难”的方针。

在党中央、毛主席的大力推动下，边区的生产运动很快开展起来，并取得成效。首先是农牧业生产有较大发展。1939、1940年，全边区开荒170余万亩，粮食产量和牛、驴、羊数量都有较大幅度增长。1940年，部队已可自己解决一个半月的口粮，并解决了部分装备补充。机关学校也投入生产运动。

从中央和边区领导人到勤务员和青年学生，全体动员上山种地，场面十分壮观。与农牧业发展的同时，边区的工业建设也迈出了最初的步伐。1938年2月，工业专家沈鸿带着11部机器和7名工人来到延安，建立起边区机器厂。接着，恢复和创办了石油厂、纺织厂、造纸厂、农具厂、皮革厂、化学厂、制药厂等。华寿俊同志在1939年用当地盛产的马兰草造纸试验成功，大大推动了边区造纸业的发展。

在这个阶段，一方面是边区自身开展了生产运动，另一方面边区也还有一定的外援，即国民党政府尚给八路军发放一定数额的军饷。

1941年到1942年，由于长期战争的消耗，日军的残酷“扫荡”与国民党顽固派的经济封锁，加上自然灾害的侵袭，非生产人员的大量增加，使根据地的财政经济遇到了极大的困难。毛泽东回顾这时的情形时说：“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国民党“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面对这样严峻的形势，党中央、毛主席号召边区军民更加努力地开展生产运动，以使边区的财政经济由半自给转到完全自给。陕甘宁边区的生产运动由此进一步发展起来。

1941、1942年，军队、机关、学校的生产受到极大的重视，国营经济获得较快的发展。其中，三五九旅开发南泥湾的成绩尤为突出，为大生产运动树立了一面光辉的旗帜。

南泥湾位于延安东南45公里处，方圆百里，沟壑纵横、山峦重叠，三条大川组成一个“丫”字地形。西边是南蟠龙川，南边叫九龙泉川，东边叫南阳府川，三川交汇处叫阳湾。相传在清同治年间，这里原是一个人口稠密、经济繁荣的富饶

之地，由于清朝政府的民族政策引起回汉民族互相残杀的悲剧，再因民国时期军阀横行，土匪劫掠，这里便成为一个蒿蓬塞路、野兽纵横的荒凉地方。

1940年5月，朱德奉命从抗日前线返回延安。为了克服严重的物质困难，坚持持久战，他及时提出屯田军垦的主张，并亲自率中共中央直属财经处处长邓浩，三五九旅七一八团政委左齐以及技术干部多人，到南泥湾进行实地勘察。1941年3月至1942年，三五九旅在王震旅长、王恩茂政委率领下，分四批开进南泥湾。

初进南泥湾，迎接指战员的是一个又一个的困难，但同志们发扬了敌后战场勇歼敌寇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同困难进行了顽强的战斗。没有房子住，就自己动手搭草棚、挖窑洞，甚至露宿野外。粮食不够吃，就到百里以外的延长等地去背粮。运粮没有口袋，有的用床单缝成袋子，有的把裤腿两头扎起来当口袋。为了弥补粮食不足，就挖野菜、打猎。当时战士们穿的衣服，经过汗浸雨淋，荆棘撕扯，已经破烂不堪，很少见到没有补丁的衣服。战士们风趣地说：“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再三年，别说补的不好看，又省钱来又耐穿。”由于被褥单薄，黎明前天冷，战士们就烧起篝火取暖。学习没有纸，就以大地为纸，树枝为笔。后来，他们发现桦树皮薄厚均匀，晾干后可以写字，就用它做纸。当时记笔记、出墙报，甚至医生开处方都用桦树皮，人们称它为不花钱的油光纸。开荒种地没有农具就组织人力上山伐木锯板，运到外地卖钱买回农具，或发动大家找废铁，或从前线把敌人的钢轨锯成小段，用毛驴驮回来，自己制造农具。生活是艰苦的，精神却是愉快的。英雄的三五九旅战士在“一把镢头一支枪，生产自给保卫党中央”

的口号下，披荆斩棘，开荒种植，以坚强的革命意志和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在南泥湾的山川里，摆开了大生产的战场。

为了加强对生产的领导，三五九旅从旅部到连队，都成立了生产委员会，干部战士都编入农作小组。他们提出了“上至旅首长，下至伙夫马夫，一律参加生产，不使一个人站在生产战线之外”的口号，人人上阵，个个争先。在开荒中，旅团首长以身作则，带头冲在前面，鼓舞了全旅战士的斗志。

为了加快生产进度，提高劳动效率，三五九旅开展了劳动竞赛，连排班之间，个人之间互相挑战，涌现了许多“气死牛”式的模范人物。七一八团模范班长李位，在开荒大竞赛中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在一次全团组织的175名突击手的开荒竞赛中，李位挥舞着一把四斤半重的大板镢，经11个小时的激烈“战斗”，创造了日开荒3.67亩的最高记录。人们赞叹说：“好家伙，两头牛一天才能耕2亩多地，他一把镢头就挖了3亩多，真要气死牛了。”接着，七一九团刘顺清又以4.11亩的记录，超过了李位，四支队尹光普又创4.28亩的最新记录。在劳动英雄们的带动下，全旅掀起了开荒生产的热潮，记录不断被突破。为了指导部队的生产，王震旅长批准了闻名南泥湾的生产能手、71岁的老人朱玉寰参军，并委任他为全旅的生产副官，要求各部官兵向他请教，虚心接受他的指导。从此，朱老汉焕发了革命青春，经常穿一身灰军装，走遍了南泥湾的山山岭岭，随身带一把明晃晃的镢头，走到哪里就干到哪里。旅部还组织家属纺线织布，为此，王震旅长组织各团木工在延安，用一周时间制造了1000辆纺车。在开展纺线运动中，供给部家属陈敏，不顾家务和孩子拖累，纺线自给，全年不要政

府一尺布，一粒米，一分钱。在她的带动下，供给部的家属妇女全部行动起来了。政治部、司令部的妇女提出和他们挑战。卫生处的妇女也来供给部取经。各团的妇女也努力学习纺线技术，很快就纺出了头等线。四支队供给处吴成恩的女儿吴萍，年仅7岁也不甘落后，每天能纺1两头等纱。陈敏更是忙得不可开交，早起晚睡，每天可以纺半斤纱，7个月完成全年计划，被评为家属模范，出席了陕甘宁边区的劳模大会，受到毛泽东和旅首长的高度赞扬。

在从事农业生产的同时，三五九旅还办起了纺织厂、被服厂、造纸厂和粮食加工坊等，成立了运输队和军人合作社。特别是大光纺织厂的产品，花样新、品种多、质量好，除自给外，还上市销售，深受群众欢迎。

1942年，朱德邀请谢觉哉、徐特立、吴玉章、续范亭几位老人一同视察了南泥湾，并赋诗盛赞南泥湾的美好风光和巨大变化。朱德在《游南泥湾》一诗中写道：

去年初到此，遍地皆荒草。
夜无宿营地，破窑亦难找。
今辟新市场，洞房满山腰。
平川种嘉禾，水田栽新稻。
农场牛羊肥，马兰造纸俏。
屯田仅告成，战士粗温饱。
熏风拂面来，有似江南好。

三五九旅在生产的同时，十分重视政治与文化学习，使指战员的理论水平与科学文化知识都有了很大提高。在整风运动中，指战员们认真学习文件，密切联系实际，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提高了革命觉悟，增强了团结。在艰苦的环境中，开展

了识字运动。纸张缺乏，就用沙盘练字。没有笔就用树枝代替，或用小弹壳自制蘸水笔，战士们亲切地称它为“自来水笔”。经过刻苦学习，许多人摘掉了文盲帽子。

三五九旅战士生产不忘练兵，积极开展各种军事训练，内容从射击、投弹、刺杀三大技术为主，开展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的练兵热潮。王震在训练中提出：“首长负责，亲自动手；人人必到，一到必投；风雨无阻，假日不休。”他要求指战员苦练杀敌本领，努力提高军事技术。七一八团团团长陈宗尧严格要求，身体力行，不仅投弹达到50米，而且射击是神枪手，刺杀是优秀。他对每项训练都能做到动作熟练、准确，从而推动了全团的军事训练。1944年9月在留守兵团举行的军事表演中，三五九旅获得团体第一名。

三五九旅在屯垦南泥湾中，一面生产，一面学习，一面战斗，获得了优异成绩，为保卫边区、建设边区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成为大生产运动的一面红旗。

1942年12月，毛泽东在西北局高干会上，表扬了三五九旅的生产自给工作。他说：“边区留守兵团各部队中，以三五九旅生产自给工作做得比较好些。”大会给三五九旅奖了一面锦旗，上面写着“发展经济的前锋”。1943年，毛泽东在一次会议的报告中表扬了三五九旅七一八团团团长陈宗尧、政委左齐。他说：“陈宗尧同志是八路军的团长，他率领全团走几百里路去背米，他不骑马，自己背米，马也背米，全团指战员为他的精神所感动，人人精神百倍，无一个开小差。左齐同志是该团政治委员，他在战争中失去了一只手，开荒时他拿不起锄头，但在营里替战士们做饭，把饭挑上山去给战士们吃，使得战士们感动到不可名状。”他号召全体党的干部“学习这两位

同志的精神，和广大群众打成一片”。他说只要这样，“我们就一定会胜利。”正是这种上下一致、艰苦奋斗的精神，保证了南泥湾屯垦乃至整个大生产运动的成功。

在边区的大生产运动中，党中央、西北局、边区政府的领导都以身作则，参加到生产运动中去。1943年初，毛主席在自己窑洞下面开垦了一块地，种上了菜，朱总司令组织了一个生产小组，开垦菜地3亩。1943年，中央直属机关和中央警卫团举行纺线比赛，周恩来、任弼时、李富春等领导同志都争先参加。任弼时同志夺得纺线第一名，周恩来同志被评为纺线能手。高层领导人的模范行动，成了生产运动的鼓舞力量。

大生产运动取得的成就

经过几年时间的努力，边区的农业有很大发展，粮食不但能够自给，而且可以向外输出一部分。1938年耕地面积890多万亩，生产粮食120多万石；1940年达到1100多万亩，产粮150多万石；1942年达到1200多万亩，产粮160多万石，到1944年产粮达200多万石。植棉亩数大为增加，1939年仅3700多亩，1940年1.5万亩，1941年3.9万亩，1942年达到9.4万亩，每年都成倍地增加。这为发展边区纺织业，逐步做到丰衣足食奠定了基础。1940年，各机关学校响应朱总司令的号召，掀起了纺毛线运动。接着各单位纷纷组织建立被服、制鞋、木工、造纸、榨油等工厂。1942年，边区生产的布匹（包括公私营）已能满足军民年需要的40%，接近了半自给，而国营纺织厂已能供给党政军学需要的70%，边区生产的纸张已能自给。至1942年底，边区党政军学各部门经费自给率已达到一半以上，资产积蓄达5亿元左右，取之于己的部分已

超过取之于民的部分。边区的财政难关已经渡过。对此，毛泽东说：“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未有的奇迹，这是我们不可征服的物质基础。”

1942年12月，毛泽东在西北局高干会上作的《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报告中，对1938年以来陕甘宁边区生产运动的情况与经验，作了全面系统的总结，并在此基础上论述了党领导根据地经济建设的各项方针政策。毛泽东的这篇报告及1943年写成的《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组织起来》等文章，构成了当时党领导根据地大生产运动的基本纲领。

1943年初，党中央提出了“丰衣足食”的口号。2月9日，毛泽东在一份电报中说：“边区在渡过财政难关的基础上，今年决定大力发展农工盐畜生产，提出丰衣足食口号，如不旱，大有办法，人民经济亦大有发展，可达到丰衣足食。”这是党中央对边区生产运动的一个新的部署。5月1日，朱德在《解放日报》上发表文章，号召建设好“革命家务”，在工业生产方面，“争取一二年内首先做到党政军学主要必需品的全部自给，并照顾将来稳健的向前发展。”对朱总司令“建设革命家务”的提法，毛泽东十分赞成。他风趣地发挥说：“国民党以前不是常说我们窜回老巢吗？过去我们并没有巢。在陕北这个地方，靠着桥山山脉的确可以建立一个又深又好的‘巢’。敌人不能去，里面有工农商学，有牛羊鸡犬，有好娃娃，有生产班。这里好好计划一下，要如朱总司令所讲的好好的搞一个革命家务。”经过一年的努力，党中央提出的“丰衣足食”的号召基本得到实现。

1943年9月，毛泽东和任弼时、彭德怀等乘汽车前往南

泥湾视察。毛泽东一行到桃宝峪后，改为骑马，边走边看，来到南泥湾垦区政府所在地阳湾。

毛泽东一行视察了三五九旅旅部所在地——金盆湾。在吃饭中，他详细询问了战士们们的生活情况，每人每天吃多少油，伙食怎样改善，有没有发生柳拐病等。旅团首长一一做了回答。毛泽东听了十分满意，风趣地说：“国民党要困死我们、饿死我们，它越困，你们越胖了。看！困得连柳拐病都消灭了。”毛泽东指出：“困难并不是不可征服的怪物，大家动手征服它，它就低头了。大家自力更生，吃的穿的用的都有了。目前我们没有外援，假定将来有了外援，也还要以自力更生为主。”饭后视察了通讯连养猪场，在教导营检阅了部队，观看了军事表演。

在视察七一九团驻地——九龙泉时，毛泽东对粉碎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军事进攻作了重要指示。他说：“胡宗南还在我们门口，随时准备侵犯边区。我们要一面战斗，一面生产。”返回阳湾时，又视察了毛纺厂。

在党中央、边区政府的直接领导下，三五九旅在屯垦南泥湾的战斗中，取得了辉煌的成果。1943年，全旅开荒种地10万亩，收获细粮12000石，达到了粮食、被服、蔬菜、经费的全部自给。

1944年，全旅种地达26万多亩，收获细粮36000石，并上缴公粮10000石，实现了每人生产6石细粮，一人一只羊，两人一头猪，十人一头牛的计划，达到了“耕一余一”。

1943年春节，鲁艺秧歌队去南泥湾慰问三五九旅，演唱了由贺敬之作词，马可谱曲的著名歌曲《南泥湾》，热情歌颂了三五九旅屯垦南泥湾取得的辉煌成果。歌中唱道：“如今的

南泥湾，与往年不一般，再不是旧模样，是陕北的好江南。陕北好江南，鲜花开满山，又学习又生产，三五九旅是模范。咱们走上前，鲜花送模范。”

1944年，边区的经济状况进一步改观。由于部队机关学校自给率显著提高，边区财政收入中取之于民的部分只占31%，因此人民的负担大大减轻。1941年财政最困难时，征收公粮20万石，到1945年减至12万石。

大生产运动的意义是十分重大的。它是我们党在战争条件下所进行的一次成功的经济活动。大生产运动中三五九旅的功劳是巨大的。它不但减轻了人民群众的负担，实现了生产自给，而且还有力地推动了西北乃至全国的抗战新局面。它向世界证明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群众，能用自己的双手和智慧，克服种种困难，将革命的航船驶向胜利的彼岸。

（作者：延安革命纪念馆馆员）

延安时期的体育活动

米晓蓉

在新中国体育事业发展的历史长卷中，延安时期的体育活动占有极其重要的篇章。

延安时期，在毛泽东、朱德、贺龙等老一辈革命家的亲切关怀下，成立了多种形式的体育组织，举办了各种类型的体育运动会，因陋就简地修建了体育运动场地，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以工农兵为主体的新民主主义体育体系，为新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陕甘宁边区体育组织机构是在中央苏区体育组织体制的基础上，结合边区的实际情况建立起来的。党中央初到陕北时，基本上是按照中央苏区创建的俱乐部组织形式开展群众体育活动的。1937年5月，为推动陕甘宁苏区群众体育运动的开展，成立了以朱德为名誉会长，冯文彬为会长的苏区体育运动委员会。此后，苏区各省、县也相继成立了体育运动委员会。苏区体育运动委员会成立后，成功地举办了1937年8月在延安举行的“八一”抗战运动大会。抗日战争时期，在延安成立的体育组织还有延安体育运动委员会和延安新体育学会。延安体育运动委员会是继苏区体育运动委员会后又一个影响较大的体育组织，1940年5月成立于延安，李富春任名誉会长，委员多由各单位俱乐部主任兼任。延安新体育学会，是一个群众性的

体育科学研究机构，1941年1月成立，朱德为名誉会长，张远等7人为学会理事。

当年，延安群众体育活动是非常活跃的。夏季有游泳比赛，冬季有滑冰比赛，春秋季举行球类和田径比赛。每逢“三八”、“五一”、“五四”、“八一”、“九一八”等节假日、纪念日，还组织不同类型的体育比赛。游泳比赛一般都在延河里选一段水势平缓的地方举行。1942年8月，体育会李导主任在清凉山下的延河东岸边，设计并修建了延安第一个游泳池，池长50米，宽10米，水深2米。同时，利用岸上一巨石修建了跳水台，跳板距水面3米左右。延安“九一”运动会的游泳、跳水比赛就是在这里举行的。抗日战争时期，在延安曾举办过数十次运动会，其中规模较大的有两次。一次是“八一”抗战动员运动大会，另一次是“九一”扩大运动会。

“八一”抗战动员运动大会是1937年8月1日至6日在延安南门外体育场举行的。参赛运动员469人，来自陕西省、陕甘省和陕甘宁省及各部队、机关、学校。比赛和表演的项目有篮球、排球、足球、网球、乒乓球；田径、武术、团体操和军事项目等。毛泽东出席了开幕式和闭幕式并作了重要讲话。延安“九一”扩大运动会是1942年9月1日至6日在北门外文化沟青年体育场举行的。参赛运动员经过各区县及基层单位层层选拔，组成各自的代表队，共1388人。边区工人代表队和市民代表队都是第一次组队参赛。晋绥边区应邀派出以一二〇师战斗队为主力的39人体育代表队。山西新军也派出了由10人组成的体育代表团参加了运动会。在这次运动会上，延安大学代表队邓子力创造了男子100米12秒的好成绩。

延安时期体育活动的突出特点是它具有广泛的群众性，达

到了经常化。朱总司令当年在延安就明确指出，陕甘宁边区体育广泛深入开展的关键是“运动要经常”。那时，从中央领导到普通干部，青年人特别多，朝气蓬勃，生龙活虎，每天早晨和傍晚，人们成群结队地参加跑步、做操、打球、游戏。体育已真正成为广大群众强身健体，活跃文化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为了使体育运动更加普遍化和经常化，1942年在延安开始推广“十分钟运动”的活动。这项活动内容广泛，方法灵活多样，人们可任选一种体育项目，利用工余时间，天天坚持10分钟到15分钟运动锻炼，收到了极好的效果。

随着体育活动的普遍开展，延安需要大批体育专门人才。陕甘宁边区体育人才的培养，主要是通过举办体育训练班和开办延安大学体育系来实现的。体育培训班有脱产的和不脱产的两类形式。1940年5月，毛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在文化沟成立。初成立时设有6个班，1941年1月又招收了一个体育训练班，学员来自延安各个机关单位专门从事体育工作的干部，任务是经过一年的专业培训，为边区培养合格的体育专门人才。此外，中国女子大学，延安师范学校，边区保安司令部和八路军三五九旅，也都举办过体育干部训练班，为本系统本部门培养了一批体育教员和体育工作的骨干。1942年8月，一批游泳活动积极分子发起成立了延安游泳研究班，开创了延安游泳人才的培训工作。延安大学体育系有学员20多人，专职教员仅有三四人，其他教员都是兼职的。系主任张远主讲体育理论，教育系主任刘泽如主讲教育学，医科大学教授薛公绰主讲解剖；田径由留守兵团俱乐部主任刘华锋主讲；篮球由抗大俱乐部主任蔡德仁主讲；排球由留守兵团排球队队长李鹰航、延安排球队队长王禹明主讲；体操由女大杨烈和军事学院董其祥

主讲；游泳由延安体育会主任李导主讲。这些教员都是延安体育界的知名人士和大学教授。他们为培养新中国的体育人才做出了重大贡献。

历史的车轮向前又滚动了半个世纪。回首延安时期的体育活动，至今仍闪烁着熠熠光辉。继承和弘扬延安体育优良传统，必将为社会主义现代体育运动的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作者：延安革命纪念馆馆员）

延安时期第一次公祭黄帝陵

江 林

继“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侵略者又在华北等地不断制造事端，民族危机日益加重。我党为表明团结抗日及拯救民族的决心和信心，怀着对华夏始祖黄帝创造中华文明丰功伟绩的仰慕之情，于1937年清明节，代表当时陕北苏区的全体人民首次公祭黄帝陵。

这次公祭由林伯渠主持。毛泽东起草了祭文，并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人民抗日红军总司令朱德的名义发表。全文如下：

维中华民国廿六年四月五日，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人民抗日红军总司令朱德恭遣代表林祖涵，以鲜花束帛之仪致祭于我中华民族始祖黄帝之陵。

赫赫始祖，吾华肇造；胄衍社绵，岳峨河浩。聪明睿智，光被遐荒；建此伟业，雄立东方。世变沧桑，中更蹉跎；越数千年，强邻蔑德，琉台不守，三韩为墟；辽河燕冀，汉奸何多，以地事敌，敌欲岂足；人执笞绳，我为奴辱；懿维我祖，命世之英，逐鹿奋战，区宇以宁，岂其苗裔，不武如斯，泱泱大国，让其沦胥。东等不才，剑履俱奋，万里崎岖，为国效命。频年苦斗，备历险夷，匈奴未灭，何以家为。各党各界，团结坚固，不论军民，不分贫

富。民族阵线，救国良方，四万万众，坚决抵抗。民主共和，改革内政，亿兆一心，战则必胜。还我河山，卫我国权，此物此志，永矢勿援。经武整军，照告烈祖，实鉴险之，皇天后土，尚飨！

（作者：延安革命纪念馆馆员）

一位美国朋友的延安情

田林艳

玛格丽特·斯坦丽曾八次来华。她每次来华，必访延安。在她看来，当年在延安工作和生活过的日子，是她一生中最幸福、最有意义和最有青春活力的时期，使她难以忘怀。

玛格丽特·斯坦丽，1919年9月18日出生在美国中西部，父母均为教师。大学毕业后，获护理硕士学位，并成为公共卫生护理员。1945年至1946年间，我国河南省灾区瘟疫流行，传染病猖獗，她冒着生命危险，参加“美国公谊服务会赴中国救护队”，同中国、新西兰、加拿大、英国以及美国的青年人一道，在河南郑州、中牟等地医院从事护理工作。

在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中，她决心为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尽一份力量。1946年12月2日，她同公谊救护队其他6名成员组成一支医疗队，由救委会主任李为林先生陪同自郑州乘飞机到达延安，在国际和平医院工作。延安军民为解放全中国而献身的革命精神，百折不挠的坚强毅力和艰苦的生活，使她很受教育。她觉得为世界和平、为解放中国人民而战斗的崇高事业是生命的价值所在。所以，她工作特别积极，整天在病房忙碌。她开朗温柔，经常到病房为伤员们讲故事、唱歌，分散他们的注意力，减轻他们的伤痛。她在生活上从不要特殊照顾，和延安人民过着同样艰苦的生活，并以此为

荣。

1947年3月，胡宗南军队进犯延安，她主动要求到洛杉矶托儿所工作，随孩子们一起转移。孩子们都很喜欢她，因为这位洋阿姨不仅年轻漂亮，而且还会唱好多好多的歌，一天到晚总是乐呵呵的。“阿姨，美国的小朋友也坐摇篮吗？他们也行军吗？”“阿姨，美国有窑洞吗？”对孩子们提出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她总是耐心地一一解答，从不嫌麻烦。在敌军围追堵截的急行军中，她冒着生命危险，精心护理着每个孩子。在转移途中，在黄河岸边，她手拿照相机为洛杉矶托儿所的孩子们，以马背上的摇篮和骡车为家的感人生活拍摄了许多珍贵照片。并整整保存了36年，一点都没损坏。1983年她在美国将这些照片亲手交给了中国肿瘤研究所负责人李冰同志。这是多么珍贵的历史文物啊！

1948年，玛格丽特·斯坦丽奉公谊服务会总部的调遣回国。但她时刻想念延安，这不仅是因为延安的山川、小米和人民的友情已经成为她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更主要的是她认为她当初居住和工作过的延安，是中国人民在革命艰苦年代创造了奇迹和优良作风的地方，应该更多地向外国介绍延安，再为延安做些事情。1972年5月，她作为美国公谊服务会代表团成员，来华访问三周。1977年她和好友海伦·斯诺在美国创办了“延安会”，联系过去访问过延安的美国人士，加强同延安人民的友好关系。同时，一起编辑了记载1935年至1949年到延安的外国人及其有关延安要事的一本书。这本书字里行间浸透着她对延安的浓浓情思。1987年她又组织一个美国电视组，专门拍摄了延安的历史与现状，并担任向导和解说。这部名为《重返延安》的电视片在美国播出后，吸引了成千上万

的观众。此后，她还写了一篇回忆延安的文章，参加我国举办的“《西行漫记》和我”的征文活动并获奖。

1988年，应延安医学院的邀请，她又远渡重洋来到气候不大好、物质条件较差的延安讲学一年，主讲英语语音和听力。她平易近人，经常和老师们一起探讨教学中的经验和存在的问题。对于学生们提出的任何问题，她总是耐心讲解。她谢绝任何报酬，义务为延安培养人才。在生活中从不搞特殊，吃大灶饭，和师生们打成一片，因为重返延安工作是她多年的夙愿。同年将她保存多年的“公谊队”证章捐献给了延安革命纪念馆，作为永久的纪念。1991年，她最后一次访华。已72岁高龄的她仍坚持要专程来延安，重访昔日住过的窑洞、任教的学校，同延安人民一起过了春节。2月27日回到北京，逢人就讲她在延安过春节的喜悦和兴奋以及近年来延安的显著变化。3月1日因突发脑溢血，第二天在北京与世长辞。

玛格丽特·斯坦丽虽然走了，但她把生命的最后一刻留在了中国，把欢乐和友情留在了延安。正如她在诗中写道：“什么是友谊？它摸不着，看不见，却存在于人们之间。它是心同心的相遇，是人对人的奉献……”这是多么纯真的友情。延安人民将永远怀念这位忠实的美朋友。

（作者：延安革命纪念馆副研究员）

劳动英雄申长林的壮丽人生

贺延荣

陕甘宁边区特等劳动英雄、中共“七大”代表申长林同志虽然离开我们 40 多年了，但他毕生为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所做出的特殊贡献，至今深深地留在人民的脑海里，让人难以忘却。

1894 年，申长林出生在陕西省米脂县驼河岸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里。11 岁起就给人家放羊，当长工。1929 年，陕北发生大灾荒，他和全家逃荒到延安县蟠龙区雷鼓川乡马家沟村，当年冬天，他的父亲被饥饿夺去了生命。申长林和两个幼年的弟弟流着眼泪埋葬了父亲。从此，养家糊口的重担就压在了申长林一个人的身上。申长林没有一寸土地，只得靠揽工维持生计。1934 年，蟠龙一带闹起了革命，申长林家分到了 40 垧土地和一些牛羊，生活才一年一年好起来。1936 年春天，申长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担任了村干部，他带领乡亲们踊跃支前，保证前线军队的物资需求。

1939 年，国民党、蒋介石不断地向边区发动武装挑衅，并在经济上进行封锁，边区军民生活极为困难。党中央、毛泽东及时发出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申长林积极响应这一号召，他带领两个弟弟以及家里的女劳力早出晚归，开辟荒地，深耕细作。当年他家就产各种粮食 69 石（合 24150

斤）。为了促进生产支援边区，他还喂耕牛 8 头，驴 2 头，羊 187 只，猪 2 头，鸡 15 只。

申长林富裕了，但他没有忘记政府和军队正处于困难时期。他积极地支援政府和军队，在抗日支前捐献中做出了惊人的成绩。从 1939 年到 1943 年五年当中，申长林所在的马家沟村共负担公粮 84 石 6 斗，申长林就担负了 48 石 3 斗，占全村总数的 57%。1941—1943 年三年当中，全村共负担公盐 3385 斤，申长林负担 1565 斤，占全村总数 46% 以上。但是他的土地和粮食收入只占全村总数的 30%，劳力和耕牛只占全村总数的 20%。在政府征收公粮大会上，申长林常常是打先锋自愿报数的。1942 年征粮会上，他自愿报出 13 石，评议会认为太多了，可他却说“为了抗战，为了革命，多负担点是应该的！”

申长林富裕了，但他没有忘记穷人，他常常拿出自家的粮食和土地帮助穷人发展生产。1943 年，申长林安置了三户移难民。他把自己的 3 垧川地和 30 垧山地，无代价的让给移难民们去种，自己却拿 1 石 5 斗租子向别人租地种，以补耕地不足。在青黄不接的春天，移难民和贫困户没粮吃，申长林拿出家里的粮食救济，并鼓励移难民们好好劳动生产。在申长林的扶持帮助下，三户移难民一年下来，生产的粮食不仅够吃，而且还有余存。申长林还经常代替贫困户交纳公粮、公盐，帮助“二流子”发展生产，带动全村村民支援抗战，村里有个叫刘德银的人，原来当过邮差，是出了名的“二流子”，整天东游西串，游手好闲，一贯害怕吃苦种地。经申长林多次说服教育，思想有些转变，可确实不会种地，申长林就主动借给他 3 斗粮食并手把手地教他种了 7 垧地。秋后收获了 5 石粮，刘德

很高兴得逢人便说：“全凭老申帮助，明年我要好好种庄稼哩。”并且当年就交了1石公粮。申长林用同样的办法，共帮助转化了三个“二流子”，使这些人走上自食其力和对革命的贡献的正道。

申长林的突出成绩，受到了党中央和陕甘宁边区的肯定和表扬。他多次被评为模范共产党员和劳动英雄，受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接见。

1943年11月26日，申长林光荣地出席了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劳动英雄代表大会。会上，边区政府对边区的200名劳动英雄进行表彰奖励。同时，还评出特等劳动英雄25名，申长林就是其中之一。29日下午，申长林和出席大会的200多名劳动英雄一起，被众人簇拥着走进杨家岭中共中央大礼堂，第一次幸福地见到了毛泽东。

12月9日下午，毛泽东在西北局办公厅特地邀请17位劳动英雄座谈交流生产经验，申长林也应邀参加了这次座谈会。在座谈会上，申长林激动地向毛泽东汇报了他向年来的生产情况和第二年的生产计划：预收粮食76石8斗，羊增加到210只，在村里组织变工组，妇女纺线组，帮助安置移民难民等。并保证：“自己是共产党员，眼光要放远，事事要顾及到大家的利益。”后来人们和他谈及见到毛泽东的情景时，他总是激动不已地说：“我一个揽工汉能参加劳模会，几次见到毛主席，这是很大的幸福，很大的光荣，我一生一世也都不能忘记！”

1945年4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在延安胜利召开。申长林作为“七大”代表，光荣地参加了这一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盛会。申长林认真地听取了毛泽东、朱德、刘少

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作的报告，受到了更加深刻的教育，回到家乡后，他积极宣传“七大”精神，并以此为指导，带动全乡群众努力生产，为抗战的最后胜利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1947年3月，国民党胡宗南部20多万兵力进攻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妄图摧毁我党我军领导中枢，为了诱敌深入，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党中央主动撤离了延安。国民党占据延安后，群众的财产被洗劫一空。申长林家的两头驴、一匹马被拉走了，猪羊、鸡鸭也被敌人杀光了，家中粮食除战前送给解放军40石细粮和埋藏了一部分外，其余的全被匪兵抢走了。

1948年4月，西北野战军和边区军民光复了延安。申长林积极响应毛泽东“迅速恢复战争创伤”的伟大号召，组织变工队、互助组等发展农业生产。为了使群众能安心生产，申长林将战前埋藏的20余石粮食全部拿出来救济乡亲们。

建国后，申长林本可以得到国家较高待遇，可他却把党和人民给予的荣誉当做激励自己继续努力的一面镜子，申长林仍用他那双勤劳的手继续奋斗，心甘情愿地当一名普普通通的劳动者，去创造更大的价值来报效党和人民。

申长林在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时期，始终保持着战争年代的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始终保持了一个从延安时代过来的模范党员、劳动英雄的光荣传统，在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声誉。他历任中共延安地委委员，延安县下坪公社党委副书记、马家沟生产队党支部书记，却始终坚持和农民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共同建设家乡，从未脱离劳动。他多次被评为模范共产党员、建设社会主义的生产模范，光荣地出席了中共陕西省委第三次代表大会。

1962年6月14日，申长林与世长辞，终年68岁。6月

21日上午11时，申长林追悼会在马家沟村隆重举行，延安地、县党政领导和周围自发赶来的千余名群众含着热泪为英雄送行。

申长林同志的一生是勤劳的一生，革命的一生。他虽然去世了，可他一心为革命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崇高精神将会永远激励着延河儿女。

（作者：延安革命纪念馆馆员）

延安时期的独臂将军左齐

党政军 刘 晶

左齐，江西永新人，1932年参加红军，同年入党，参加过反“围剿”斗争和长征。1938年任一二〇师三五九旅七一七团参谋长，11月率部在山西蔚县明辅村后山伏击日军一个运输大队。在战斗进行得异常激烈时，不料，八路军的一架重机枪突然卡壳。在这关键时刻，正在指挥战斗的左齐跳进机枪阵地，迅速排除了故障。但日军瞅住机枪停射的片刻时机，集中火力向我机枪阵地猛射，左齐右臂上部中弹，顿时鲜血泉涌。他忍住疼痛，用左手死死捂住伤口，指挥战士反击，一直坚持到战斗胜利结束。左齐右臂伤势严重，无法保留，白求恩大夫亲自为他做了截肢手术。右臂失去以后，左齐仍以坚强的毅力坚持在部队第一线。

1941年春，为打破国民党对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封锁，坚持抗战，党中央号召根据地军民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开展大生产运动。三五九旅奉命开赴荒无人烟的南泥湾开荒种地、发展生产。经过两年多时间的艰苦奋斗，终于使南泥湾变成了粮食堆满仓、遍地是牛羊的陕北好江南，成为了边区自力更生、发展生产的一面光辉旗帜。

对此，毛泽东很高兴，特意安排接见了三五九旅旅长兼政委王震、副政委王恩茂，认真听取他们的汇报。当王震介绍在

大生产运动中涌现出的英雄模范人物时，提到了七一八团政委左齐是只有一条胳膊的人，在南泥湾开荒生产运动中，他深入营、连做政治思想工作，发现先进及时表扬、推广，使整个部队掀起你追我赶的劳动竞赛热潮。他看自己独臂不能像大家一样抡镢头开荒，就主动充当“伙头军”，上午跟炊事员们一起做好饭，中午又亲自挑着饭送上去。从春到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左齐就是这样天天当“伙头军”。七一八团的干部战士无不为之行动所感动。大家情绪高昂，士气旺盛，干劲十足，努力生产，取得突出成绩，被评为三五九旅中的“生产模范团”。左齐也成了远近闻名的“劳动英雄”。朱总司令从前线回到延安后，特地去看了七一八团，对七一八团大加赞赏。

1943年5月，在杨家岭大礼堂召开的一次干部会议上，毛泽东讲了话。在讲到延安的大生产运动时，特别表扬左齐说：“左齐同志是七一八团政治委员，他在战争中失去了一条胳膊。开荒时，他拿不起镢头，但在营里替战士们做饭，挑上去给战士吃，使得战士们感动得不可名状。”说到这里，台下爆发出热烈掌声。

1944年11月，三五九旅奉命组成南下支队挺进华南，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行前，三五九旅请毛泽东等中央首长吃饭，各团团团长、政委参加。席间，王震把左齐介绍给毛泽东：“这就是你表扬过的左齐同志。”左齐举起左手向毛泽东敬礼。毛泽东热情地握住左齐的手，亲切地笑着说：“你这样鼎鼎有名的人，我第一次见到，非常高兴。”

（作者：延安革命纪念馆管理员）

李鼎铭与三五九旅

任 勇

李鼎铭先生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后，特别关心部队的生产与生活情况，曾多次深入连队视察工作。1942年7月在南泥湾中央休养所避暑休息时，还特意到八路军三五九旅各部询问部队生产及各方面情况，并为当地老百姓治疗疾病，深受当地驻军和广大群众的爱戴。本文将简要记述李鼎铭先生与南泥湾及三五九旅的活动片断。

高度赞扬三五九旅生产与节约

1942年7月，按照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的有关规定，李鼎铭到南泥湾陶宝峪中央休养所避暑休养。他经常以一个普通工作人员的身份，到部队了解开荒种地的情况。三五九旅英雄们的功绩使他很受鼓舞。回到延安后他利用各种场合，大力赞扬部队不仅生产搞得好，而且节约运动也搞得非常出色。1944年1月27日的春节期间，李鼎铭先生出席中共西北局办公厅举办的欢迎在延党外人士宴会上发言，畅谈了他在南泥湾休养时对三五九旅生产的深刻印象。他说：“自来当兵叫做吃粮的，于今咱们边区军队不仅打仗是模范，而且生产节约与帮助老百姓也都是模范。三五九旅去年用南瓜洋芋做饭，就节省了3000石细粮。我亲自看到他们开荒，节省民力及拥政爱民的

实际精神，真使我五体投地。”^①

后来，陕甘宁边区政府把机关人员生产节约，作为边区财政经济方面重大措施之一。林伯渠、李鼎铭两位正副主席均以身作则，订出自己的生产节约计划。当记者专访李鼎铭副主席时，他说：“关于生产节约，我同意林老的意见，至于我自己也想在这方面努力一下，虽然我年纪已经大了，但我准备采用变工的办法种些地；其次我到延安工作两年，公家发给我很多衣服被褥，因此今年这些东西我不领，给公家节省一些。”接着，李鼎铭先生又一次赞扬了三五九旅生产节约上巨大收获。他说：“几千年以来，国家养的兵，都是穿老百姓吃老百姓的，惟独我们八路军，除了打仗以外，还进行生产，自给自足，并帮助人民春耕夏耘秋收，这是天下少有的。我们的军队不但生产得好，而且节约得也很好，如‘团结’部去年因为调剂吃南瓜、洋芋和饭，就节省了3000石细粮。‘团结’部现在每个战士平均有5000元存在军人合作社，这5000元在几年以后，将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因此将来到了战后，军队也不用老百姓养活了。”^②

关心群众和战士的疾苦

李鼎铭特别擅长中医。他在南泥湾休养期间，除深入部队了解他们的生产及生活情况外，经常去农村了解当地群众的疾苦，为群众排忧解难。有一位姓马农民，是南泥湾的老住户，儿媳妇因瘫痪不能下炕，一家人十分焦急和苦恼。老马经常求神拜佛，祈求神灵保佑，盼望儿媳早日康复。然而，儿媳病情日趋恶化，一家人急得团团转。李鼎铭得知后，多次为她治病，药物、针灸并用，不久这位妇女的病就痊愈了，老马送上

药费被他谢绝了。老马后来得知，为儿媳治病的竟是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激动地逢人便说：“贵人扶持！贵人扶持！”

李鼎铭在南泥湾休息时间虽短，而了解和掌握到的情况却很多。当他得知有一位河北籍战士，30多岁了还没成家，他家46口人，被日本鬼子杀了43人，只逃出3人，其他两个也失去联系，他自己在战场上负过伤。李鼎铭说：“人家负了伤，南泥湾这地方太潮湿，把他调到延安去。让他成个家，留个后代吧！”这个战士调到延安后，非常感动。他刻苦学习，认真工作，进步很快，不久被提为营级干部。后来他给李鼎铭写信说：“部队就是我的家，革命处处有亲人。”^③表示不忘副主席的关怀，为抗战胜利奉献自己的毕生精力。

批复王震旅长的来信

王震率三五九旅进驻南泥湾后，他兼任延属军分区的领导工作，三五九旅归属延属分区驻军。当时广大指战员听到林伯渠、李鼎铭两位正副主席订出自己的生产节约计划后，纷纷致信给王震司令员，认为两位政府主席已届高龄，且领导边区政府，政务繁忙，要求他们在春耕夏耘期间，至驻军各防区视察，指示生产，他们的生产任务，则由部队代耕。王震随即将广大指战员这片心意，转呈林、李两位主席。当时，李鼎铭便询问起三五九旅在新的一年里开荒种地的计划。他深知该旅自1941年进驻南泥湾后，几年来已经取得很大成绩：第一年刚起步就开荒种地11200余亩，收细粮1200石，达到粮食自给76%，部队经费自给达78.5%（包括衣服、油盐、津贴、杂费等）；1942年基本好转，种地26800亩，收细粮3050石，粮食自给88%，经费自给达到90.3%，蔬菜、肉食、油料和

鞋袜全部自给；1943年种地面积达10万亩，净收细粮12000石，加上洋芋、南瓜等折合成粮（3斤折1斤）共计15000石，蔬菜590多万公斤，粮食蔬菜全部自给有余。李鼎铭希望王震能使三五九旅的生产更上一个台阶，争取做到“耕一余一”。为此，他要求王震能及时向边区政府汇报部队生产的具体进展情况。

为落实李鼎铭副主席对该旅的期望，王震同志于1944年4月19日由延安出发，巡视各部开荒播种情况。他先后视察了延安之金盆区，固临之临镇区和富县之牛武区。找区乡干部和居民了解春耕情况后，于4月26日向李鼎铭写了一封长信。他在信中说：“今年生产，官兵均有亲身体会之经验教训，至于耕作粗细与勤惰，乃难逃果实收获之偿罚。”他认为：经过边区群英会，部队劳动英雄获得宝贵耕作法的知识，以及延安县组织春节劳军团，由尹区长、吴满有等劳动英雄于春假期间在部队中广为检查过去耕作优缺点，宣传教授农作方法，因此今年农业生产不仅情绪高，而且耕作亦都比较得法精细，地亩亦较去年宽大。他在信中说：“截至本月底止，开荒地10万亩，加上去年熟地约有15万亩谷子下种完毕，另有3600亩棉田，5000亩麻子、1万亩洋芋均已下种，且苗芽亦出土。从5月1日起，继续开稻田及糜子地，稻田可开2000多亩（水渠泉井正修中），糜子地可再开6.7万亩，九旅全部官兵除从事工商运输生产人员外，可完成25万亩谷物耕地。”^④王震同志还向李鼎铭汇报了南泥湾垦区领导班子人选的意见。

李鼎铭收到王震的亲笔信后，非常满意，于5月4日签发请秘书处给予批复。果不出预料，1944年三五九旅种地达26万余亩，后因一部分部队奉命挺进江南敌后，将部分庄稼交边

区机关和兄弟部队，还产粮食 36 000 石，不仅部队经费全部自给，还向边区政府上缴公粮 1 万石。这样，便达到了“耕一余一”的目标，创造了部队不吃公粮而向政府交粮的奇迹。

注 释

①《西北局办公厅，欢宴党外人士》，《解放日报》1944 年 2 月 2 日第 1 版。

②《林主席李副主席以身作则，订出生产节约计划》，《解放日报》1944 年 1 月 28 日。

③常银山等著：《爱国典范李鼎铭》，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44 页。

④《王震给鼎老副主席的信》，存陕西省档案馆。

“窑洞大学”育英才

黄卉青 王一美

延安窑洞不仅出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出了指导抗日战争的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而且也培育出了数十万支撑抗日大厦的栋梁之材。因此，人们亲切地称她为“窑洞大学”、“革命熔炉”。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

抗日战争爆发后，党中央、毛泽东在延安举起了抗日救国的大旗，领导全国人民点燃了人民游击战争的烽火，使全国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看到了希望。延安，成了人人向往的革命圣地。许多具有爱国心、血气方刚的青年，冲破重重阻挠，纷纷从国统区、敌占区奔赴延安，寻求救国的真理。

据统计，仅1938年5月至8月，经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奔赴延安的青年就达2288人。北京各大学的青年学生，不堪忍受日寇的欺凌，大呼“偌大一个华北，已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纷纷离家出走，成群结队奔向延安。上海的一批知识青年，冒着杀头的危险，不顾路途遥远，历时13个月，走了1万多公里路，于1939年底来到延安。途中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是可想而知的。有个姓吴的华侨青年，是一个资本家的独生子，在革命理想的驱使下，他冲破家庭的阻拦回到了祖国，并闯过层层封锁线来到延安，投身到革命的怀抱。当一位

归国青年到了延安南郊的三十里铺，从哨兵口里得知“这儿已是延安地界”的时候，他激动万分，跪在地上双手捧起一抔黄土，紧紧地贴在自己的脸上，感慨地说：“祖国呵！就剩下您这一片干净的土地了！”

事实上，千百万青年奔赴延安，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首先，要冲破国民党的重重阻拦和封锁。1938年国民党反动派包围边区的总兵力达30万人以上，设有五道封锁线，仅南面的第一道封锁线上就筑有6300多个碉堡，不少正在奔赴延安途中的革命青年身陷囹圄，惨遭迫害。从1938到1940年之间，被害青年达数万之众。

但是，马列主义的真理是封锁不住的，革命的信仰力量是不可抗拒的，艰难险阻动摇不了他们追求真理，要求抗日的决心。他们坚信“割掉皮肉还有筋，打断骨头还有心，只要还有一口气，爬也爬到延安城”。正如歌里唱的那样：宝塔山下，延河之滨，聚集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民族的解放，救国的责任，将靠他们来承担。

就这样，大批进步青年奔赴延安。一方面，抗战急需培养一支庞大的干部队伍。同时，原有的干部也急需通过学习，增长才干，以适应抗日形势的需要。为此，党中央发出了《关于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关于干部学校的决定》，要求把干部教育放在党的重要工作地位上来。在极短的时间里，党中央、边区政府，利用延安处于战略总后方相对安定的有利条件，以极大的魄力创办了20多所各类干部学校，把延安变成了名副其实的“窑洞大学”。

在这些干部学校中，有专门培养党的高、中级理论干部的中央党校；有被誉为最高学府的马列学院；有边区第一所综合

大学——延安大学；有培养军事干部的八路军炮兵学校；有专门培养文艺人才的鲁迅艺术学院等等。在所有干部学校中，最享有盛名、并具有代表性的学校就是抗大了。

抗大，是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的简称。毛泽东在抗大开学典礼上指出：“第一次大革命时有一个黄埔，它的学生成为当时革命的主导力量，领导了北伐成功，但是现在它的革命任务还未完成，我们的红大就要继承黄埔的精神，要完成黄埔未完成的任务，要在第二次大革命中也成为主导的力量，即是要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1936年6月1日红军大学在瓦窑堡成立，1937年1月随中共中央由志丹迁驻延安，抗日战争爆发后，红大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毛泽东在高度赞扬这所学校时说：“抗大之所以大，是因为我们的理想大，奋斗目标大。”1938年3月，毛泽东为抗大题写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题词，从而为抗大制定了正确的教育方针和办学方向。

据统计，抗大总校当时在延安共办了八期，培养了29072名干部，加上十二所分校共培养造就干部10多万。其他学校如鲁艺办了四期，培养文艺人才502人；边区各中等学校培养了3000多名干部。如果把当时所有干部学校培养的人数统计出来，那将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是啊，延安的“窑洞大学”当时的确像一座革命熔炉，使无数有志青年在此百炼成钢。

当时干部学校的教员非常缺乏，许多中央首长和各部门负责人都是学校的兼职教员。毛泽东为造就大批干部，倾注了极大的心血，虽日理万机，仍抽出时间给抗大和鲁艺的学员讲

课。他讲课深入浅出，通俗易懂，深受学员们的欢迎。周恩来、朱德、吴玉章、罗瑞卿等，都是兼职教员，他们以身作则，为党的教育事业殚精竭虑。

在艰苦的战争年代里，由于经费困难，物资缺乏，各学校都积极倡导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作风。师生一起住土窑洞，穿布衣草鞋，吃小米饭，过军事化的生活。校舍不够，自己动手挖窑洞。据一位女学员回忆说，在房子特别紧张的时候，她们是十几个女生挤在一个炕上睡觉。学生们在延河边洗漱，宝塔山下出操，露天吃饭。树阴下、窑洞前是天然的“教室”。正如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描写的那样：“以窑洞为校舍，石灰泥土糊的墙为黑板，石头砖块为桌椅，校舍完全不怕轰炸的这种高等学府，全世界恐怕就只有这么一家啦！”

为解决经费不足的困难，学生们在学习之余还开荒种地，纺线织布，以求自给一部分或大部分，努力减轻政府和人民的负担，枪杆、镢头、马列书就成为干部学校的三件宝。

开荒生产对在城市过惯舒适生活的年轻人来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少人因过不了劳动关而流过泪。播种的季节，有的打算直接种小米，而不知种谷子；有的打水时因桶“吃”不了水，用石头砸桶而砸掉了桶底……

困难很多，但是为了民族的解放，一切艰难困苦都显得那么微不足道，广大学员以极其乐观的态度对待这些困难。有好多来自南方的青年，刚来到延安时，看到金黄金黄的小米饭还以为是蛋炒饭，一吃才感到粗糙，难以下咽。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完全克服了生活上的困难，风趣地把小米饭叫做“劳动饭”，把小米掺大米做的饭叫“国共合作饭”，把锅巴称

为“马列饼干”。

延安自然科学学院的学员还写了这样一首诗：

我们的生活艰苦又紧张，
我们的革命热情却日益高涨。
谁说我们没有课堂？
我们有世界上最大的课堂：
蓝天是我们的围墙。
谁说我们没有教具？
自制的教具更加漂亮。
谁说“土包子”不能办大学？
我们的意志比钢铁还坚强。
为了祖国的新生、民族的解放，
任何困难也不能把我们阻挡。

难怪，一位印尼朋友曾赞叹说：中国共产党人真了不起，吃小米饭，啃《资本论》。

延安的生活条件虽然艰苦，但精神生活却异常丰富多彩。学员们经常比赛排球、篮球，清凉山下延水河畔就是最好的跳水台和游泳场。

广大学员在延安这所“窑洞大学”中，迅速成长为英勇的抗日战士。毕业的学员，由于前后方的急需，总是供不应求。学员们都把自己能够分配到抗日最前线，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工作当成一种莫大的光荣，因此那些被留在延安的，往往还要闹情绪，哭鼻子呢！

毛泽东、朱德曾多次在毕业典礼上热情勉励学员们要像种子那样，在人民群众中开花结果，献身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

延安时期创办干部学校、培养革命干部，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思想的具体体现。延安窑洞大学作为革命的熔炉，曾培养出了数十万治党治军的栋梁之材。不仅为抗日战争的发展和胜利奠定了基础，而且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为建设新中国准备了干部。

窑洞大学作为一页历史轻轻被岁月翻过，但它所蕴含的伟大精神将导引一代又一代青年向前，向前！

（作者：延安革命纪念馆馆员；助理馆员）

丁玲在延安

白 彬

丁玲 1936 年 11 月由西安到达延安的保安县，找到了中共中央。日本投降后，丁玲、陈明、杨朔等同志经批准组成延安文艺通讯团，并于 1945 年 10 月徒步去东北。她在延安生活战斗了 10 年。

初到延安

1936 年 9 月，丁玲躲过了国民党特务的严密监视，先后从南京至上海、北京等地，在鲁迅、曹靖华、冯雪峰、张天翼等人的帮助下找到了党组织。

当她到达西安后，正值秋天，她暂住在一个名叫冯海伯的外国牙科医生的家里。在这里丁玲第一次遇到了斯诺和史沫特莱。

1936 年 11 月丁玲离开西安，长途跋涉，来到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县。党组织为丁玲的到来在一间宽敞的窑洞里召开了“盛大”的欢迎会。

次日丁玲又一一到毛泽东、周恩来、林伯渠等领导人住的窑洞拜访做客。毛泽东问她：丁玲你打算做什么呀？她不假思索地说：“当红军。”毛泽东说：好呀！还赶得上，还有最后的一仗，你跟着杨尚昆领导的前方总政治部上前线去吧！在保安

丁玲只住了 12 天，就以红军战士的身份，随部队上了前线。

到了前线后，任弼时同志给丁玲挑选了一匹温顺漂亮的枣红马。在部队行军时丁玲从不骑马，她总是步行，随部队昼夜兼程，每天要走 60 多里路，脚上打了许多小泡，她学战士们的办法，用针在油灯上烧红再从水泡中穿过去。第二天她忍着痛照样跟着战士一起行军。

部队到庆阳后，丁玲收到了毛泽东同志用电报发给她的欢迎词《临江仙·给丁玲同志》：

壁上红旗飘落照
西风漫卷孤城
保安人物一时新
洞中开宴会
招待出牢人

纤笔一支谁与似
三千毛瑟精兵
阵图开向陇山东
昨天文小姐
今日武将军

1937 年初，丁玲陪同史沫特莱从前线回到中央所在地延安。毛泽东又亲自录写了这首词的全文送给了丁玲。

在中央警卫团的日日夜夜

丁玲从前线回到延安后，毛泽东派丁玲同志去中央警卫团担任政治副主任。她虽然在警卫团仅仅工作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但却给她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此后丁玲在《警卫团生

活一班》中说：“这一个多月的生活经验，却在我以后的工作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在警卫团时，她深深地体会到用笔作武器进行战斗的威力。后来她在《红色中华》副刊刊尾随笔中写道：“战斗的时候要枪、要子弹去打敌人。但我们也不要忘记使用另一种武器，那就是帮助着冲锋侧击包剿的一支笔。”

筹备成立中国文化协会

丁玲到了保安后，便向组织建议成立一个文艺团体，得到毛泽东、张闻天等中央领导的支持。当时苏区教育部商议成立一个正规的文艺组织，所以苏区教育部就委托丁玲做筹备工作。

1936年11月15日，中国文艺协会举行第一次筹备会议。由丁玲、伍修权、徐特立、徐梦秋、洪水、李克农、成仿吾、李伯钊等34人发起。

协会发了《缘起》，说明了成立这个组织的目的及意义：“为了联络各地的文艺团体，各方面的作家，以及一切对文艺有兴趣，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新的战斗力量。所以我们组成文艺工作者协会。希望一切在战争中有兴趣的同志们共同来参加。”

11月22日中国文艺协会于上午9时召开成立大会，到会人员及来宾共百余人。李伯钊报告协会成立意义，丁玲报告筹备经过。毛泽东出席大会并提议该会定名为“中国文艺协会”。毛泽东的提议得到了与会者一致同意。毛泽东、张闻天、博古、林伯渠、徐特立、凯丰、吴亮等相继讲话。毛泽东说：“中华苏维埃成立已很久，做了许多伟大惊人的事，但在文艺

创作方面，我们干得很少，今天这个中国文艺协会成立，这是十年来苏维埃运动的创举。”毛泽东又说：“要结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去，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

大会通过“会章”，选举丁玲、成仿吾、贾拓夫、王亦民、徐梦秋等16人为干事，组成干事会。李殷森代表“文协”会致了谢词。会议气氛十分活跃，在会上毛泽东讲的笑话和李伯钊唱的长征途中学来的少数民族的情歌，引得全场热烈掌声。

11月23日，中国文艺协会16名干事召开第一次干事会。会上推选丁玲为中国文协主任，王盛荣为组织部部长，王亦民为联络部部长，成仿吾为研究部部长，徐梦秋为机关编委主任。会议决定在《红色中华》出不定期副刊。

中国文艺协会成立后，徐梦秋在《红色中华》副刊创刊号上发表了《中国文艺协会的发起》，文中写道：“培养无产者作家，创立工农大众的文艺，成为革命发展运动中一支战斗的力量，是目前的重要任务。”

1937年1月，中国文艺协会召开第二次会员大会，参加的有50余人。经过讨论，对于写作研究、出版、联络组织等工作作了新规定。

3月1日文艺协会和新中华社联合集会，欢迎美国女作家史沫特莱到延访问。丁玲主持会议，并作了简短讲话。李殷森代表中国文协致欢迎词。史沫特莱发表了长篇自传式的讲演。

1937年5月，中国文艺协会召开座谈会，讨论由上海文艺运动引起的两个口号的争论问题，到会70多人，丁玲任主席。李殷森作了关于联合战线下的文艺运动的报告。

6月20日，中国文艺协会召开世界革命文学导师高尔基逝世周年纪念会。毛泽东出席了会议，他在讲演时赞许高尔基

的实际斗争精神与远大的政治眼光，指出他是一个革命的文学家。朱德、洛甫、周恩来、博古等同志先后讲话。徐梦秋报告文艺协会发展概况。

中国文艺协会从1936年11月在保安建立至1937年11月停止活动，历时一年时间，对边区的文化事业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协会联络了各地的文艺团体和各方作家，给广大对文艺有兴趣者提供了“一个舞台”。在中国“文协”的影响下，边区的文化组织像雨后春笋一样的出现，各种文艺团体迅速地建立起来。

组织编撰《二万五千里》

1936年8月5日，毛泽东、杨尚昆为出版《长征记》征稿，给各部队发电报、给参加长征人员写信：“现因进行国际宣传，及在国内国外，进行大规模的募捐运动，需要出版《长征记》，所以特发起集体创作。”征文中要求“各人就自己所经历的战斗、行军、地方及部队工作，择其精彩有趣的写上若干片段。文字只求情通达意，不求钻研深典，写上片段即是为红军做了募捐宣传”。1937年5月，丁玲被任命为红军历史征编委员会委员。随后她与徐梦秋负责编辑了30余万字的《二万五千里》一书。这是撰写红军长征历史最早的书。

领导西北战地服务团赴前线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发生，全国人民的抗日浪潮风起云涌。延安城内的抗日热情更是热火朝天，许多仁人志士先后奔赴抗日前线。

丁玲本是个充满热血的革命志士，在这民族存亡的危难时

刻，她忧心如焚。经认真考虑后她提议组织一个战地记者团，赴抗日前线采访报道。她们的口号为：“只要很少的人，花很少的钱，走很多的地方，写很多的通讯。”

这个消息传出后，抗大的同学们纷纷要求参加，要求扩大组织，很多人找丁玲要求加入。后来上级研究决定，将原拟组成宣传队的抗大四大队和正在准备成立的战地记者团合并，组成战地服务团。

毛泽东对成立这个团体非常重视，曾先后几次找丁玲商谈。毛泽东说：“这个工作很重要，对你也很好，到前方去可以接近部队，接近群众，宣传党的政策，扩大党的影响。你们在宣传上要做到群众喜闻乐见，要大众化，不管是新瓶新酒也好，旧瓶新酒也好，应该短小精悍，适合战争环境，为老百姓所喜欢，要向友军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扩大我们党和军队的政治影响。”毛泽东的这些指示，丁玲都向团员们一一作了传达。

8月12日，西战团召开成立大会，到会会员23人，全是22岁左右的热血青年。会上，朱光代表中宣部讲了西战团的任务，筹备经过和组织机构。并宣布了上级的任命：任命丁玲为该团主任，吴奚如为副主任。会议确定了西战团的性质，讨论通过了行动纲领、本团规约及成立宣言。并决定发一成立宣言和通电。行动纲领、成立宣言、通电、刊登在1937年8月19日的《新中华报》上。

该团还建立了党支部，吴奚如任书记，丁玲和陈克寒分别任宣传干事和组织干事。该团业务分为通讯、宣传两个股。宣传股长由陈明担任，分为戏剧、歌咏、演讲等组。通讯股专门采访战事消息。

8月15日晚，延安各界在大礼堂举行欢送西战团出发抗日前线的晚会，毛泽东出席晚会，并致词。他说：“战地服务团是一件大工作，因为打日本在国内在国外在世界都是一件大事，我们数年来要求团结一致抗日，在今天可以说已经实现了。这次战争可以说带有最后一次的意义，战地服务团随红军出发前方工作。你们要用你们的笔，用你们的口与日本打仗。军队用枪与日本打，我们要从文的方面，武的方面夹攻日本帝国主义，使日寇在我们面前从此覆灭下去。”丁玲在答词中说：“我们战地服务团的组织虽小，但是他好像小河流一样慢慢流入大河，汇聚着若干河的水，变成了一个洪流，我们誓死要打退日寇，如不达到此目的，决不回来与诸位见面。”表达了他们巨大的决心和坚定信心。

欢送会后，他们又做了40天的准备工作：第一，加强政治学习，讨论时事和理论。为此他们请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作专题政治报告，以提高团员们的理论政策水平。第二，组织演讲竞赛和辩论会，以提高宣传能力。第三，宣传内容的准备，主要是编排文艺节目，在40天内排演了十几个独幕剧，还有秧歌舞、大鼓、歌曲、相声、绘画等。为了提炼宣传内容，他们在延安街头演出征求各界人士的意见，再根据群众反映，不断改进、提高。

1937年9月22日，西北战地服务团40多人，打着红旗，唱着抗日歌曲，用7头毛驴驮着行李和演出用品赴山西抗日前线。

从此，这支精悍的队伍，顶烈日、冒严寒、爬高山、过大河，活跃在抗日前线。白天行军宣传，晚上演出，有时则日夜兼程。他们冒着枪林弹雨，表现出了惊人的毅力和高度的革命

热情。他们走一路，宣传一路。每次演出结束，观众们仍迟迟不肯散去。

西战团在山西逗留了6个月后，于1938年7月返回延安，在庆祝“八一”建军节的晚会上做了汇报演出，得到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高度赞扬。

在这6个月中，他们途经16个市县及60多个村庄，辗转3000余里。1938年丁玲又带领西北战地服务团奔赴国统区陕西潼关、西安等地进行抗日宣传演出。西战团到达西安后，丁玲主编了一套“西北战地服务团”丛书。年底回到延安马列学院学习。

西北战地服务团在丁玲的领导下，团结和带动培养了一大批颇有才干的文化人才。在工作中丁玲很注重发挥队员们各自的特长，听取他们的意见，有时也会对他们提出诚恳的批评，同事们常被她逗得愉快高兴。

丁玲在西战团中享有相当高的威望，人们尊重她，不仅因为她是一位早已在文坛上负有盛名的女作家，更主要的是因为她在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是一个不畏艰险的勇敢战士。

丁玲在西战团工作期间，与西战团宣传股长陈明建立了深厚的友谊。经过四年的磨炼考验，1942年他们在延安结了婚。此后在他们艰难的生活中，两人相亲相爱，同甘共苦，情深意长。

西战团活跃在晋察抗日前线及国统区，为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们用自己的血汗和生命实现了自己成立时的誓言。

丁玲在延安期间，先后写的小说有《压碎的心》、《泪眼模糊中的信念》、《县长家庭》、《入伍》、《我在霞村的时候》、

《夜》、《在医院中》等。这个时期她更多的是写散文，如《田保霖》、《三月杂记》、《记砖窑湾骡马大会》等散文。后来均收入《陕北风光》集里。

以上只是丁玲在延安生活战斗近十年的部分记录，更大量的时间，她生活在群众中。延安时期是她一生中很可贵、很幸福的一段日子，也是她创作的黄金时期。延安的十年为她后来的文学创作奠定了雄厚基础。

1945年日本侵略者无条件投降后，丁玲、陈明、杨朔于1945年10月，组成延安文艺通讯团离开延安前往东北。

（作者：延安革命纪念馆馆员）

李木庵与怀安诗社

马 琼

李木庵，原名振堃，字典午。1884年出生于湖南桂阳县一户殷实农民家庭。他于1925年夏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地下活动期间用过靖康、蔓园等名字，30年代改为木庵。李木庵1941年到达延安，曾担任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等职。

1941年9月5日，陕甘宁边区宴请延安诸老。席间，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倡议成立怀安诗社，李木庵与谢觉哉、高自立、鲁佛民等与会者齐声赞同，林老即席赋《延水集》两首，拉开了诗社活动的序幕。两天后，《解放日报》以“延水雅集”为题，刊登了诗社成立的消息。

诗社定名“怀安”，取“老者安之，少者怀之”之意，体现了革命圣地延安及陕甘宁边区各抗日根据地是中国人民的希望所在。诗社公推李木庵任社长，主持诗坛，汇集佳作。

关于诗社的宗旨，李木庵在他主编的《怀安诗刊》的序言里写道：“一国兴亡，视乎民气；民气升沉，系于士志，士志激越，发飞心声。诗词歌曲，皆心声也。时至今日，四海横流，法西肇祸于西欧，倭寇逞暴于东亚。吾国积弱，首遭侵袭，大好河山，竟成破碎。国中志士，敌忾同仇，义愤所激，恒多泣血椎心，歌哭无地。西北为抗日民主根据地，五载以还，相率艰苦奋斗之中，不无慷慨悲歌之士，披襟述怀，吮毫

抒愤，情无间于儿女，而敷陈时艰，痛心国难，志不失为英雄。意切共鸣，言出自由，或创作，或译述，辞在雅俗之间，体无新旧之限。不以地囿，相应声同。积篇成帖，随期公布，俾草木天籁，合成巨响；涔蹄浅沼，汇为洪流，既可扬民族之性，亦以振中国之魂。则心声所及，国运可回；军歌与战鼓齐鸣，吟坛共战场并捷。直可辅翼武功，岂徒目为文艺！”说明诗社是与国家民族命运息息相关，为抗日战争擂鼓助威的业余文艺团体。

怀安诗社成立后的八年中，李木庵收集革命者的古风、近体、新诗、译诗 2500 余首。这些诗内容丰富，题材广泛，生活气息浓郁，战斗性很强。“怀安一炬火，光辉照人寰。”诗社在伟大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都发挥了战斗号角的作用。

怀安诗社成员有朱德、林伯渠、董必武、徐特立、谢觉哉、吴玉章、钱来苏、续范亭和熊瑾玎等。诗社社长李木庵曾对他们的诗作一一作过评论。他说“朱总司令的诗，辞气慷慨，规模雄伟”；林老的诗“置诸少陵，剑南集中，殆无逊色”；“谢老镕经铸典，以古利今，清词如海……”

李木庵和诗友们一道在改革旧体诗格律、订正诗韵、提倡通俗化方面，作了大胆的尝试。在李木庵的倡议下，怀安诗社的新作突破了一些旧的清规戒律，出现了旧瓶装新酒，律绝通韵，不拘对仗等比较灵活的形式，在通俗化、群众化方面，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李木庵收集、整理、保管的怀安诗社的诗稿，热情讴歌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赞颂延安及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斗争生活和光辉业绩，洋溢着革命的豪情，跳动着时代的脉搏。诗社历时八年，于 1949 年停止活动。诗稿原件于 1975 年 7 月 8 日由

延安革命纪念馆征集收藏，被定为一级文物。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诗稿被收入《十老诗选》、《怀安诗社诗选》、《怀安诗选》的集子中出版发行。李木庵的遗作，则被收入《窑台诗话》一书。

（作者：延安革命纪念馆馆员）

延安时期的几则婚礼

郝璐

毛泽东与江青

1938年8月，在鲁迅艺术学院任戏剧教师的江青被调至中央军委办公室当秘书，开始了她在主席身边工作的历史。同年11月初，经组织审查，两人共同生活。当时没有举行结婚仪式，只是分别邀请在延安的中央首长及亲友到凤凰山麓的窑洞内做客。因为只请了一位厨师，所以每次规模都很小，数人围坐一桌。客人们都知道主席请客的目的，但主席没有明说，大家也就心照不宣。江青坐在主席的身边，殷勤地敬酒夹菜。时年毛泽东45岁，江青24岁。婚后，江青仍以军委档案秘书的身份，照料毛泽东的生活。

邓小平与卓琳 孔原与许明

1939年9月初，傍晚，延安杨家岭毛泽东窑洞前，邓小平与卓琳喜结良缘。毛泽东、刘少奇、博古、张闻天及夫人刘英、李富春及夫人蔡畅等，同来庆贺。婚礼只是一个简朴的聚餐会，桌上没有什么山珍海味，仍是陕北小米饭，只不过增添了几个新鲜菜和几瓶喜酒。同时结婚的还有孔原和许明。豪爽的战友们把孔原灌得酩酊大醉。邓小平却安然无事。刘英感叹

地说：“小平的酒量真大！”张闻天笑着说：“里面有假！”原来，李富春和邓发暗下“手脚”，给小平倒的那瓶酒，装的全是白水。时年小平 35 岁，卓琳 23 岁。

贺龙与薛明

1942 年 8 月 1 日，贺龙与薛明结婚了。这一天，贺龙住的窑洞里，高朋满座，喜气洋洋。任弼时、林伯渠来了，高岗、陈正人、张帮英等西北局的领导人来了，贺龙的老部下王震、李井泉也都来了。林老举着一杯酒指着陈正人夫人说：“你这个红娘做得不错呀！他们俩同意结婚，我就来喝喜酒。老贺，祝贺你，我先敬你一杯。”薛明知道贺龙有胃病，不宜喝酒，那是贺龙的部下告诉她的。她马上接过林老手中的酒杯，一饮而尽。于是，大家就冲着薛明开起玩笑来。

没过几天，一二〇师战斗篮球队在贺龙的窑洞里接受毛泽东的接见。贺龙陪着毛泽东来了。这是薛明第一次同毛泽东见面。毛泽东向薛明拱拱手，笑着说：“薛明同志，好呀！恭喜恭喜！”贺龙在一旁微笑着。他能不高兴吗？在延安，他有了一位伴随终生的伴侣。延安的岁月，贺龙是难以忘怀的。

徐向前与黄杰

1946 年五四青年节，是徐向前和黄杰结婚的日子。关于婚礼的情况，当时给徐向前担任警卫的张双优有如下的叙述：

“那天是个假日，我陪首长走到苏井观部长家，有位女同志已先在那里，正和苏部长的爱人说话。后来，他们 4 人打扑克。苏部长的警卫员小王忽然问我知不知道首长今天来这里有什么事？我说不就是休息来玩玩呗！他唉呀一声，‘你们首长

今天是来结婚的呀！那位女同志是保育院的黄院长。’我赶紧给家里的同志打电话，叫他们快作准备。内心里直埋怨首长，这么大的事也不言语一声。当我跟随首长他们两人步行回到家时，见到大伙正在打扫屋子，首长笑着说了一声：‘嗨！小鬼！’”。

“婚礼”就是这么简单，这么平平常常。这正是战争年代革命家们成家的一個缩影。

黄杰，一位久经考验的革命老战士，湖北江陵人，在武汉军校女生队学习过，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松滋县第一任县委书记，组织领导过九岭岗暴动，后长期在上海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工作。1946年5月，任延安第二保育院院长。

刘伯承与汪荣华

1936年，第二、四方面军会师后，任弼时和夫人陈琼英对刘伯承非常关心。当他们知道刘伯承早与前妻失去联系，伤残的身体又无人照顾时，就介绍汪荣华与刘伯承结婚。从此，汪荣华这位1931年参加革命，从鄂豫皖长征到川陕的19岁的红军女干部，就成了刘伯承的亲密战友和终身伴侣。

（作者：延安革命纪念馆助理馆员）

中共中央机关遇险瓦窑堡

花海洋

东征战役胜利结束后，周恩来和中共中央机关一道于中国的传统节日——端午这一天撤离瓦窑堡，向保安进发。

这天早上，周恩来正利用行动前的一点时间批阅文件和电报。突然，从远处传来“呼！呼！”的几声枪响，周恩来立即抬起头来，顺着枪响的方向望去，想了解其中的原因。不多时，安定县委派人送来情报，说是枪声来自石湾方向，可能是在榆林驻扎的高双成部的人马，而且人数不少。游击队和赤卫队已和敌人接上了火，但由于我方此时以大刀和长矛为主要武器，无法与敌军长时间相抗衡，县委要求中央领导做好准备。

时任副参谋长的张云逸立即派人将这一情况报告给周恩来。

周恩来得知这一情况，随即说了一句：“这里没有防备，他倒来了。”这一突变的事件使他对党中央、毛泽东的安全撤离担忧。

自从6月14日做出撤离的决定后，在周恩来亲自部署下，红军在瓦窑堡部队已全部开赴新的地点，在这里的兵力共有两个班的人马，要拒敌于城外是没有任何可能。为了让党中央机关人员及早脱离险境，周恩来让警卫员贺清华同志叫醒因彻夜工作此时正在酣睡的毛泽东，催促毛泽东立即动身撤离，自己

和张云逸、陈友才等人负责掩护工作。

毛泽东走后，周恩来得到确切情报，今日来犯之敌正是高双成部的一个炮兵营，营长张云衢。因该营无炮而骡马众多，人送绰号“骑兵张”。

正在指挥战斗的张云逸见毛泽东已经撤离，要求周恩来也尽快转移，但周恩来不同意把危险留给自己的同志，决心和大家坚持到最后一刻，并命令陈友才等人不要恋战，尽快转移。

周恩来、张云逸和陈友才他们摆脱了和敌人的正面接触后，走到离瓦窑堡不远的红石峁山，忽然看见从山顶上下来十几个身背长枪的敌人。此时如果和敌人交战，虽能将这股敌人全歼于这里，但会引来正在瓦窑堡的大批敌人，中央机关和毛泽东的安全将会受到极大的威胁，其后果是难以想像的。周恩来当机立断，命陈友才带领一个班的战士进占沟右侧的高坡，做好应急准备。值得庆幸的是，这股敌军此时的目标是如何能掳到百姓更多的财物，并没有发现正在沟底转移的中央机关人员。周恩来等人最终安全地来到了保安县。

周恩来和党中央机关在毫无抵御能力的情况下，突破敌一千多人的突然袭击而安全转移，虽说是险象环生，但也暗示了只是一群乌合之众的蒋匪军，其走向失败的命运是必然的。也体现了周恩来等人临危不惧、敢于赴难的精神是国民党中无人能及的。

（作者：延安革命纪念馆馆员）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国外

孙凌云

世界上最早翻译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国家是朝鲜。1945年12月，朝鲜咸境南道就译出了单行本。第二年，朝鲜文学艺术总同盟还组织了专门的学习讨论会。1946年8月，南韩汉城大学中国文学系也译出了《讲话》，那里的进步文艺界还成立过“地下文艺研究会”，学习、研究《讲话》。

日本也是最早翻译《讲话》的国家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结束，就有了日译本《讲话》全文。至今已有六七种译本。五六十年代，不少进步剧团和作家团体就多次组织过集体学习；早稻田大学的一个学生组织“中国文学研究会”，还把《讲话》列为首要研究课题。

1950年左右，《讲话》在印度出版。在苏联，《讲话》最初也一直得到肯定和推崇。新中国成立后，《讲话》开始在西方陆续出版。最早由“彼埃·西盖尔”出版公司出了法译本，不久即流传开来，有了西班牙文和葡萄牙文译本。民主德国在1949—1952年发行过三种译本。美国1950年由国际出版社出过单行本，在此以前纽约的《工人日报》曾摘译登载过。50年代，英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意大利、匈牙利、古巴、巴西等十多个国家就有了译本。

（作者：延安革命纪念馆管理员）

《为人民服务》与张思德

冯 勇

在延安枣园村的西山脚下，一块绿树环抱的土台旁边立着一块石碑，碑上刻有“为人民服务”五个大字。这就是1944年9月8日毛泽东为悼念张思德同志而发表《为人民服务》讲话的地方。也就是从那天起，张思德的名字便与共和国的钢铁大厦凝为一体。是的，张思德——一个响亮的名字；他曾引出一篇影响深远的讲话，引发全体中国共产党党员对全党最高宗旨的思考。

1915年，张思德出生于四川省仪陇县的一个佃农家中。他和同处黑暗势力压迫下的所有佃户的孩子一样，在为地主打工干活中度过了艰难的少年时代。1932年中国工农红军来到四川，在当地打土豪，斗地主，刚满17岁的张思德报名参加了红军，走上了为天下老百姓谋幸福的道路。儿行千里母担忧，临行前夜，母亲找出积攒了多年的碎布头为儿子缝了一件土色花肚兜。她对儿子说：“娃子，你拿上了枪杆子，以后可得多为咱们这些人办事呀！”望着泪流满面的母亲，张思德默默地点了点头，他心里明白母亲说的“咱们”就是天下受苦的老百姓。他穿着那件土色肚兜带着母亲的叮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走进了通信班，走进了警备团……

到达陕北后，生活十分艰苦，但张思德从没有忘记自己的

出身、忘记母亲的叮咛。每到一处总是和当地的老百姓打得火热，练兵闲时帮助老乡们干这干那。虽然在语言上差别很大，但乡亲们提起张思德这个“四川兵”没有一个人不喜欢。大家伙经常在一起干活、拉家常，亲得就像一家人。有一天一位战士在路过老乡家菜地时顺手摘了地里的一根黄瓜吃，正好让张思德看见了，这个平日说话和气，从不和人红脸的汉子此时判若两人，他走上前去对那个战士大声训斥，还非要他给老乡赔钱。事后张思德找到了老乡家，主动代那个士兵向老乡道歉。老乡越听越糊涂，原来这件事他压根就不知道！张思德对工作认真，对同志更是热心。1940年张思德来到了姚店担任警卫营通信班长。姚店距延安城25公里，当时，送信全靠人的两条腿，但这两年中张思德以身作则，带领全班战士克服重重困难，出色地完成上级交给的每项任务。在平凡的工作中体现出对工作极端负责的精神。一天傍晚，通信班突然接到了紧急任务——将一封急件连夜送到王家坪总参谋部。为了能让劳累了一天的战友们多休息一会儿，张思德将刚解开不久的绑腿重新打好，装好信件消失在夜色中。走到半路时，下起了大雨，他既没有雨具，又没有躲雨的地方。为了保证信件不被雨淋湿，张思德干脆脱下了鞋将信放在鞋壳里，然后将两只鞋扣在一起夹在腋下，光着脚板深一脚、浅一脚地跑了50多里路。信完好无损地送到了，可是张思德的双脚却被山石割得伤痕累累。

张思德为了党的事业，为了广大人民的利益，为了完成母亲的嘱咐，一切听从党的安排，无论组织如何安排，他都是以满腔热情投入工作。1944年为了解决中央机关冬季取暖的问题，中央办公厅总务处抽调了一批同志到安塞县石峡峪山中烧木炭，张思德被邀请去当技术指导。9月5日那天下着毛毛细

雨，为了早日完成任务，张思德和战友们冒雨挖炭窑。突然窑顶土层松动，马上就要坍塌。张思德用力将不知所措的战士小白推出窑口。一声巨响，张思德被两米多厚的黄土吞没了。“张思德、张思德”，小白拖着受伤的双腿用手奋力地刨着黄土，呼喊着他的名字。战友们闻声赶来从黄土中刨出了张思德的遗体，战友们都边哭边喊着张思德的名字，然而他们的好战友，好兄长——张思德已经听不到了。

就这样，张思德——一位 29 岁的普通战士，走完了他平凡而又光辉的一生。

噩耗传来，毛泽东十分沉痛。他指示说：“第一，把张思德的遗体洗干净，换上新衣服；第二，打口好棺材；第三，要举行追悼会，我要参加，要讲话。”

9月8日，就在这土台子旁，追悼会隆重召开，毛泽东亲笔题写了“向为人民利益而牺牲的张思德同志致敬”的挽词，并发表了《为人民服务》的讲话。他说：“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的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毛泽东同志那深沉又昂扬的声音，在人们的心中久久地回荡……

半个多世纪已经过去了，英雄们都相继离开我们。可是朋友，如果当您被金钱、地位、权势所困扰的时候，您不妨到枣园西山脚的土台旁走一走，站一站，感受张思德的崇高人生和主席那具有深远意义的讲话，您的灵魂一定会得到洗涤。

（作者：延安革命纪念馆助理馆员）

《兄妹开荒》之原型——马杏儿父女

钱竹梅

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创作的秧歌剧《兄妹开荒》，不仅在当时深受边区军民的喜爱，就是今天许多人也能哼上几句。然而，这部秧歌剧的创作原型——马杏儿父女却鲜为人知。

马杏儿父女原籍米脂杨家沟，1941年马杏儿与父母及三个弟弟逃荒来到延安，住在延安的南三十里铺。1942年春天，父亲马丕恩与边区农场合伙种了53垧地，当时马杏儿年纪只有17岁，她和父母一样，憨厚老实，干起活来非常卖力，每天鸡叫后就和父亲一起下地干活，晚上点灯才收工回家。她光着脚片，翻山越岭，开荒种地，在劳动中表现的非常活泼，总是边劳动边唱歌，有时还同一些年轻小伙子比赛锄草，一步也不肯落后。收割时她总是笑眯眯地把一捆捆庄稼从老远的地里背回家。经过她与父亲辛勤劳动，年终打了50石粮食，一年就使全家人过上了丰衣足食的生活。

1943年3月20日，马杏儿父女被边区政府授予劳动英雄称号，受到边区政府、建设厅、延安县政府、抗援会、南区区委、南区合作社等组织的奖励。边区政府号召全区妇女学习马杏儿父女艰苦创业支援前线的模范事迹。由于她们的先进事迹突出，马杏儿父女的名字一村又一村地流传开来。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王大化、李波、路由根据马杏儿父女的模范事迹创

作了秧歌剧《兄妹开荒》，演出时受到边区军民的热烈欢迎。几十年来，依然为中国人民所喜爱。

（作者：延安革命纪念馆馆员）

冼星海在延安

张国全

1938年秋天，武汉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给冼星海送来一封信，信封上写道：“聘书一件致冼星海同志”，落款是：“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他急忙抽出聘书，只见上面用工整的隶书写道：

冼星海同志：

兹聘请同志担任本院音乐系教授。此致，民族解放敬礼。

院长 沙可夫

中华民国二十七年九月二十日

信的正文热忱地欢迎冼星海来延安教学，落款处有音乐系全体师生三四十个人的亲笔签名。此刻的冼星海，仿佛看到三四十张热情的面孔，他的心儿早已飞到了延安。

一、初到延安

1938年11月3日11点半，冼星海和他的夫人钱韵铃乘着一辆华侨捐赠的运送药品的救护车到达了延安。下了车，冼星海敞开胸膛深深地呼吸着。他觉得这里的一切正如自己所料，是一个向上的新鲜的世界。他就像吃奶的孩子看到了自己的母亲，又像个登山运动员在严重缺氧的情况下，突然获得了

足以维系生命的氧气。他贪婪地呼吸着，仿佛每一把泥土都在散发着诱人的香味。

当天，冼星海和钱韵铃被临时安排在西北旅社。这是当时最上等的旅社，宽大的窑洞，通透明亮。下午，沙可夫院长，音乐系主任吕骥陪着冼星海参观了鲁艺。一张张热情的笑脸，一阵阵热烈的掌声，一双双热乎乎的大手，像甘露春雨，滋润着冼星海那被国统区的人情世故折磨得几乎干枯了的心田。他激动得眼睛湿润了。他感受到了师生们一颗颗真诚的心。从学员的笑脸上，他看到了他们强烈的求知欲望。

晚上，由于旅行的疲劳，没过几分钟钱韵铃就睡着了。冼星海为她掖好被角，轻轻地走出旅社，独自领略着延安初冬的夜色。虽然寒气已经袭人肌肤，但冼星海的心却是热乎乎的。只见那一排排半圆形窗口，透过雪白的窗纸闪着迷人的光亮。远眺东南，可以从淡淡的朦胧夜色中，显出深黛色的宝塔山轮廓。延河的潺潺流水，像是一首永远也唱不完的歌，缓缓地流淌着。眼前的一切，使他激动、兴奋。他没有睡意，也忘却了疲劳。他被一种理想的环境、同志的友爱所激动着。

冼星海上任以后，就投入了忘我的工作。他把每天的时刻表排得满满的，除了睡眠以外就是学习、接待客人、备课、创作与教学，即使是休息吃饭的时间，他也不轻易放过。

11月20日的清早，当第一缕阳光射进窗口的时候，冼星海已经开始写作，韵铃也在房门口翻阅着《政治常识》。突然，日本飞机轰炸来了。冼星海拉着韵铃刚刚走出房门准备到防空壕去躲一会儿，炸弹就在头上丢下来了。他俩赶忙卧倒。还好，炸弹在前面炸开，房子被炸塌了，他俩安然无恙。

这是延安第一次遭轰炸，城里成了一片废墟。敌机走后，

硝烟未散。冼星海带着妻子回到旅社，稍稍收拾了一下东西，当天就搬到了鲁艺山上的一个旧窑洞里。

对于窑洞，冼星海后来有一段回忆：“从前我以为‘窑洞’又脏又局促，空气不好，光线不够，也许就像城市贫民的地窖。但是事实全不然，空气充足，光线很够，很像小洋房。不同的只是天花‘板’（应说‘土’）是穹形的。后来我更知道了它冬暖夏凉的好处。”

在延安，冼星海很快就习惯了这里的一切。他很乐观，也很愉快。“生活既安定，也无干扰，更无拘束。”这几句话简直成了他的口头禅。他还经常手里拿着一根打狼棒，提着马灯，在晚饭后外出教唱歌，每次要走十几里，甚至几十里的山路，回来时往往已经到了深夜。然而每次夜间回来，老远就可听到他的歌声。有人写了一首打油诗赞道：

马灯闪闪亮，
肩扛打狼棒。
歌声飞到鲁艺来，
星海还在山坡上。

要说冼星海的课，那是没得说的，学员们都很爱听。上课时间往往要延长许多。有一天，星海讲授《音乐指挥》，本该休息了，但学员们都说疲倦，要继续听下去。星海就一直讲到深夜，讲到天明才罢。

二、“二月里来”不胫而走

12月9日这一天，在抗大第三队操场上召开了纪念“一二·九”大会。这时，虽已天寒地冻，但人们心里都十分火热。冼星海正在台下教唱《一二·九纪念歌》，突然，一个高大的身

影出现在主席台上，操场内外立即爆发出热烈的掌声：毛主席来了！冼星海看到主席魁梧的体态，慈祥的笑脸，激动得脸都红了。他的视线紧紧追随着毛主席的身影：主席穿着一套灰色土布棉军装，头顶大耳棉帽，脚穿一双黑布鞋。军装的袖口绽出了棉花，两个胳膊肘上打着补丁。冼星海在来延安之前，曾经想过，革命部队再艰苦，但像毛主席这样的领袖人物，生活上与一般同志总有些不同吧，事实却不然。当他来到延安，就听到许多传奇般的传说：主席睡的炕上，只有一套普通的粗布被褥，连个枕头都没有。只是在薄薄的、仅有几件衣服的包袱下面垫几本书，或者干脆卷起棉衣来当枕头。这种艰苦朴素的生活，使冼星海十分感动。他见过多少国内外的达官贵族、军阀官僚，又有哪一个领袖人物像毛主席这样与士兵同甘共苦啊！

毛主席在大会上讲了话。号召大家开展大生产运动，自己动手，克服困难。主席的话既具体，又明了，仿佛使冼星海得到了灵感上的启迪。他发现音乐上许多过去无法解决的问题，在这一刹那竟得到了解答。

纪念会开完后，操场上只留下了冼星海和塞克两个人。他们一个是词作家，一个是音乐家，便很自然地凑在一起，似乎都有一种难以抑制的创作冲动，也都想为边区的大生产运动写些作品。这天，他俩简短地商量了一下，便把《生产大合唱》的艺术构思统一了起来。

一连几天，冼星海都在为《生产大合唱》作准备。他使自己埋头于大量的民歌整理工作之中。他把搜集到的民歌，分成西北、东北、西南、中南、华北等不同地区、不同风格的几大类。饭后又捧着小本子，找一些外地刚来延安的同志：“请你

唱段你家乡的民歌好吗？”真像个贪得无厌的牛犊，拼命地吮吸着民间音乐的丰富营养。

春节这天，冼星海正在贴对联。上联是“春光明媚开展大生产，”下联是“秋谷金黄支前打胜仗，”横批是“齐心抗日”。塞克走来，把一叠稿纸交给了钱韵铃。冼星海贴好对联，捧着这份《生产大合唱》的歌词，渐渐进入了一个既陌生又熟悉的环境，他仿佛站在风和日暖的山坡上，静静地俯视着春山野景。老农在耕着地，妇女小孩在播种，忽然一个提篮的妇女来了，她在唱，啊，这是一首新鲜、优美而又具有南方民歌特征的调子。冼星海匆匆在词页上记下了音符，自己吟哦了几遍，便放开了喉咙：

二月里来呀好春光，
家家户户种田忙！
指望着今年的收成好，
多捐些五谷充军粮！

.....

谁料，《生产大合唱》还没写完，“二月里来”已不胫而走，传出去了。

那是在春节过后，毛主席带着锄头，在自己的山坡上开荒地。这时，一批中央党校的学员正往杨家岭后沟山上去生产。经过沟口，看到毛主席正在开荒种地，他们感动得一齐给主席鼓起掌来。主席站起身来，微笑着向大家招手。不知是谁起了个头，大家唱起来了：

二月里来呀好春光，
家家户户种田忙！
种瓜的得瓜呀种豆的得豆，

谁种下仇恨他自己遭殃！

……………

加紧生产呀加紧生产，

努力苦干努力苦干！

我们能熬过这最苦的阶段，

反攻的胜利就在眼前！

毛主席为这首最新、最美并且具有现实意义的歌曲鼓起掌来。受到毛主席的鼓舞，这首歌越唱越响，它等不及春天的到来，便传遍了陕北的高原。

三、毛主席连说几个“好”

1939年3月26日，冼星海开始写《黄河大合唱》。据光未然回忆：1939年春天，我在晋西游击区坠马受伤，到延安诊治，抗战演剧第三队的同志们伴送我回到延安。三队需要新的演出节目，冼星海也提议再来一次合作，催之不已。我便把两次渡黄河及在黄河边上行军时本来要写的一首诗，改写成大合唱的歌词。躺在病床上口授，由友人笔录。用五天时间写成后，当晚请来冼星海，开了个小小的朗诵会，并把写作的动机和意图讲给他们参考。冼星海听后站起来说：“我有把握把它写好！”后来我们每天早上派人去探问晚上的成果。这样，每次带回一支新曲，并授权我们：“可以随便地改。”像《黄河颂》、《黄河怨》，我们挑剔较多，他都全部推翻进行了重写。

3月31日，经过六天六夜的奋战，冼星海完成了《黄河大合唱》的写作。这是一部杰出的、影响极大的合唱，也是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最优秀的一部大合唱。

5月11日，鲁艺举行周年纪念第一次音乐会，正式公演

《黄河大合唱》。合唱团 100 余人，伴有乐队，演得相当成功。冼星海在日记中写道：“今晚的大合唱可真是中国空前的音乐晚会。里面有几首非常动人的曲子：（一）《黄河船夫曲》；（二）《保卫黄河》；（三）《怒吼吧，黄河》；（四）《黄水谣》。当我们唱完时，毛主席都跳起来，很感动地说了几声好。我永远不会忘记今天晚上的情形。我是很严格地、热情地去指挥歌唱队。”萧三也记述当晚的情形：“尤以光未然作词、冼星海作曲的《黄河大合唱》为最出色。这是一部巨大的作品，共分八部，很有气魄。”“在延安——边区和在大后方以及全国各地的人听着这首大合唱的时候，都为中国有这样的音乐而自豪！冼星海同志不愧为人民的音乐家。”

7月8日，鲁艺为欢迎从重庆回来的周恩来副主席，举行了一场文艺晚会，会上又一次演出了《黄河大合唱》。演出结束时，周副主席笑吟吟地走上舞台，握着冼星海的手说道：“冼星海同志，祝你成功！”说完，便亲笔题词：“为抗战发出怒吼，为大众谱出呼声。”

后来，全国文艺界人士纷纷撰文盛赞《黄河大合唱》。

郭沫若说：“星海兄去延安，大后方的一切声音差不多都沉没了。而《黄河大合唱》却和黄河之水天上来的一样，从北方吼唱了起来。这是人民的声音，使得好些人民的叛徒们听到后发出了战栗。”又说：“《黄河大合唱》是抗战中所产生的最成功的一支新型歌曲。音节的雄壮多变化，使原本富于情感的词句，就像风暴的浪涛一样，震撼人的心魄。作词的光未然兄，我们今后还可以多多领受他的创作。但作曲的冼星海兄可惜在前年已经在莫斯科病死了。这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损失。”

茅盾说：“我所听到的《黄河大合唱》，据说是小规模，

然而参加合唱的人数已有三百左右。朋友告诉我，曾经有过五百人以上的。”“是开了我的眼界，这使我感动，老觉得有什么东西在心里抓，痒痒的又舒服又难受。”“它那伟大的气魄自然而然使人鄙吝全消，发出崇高的情感，光是这一点，也就叫你听过一次就像灵魂洗过澡似的。”

萧三说，听《黄河大合唱》，台上“一时作船夫的挣扎，一时作河东父老的哀鸣，最后作黄河的怒吼。歌声时而呜咽，如泣如诉，时而悠悠然，如读悠闲的田园诗，最后直感到黄河之水天上来，滚滚白浪滔天，波浪万丈汹涌，到了这里，我对作曲者冼星海同志真是五体投地了！他的气魄是如此之大，他的才能是如此之高，他的创造力是如此的丰富。”

何其芳说：“我听了冼星海同志的《黄河大合唱》，感到那是一个惊心动魄的有力的作品。虽说对于音乐我几乎近似聋子，连听音乐的训练我都缺乏，但这个合唱却深深地震慑了我。”

周巍峙说：“在1940和41两年间，《保卫黄河》成了群众大会（工人的、农民的、士兵的）每次必唱的歌曲。它的轮唱部分特别使群众喜爱，他们把它的主调唱成三部、四部的轮唱，而且由此影响到许多乡村剧团和连队，以后竟把许多齐唱曲按照《保卫黄河》的格式改编成轮唱曲。”

总之，《黄河大合唱》是十分成功的。她是划时代的作品，是中国革命民族音乐的杰出代表，她创造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形象，把民族精神提到了空前的高度。一些西方国家的友好人士也把她称为盖世佳作。

1939年6月14日，冼星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0年5月，冼星海受毛主席委托乘飞机到了西安，然

后改乘苏联飞机，直达莫斯科，化名黄训，去完成一项特殊的任务。黄是他母亲姓，训是他岳母的名。但是，谁也没有想到，5年之后的1945年10月31日午夜12时，冼星海同志却逝世于克里姆林宫医院的病榻上。噩耗传到延安，鲁艺师生和延安各界代表悲痛不已，犹如延河流泪，黄河呜咽。毛主席为冼星海同志题写了一幅挽联，上面写道：

为人民的音乐家冼星海同志志哀！

（作者单位：民盟延安市委）

三位书记与两个馒头

花海洋

1947年3月，蒋介石在全面进攻失利的情况下，又派出他的得意门生——胡宗南率23万人马，向陕甘宁边区气势汹汹地扑了过来。

当时，驻陕甘宁边区的我西北野战军共有两个纵队六个旅2万多人，形势十分严峻。为了把国民党的这支精锐部队拖在陕北，用一个延安换取一个全中国，党中央撤离了延安，转战陕北，伺机消灭国民党的有生力量。

一天晚上，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同志转战到了子洲老君殿西边的一个小山村里。周恩来住下后，顾不得扫去一天来落在身上的灰尘就开始埋头处理文件。这时，一名警卫员给他端来了一碗小米稀饭和两个用报纸包着的馒头。在极度困难的环境里，有两个馒头放在眼前是多么招人眼热啊。周恩来放下手里的笔，瞟了一眼放在跟前的还微微冒着热气的馒头，问道：“大家都有馒头吃吗？”警卫员回答说：“没有。”周恩来又说：“那，这两个馒头是从哪儿弄来的？”警卫员说：“是路过老君殿时候买的。”周恩来推开桌子上的文件，看着警卫员，又问：“就买到两个吗？”警卫员点头回答说：“由于兵荒马乱的，馒头馆暂不开张，说只剩两个了，所以就只买来两个，您没日没夜地工作，身体又不好，给您补补身子。”

周恩来听了警卫员的话慈祥地笑着说：“你看，我的身体不是很好嘛，用不着补的，你还是马上给毛主席送去，他才最需要增加营养。”

警卫员看着周恩来因过度劳累而日渐消瘦的脸，双眼不由得湿润起来，他很想把这两个馒头让周恩来留下，但他深知周恩来的脾气，在个人问题上一旦做出了决定，即使再说也无用，便端起馒头给毛泽东送去。

毛泽东见周恩来的警卫员送来了馒头，高兴地问：“周副主席吃过了吗？”由于这位警卫员生平第一次撒谎，回答出的话在迟疑中带着结巴，“吃，吃过了。”毛泽东信以为真，拿起馒头看了看。他想既然只送来两个，说明馒头的数量极为有限，说不定是仅有的两个呢，弼时同志有病，馒头应该让他吃才对。见周恩来的警卫员已经走了，便让自己的警卫员给正在病中的任弼时同志送去。

任弼时接到这两个馒头后，考虑到周恩来经常通宵达旦地工作，身体今不如昔，便派警卫员又原封不动地给周恩来送去。

周恩来见这两个馒头又原本照旧地放在了自己的桌子上，不由得胸中涌出一股暖流。这个时候，又如何能咽下去这诱人的馒头呢？于是，他让任弼时的警卫员带回去一个馒头，另一个送给了毛泽东。

三位书记互让两个馒头的故事，虽然是领袖们在一生中的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但可以通过它了解到伟人们互相关心的可贵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作者：延安革命纪念馆馆员）

为毛泽东借皮鞋

窦崇贵

贺清华是延川县永坪镇人。他从1936年到1947年，一直给毛泽东当警卫员。对毛泽东在延安时生活方面的故事，他不但知道的多，而且非常具体、真实感人。所以，我们为了能够掌握毛泽东在延安的革命活动和生活故事，曾多次访问过贺清华。有一次，他给我们讲了给毛泽东借皮鞋的故事。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一面派军队到东北、华北抢夺胜利果实，一面连发三次电报，假惺惺地邀请毛泽东到重庆进行和平谈判。毛泽东置个人安危于不顾，毅然决定赴重庆谈判。

一切准备工作就绪以后，中央办公厅的同志们为领袖赴重庆着装而发愁。因为，毛泽东要直接与蒋介石谈判，还要见很多国民党要人和一些著名的民主人士及许多社会名流，总不能再穿补丁衣服去谈判吧。后来决定给毛泽东做一套延安生产的土呢子衣服。但是鞋子的问题难以解决，因为延安当时还不能生产皮鞋。后来，毛泽东身边的一位工作人员说他看见办公厅一位工作人员，前几天刚从外地回来，穿着一双新皮鞋，大小可能正合毛主席的脚，能不能借给主席穿。大家觉得这个办法好，就和那位有皮鞋的同志商量，那位同志慷慨地同意了。就这样，皮鞋问题得到了圆满的解决。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一行人乘汽

车由枣园出发向飞机场驶去。车行到清凉山下丁泉砭处，细心的周恩来觉得毛泽东借用苏联医生米大夫来延安时戴的那顶帽子有点小，便把自己头上戴的礼帽换给毛泽东戴上。

1945年10月11日下午1点钟，毛泽东由张治中陪同，安全回到延安。毛泽东走下飞机，面对4000多欢迎的群众，发表了简短的讲话，并请张治中先生讲话。张治中拍了一下胸脯说：“我把毛主席迎接到重庆去，今天又负责把他送回来，这对得起大家吧。兄弟的责任尽到了，我也感到光荣。”

（作者：原延安革命纪念馆职工）

首届中国青年节

霍志宏

1939年3月18日，中共领导下的全国青年团体的最高领导机关，西北青年救国会（简称西青救）召开常委会。决定把5月4日作为中国青年节。4月5日，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关于纪念“五四”给根据地和大后方分别发出指示，要求对西青救的提议在各青年团体中宣传和讨论，并号召本年5月4日各地举行拥护中国青年节的运动及纪念西青救成立两周年。4月6日，八路军总政治部、中央青委联合发出《关于部队纪念“五四”青年节工作的指示》，要求以拥护青年节的运动为目标，以各种形式广泛宣传五四运动的救国精神，明确指出中央青委决定每年5月4日为中国青年节。4月13日，中国青年救亡团体联合办事处建议“五四”为青年节，得到全国各地青年团体的支持与赞助。

当时，国民党在广大青年群众的爱国热情极其高涨的压力下，也同意了这个决定。为纪念五四运动和宣传中国青年节，陕甘宁边区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宣传活动。4月28日，中共中央机关报《新中华报》刊出“五一、五四纪念特辑”，刊载了乔木《纪念中国青年节与国民精神总动员》、艾思奇《五四文化运动在今日的意义》和冯文彬作词、吕骥作曲的《“五四”青年节歌》。5月1日，《解放》周刊登载乔木《青年要发扬五

四爱国精神》，毛泽东也为该刊撰写了《五四运动》一文。

1939年5月4日下午6时，延安各界青年在抗日军政大学第五大队操场上集会，隆重纪念五四运动二十周年暨首届中国青年节。会议选举毛泽东、朱德、林伯渠、宋庆龄、李富春、沈钧儒、柯尔曼等10人为名誉主席团，冯文彬、艾思奇、胡耀邦、毛齐华、李昌、胡乔木、高朗山、刘光等23人为大会主席团。李昌致开幕词。毛泽东作了著名的演讲，即收录在《毛泽东选集》中的《青年运动的方向》，1939年6月1日出版的《中国青年》第三期发表时题为《在延安五四运动二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演讲》。他首先指出：“现在定了五月四日为中国青年节，这是很对的。‘五四’至今已有二十年，今年才在全国定为青年节，这件事含着一个重要的意义。就是说，它表示我们中国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人民民主革命，快要进行一个转变点了。”他总结了我国革命与五四以来青年运动的历史经验，指出了中国青年运动的方向，那就是“全国知识青年和学生青年一定要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这一光辉思想，至今仍在教育和激励着我国青年。他还热情地称赞了延安的青年运动，指出“延安的青年运动是全国青年运动的模范。延安的青年运动的方向，就是全国的青年运动的方向”。这个演讲发展了马列主义关于青年运动的思想，成为指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时期中国青年运动的纲领性文献。毛泽东报告刚完，几个强健的青年高举火炬，由会场北端出现，奔驰而来，全场起立欢呼。跑步绕场三周，至主席团前向毛泽东敬献锦旗，锦旗上书“献给我们最敬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中书“新中国的火炬”六个大字，下书“延安市全体青年敬献”。与此同时，一名女青年高声朗读献词，表

示：“一定要用自己一切力量去实现您向我们青年所指示的任务——把自己的工作与工农民众结合起来，到民众中去，变为民众的宣传者和组织者！”毛泽东微笑着举手向台下青年答礼接旗。献旗仪式后，冯文彬、抗大代表、工人学校代表先后讲话，通过大会宣言和提案。会后举行了欢乐的篝火晚会，中央党校、马列学院、印刷厂表演了秧歌舞和生产舞，鲁艺冼星海指挥演唱了《生产大合唱》，抗大表演了国术。

后来，国民党畏惧青年学习“五四”的革命精神，改定3月29日（黄花岗烈士纪念日）为青年节。而在中共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内则继续以5月4日为青年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于1949年12月正式宣布以5月4日为中国青年节。

（作者单位：延安市政协）

张治中三到延安

白富平

抗战胜利后，为了国内的和平、团结，张治中曾三次来到延安。

首次来延安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为了夺取抗战胜利果实，消灭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和根据地，采纳了美国大使赫尔利的策略，于1945年8月14日、20日、23日，给延安连续发了三封电报，邀请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到重庆谈判。

8月25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延安召开会议，研究毛泽东去重庆谈判的问题。毛泽东权衡利弊，决定应蒋介石之邀，亲去重庆与蒋介石谈判。

当晚，毛泽东给美军中国战区司令复电：“鄙人承蒋委员长三次电邀，赫尔利大使两次表示愿来延安，此种诚意，极为心感，愿欢迎赫尔利大使来延面叙，鄙人及周恩来将军可偕赫尔利同机飞渝。”

毛泽东去重庆进行谈判的电报打乱了蒋介石原来的构想，他只好把假戏唱到底，即派张治中和赫尔利到延安接毛泽东等中共代表团来重庆谈判。

1945年8月27日，张治中、赫尔利乘机抵达延安。毛泽

东、周恩来、朱德、林伯渠等人亲自到延安新修的机场迎接（机场是为了迎接张先生他们新修的）。下机后张治中与中共领导人一一握手，互相问候，互致敬意。

张治中和周恩来同乘一辆汽车从机场到枣园。当日晚，赫尔利和毛泽东谈了些有关重庆的情况。

张治中应邀在周恩来的窑洞内商讨毛泽东到重庆的安全。在谈话中周恩来直截了当地说：“我最担心的是毛泽东的安全问题。”张治中说：“苏、美两个大国的领导人都对蒋委员长做了工作，他们都能保证毛先生的安全，我看不会有问题。”周恩来说：“文白兄，他们担保是担保，但我们不能大意，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张治中说：“毛先生住别的地方你不放心，我可以把桂园腾出来，让毛先生住。”周恩来说：“住在你的官邸当然好！桂园在上清寺，这距我的住处曾家岩 50 号很近，离红岩新村也不远，位置适中又在马路边上，汽车进出也很方便，只是苦了你一家人，让嫂夫人和孩子们住哪儿？”张治中笑了笑说：“那好办，重庆那么大，在哪找不到一处房子。”周恩来提出保卫的问题，张治中说：“保卫人员不成问题。平时我的桂园就住有政治部警卫营一个手枪排，这些人都是我的家乡子弟兵，一个排不够用，可以再调人来。”周恩来听了略作沉思说：“这样当然放心，但有另外一个问题不知你想过没有，万一发生任何一点事故，责任都是你治中的了，我想你把保卫任务推给宪兵司令张镇，你的人可以换成便衣，做内部保卫。”两个人还就谈判中可能遇到的问题交换了意见。

8 月 28 日上午，周恩来、赫尔利和张治中等人陪同毛泽东登上了飞往重庆的飞机，离开了延安。

第二次到延安

国共谈判是曲折、紧张、复杂的，谈判多次濒于破裂。在40多天的谈判中，张治中殚精竭虑，功不可没。

9月29日，周恩来主动去拜访张治中，商谈毛泽东回延安之事。周恩来说：“文白兄，毛主席来重庆已经一个多月了，谈判的协议已基本通过，毛主席想早点回延安。”

张治中问：“毛先生预定哪一天回延安？”周恩来说：“预定十月一日走。”稍停又说：“让毛主席一个人走，我们可不放心啊。”张治中说：“恩来兄你放心，我既然接毛泽东先生来，当然要负责安全地将毛先生送回去。但10月1日不行，我的活动时间和日程已安排满了。要在10月10日后才成。”

10月8日上午，张治中通知周恩来：“蒋主席同意毛先生《纪要》签字后回延安，并用蒋的专机‘美龄号’送毛先生回延安。但有个新情况，蒋主席要我在《纪要》签字后立即飞兰州，去新疆解决伊犁地区的问题。”周恩来说：“只派专机，没有政府的人陪送，毛主席的安全还是没有保障，你能不能先送毛主席回延安，再飞兰州去新疆？”张治中当即答复说：“可以，不过还要请示蒋主席批准。”当天下午，张治中得到蒋介石的批准，先送毛泽东回延安，再飞兰州。周恩来对张治中说：“这样我才觉得对毛主席的安全放下了。”张治中对周恩来说：“我能亲自送毛先生回延安，感到非常荣幸。”

10月8日晚上，张治中在林森路国民党军委大礼堂举行盛大鸡尾酒会，为毛泽东送行。应邀参加这次宴会的有国民党军政要员和各界知名人士数百人。毛泽东首先讲话，再次明确表示共产党人坚持和平、民主、团结的方针。在这次晚宴上张

治中高兴地向各界人士宣布，他将陪送毛先生回延安。

10月11日下午2时，毛泽东在张治中陪同下乘坐蒋介石的专机“美龄号”安全地降落在延安东关机场。

10月12日上午9时，张治中将军将乘机离开延安。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彭德怀等人亲赴机场送行。在去机场的路上，毛泽东和张治中同乘一辆汽车。毛泽东说：“你对和平的奔走是有诚意的。”张治中笑着说：“何以见得？”毛泽东幽默地说：“这个我调查过，你把《扫荡报》改为《和平日报》就是一个例子。《扫荡报》是在江西围攻我们时办的，你要改名字，一定有很多人不同意。第二件事，你把康泽办的一个集中营撤销了，释放了许多革命青年，这也是一件大好事。”毛泽东几句话说得张治中心里热乎乎的，他感到十分欣慰和感激。

第三次到延安

为了国内和平，落实整编军队，恢复交通，停止国内战争，1946年3月4日下午，军事3人小组（马歇尔、张治中、周恩来）从绥远乘飞机抵延安。

延安人民为欢迎军事3人小组来延安，在东关机场用红布搭了一座牌楼，牌楼顶部左右角插了中美两国国旗，在微风吹动下，随风飘扬，特别引人注目。飞机到达延安上空时，绕了一圈后平稳地降落在东关机场上。

在延安机场，毛泽东陪同马歇尔、张治中、周恩来一起检阅延安卫戍司令部仪仗队。机场上排满了汽车队伍，车上挂着中美两国国旗。当三位将领和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汽车在欢迎群众面前缓缓驶过时，人群中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

声。

沿街的墙壁上，张贴的是欢迎马、张、周三位和平使者的红红绿绿的标语。

当晚，中共中央设晚宴招待张治中、马歇尔一行。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出席。毛泽东首先端着陕北自己酿造的酒，站起来致词：“三位将军做了许多有益于中国人民的事。一句话，就是帮助中国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中国人民感谢各位的努力，并准备尽一切努力来做这些事。”最后毛泽东建议：“让我们为杜鲁门总统、蒋主席、马歇尔、张治中将军和在座的各位朋友的健康干杯！”毛泽东虽然不胜酒力，他还是离开座位，端着酒杯和客人们一一碰杯。朱德总司令代表中共中央致词说：“……政治协商会议的协议，三人小组的协定，中国共产党都愿忠实地彻底地实现。”

张治中将军十分激动地走上台子说：“兄弟此次来延，已是第三次了。去年迎接毛主席赴渝，那时以满腔的热忱，对于国内团结和平事业，寄予莫大的希望。第二次是陪送毛先生回延，当时已签订了《双十协定》，奠定了国内和平、民主、团结、统一的基础。此次陪同马歇尔元帅前来，是由于中国的伟大的友人马歇尔元帅的赞助，两月以来签订了停战协定，通过了政协决议，签订了军事方案。”最后，张治中又说：“我还要讲一个笑话，我刚才和毛主席谈过，将来你们写历史的时候，不要忘掉写上一句，张治中三到延安。”张治中讲完话走下台回到座位时，毛泽东笑着对张治中说：“你将来也许还要到延安，为什么只三到延安呢？”张治中说：“和平实现了，政府改组了，你们就搬到南京去。延安这地方不会有来的机会了。”毛泽东说：“我们将来是要到南京去的，听说南京很热，我怕

热，希望长住在淮安，开会再到南京去。”

3月5日，吃过早饭，火红的太阳从延安山头上缓缓升起，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彭德怀、林伯渠等领导人陪着马歇尔、张治中、周恩来站在机场跑道上话别。张治中热情地对毛泽东说：“欢迎你早日到南京去。”这时一位记者从旁边插话：“请问主席，准备什么时候去南京？”毛泽东回答说：“蒋主席什么时候要我去，我就什么时候去。”

登机前毛泽东对马歇尔说：“我再说一遍，一切协定一定保证彻底实行。”

当飞机升起后，人们都仰视挥手致意。他们是在盼望中国的和平统一，团结安宁的日子早日到来。

（作者：延安图书馆助理馆员）

人民艺术家张寒晖

贾亚娟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森林、煤矿，
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我的同胞，
还有那衰老的爹娘。

“九一八”，“九一八”……

这首饱含血泪和悲愤的歌，诞生已有半个多世纪。它在东北沦丧，日寇大举入侵，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唤醒了民族之魂，点燃了遍地抗日烽火，至今仍激扬着中华儿女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这首歌的作者就是人民音乐家——张寒晖。

张寒晖，原名张兰璞、张含晖。1902年5月5日出生于顺直省定州（今河北省定县）西建阳村一个衰败的书香之家。祖父琴棋书画皆通，曾考取功名，却弃官不做，终生过着一种恬淡的田园生活。父亲以教书为生，酷爱音乐，是位进步的民主主义者。

张寒晖中学毕业后，考入北京戏剧专科学校，曾参加演出

《朱砂痣》。毕业留校后，又参加演出了《黄绸衫》、《终身大事》、《英雄与美人》、《一片爱国心》等剧。“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张寒晖用古老民歌《三国战将勇》的曲谱填写了《可恨的小日本》，以《满江红》的曲调填写了《告我青年》，号召青年“激奋起，齐赴国难”。从此，他开始了用歌曲唤醒民众，投身抗战的革命艺术生涯。

1932年，张寒晖来到西安，被任命为民教馆总务部部长。这期间，他创办了民众剧社，并亲自编导了《不识字母亲》、《鸟国》等。

1935年初，张寒晖创作的《松花江上》在学校和军营中传唱开来，它唤起了人们对日寇的刻骨仇恨和强烈的爱国热情。

张寒晖在西安的革命活动受到国民党反动当局的监视和迫害。1941年8月，张寒晖被迫离开西安，来到陕甘宁边区根据地。1942年初，张寒晖来到延安。

踏上这块红色热土后，张寒晖即以满腔的热情投入到伟大的斗争生活中。党对这位人民音乐家十分器重，任命他为边区文协秘书长兼组织部部长。不久，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他光荣地出席这个在中国革命文艺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盛会。毛泽东的《讲话》拨开了遮在他眼前的一团迷雾，他感到眼更明了，心更亮了。在《讲话》精神鼓舞下，张寒晖废寝忘食，创作了大量讴歌革命斗争生活、歌颂边区人民的文艺作品。特别是他用陇东民歌曲调创作的《军民大生产》，久唱不衰。解放后，这首歌与《松花江上》一起被收入大型革命舞蹈史诗《东方红》，在全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繁忙而忘我的工作，夺去了张寒晖的健康，他积劳成疾，

于1946年3月11日病逝于延安，永远告别了那块他无限热恋的土地。党和人民为了纪念这位英年早逝的人民音乐家，在延安文化山上为他举行了简朴而隆重的葬礼，墓碑上铭刻着一行大字：“人民艺术家《松花江上》作者张寒晖之墓。”

历史虽然进入21世纪，但张寒晖和他创作的《松花江上》是不朽的。这首饱含着血泪和悲愤的歌曲，将永远激励着华夏子孙的爱国热情。

共和国从延安走来

刘 滢

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领中央机关从撤离延安到东渡黄河前往西柏坡，在极其艰险的环境中转战陕北，共 373 天，行程 1000 多公里，居住过 12 个县境内的 38 个村庄，并从这里领导着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进程，无疑，这是一段富有传奇色彩的经历。

转战陕北胜利结束，领袖们在惜别延安时，心里却在构想着另一幅更加壮阔绚丽的图画：拿一个延安换一个全中国。

早在 1948 年 3 月初，周恩来就向毛泽东建议：“现在全国解放区战场开始陆续转入战略反攻，形势对我们有利，为了更好地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党中央应适时东渡黄河，到邻近的解放区去就近指挥作战。”

就此问题毛泽东也不是没有考虑过，党中央假如返回延安，从政治上无疑会产生巨大影响，但延安偏居西北，召开一个各大战略区主要负责人的会议，来往交通不方便，不利于指挥迅速发展的全国解放战争。而晋察冀位置适中又是老根据地，群众基础好，容易保密，也比较安全，因此 1948 年 3 月 10 日，周恩来向党中央直属机关的全体干部正式宣布：为了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全国范围的胜利，中共中央决定东渡黄河，前往西柏坡与中央工委会合，共同完成夺取全国胜利的历

史任务。

就这样，作为历史教科书中的一页，“转战陕北”被我们轻轻翻起后，我们又迅速地揭起了另一页：过黄河——东移西柏坡——进驻北平。如果说1947年3月18日黄昏开始的那场转战，我们是在黑暗中手脚并用摸爬滚打地在陕北的山峁、沟壑间创造着希望，那么东移西柏坡时我们已是实实在在地用两条腿走路，共产党人为之终生奋斗的那个希望已经是越来越近了。

作为延安革命纪念馆年轻的业务工作者，我们有权利更有义务去寻找那尚未走远的足迹，去印证去发现那一串串脚印里所发生的许许多多鲜为人知的精彩故事。就这样，公元1999年11月8日，一支由11人组成的寻访队伍开始奔波于半个世纪前那个队伍所走过的进京路上。

第一站：渡口

这就是渡口，那个最后告别陕北父老乡亲的地方。河口的乡亲们至今也记得那天晴空万里，风和日丽，领袖和他的队伍生气勃勃，行色匆匆。那一刻这支队伍里的每一个人心中都在进行着一场电闪雷鸣，就似这波涛汹涌、奔腾不息的黄河。从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到1948年3月23日从吴堡川口东渡黄河，13个年头已经过去，其间经过多少风云变幻，世事艰辛，陕北人民用小米支持着一个伟大的事业，那种彼此间的相濡以沫，那种无以回报的款款深情，是用言语所不能表达的，也是表达不出的。

“现在要离开陕北了，还真有点舍不得呀，请你们转告陕北的乡亲们，谢谢他们，我们还会来看望大家的。”51年后，我们站在这渡口之上，那浓重的湖南口音仍不绝于耳。这能否

理解为是一种承诺？上岸了，那个充满眷恋的声音再一次响起：“陕北人民对革命做出了很大贡献，我们是忘不了的。”纵然是日后的穷山恶水，纵然是日后战争所带来的贫瘠，延安人就因为这一句话而辈辈无怨无悔，肃立渡口，昔日的嘈杂声、河水的咆哮声、船工的号子声随着翻飞的浪涛扑打过来，河面上仿佛又是十几只小船一列地排过去，那个穿棉袄的湖南人深情站立船头，谁能告诉我们他是不是也在想念？

我们猜想那是一种负重后的释然，我们猜想那是一种很苦涩的感念，我们更猜想那是看到胜利就在眼前时的一腔英雄豪气。

伟人终于走了，山已经荒芜，水变得浑浊，这是一种代价。伟人站立船头的身影越来越远，而眼前这座孤零零的东渡碑又能证明些什么？这块伟大厚重的黄土地在完成了自己最引以自豪的责任后，忽然变得无所适从起来。我的古老的高原，善良的乡亲，除了为他人之外，真的就不知为自己做些什么吗？！夕阳如画，残阳如血，车寂寂地行进，我们一路的沉默，可心在呐喊：伟大的是人民！

第二站：苛岚

第三站：代县

哪怕是仅仅呆了一天、一个小时，也留下了这些遗址，人们对领袖的敬意近乎崇拜，他们想用这种形式尽可能地把自已最敬爱的人留下来，门大都半开着，院落很安静，就像主席刚刚转身出去。我们的脚步很轻，惟恐打扰了院落的主人，一路看过去，无数遗址孑孑而立，心里的感觉竟是无奈。主席若地下有知，不知对这许多闲散院落的安排是否满意？

第四站：五台山

历史往往在某一时间很相似。

1948年4月11日，主席冒雪登山的情景仿佛就在昨天，当年爬雪山也没有遇到过这么大的暴风雪，主席称之为继续长征，转战陕北时的一顶破草帽在山西境内又一次帮助了他。

而今天，11月10日，我们在寻他时，山上竟也下了雪。啊，久违了的北国的雪，我们多想拥你入怀，你能告诉我们，那个高个子的湖南人从你身边昂然走过时，他可曾讲起些什么？这似二万五千里长征路上红军长长的裹腿缠绕出的公路，是否就是那支队伍郑重的馈赠？在这无边的辽阔面前，那位伟人是不是卸掉了所有的重负，当二百五十个风铃在山风的吹拂下齐声奏响时，这支队伍可曾受到过来自佛国的庇护，五台山请导引我们。就是这个山门，这个四合院，毛泽东住北屋，我们慢慢地行，轻轻地走，我们在寻找一种心境，寻找一种久违的感觉：豁达、充实、淡泊。

五台山有幸。因为主席说过：好好保护这些古迹，这是文化。

第五站：城南庄

第六站：华山村

名不见经传的小山村，依旧是往昔的模样。不同的是有了这个馆，这个曾经被轰炸过的小山村，弹孔仍历历在目，呈现在眼前的有主席旧居，晋察冀军区所在地的城南庄，讲解员的声音把我们带的很远很远……

1948年5月18日，国民党飞机轰炸城南庄晋察冀军区大院，击中毛泽东的住房。敌机投下的是杀伤弹，毛泽东住的两间房子，门窗的玻璃震碎了，房里的两个暖水瓶，被飞进来的弹片炸碎了，还有买来的一些鸡蛋，也被弹片崩了个稀巴烂，

显然国民党方面已经获得毛泽东住处的情报。案子直到解放了大同、保定后通过查阅敌伪档案，才把问题搞清楚。特务得到了应有的下场，而民间就有了一个个神奇动人的传说。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没有什么神仙皇帝”，这是一代代伟人所倡导的，可他自身就是一个奇迹，险象环生却往往是有惊无险，仅凭一句“这是个巧合”是怎么也说不清楚的。伟人自身人格的魅力震撼了所有的鬼魅，他把自己的风流潇洒发挥到了极致。

从城南庄的惊心动魄中出来，我们直奔华山村。这里有一位74岁的老人——张冀新。老人很激动，我们也很感动，握着老人颤巍巍的手，我们忽然明白：无论是延安，还是美丽的华山，大山挽着臂膀在呼唤着同一句话：归来，亲人！

华山村在等，张冀新在等，朝霞初上，夕阳西下，14岁就参加革命的他在22岁见到主席后，他那平凡普通的一生霎时霞光四射。张冀新在讲：“那天我和娘、妹妹在这个磨盘上推磨……”从老人望得很远的视线里，我们知道时间在老人那里是停顿的，而他的故事将会被后人深深铭记并流传广远。告别老人，我们去寻找西柏坡，去寻找那个走了就再也没有回来的人。他的脚步匆匆，我们是日夜兼程。

第七站：西柏坡

1948年5月27日，毛泽东前往西柏坡。这是他离开陕北后长途行军生活的最后一天，行军生活将告结束。

西柏坡，一个多么美的小山村。滹沱河水从村前急促地流过，沿滹沱河西上，就是巍巍的太行山脉，顺河东下，是著名的华北大平原，最小的司令部36平方米，墙上挂满了地图。五大书记就是在这里领导中国革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七届

二中全会的召开以一段著名的讲话开辟了一个崭新的世纪。让我们齐声地朗诵：“夺取全国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第八站：北京

有这样一个情节：1949年3月23日，毛泽东对周恩来来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进京赶考去。周恩来笑答，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能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1999年11月15日清晨，当我们顶着冬日北京的寒风与许许多多的人站立天安门前，等待国旗冉冉升起来的那一瞬间，无声的泪水从冰凉的脸颊滑下。飘扬的国旗告诉我们：共和国考了一个好成绩，不会被退回去！

从延安走来的共和国，在天安门广场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我们齐声祝愿：祖国您好！

延安中央警备团组建始末

米晓蓉

20世纪40年代，在延安组建了一支担负特殊使命的武装部队——中央警备团。它是由中央军委警卫大队和中央教导大队合并组建而成的，担负着中央首长和中央各机关的安全保卫工作。

中央军委警卫大队初组建时叫红军前敌总指挥部特务营，1935年12月在富县张村驿成立，邱创成任营长兼政委，是由红军长征时前总的三个警卫连编成。特务营成立后，由红十五军团调来一个少年先锋连编为第四连。1936年2月，红军东征时，邱创成率第一连随卫毛泽东、张闻天，二连随卫彭德怀、叶剑英。1936年5月，红军回师陕北后，在延川交口镇，特务营与地方独立团合并，扩编为前总特务团，调红一师三团团长曾保堂任特务团团长，邱创成任政委，原特务营四个连编为一营，营长谢国义，政委严雄；原独立团的四个连编为二营。西安事变爆发后，特务团随卫红军前总，移驻关多云阳。

1937年3月，特务团奉中央命令调第一营回延安保卫党中央。4月下旬，特务团第一营在谢国义营长、严雄政委的率领下到达延安。4月23日在城内操场上召开了全营军人大会，朱德总司令出席大会并讲了话。那时，延安正在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即延安四月政治局会议），特务团一营立即投入到会

议的安全保卫工作。

在此期间，发生了周恩来劳山遇险事件。担任此次护送任务的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办事处保卫局特务队的一个排。

4月25日早饭后，周恩来乘一辆卡车从延安出发，去西安同国民党代表顾祝同、张冲就国共合作、联合抗日等问题再次举行会谈。同行的还有张云逸副参谋长，军委一局参谋、调任刚刚建立的红军驻西安办事处秘书的孔石泉，以及周恩来的随从副官、延安卫戍司令部参谋长陈友才和机要员、警卫员等。担任护送任务的西北办事处保卫局特务队一排排长率领两个班乘两辆卡车于前一天出发，副排长陈国桥带一个班护送周恩来乘坐的这辆卡车。当车行驶到甘泉县境内劳山峡谷时，突然遭到李清伍股匪的袭击。消息传到延安，上上下下很为震惊。

军委警卫团政委黄霖（即江华）接到电话后，冲出窑洞立即集合队伍。刘伯承参谋长下令把中央领导人的马通通牵来，黄霖顾不得清点人数便同战士们上马出发。

边区保卫处处长周兴一面派于桑带特务队骑兵排前往劳山增援，一面派人送信给南区剿匪司令员吴台亮，令他火速返回延安商讨对这股土匪的侦破和围剿工作。

特务团一营营长谢国义也带领战士前往驰援。他们到达三十里铺时，在兵站见到了安全转移的周恩来。留下贺福祥等护送周恩来回延安，其他战士到劳山去清理现场。

劳山事件中，陈友才、陈国桥等11人为保护中央首长的安全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劳山事件后，特务团一营改称为中央军委特务营（后又称中央军委警卫营），将军委通讯连和军委警卫团第二连和机枪

排调归特务营建制。军委警卫团是长征中随卫朱德总司令到达陕北的。

1937年五六月间，军委特务营派李连富带领四连和一连的一个排到劳山地区，协同延安县保卫营的两个连进行剿匪，扫清道路，保障中央首长和边区军民的通行安全。

军委特务营下辖六个连和一个机枪排，共900余人。

一连，担任清凉山、宝塔山、飞机场的警戒和南三十里铺检查站的安全检查工作；

二连，担任城内凤凰山麓毛泽东、张闻天、朱德等中央首长外围警戒和总参谋部、总政治部的警戒任务，在凤凰山老爷庙一带设固定哨位10个。

三连，担任延长县凉水崖黄河渡口及兵站、仓库的警卫工作；

四连，负责兰家坪、李家洼各中央机关和电台的警卫工作；

五连，担负延安南门、东门和北门的警卫；

通讯连，负责机要通讯；

机枪排，在宝塔山、清凉山、凤凰山山顶负责延安的防空警戒。1937年12月，延安县保卫营防空队调归特务营建制，与机枪排扩编为机枪连。

1938年11月20日，日本飞机第一次轰炸延安。当晚，毛泽东由城内凤凰山麓移住杨家岭，张闻天由城内移住兰家坪。此后，中央机关和军委机关先后迁往城外。军委警卫营（即特务营）二连到杨家岭随卫毛泽东，三连到兰家坪随卫张闻天和中央书记处，四连到王家坪随卫朱德、王稼祥和八路军总部机关。其他各连在清凉山、文化沟、小沟坪等地担任中组

部、中央党校、抗大、陕公、新华社、解放日报社和八路军总部机关的警卫工作。那时，以连为单位，分区负责，按班轮流执勤，两小时一换哨。晚上，还划分有巡逻区，以连为单位，分区巡逻，三人为一组。首长外出，有专人护送，并在沿途警戒。1939年10月，警卫营各连进行了一次换防。三连将兰家坪的警戒任务交予中央教导大队，调至杨家岭接替二连，二连调至王家坪接替四连，四连调延川县延水关。

1941年11月，军委警卫营改称为军委警卫大队，大队长王金，政治指导员宋家治，下辖6个中队和1个防空队，共499人。在此期间，杨家岭的警戒任务交中央教导大队，军委警卫大队只担任王家坪总部机关和抗大、新华社、解放日报社、安塞军委二局、延安防空等警戒任务。其余连队有的去定边打盐，有的去南泥湾孟家湫开荒生产，有的参加修建军委礼堂和延安机场的劳动。

1938年2月，中央系统也成立了一支警卫部队，即中央教导队。它是从三五九旅七一八团、三五八旅七七〇团、延安各军校等单位抽调了130多人组建成的。队长王金，政治指导员肖前，下设三个区队，直属社会部领导。

中央教导队初成立时，负责兰家坪张闻天、中组部陈云、社会部康生等人的内卫警戒工作。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时，负责会议的安全保卫。1939年5月，中央教导队扩编为中央教导大队，大队长吴烈，政治指导员肖前，下辖两个中队，原教导队为一中队，中队长刘辉山，指导员莫逸明。二中队由延安县保卫大队调来80余人编成，中队长张吉原，指导员张久候。7月，又从职工学校抽调100余人编为第三中队，中队长张耀词，指导员田学文。10月，又成立了骑兵团，队长古远兴，

指导员王忠。至 1939 年底，全大队共 323 人。

1939 年 10 月，中央教导大队一中队接替军委警卫营在兰家坪的执勤任务。1941 年 10 月，又到杨家岭接替军委警卫营三连的任务。兰家坪的警戒任务交由中央教导大队二中队负责。

1940 年 6 月，由晋察冀彭真警卫大队调来一个中队，编为中央教导大队第三中队，中队长方仲宝，指导员冉法根。负责侯家沟农村工作委员会的警卫工作。原第三中队改为训练队。1941 年 4 月，又由彭真警卫大队调来一个中队编为第四中队，副中队长马英杰，指导员曾策。负责枣园社会部的警卫工作。

1942 年 10 月，中央社会部和军委总参谋部共同商定，决定对中央系统和军委系统的保卫部队进行合并整编，成立中央警备团（后称中央警卫团），对外称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警备团。10 月 20 日，中央警卫团在西川侯家沟成立，团长吴烈，副团长王金，政委肖前，参谋长刘辉山，政治处主任张廷祯，总支书记宋家治，供给处主任田学文。全团共 811 人，下辖五个连和一个骑兵连，一个机枪连。

一连（手枪连）连长莫逸明，指导员温昌连；

二连连长罗志淮，指导员曾策；

三连连长何有与，指导员赵沉幽；

四连连长吕锡彬，指导员杜泽洲；

五连连长方仲宝，指导员杨树先；

骑兵连连长古远兴，指导员姜玉坤；

机枪连连长张海龙，指导员王光。

1943 年增编了第六连，人员由三五九旅、独一旅、警备三团调来，共 379 人。此后，又设立营的建制。一营营长刘辉

山，教导员莫逸明。二营副营长罗志淮，教导员张耀词。

1944年9月5日，中央警备团战士张思德，在安塞县石峡峪烧木炭时因炭窑崩塌不幸牺牲。9月8日，中央直属机关在枣园后沟举行追悼大会，毛泽东在会上作了《为人民服务》的讲话。张思德原是军委警卫营通讯班班长，部队整编后，自觉服从组织分配，仍在警备团当战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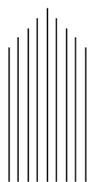
1945年党的七大在延安召开，中央警备团担任大会的警卫工作。党的七大成立有临时警卫处，陈龙任处长。警卫处分内勤、外勤两个小组。内勤组由中央机关警卫处选调干部组成，负责会场内部的招待及中央首长的警卫工作。外勤组由中央警备团一营营长刘辉山任组长，负责会场以外的警卫以及防空的组织指挥和检查督导工作。在中央首长和代表通行的路线上，设有固定哨位和巡逻哨。杨家岭共设有17个哨位，在各大门口，负责检查入场证件。周围山头上，由机枪连负责防空。骑兵连担任巡逻踩路，护送首长汽车等。

解放战争时期，中央警备团已改称为中央警卫团，领导成员也有变动，团长刘辉山，政委张廷祜，参谋长古远兴。中央撤离延安后，警卫团一部分护送刘少奇、朱德去了河北，留下的四个连和骑兵连随卫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转战陕北。

1949年9月，以中央警卫团为基础，组建为中国人民公安中央纵队，吴烈任司令员。

延安时期组建的中央警备团，为保卫党中央，保卫延安，保卫陕甘宁边区的安全做出了重大贡献。这支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部队，现为北京武警二支队，仍在为保卫党中央、保卫首都的安全做贡献，为祖国现代化建设保驾护航。

（作者：延安革命纪念馆馆员）



YANAN BOYUAN

● 深切的怀念 ●

延安博苑

陈云在延安二三事

霍静廉

在延安西北 5 华里的杨家岭半山坡上，有两孔依山开凿的土窑洞，每孔深不足 5 米，宽不足 3 米。这种土窑洞在今天的延安老百姓也没多少人居住了，而当年却居住着一位管理着 121 万党员和 50 多万驰骋疆场、及活跃于国统区干部的中国共产党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同志。

陈云同志是 1937 年 11 月底由莫斯科来到延安的。毛泽东对这位 15 岁就参加革命，性格内向、勤思寡言、讲究实际的党的干部十分器重。不久，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上，陈云同志被推举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兼组织部部长。他凭着对党对人民对祖国的赤胆忠心，凭着对法西斯反动派的仇恨，凭着卓越的组织才能，惟才是举，以博大的情怀和力量，使延安的干部朝气蓬勃、励精图治、无私奉献。至今，陈云同志关心干部、爱护干部、使用干部的佳话，在延安广为流传。

“奋斗到底是什么意思”

陈云同志在延安担任了八年的中央组织部部长。他知道要使千百万贫苦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成为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终生的坚强干部，必须要做好党建宣传，明确党的主张、任务、目的。因此，他在百忙中总是挤出时间，给中央党校、抗大、

马列学院、陕公、女大的干部学校上党课。《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党的干部》、《论干部政策》等文章就是他给延安干部学校上课的讲稿。陈云同志的党课在当时的延安声誉很高，最大的特点是理论联系实际，生动活泼，深入浅出，用大量的典型事例阐明党内生活的基本原则。1939年春，他到马列学院三班讲《怎样做一个共产党》。他说一个共产党员“必须要有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要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到底。奋斗到底是什么意思？到‘底’就是死的意思，用上海人的话讲就是‘翘辫子’。怎么叫到底，怎么叫不到底，陈独秀、顾顺章、张国焘就是没有到底。比如监狱叛变，战场逃跑，受金钱美女利诱等等。总之只想个人得失，就不能到底。而一些先烈身陷囹圄，惨遭酷刑面临死亡而坚贞不屈，最后从容走上刑场，慷慨就义，忠诚地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这就是到底。”陈云同志由浅入深、结合现实的讲法，将一个抽象的政治说教，引入现实生活中，使干部学员豁然开朗，并给大家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学员们也认识到，为了革命胜利，不仅要牺牲个人的利益，直至个人生命，还需要千百万具有这样崇高品质的共产党员所组成的共产党，才是战无不胜的。为此，同学们对共产党与党员的认识进入了更高的境界，越听越爱听，越听越为自己选择的道路庆幸。一位学员激情满怀地写了七律诗一首：“百炼千锤不锈钢，沙场刑狱亦坚强，终身奋战红旗举，指路明灯马列芳。铁马金戈驱日寇，改天换地拓新邦。崇高理想乾坤赤，广育贤能事业昌。”众多的青年学生经过上党课，更加深了为什么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理解和认识。学生毕业后，他们不畏国民党的残酷镇压，不畏日寇的飞机大炮，奔赴各个战场和工作岗位，知难而进，前仆后继，硬是用为共产主义奋

斗到底的坚定信念赶走了日本帝国主义，推翻了蒋家王朝，建立了新中国。

一位当年曾聆听过陈云同志讲课的老八路，50年后回到延安，还记忆犹新地说：“当年，陈云同志的党课有口皆碑，大家以能听到他的党课为最大的精神享受，他讲的‘怎样才算是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给学员们留下深刻的印象，我们这批人几十年如一日，不畏艰难坎坷，就得益于‘奋斗到底’的精神力量。”

“为什么要开除刘力功党籍”

1939年5月，延安发生了一件开除刘力功党籍，通报全党的事情。刘力功是个知识分子，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抗大毕业后又进入延安党校训练班学习。毕业时党组织决定他到基层去锻炼，这是抗大和党校毕业分配原则。刘力功却坚持要进马列学院学习或回原籍工作，否则就退党。陈云同志和党组织七次找他谈话，帮助他认识基层工作的需要和组织分配的原则，他仍执迷不悟。最后一次谈话时，组织慎重地告诉他：“个人服从组织，是党的纪律，要你去华北基层工作是党的决定，必须服从。”并给他时间反省自己。他蔑视组织的再三教育，不仅不去华北基层，反而提出“一定要到八路军总司令部工作，否则，拒绝执行党的决议”。对如此目无组织，目无纪律的共产党员，陈云的心情十分沉重，透过刘力功的事件，他看到一些由国统区奔赴延安的青年，由于有专业技术，居功自傲，看不起工农干部，把一些小资产阶级思想和自由主义带到工作生活学习中，工作上讲条件，生活中求待遇，学习中图虚名，如不及时纠正，就会影响抗日斗争的士气，挫伤前

方将士的积极性。为此，他以刘力功事件为引线，在延安各机关、学校开展了一场“为什么开除刘力功党籍”的大讨论，并亲自撰文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杂志上发表。他说：“究竟一个共产党员在党的分配工作时有些什么权利和义务呢？只有说明自己意见的权利，只有在党决定后无条件执行决议的义务。除此之外，决不能增加一点权利，也不能附加一个条件，否则就违犯了党的纪律。”他专门抽出时间，参加机关、学校的大讨论。他语重心长地告诉大家：“中国革命是长期的艰苦事业，共产党及其党员没有意志行动的统一，没有百折不回的坚持性和铁的纪律，就不能胜利，中国是一个资产阶级成分占优势的国家，如果中国共产党没有严格的纪律，将无法防止小资产阶级意识侵入党内，如果不是有铁的纪律的队伍，就不能去团结最大多数的人民群众。因此破坏党纪，实质上就是破坏革命，我们必须与任何破坏纪律的倾向斗争。”这次讨论，在延安的各机关干部学校引起很大震动。干部学生纷纷从刘力功事件中，检查自己的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思想，检查是否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是否遵守党的纪律，是否言行一致地执行党的决议。通过广泛而深入的讨论和批评与自我批评，机关干部、青年学生从思想上认识到一个共产党员严守纪律，执行党的决议是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争取中国革命胜利的重要保证。任何目无组织纪律的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都会给革命胜利造成不必要的损失。一场讨论，使各干部学校的学生丢掉了包袱。一些要求重新安排工作的干部学生，主动撤回请求；一些分配工作还未到岗的干部，立即打起背包出发。一时延安出现了三多三少的现象：讲个人要求的少了，服从组织分配的多了；要求到前线和艰苦地方锻炼的人多

了，图安逸比享受的人少了；严守纪律的人多了，自由主义现象少了。一个严纪、守法、团结、奋进的热烈气氛悄然兴起。

“尊重和团结非党干部是党的重要政策”

1937年7月，卢沟桥的隆隆炮声，使全国的工人、农民心向共产党，就连知识分子、民族资产阶级也心向共产党。成千上万的青年学生、大学教授、工程师、留学生不畏千难万险徒步来到延安，聚集在以共产党为核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在这些热血青年中，有一大批是非党人士，他们学识高、有专长，也是延安各条战线急需的专业人才。但这些干部由于缺乏马列主义的基础知识，世界观尚未得到改造，带有自由散漫和一些不良作风，在工作中，与延安的干部有明显不同。许多党员干部看不惯，不愿使用这些专家，甚至认为这些人不可靠，不能让他们参加到革命队伍中。面对这种复杂的思想问题，陈云同志根据毛泽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示，作了一个题为《尊重和团结非党干部是党的重要政策》的专题报告。指出：“团结于党周围的非党干部和社会各阶层的进步分子，是党广泛联系群众的桥梁。不反映党外人士的意见，党的政策就不会完全正确；不经过党外人士的传播，党的政策就不能深入群众，没有党外人士的同情和合作，革命胜利就不可能。因此，我们不仅必须与已经共事的非党干部亲密团结，而且竭诚欢迎广大的党外人士与我们共事。”并到各机关学校作专题讲座，耐心细致地做两方面的工作。1939年，中组部受毛泽东、周恩来等委托，筹建一所正规化的模范医院。当时延安医生奇缺，药品、仪器设备也很少。陈云同志立即将毕业于法国耶鲁士大学的医学博士何

穆，齐鲁大学医学院毕业的医学博士魏一斋、金茂岳，德国柏林大学医学院毕业的印尼华人毕道文，红十字会医疗队的侯建存等一批高级医学专家调至中央医院，发挥他们的专长，让他们为边区的医疗卫生做贡献。这些人几乎全是非党专家。他们思想认识上与延安的干部认识不一，如何团结、尊重他们为抗日民族解放多做贡献，陈云同志首先派一个工作细致、能力较强的党员干部任院支部书记，又从各干部学校挑选一些热心此项工作，思想觉悟较高的青年党员组成党支部，开展一帮一、比、学、赶、帮的竞赛活动。并明确分工，行政上在院党支部领导下开展思想工作，业务上团结和尊重以非党干部何穆为院长的意见，充分发挥专家之长。开始，医院按照大城市医院的办法，制定了许多规章制度，如住院制度、医疗制度、探视制度等等，严格规定探视时间。一位从前线回来探视战友的将军，也因不到探视时间被挡驾在外，一些党员和伤病员十分看不惯，对个别专家的家长作风更是不适应，纷纷提意见。如何团结非党知识分子合作共事，成了中央医院的突出问题。陈云同志多次来到医院与非党专家促膝谈心，引导他们认识延安的战争环境和客观条件。组织召开中央医院全体党员会议，动员党员支持非党专家的领导，他说：“中央医院聚集了魏一斋、侯建存、金茂岳这么多医学专家，最近何穆回延安，又带来一批医护技术人才，这是很不容易的。”“我们许多党员干部出生入死，对敌斗争十分勇敢，但生了病就没有办法，我们治不了病，需要专家。高明的医生，治好了我们的干部，我们的伤病员，这对革命是多大的贡献啊！”“来到医院的专家，都具有很高的抗日爱国热情，他们都是自觉自愿牺牲个人利益到延安来的，我们怎能不好好团结他们，发挥他们的专长，来为革命服

务呢？人都是有缺点的，他们有他们的缺点，但主要应看他们的优点。”他号召全体党员，要以坚强的党性，带头服从非党专家的领导，保证正规化医疗制度实行。还强调党员要向专家学习科学技术，使整个医疗水平不断提高。在陈云同志的关怀和帮助下，中央医院的党组织加大了耐心细致的传、帮、带工作。经常征求非党专家的意见，改进工作方法和制度，并在生活上给予特殊照顾。专家们也通过学习和自身的工作实践，逐步接受了马列主义的理论和战时医院的管理方法，不断进步，先后有几名专家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陈云同志亲自介绍妇产科主任、后来任院长的金茂岳入党，使他们安心工作，不断为发展边区的医疗卫生事业做贡献。

中央医院在中央领导和陈云的亲切关怀和领导下，党员与非党专家携手合作，不几年便成为边区一座制度严密、技术优良、操作正规、作风严谨的革命化、正规化、科学化的医院，被誉为“延安人才最多的最高医疗机关”。中央医院从1939年9月到1947年2月共收治住院病人15000余名，做手术5667人。妇产科8年接生3000余婴儿，无一例死亡。收治儿童1700余人。工作人员献血27295CC，抢救了大量伤病员的生命，并完成了中央首长的医疗保健，为解除边区人民痛苦，促进边区的医疗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并为新中国的医疗事业培养了大批人才。中央医院尊重和团结非党专家携手共进的典型事例也促进了延安各机关团结非党干部共同工作的重要政策的执行，使大批的非党干部在我党政策的感召下，克己奉公，充分发挥专长，为抗战的胜利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

“用父母爱儿女之心来爱护干部”

“用父母爱儿女之心来爱护干部”。这是陈云的口头禅，也是他对待干部的行动准则。他经常告诫大家：“爱护人很重要，凡是提干部，得全面估计他的德和才；既提起来就得多方面帮助他，不使他垮台，对干部一切不安心的问题，都要很耐心很彻底地去解决。当牵涉到一个干部政治生命的时候，要很郑重很谨慎的处理，对于干部，不要‘抬轿子’，要实事求是。做到这些，才能算真正的爱护人。”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整风时，由于康生发动的抢救失足者运动，使大批满怀热情从国统区来延安的青年干部被打成叛徒、特务。他心急如焚，一面向毛泽东及有关领导谈自己的看法，一面积极组织人员进行调查，尽快澄清事实，解放干部。一位青年因有人说他是托派，被开除党籍，陈云知道后，立即派人内查外调，很快将各方面证词收集齐全，搞清这一青年不仅不是托派，而是一个坚定的具有光荣历史的共产党员，在事实面前，那些别有用心者不得不为他平反，恢复党籍，从而挽救了这一青年的政治生命。

一位曾被派往白区，做《大公报》记者的共产党员，因工作需要被迫脱党。她仍废寝忘食，舍生忘死地为党工作。在特务殴打、威胁面前，她孤军奋战，毫不畏惧。后在左倾错误路线的影响下，被误告为叛党、特务。她一时心如刀绞，悲愤交加，忧郁欲死。罗瑞卿同志带她去见陈云，陈云听后，语重心长地讲：“不论在多么艰难困苦的处境里，一个共产党员必须活着来尽自己的义务。”“有的共产党员在奔赴前方时，能慷慨赴死，在敌人牢里能从容就义。但在被组织误会时，却会伤心

痛哭，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我们一定要经得起这个严峻的考验，相信党会弄清问题的，受屈不变心才是最好的同志。”并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地嘱咐她：“在我们党内叛徒是极少的，在这极少数中女性比例更少，因为妇女是受双重压迫。”几句肺腑之言，使这位坚贞不屈的女性热泪盈眶，她说陈云同志“把对党的爱倾注到我们心中，说服力、感染力很强，成为我们在艰难时刻的精神支柱，指路明灯”。从此，她不畏艰难，任劳任怨地工作，终于迎来了平反冤案。几十年后，当人们去采访她时，仍感激地说“是陈云解救了我的生命”。

陈云同志不仅在工作上关心、支持、爱护干部，而且在生活家庭婚姻中也十分关心体贴干部。他告诫中组部的同志们，凡是干部担心的事，也是组织部关心的事，只有解决好他们的事，解除后顾之忧，才能安心工作。1938年，邓小平同志从前线回到延安向党中央、毛泽东汇报工作，陈云同志亲自安排他住杨家岭高干所，并同他同住一起，以便畅谈，全面了解情况。他看到邓小平同志30多岁，戎马倥偬，南征北战，仍孑然一身，就主动提出当红娘，将刚从陕公毕业分配到训练班的卓琳介绍给邓小平同志。经一段接触，他俩情投意合，马上又张罗着为他俩举行了隆重而简朴的婚礼，并邀毛泽东、张闻天等参加。正因为陈云对干部爱护有加，因人施教，延安的干部、学生遇到困难、矛盾都愿意到中组部倾吐衷肠。而陈云同志不论工作多忙都是认真听取，一一帮助解决。时间长了，中组部成了各根据地和前线将士的家，每次回延安，都要来“家”看看，说说心里话。以陈云为首的中组部干部也成了大家的亲人。

“这里就是你们的家”

在延安杨家岭半山坡那两孔土窑洞里，经常有孩子出出进进。每到星期六下午，饭桌上就围着一大群孩子，陈云的爱人于若木，把组织照顾首长的“好吃的”全拿出来招待孩子们，孩子们也兴高采烈地将“好吃的”一扫而光，并拉着陈伯伯的手问这问那。这些孩子大多是烈士的遗孤。他们的父母，有的牺牲在抗日前线，有的因搞地下工作而遇难，孩子们不仅失去亲人的照顾，有的还会进一步遭受敌伪迫害，为保护这些革命的后代，陈云安排各地的地下组织将他们一一送到延安，再送到各个学校去上学。每到星期六，其他孩子回家，这些孩子无家可归，陈云就将他们接到自己的家中，给他们以极大的厚爱和温暖。他不论工作多忙，总要抽出时间，给孩子们讲革命先辈的故事、讲小英雄的事迹，给幼小的心灵播下革命的种子。有时还把自己节省下来的笔记本、牙粉、牙刷发给孩子们，孩子们高兴地得到其他孩子难以得到的“奢侈品”而夸耀，殊不知陈伯伯为给他们节省这些“奢侈品”是怎样勤俭节约的。有的孩子刚来时有些陌生，陈云总是关切地告诉他们“这里就是你们的家，有什么困难就来找伯伯”。孩子们得到陈伯伯和于妈妈父母般的爱护，如同回到家见到父母一样，遇到问题和身体不适就来找他，他总是耐心细致地解决。

一天下午，刘伯坚烈士的儿子刘虎生从学校回来，一进陈云的家门，便瘫倒在地上，陈云同志连忙抱起来，一摸全身发烧，还有许多小红点。他吓坏了，立即翻箱倒柜找药，又打电话请来医生治疗，待吃药后，仍不见好转。陈云更急了，急忙找了一副担架，火速送到几十里外的和平医院，经医生检查是

急性败血症，立即给予治疗。第二天，他又和蔡畅同志赶到医院，把组织照顾他的营养品全部拿给虎生吃，还特意用节省的津贴买了一只大公鸡给虎生补养身体，又派勤务员到医院照顾虎生。在陈伯伯和其他首长、医院阿姨的精心治疗下，虎生的病一天天好起来。刘虎生在陈云等老一辈的关怀照顾下，在延安读完了小学、中学直到军政大学毕业。1948年组织选送21位烈士子女和干部子女到苏联去学习，刘虎生也是其中之一。临走时，陈云特意为他们组织了欢送会，并把伴随他多年连自己的儿女也没舍得给的惟一一块瑞士怀表送给了虎生，鼓励虎生继承先辈的遗志，努力学习，报效祖国。这些深情厚谊，激发了孩子们奋发向上的决心。到苏联后，他们刻苦学习，成绩都很好。后来，来延安的孩子越来越多。陈云同志嘱咐中组部干部每到星期六就把烈士子女和父母不在延安的孩子们接到中组部来，而这一天也是中组部伙食最好的一天。此后，中组部就成为了孩子们的家。孩子们把中组部的首长干部当亲人，中组部的干部也每逢节假日，首先的任务就是接孩子们来度假。中组部这个家给这群革命的后代以博大的温情和厚爱。几十年后，他们陆续再度回到延安，望着那两孔简朴的土窑洞，激情满怀地讲述“家”的故事。

陈云在延安的八年，是呕心沥血、艰苦奋斗的八年，他率先垂范，以博大的情怀，关心爱护干部，成为各级领导的楷模，而这一时期，也是我党历史上政治最坚定，思想最统一，作风最过硬的时期。当时延安培养造就的数以万计的各种人才，不仅保证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也为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

陈云同志离我们而去已经五年了，但他的博大情怀、组织

才能和高超的领导艺术将风范永存，彪炳史册，光照千秋。

（作者：延安革命纪念馆副馆长、研究员）

江华回延安

刘 煜

正当我们在喜迎澳门回归后又期待新千年曙光到来的时候，一位世纪老人，曾在延安这块热土上生活过五年的原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于1999年12月24日在杭州与世长辞了。为了表达延安人民对这位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党党务工作和政法战线的杰出领导人的怀念和敬仰之情，特将他建国后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回延安的情况回忆于后。

1990年5月27日—6月2日，江华及夫人朱浔、民政部原副部长张邦英一行在原陕西省顾委常委、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杨沛琛等陪同下，来延安视察工作。

江华，原名虞上聪，我军初创时的军队政治工作领导人之一。1930年改名黄春圃，参加了中央苏区的五次反“围剿”斗争。遵义会议前夕任红三军团直属队政治部主任。1935年10月19日，随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吴起后，任中央军委警卫团政治委员。不久，被派往关中特区担任军分区司令员。1936年夏，为配合红军主力西征，又调回瓦窑堡任红二十八军政治部主任。党中央迁到志丹县后，他率部拔除了陕北红区境内最后一个土围子——旦八寨。12月13日，即西安事变的第二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命他带张国焘的手枪连与陕北红一团去接管延安城防。18日接管延安，任城防司令部政委。

1937年春，入抗大二期第一队学习。抗大毕业后任军委第四局副局长、局长。1938年8月，又改名江华同郭洪涛等赴山东敌后抗日，历任八路军山东纵队、军区政治部主任等职。1943年秋，作为出席党的“七大”的山东代表团副团长回到延安，入中央党校一部（小沟坪）学习。1945年4月23日—6月11日，参加了在延安杨家岭召开的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抗日战争胜利后，为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江华赴东北解放区工作。

吃过陕北的小米饭，一辈子不会忘延安。建国后，日理万机的江华时刻关注着延安的建设和发展，日夜向往、怀念在延安的岁月，45年后，终于圆了重返延安的梦。为了参观的方便和相机采访，地委抽我参加了对江华一行的接待工作，亲眼目睹了他对革命圣地的那一份深厚、凝重的游子之情。

年届83岁高龄的江华在短短5天中，详细参观了凤凰山麓、杨家岭、枣园、王家坪、小沟坪等革命遗址和延安革命纪念馆，登上了宝塔山，浏览了延安城全貌，并召集延安史学界、宣传、文化部门的有关同志在宾馆举行了党史座谈会。为了不使江老过度劳累，活动日程安排得比较松，基本是半天活动，半天休息。可是我们的这个安排并没有真正落实。在参观之余，江老仍以充沛的精力接见各方人士，同法院的同志交谈办案业务，同搞党史的同志总结延安时代的历史经验，还要接受记者的采访，并为一些求字者挥毫泼墨。

在参观中央党校旧址小沟坪时，他回忆了当年的学习情况，深情地说：1943年我带山东根据地选出的“七大”代表回到延安参加会议，但是由于党内思想不统一，“七大”延期召开，回到延安的“七大”代表全部住在中央党校进行整风学

习。通过学习 22 个整风文件，认真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结合个人的思想实际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提高了认识和理论水平，从路线上分清了是非，为“七大”的召开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所以“七大”的高度团结统一是延安整风的必然结果。这个宝贵经验，我们应该很好发扬。

在杨家岭“七大”会场，他给我们指了山东代表团的位置，同时找出了自己的座位并拍照留念。在现场给我们回忆了“七大”的盛况和会议内容。

5月30日上午，在延安宾馆召开了党史座谈会。主要由江老介绍他在延安的活动，特别是接管延安城防的详细情况。江老的第一句话就是：“这次回延安是还债来了。一是在延安生活那么久，一直没有机会回来看看，对不起延安人民；二是对我亲身经历的接收延安的历史，有责任作个交待。”接着用两个多小时讲述了当年的情况。会上，他把初步整理出的《关于接管延安城防的回忆》发给到会者，广泛征求意见。江老还特别叮嘱我说：“你在纪念馆工作多年，掌握资料多，定能拿出一份比较好的修改稿，晚上我等你交换意见。”

当我把修改稿整理好时已是深夜 11 点钟了。我很犹豫：去吧，已夜深了，会打扰江老的休息；不去吧，江老安顿说晚上等着我交换意见。为了不失约，最后还是去了。当我到宾馆进入江老的房间时，他正在沙发上一边翻看报纸，一边等我。我说：“对不起，我来晚了，还是明天再议吧！”江老说：“不行。多年来我已养成了这个习惯，当天的事情处理不完就睡不着觉。”

江老这种一丝不苟的精神深深地感动了我。在灯下，我汇报了修改的情况，对于增加的和删去的内容他都表示同意，特

别是对结尾一段很满意。但在接管时间上统一不了认识。我说周恩来副主席是 12 月 17 号去的西安，应是 18 号接管的延安城防，而江老坚持是 16 号送走周恩来，17 号进的城。因是江老的个人回忆，所以我放弃了自己的意见。当我走出宾馆大门时，已是第二天的凌晨了。

5 月 31 日上午，江老一行参观了延安革命纪念馆的 13 年斗争史陈列，以自己的切身体会写下了“圣地延安是红军长征的落脚地又是抗日出发点”的题词。回到宾馆后，江老不顾疲劳，以极高的兴趣赋诗，表达自己对延安的情怀。他亲笔书写了《参观有感》一诗：

九九加二回延安，（九九加二为 83 岁）
豪情满怀志更坚。
不尽延水滚滚流，
延安精神代代传。

6 月 2 日，江华、张邦英一行离开延安赴榆林视察。送别时我们希望他能有机会再回延安。谁知，10 年后他就永远地走了。

江华这位在延安生活工作过 5 个年头的老一辈革命家，虽然离开了我们，但是他留给这块黄土地的深情，延安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江华同志，安息吧！

（作者：延安革命纪念馆研究员）

杨尚昆二回延安

齐佩良 黄卉青

1947年3月，杨尚昆随中央撤离延安，同叶剑英等组成中央后方工作委员会赴晋绥工作，离开他生活战斗了10多个春秋的地方。但他时刻惦记着这块热土，解放后曾两次回到延安，寻访故土。

1965年5月25日，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第一次回到延安。他是代表中央来审查延安革命纪念馆的陈列内容和各旧址恢复工作的。延安革命纪念馆从1950年诞生之日起，就受到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和极大关怀。陈列内容在陕西省委的直接领导下先后调整了四次，然后申报中央审批。

杨尚昆认真、仔细地审查了陈列展览后指出：全国范围的东西这里不一定讲，外宾在北京看了，再看就没有意思了。陕北是中国革命的落脚点和出发点，延安馆要搞陕北活动，应当把重点放在陕北13年上，把陕甘宁边区群众活动搞细些，以补充中央馆。表现陕甘宁边区，就是表现毛主席的领导。要用这个思想作指导，慢慢调整和充实陈列。陈列室要有一张图，说明延安是全国的指导中心，要反映出延安和各解放区以及国民党统治区的联系，说明中央和主席在延安是如何领导全国各地的斗争。另外，国际支援部分的内容比较零碎，可增加一

些内容。大生产运动不仅要表现部队、机关、学校，还要表现群众组织变工队、互助组进行生产。他主张陈列内容“分三个阶段”展出，即：毛主席到达陕北至东征回来为一段；西征到西安事变为一段；西安事变到撤离延安为一段。杨尚昆在参观审查革命旧址的陈列时还介绍了许多当时的情况，为延安革命纪念馆恢复旧址的陈列等提供了可贵的第一手资料。他还对革命旧址的恢复和保护作了许多重要指示。他指出：“中央住过的地方叫‘革命遗址’不好，应该改为‘旧址’，中央领导同志住过的地方叫‘办公住址’不通俗，可写成‘某某同志住处或旧居’。各旧址领导人住处陈列的东西太少，显得空虚，用具太新，不够真实。我的意见，各领导人的住室内可以挂一些他们在延安时期的照片，陈列一些书籍和地图等，以增加生活气息。也可以摆一些反映主席生活的照片。我回北京后，找几本延安时期的书籍，盖上主席的印，拿来陈列在主席的住处。过去，周总理主持，军委同志绘了一张解放区形势图，美军观察组印的，我回去想办法给你们搞一张，挂在王家坪军委会议室。”

杨尚昆利用工作之余来到了杨家岭，要到山坡上找他当年住过的窑洞。当时负责接待的是窦崇贵。窦说山上许多窑洞尚未恢复，路又不好，恐怕首长不好行走。他说：“没关系，只要你能上去，我也能上去。”因为山上的土窑洞多年没人住，破损较大，道路也基本没有了，并且离开将近20年，所以杨尚昆也急忙回忆不起哪个窑洞是他住过的。在杨家岭的山坡上转了两个来回，每到一窑洞前都要认真回忆一番，并说这里可能是哪个部门，谁住的。后来转到朱德办公的那个水渠的山坡上找到了一孔窑洞，他仔细地看了看周围的环境说：“找到

了，就是这个窑洞。你们看，底下那两孔窑洞是李富春住的。”并开玩笑说：“我晚上经常给李富春头上撒尿。”他还说：“那时中央的同志们生活都非常艰苦，我每天洗脸吃饭都在山下。中央除毛、刘、周、朱、任等五大书记有人给送饭送水外，其余都上大灶。”并指着底下的石台阶说，我每天背着我的小儿子在这石台阶上走几趟。之后，他又叫工作人员给他在那个窑洞前照相留念。

下了山，窦崇贵见杨尚昆有点累，就让到前边接待室喝点茶，休息一下。杨尚昆说：“我们就到毛主席办公室休息吧。”他满怀深情地坐在毛主席办公室的椅子上，一边休息，一边给我们讲起了党中央进驻延安后打窑洞的情况：中央从保安迁到延安后，我们有了一个比较安定的环境。这时来延安的人很多，根据工作需要，又新成立了许多机关、学校。这么多的人往哪里住呢？那时既没钱，又没有什么建筑材料，有时吃饭都很困难，不论什么机关单位，只给指定一道沟，一个山茆或一面山坡，自己去打窑洞。南方来的同志，不懂打窑洞的技术，就让当地懂技术的老百姓现场指导。有的单位用几十天，有的用几个月，最多的用一年时间，就这样一边打，一边学，打成几孔就住，住下后再打。终于把住宿、办公的地方都解决了。杨家岭起初窑洞也很少，山坡上的窑洞，都是我们组织机关干部自己打成的。杨尚昆触景生情，回忆了1940年毛主席在这孔窑洞里接见中央党校的学员时讲的“延安窑洞里有马克思主义”的情景。

陪同杨尚昆一起回延安的还有他的夫人、中央戏剧学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李伯钊、《红旗》杂志副总编胡绳。另外，陕西省委副书记章泽、省委副秘书长蒋锡白、延安地委书记韩一

平、行署专员杨存富、副书记土金璋等也陪同参加了这次审查。

1996年4月7日，从国家主席位置上退下来的杨尚昆怀着轻松而喜悦的心情第二次回到了延安。当时他已90高龄，但仍精神矍铄，神采奕奕，脚步稳健。一下飞机就驱车赶往桥儿沟鲁艺旧址。回到故土，往事历历在目，在这里他讲述了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经过。他能准确地记起鲁艺多数教员的名字。他和桥儿沟村一位年过六旬的村民谈到当年鲁艺在这里的情况时，能一口算出这位村民当时的年龄，可见他的思维还相当敏捷。杨尚昆还应延安鲁迅艺术学校的邀请，挥笔为该校题写了校名。那苍劲有力的笔墨，如今已成为该校的荣耀。

在枣园、杨家岭、王家坪、凤凰山旧址及纪念馆，当年的一些照片和文物，仿佛又把他带回了那个年代。作为见证人，他讲述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史实。他有着惊人的记忆力。几十年过去了，他依然能回忆起中央大礼堂修建的经过，“四八”烈士遇难及安葬的经过。对毛主席、周总理、朱老总、刘少奇、任弼时的旧居，他看得都很仔细。对纪念馆及旧址的陈列也很满意，连声称赞：“对！就应该尊重历史，实事求是。”他对省、地领导讲：“在革命旧址也要种草、种花，绿化、美化。应该充分利用这块基地教育下一代，发扬延安精神、继承革命传统。”在纪念馆和杨家岭旧址，杨尚昆还分别写了“教育培养革命新一代”，“缅怀革命领袖，发扬革命传统”的题词。

在杨家岭旧址，来延安参加“四八”烈士遇难50周年纪念大会的“四八”烈士子女及部分革命领导人的子女近百人同杨尚昆汇聚到了一起。他们纷纷向杨伯伯问好，并询问自己父母在延安的有关情况和住地，杨尚昆一一作答。陈赓的儿子完

全继承了父亲的幽默，他问：“杨伯伯，我父母是在延安哪里结婚的？”引来了一阵笑声。此起彼伏的一声又一声的杨伯伯，将参观的气氛推到了高潮，其情其景感人至深。

在宝塔山上，杨尚昆凭栏远眺，延安市容尽收眼底。昔日的平房已被鳞次栉比的高楼所代替，过去的黄土道变成了宽阔的柏油马路，大街上车水马龙。延安已今非昔比，旧貌换了新颜，故人已认不出它的面貌。杨尚昆感慨地说：“变了，变了！”他不时询问，东门在哪里？南门在哪里？他对延安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有特殊的感情，对延安人民情更深。他每到一地，无论是革命旧址，还是在市场沟、大街上，群众总是围着他，在他经过的大街上，群众夹道欢迎。他总是热情地向群众挥手问候：“乡亲们好！”群众也报以热烈的掌声，齐声问候：“杨主席好！”

4月8日上午，杨尚昆参加了延安市举行的《纪念“四八”烈士遇难50周年大会》。他还非常关心延安和陕西的经济建设。4月8日下午，他挤出时间到当年延安的经济、金融中心——市场沟视察，接着又到中心街一家名为“烩菜王”的餐馆调查。随后听取了省、地的情况汇报。他对安启元、刘荣惠、艾丕善、巩德顺、高宜新、张志清等省、地领导说：陕西延安的资源非常丰富，要想办法尽快利用发展旅游事业，要采取多种形式扩大宣传，提高知名度，扩大招商引资，增加经济收入。在矿产资源开发上要重视能源转化，提高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的附加值。对国营企业亏损问题和农业发展，他也谈了自己很好的看法。

当天，他还专程到地处北关的延安希望小学去看望师生。他和这所学校有着深厚的情谊，因为他是这所希望小学的名誉

校长。

回延安令这位革命老人心旷神怡。据随行人员介绍，这些天他一直很兴奋。在纪念馆休息室，他和讲解员一起唱当年的歌曲，一起扭秧歌。4月9日，杨尚昆离开延安飞回北京。三天时间虽短，但这一切都深印在延安人民的心中。

（作者：延安革命纪念馆副研究员；馆员）

情系黄土地 丹心为人民

——纪念习仲勋同志逝世一周年

刘卫平

今年5月24日，是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习仲勋同志逝世一周年纪念日。习仲勋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曾担任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等职。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历任中共关中分委书记、分区专员，中共绥德地委书记。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历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委员、西北野战军副政治委员等职。解放战争时期，他协助彭德怀指挥西北人民解放军取得了青化砭、羊马河、蟠龙等战役的重大胜利。后又与贺龙一起领导西北地方武装和后方工作，为保卫党中央、毛主席转战陕北做出了卓越贡献。全国解放后，习仲勋同志担任了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在工作十分繁忙的情况下，他依然心系延安，时刻关心着陕北和延安革命老区的经济建设。他对党对革命对人民忠心耿耿、光明磊落以及他公道正派的优秀品质，是永远值得人们学习的。

—

习仲勋同志，1913年10月15日出生于陕西省富平县淡村，1926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年4月加入

中国共产党。1930年1月受党组织委派，习仲勋到国民党西北军杨虎城部的补充二团二营做兵运工作，任中共营委书记。1932年3月组织发动了“两当兵变”。兵变后带出了三个连和一个排，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习仲勋任队委书记。但这支队伍行至永寿时被敌人缴了械。“两当兵变”的失败使习仲勋对创建革命根据地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

1932年9月中旬，习仲勋率陕甘游击队三支队特务队到达三原武字区。不久，三支队特务队改编为武字区第二游击队，习仲勋任政治指导员，参加了创建原富耀新苏区的斗争。10月，中共渭北特委成立。11月，渭北六县民团和国民党三原驻军联合进攻武字区，渭北革命根据地遭到严重挫折。12月，省委派贾拓夫和杜衡到武字区，两次改组渭北特委。1933年2月渭北特委取消，成立中共三原中心县委，习仲勋任共青团三原中心县委书记。

1933年3月8日，中共陕甘边特委成立，习仲勋任特委军委书记，与刘志丹等同志创建照金革命根据地，并为此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习仲勋和陕甘边特委的领导同志，通过深入细致的工作，相继组织起农会、贫农团、赤卫队和游击队，开展打土豪、分田地、抗租抗捐抗税的斗争。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工作，北迄马栏川，南到爷台山，东至沮河，西到淳化河畔，南北40公里，东西25公里，面积1000平方公里的照金革命根据地创建了起来。1933年4月5日，陕甘边特委在薛家寨主持召开了陕甘边工农代表大会，成立了陕甘边革命委员会，周冬至当选为主席，习仲勋为副主席。此后，桃曲塬、照金、老爷岭、马栏川、七阶石等地的乡革命委员会相继成立，并开始土地分配。当时正值春耕夏种时节，为不误农时，习仲

勋提出按“原种归原主”的土地分配办法。这种从实际出发分配土地的办法，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

1933年5月，国民党集结10个团的兵力在地方民团的配合下，对照金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二次围攻。这时，担任红二十六军政委的杜衡固执己见，错误地放弃了照金革命根据地。率红二十六军南下渭华地区，主力部队遭到严重损失。红二十六军南下后，习仲勋和陕甘边特委的领导，继续在照金坚持斗争。8月14日，陕甘边特委在耀县陈家城召开党政军联席会议。会议接受习仲勋等人的意见，决定成立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统一领导和指挥红四团、耀县游击队和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10月，国民党4个正规团和6个县的地方民团共6000余人对照金革命根据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习仲勋、张秀山等指挥陕甘边党政军领导机关和红二十六军后勤处，坚守薛家寨，一天之内击退敌人连续十余次进攻，后终因寡不敌众，撤离照金革命根据地，向南梁地区转移。

南梁地区山大林密，地势险要，适合开展游击战和创建革命根据地。红二十六军进入南梁地区后，成立了后方工作委员会，吴岱峰任主任，习仲勋以红军后方特派员的身份参与领导工作。在后方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下，南梁地区普遍建立了农民联合会，领导农民打土豪、分牛羊，开展反封建军阀和地主豪绅的斗争。至1934年2月，已组织起南梁、玉皇庙、白马川、二将川、东华池等5个赤卫大队，队员达1000多人。2月25日，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在小河沟四合台村成立，习仲勋任主席。革命委员会在协助主力红军对敌作战的同时，积极进行根据地的建设。根据渭北和照金分配土地的经验，习仲勋结合南梁的实际情况，主张只分川地，不分山地。对参加劳动的地

主，也分配了土地。而对富农，只分其多余的土地和牛羊。为活跃商业贸易，革命委员会还发行了货币，在白马川、梨园堡等地设立了集市。在文化教育方面，创办了列宁小学，还在梨园堡成立了陕甘边军政干部学校，刘志丹兼任校长，习仲勋兼任政委，吴岱峰任副校长。从1934年到1935年春，干部学校共办了三期，培养革命干部300多人。1934年11月初，陕甘边革命委员会在梨园堡召开陕甘边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成立了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习仲勋当选为政府主席。1934年至1935年，是陕甘边根据地和红军大发展时期，作为根据地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习仲勋为党为革命做出了重大贡献。

1935年9月，在错误肃反中，刘志丹等一大批领导干部被王明路线的执行人逮捕关押，有的甚至被活埋杀害。习仲勋也以“右派”、“富农路线”等罪名被关押在瓦窑堡。陕北根据地陷入空前严重的危机之中。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中央红军于1935年10月19日到达陕北吴起镇，毛泽东及时发出“刀下留人”、“停止捕人”的指示。随后，习仲勋等被释放平反，从而挽救了这块在全国“硕果仅存”的革命根据地，并使之成为党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和抗日战争的出发点。

习仲勋恢复工作后，任中央党校三班班主任。1935年12月27日，习仲勋在瓦窑堡参加了党的活动分子会议，聆听了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1936年9月，习仲勋作为两名地方干部之一参加了党中央在保安召开的政治局会议。通过这两次会议，习仲勋对革命前途的信心更加坚定，对教条主义的认识更加明确。

二

1936年8月至1943年2月，习仲勋同志任中共关中分委书记、专员公署专员、军分区和关中警一旅政委。在这六年中，他领导关中党政军民，坚持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同国民党顽固派制造军事“摩擦”进行了坚决斗争，保卫和巩固了边区，使关中分区人民得以安居乐业和发展生产。

关中分区是陕甘宁边区的南大门，战略地位十分显要。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在封锁边区的同时，不断制造反共摩擦，掀起了反共高潮。据统计，仅1939年11月至1940年10月，国民党军队对陕甘宁边区制造的摩擦事件就达221起，其中关中分区有64起。在关中分区的反摩擦斗争中，习仲勋领导关中分区军民，在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下，给敌人以有力还击。从1940年9月起，国民党开始修筑西起宁夏、南沿泾水、东至黄河的五道封锁线。到1941年，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国民党军队达30万。1941年春，国民党军队首先向关中分区的职田镇、马家堡和马栏川等地发起进攻，接着又在三边、陇东挑起摩擦战斗。为了对付国民党军队对边区的进犯，中央军委调王震率三五九旅进驻金盆湾、南泥湾，把守延安的南大门。又令文年生率警一旅开赴关中分区，守卫边区的南大门。1941年8月，关中分区警备司令部成立，文年生兼任司令员，习仲勋兼任政委，原关中分区部队改编为分区独立团。在文年生、习仲勋的指挥下，关中分区军民首先在彬县以北的义石村、凤王山一带与来犯的胡宗南部激战三天，将其赶回凤王山以南。接着又在土桥镇和正宁县将来犯之敌赶回原地，从而保卫和巩固了关中分区。在反摩擦斗争中，习仲

勋提出与周边友党友军和地方绅士开展交朋友工作，这一工作的开展为争取大多数、孤立少数、打击顽固分子起到了积极作用。这也是对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正确贯彻执行。

1943年2月，习仲勋同志调任中共绥德地委书记兼绥米警备区和独一旅政委。到任后，他带领工作人员深入农村，通过细致的调查研究，帮助绥德县修订经济建设计划，努力发展生产，增强了当地的经济实力。习仲勋同志在时刻关心农民的同时，也十分重视基层干部的教育和培养。他经常给干部们讲：“我们共产党人的责任是为人民服务的，一切工作应对人民负责。既要服从上级指示，更要倾听人民的意见。”他对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深恶痛绝，始终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为人民服务的原则，赢得了老百姓的支持和拥护。

1944年12月中旬至1945年1月中旬，习仲勋和杨和亭带领绥德分区的劳模出席了在延安召开的陕甘宁边区劳模大会。大会期间，毛泽东在枣园用一个整天的时间约各地书记和专员谈话。习仲勋发言说，经过整风，干部作风民主了；搞大生产运动，减轻了群众负担；禁止赌博，改造二流子，社会风气好了。这些都是群众赞成拥护的。但也有个别干部工作简单，帮助农民订生产计划时只是填个表格，搞形式。特别是合作社摊派股金，引起群众不满。毛泽东最后在综合概括时说，群众不满意的，说明我们工作没有做到家。根据和大家的交谈，毛泽东后来在劳模大会上作了《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的讲话。

1945年6月，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仲勋同志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同年8月，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10月，又调任西北局书记。无论在哪里，习仲勋对工作都勤

勤恳，兢兢业业；在生活上都艰苦朴素，严于律己。他为政清廉，待人宽厚，心中始终挂念着老百姓。

三

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蒋介石、胡宗南制定了由南、北、西三面分进合击陕甘宁边区的作战方案，陕甘宁边区处在了严重的战争威胁之下。中共中央、中央军委采取“积极防御，集中主力对付胡宗南”的作战方针，除在三边、绥德地区留有部分兵力外，主力部队集中于边区南线备战。8月28日，时任西北局书记、陕甘宁边区集团军政委的习仲勋，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了《提高警惕，保卫边区》的文章，号召边区军民团结一致、加强战备，保卫边区，保卫党中央。11月13日，在西北局和边区政府号召的干部动员会上，习仲勋要求每一个共产党员站在自卫战争的最前线，坚决克服太平观念，迅速转入战时生活，把所有的人力、物力组织起来，服从战斗，争取自卫战争的胜利。

1947年3月，国民党军队分两路大举进攻延安。经过七天七夜的保卫战后，党中央毛主席撤离延安，转战陕北。西北局和边区政府领导成员分为两部分，习仲勋、刘景范等跟随部队协助彭德怀指挥作战；林伯渠、马明方等留守后方，领导地方工作。撤离延安的第二天，我军电台截获了胡宗南的一份电报，得知敌三十一旅于3月24日到延安以东的青化砭构筑工事据守。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与副政委习仲勋决定在青化砭附近打一个伏击战。23日，毛泽东批准了作战方案。彭德怀、习仲勋立即召集各纵队首长研究作战部署，并到青化砭勘察地形。25日，我军在青化砭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

歼敌三十一旅 3000 人。接着，又取得了羊马河、蟠龙战役的胜利。“三战三捷”共歼敌 14000 余人，极大地鼓舞了边区军民的革命斗志。5 月 14 日在安塞县真武洞举行了万人祝捷大会。毛泽东发来贺电，周恩来代表党中央亲临祝贺，并发表讲话。彭德怀和习仲勋也先后发表讲话。习仲勋在讲话中号召全边区青年拿起武器，参加游击队，参加正规军，发扬勇敢战斗精神，提高作战技术，争取更多更大的胜利；号召后方工作的同志们，动员男女老少，努力生产，积极参加担架运输和后方勤务，用一切力量支援前线。

在 1947 年 7 月中共中央前委在靖边县小河村召开的扩大会议上，决定习仲勋回后方主持西北局工作，并恢复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建制，贺龙任联防军司令员，习仲勋兼任政委。

习仲勋回到西北局机关驻地子洲县马蹄沟不久，即与西北局和边区机关一起东渡黄河，于 8 月中旬移驻山西临县碛口附近的烟囱村和高家坪一带。9 月 23 日，中央军委向贺龙、习仲勋发来筹集军费及军需品的指示，贺龙、习仲勋立即在兴县蔡家崖召开陕甘宁和晋绥两区部分领导人联席会议，决定两区财政经费实行统一，以更加有力地支持革命战争。沙家店战役后，延安以北的广大地区已基本收复。10 月 20 日，西北局和边区政府机关西渡黄河，移驻绥德雷家沟村一带，领导边区人民又开始了土地改革和支援前线的斗争。

《中国土地法大纲》公布后，西北局于 1947 年 10 月下旬至 11 月下旬在绥德义合镇召开干部会议，传达全国土地会议精神，并做出了关于在边区开展土地改革运动和整党工作的决定。义合会议后，各分区、各县迅速进行了土改和整党试点工作，但是，在土改中出现了“左”的错误。同年冬，习仲勋参

加完党中央在米脂杨家沟召开的十二月会议后，即到米脂、绥德、子洲等地传达会议精神，并检查指导各地土改及整党工作，纠正土改中出现的“左”的错误偏向。

1948年1月4日、19日和2月6日，习仲勋先后三次给党中央、毛主席写信，如实报告边区各地土改中普遍发生的左倾偏差问题及所造成的危害，并说明目前正在努力纠正的情况。毛泽东在对习仲勋的报告做出批示的同时，提议习仲勋和其他领导同志到各县去调查研究。为此，林伯渠、习仲勋到绥德分区，马明方去延属分区，马文瑞去三边、陇东，帮助指导县区干部和土改工作团的工作，发现并解决实际问题。他们坚持有错必纠的原则，切实兑现政策，以达到教育干部和群众的目的。在绥德义合，习仲勋带领西北局的同志，及时总结和推广了黄家川村土改工作的经验，并将有关材料呈报党中央。毛泽东阅后十分高兴，指出黄家川村经验具有典型性，对全国老解放区土改有着普遍的指导意义。习仲勋的这些材料对中央及时纠正土改中的偏差，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习仲勋同志在百忙中依然惦记着延安人民，关注着延安的经济建设。他说：“老区人民为中国革命的成功，做出了最大的牺牲和贡献，这里的经济建设搞得好坏，群众生活状况如何，对国内国外都有影响。”如今，习仲勋离开我们已经一年了，我们缅怀他就是要以他为榜样，牢记他的殷切期望，勤奋工作，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下，牢记“两个务必”，不断弘扬延安精神，让延安重现辉煌。

（作者：延安革命纪念馆馆员）

延安时代的历史见证人

——贺清华与延安革命纪念馆的情结

刘 煜

宝塔垂泪，延河呜咽。贺清华同志走了，带着对延安这块故土深深的眷恋之情悄悄地走了。但是，延安人民永远不会忘记这位从黄土地上走出去的好儿子，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忠诚战士。延安革命纪念馆的全体职工时时铭记着他与我们凝成的半个世纪的情结，忘不了他在宣传党中央和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在延安领导中国革命的实践活动与创建的丰功伟业中所付出的辛劳。在延安的发展史、纪念馆的建设史上，都应该为贺清华留下浓浓的一笔。

延安革命纪念馆于1950年7月1日成立以来的50年中，发展建设与宣传工作始终同贺清华同志的大力支持帮助紧紧地连在一起。因为纪念馆陈列宣传的是党中央从1935年10月19日落脚陕北到1948年3月23日离开陕北期间长达13个年头的历史，所管辖开放的凤凰山麓、杨家岭、枣园、王家坪、南泥湾五处革命旧址，主要宣传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五大书记的实践活动，而贺清华同志从1936年东征开始到毛主席身边当卫士一直到1966年离开中南海，在毛主席身边直接与间接工作了30个年头。延安时代他是最权威的历史见证人之一。纪念馆的工作性质与贺清华的特殊身份

形成了一种必然的联系，建立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深厚情结。

50年代是延安纪念馆的初创和奠基时期。从1953年开始到1959年，我们先后对遭到日寇飞机十多次轰炸和胡宗南军队破坏的中共中央机关旧址进行了原状恢复。面对着留下的断垣残壁，从何着手？首先需要找知情人调查掌握第一手资料。自然我们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在中央机关和毛泽东身边直接工作过11年的陕北老乡贺清华同志。从他那里我们知道了各单位的驻地分布，各建筑物的规模形状，又从他那里知道了一些主要建筑物的设计和建造者，扩大了调查访问的范围。我们不仅知道了建筑物的外形和内部结构，而且见到了由设计建造者杨作材和张协和保留的施工图纸，为恢复原状提供了准确有力的证据。

建筑物修复后，各领导人旧居内的陈设和具体摆放位置，多数是根据贺清华同志提供的情况陈列的。开放后，其他一些知情者回来看了后都说符合原貌。由此，我们不得不由衷地佩服贺清华的记忆力和认真负责的精神。

1957年，贺清华进京后第一次回家探亲，回到了生养他的故乡——延川贺家崖。家里的亲人多么希望他能多住几天啊，可他惦记着即将开放的延安革命旧址。几天后他就来到了延安，在纪念馆里一住就是一个礼拜。他白天一处旧址又一处旧址、一座建筑又一座建筑、一孔窑洞又一孔窑洞仔细审查指导，晚上同纪念馆的同志们围坐在一起座谈讨论，回忆当年的历史情况，发表自己的见解。当年同贺清华朝夕相处过的原纪念馆老同志窦崇贵、白振学等，一回忆起那段时光，依然充满深深的感念之情。

革命纪念馆的价值和教育功能的体现，必须建立在征集收

藏大量的文物资料的基础上。在大跃进的 1958 年与 1959 年两年中，纪念馆集中人力和时间对延安时代的革命文物进行了广泛的征集。仅 1958 年一年就征回 1.5 万件，1959 年又征集回 1.7 万多件。可以说，延安革命纪念馆现存的 3.5 万多件文物，基本上是 20 世纪 50 年代征回的。其中，也有从贺清华同志处征回的两件珍贵文物。他不仅将自己保存的文物捐赠给我们，而且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线索，从一大批老延安手中征回了一批珍贵文物，如刘少奇的闹钟，周恩来的搪瓷碗，任弼时的拐杖，朱德穿过的衣服等。

贺清华保留有毛主席送给他的一床棉被，因用得时间久了，被里被面已无法保存，他便将依然完好的棉絮捐赠给延安革命纪念馆。伴随这件文物的是一个生动感人的故事：1937 年冬天，毛泽东主席住在凤凰山麓吴家院的一孔窑洞里，卫士贺清华就住在外间的窑洞里。半夜，主席工作间隙想出去走走时，发现小贺还没有睡着，便走到床边用手摸了摸他的被子说：“是不是冷得睡不着呀？”当时冬季取暖只靠地上生一小盆木炭火，火熄后确实很冷。贺清华忙说：“不，不冷。”主席不由分说，便将自己的一床棉被抱过来给他盖上。贺清华知道主席也只有两床被子，为了自己让主席着了凉那咋行，便不愿接受。主席轻轻地拍拍他的头，小声而坚决地说：“盖上吧，我那边暖和。”从此，这床被子便跟着贺清华一直进了北京城。

这件珍贵文物陈列在凤凰山毛泽东旧居的窑洞里。它所体现出的领袖对战士的关爱之情，使所有的参观者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和启迪。另外，主席还把一把用过的刮脸刀送给贺清华留作纪念。为了让它发挥宣传作用，贺清华忍痛割爱，也将它捐给了我们馆，被定为二级珍贵文物收藏。

正因为有贺清华等一批老延安的热情捐赠，使我们的馆藏文物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高。为了充分发挥其宣传教育功能，增强延安的知名度，从1957年5月开始到1961年6月，纪念馆先后在全国十多个大中城市和陕西省5个地区20多个县举办了“延安革命文物巡回展”。所到之处，观者如潮，受到了普遍的欢迎。观众由衷地发出了“参观革命文物展，深知革命甚艰难；先烈有志报中国，忠魂鲜血遍地染”的感叹。

20世纪60年代是纪念馆的陈列宣传工作步入正轨并获得发展时期。随着全国学习毛泽东著作和毛泽东思想群众运动的兴起，来延的观众也逐步增多。为适应形势，我们经几次调整，陈列内容突出了以党中央和毛泽东实践活动为主的指导思想，旧址上加大了对毛泽东革命实践的宣传力度。但是，宣传领袖人物的丰功伟绩和高贵品质，不能靠空洞的说教而要以掌握大量生动具体形象的事实为依据。为此，我们除将贺清华同志为《星火燎原》写的回忆录《随从毛主席在陕北》作为宣传内容外，又几次派人进京访问贺清华等曾在主席身边工作过的老延安，整理了一批很有价值的访问资料。如反映毛主席艰苦的生活作风和严于律己的生动故事有：“一双驼毛袜子”、“一件棉衣”、“一块褥子”、“三块钱给主席办伙食”、“送毛岸英上劳动大学”、“视察南泥湾”等都是贺清华提供的。另外把主席伙食费紧张形容为“贼来不怕客来怕”、将大米小米混煮的饭称为“国共合作饭”、把小米锅巴戏称为“马列主义饼干”等生动的语言，也是贺清华告诉我们的。可以说，我们所开放的几个旧址解说词中，相当一部分史料都是从贺清华处得来的。由于情节真实感人，使参观者受到了深刻的教育。

在那场为期十年的史无前例的大动乱中，延安革命纪念馆

的工作也受到了极左路线的干扰。一度我们的陈列中只能出 9 位领导人的照片，旧址中也只开放毛泽东旧居和林彪的旧居。全国其他纪念地曾出现了伪造历史的情况。如井冈山纪念馆将“朱毛会师”改为“毛林会师”等，闹出了历史大笑话。延安馆一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宣传指导原则，贯彻“历史的真实性与政治的倾向性”相结合的方针，在这场风波中也产生了许多疑虑。尽管迫于政治形势增加了一些本不应该陈设的内容，但是仍遵循历史真实性原则而没有伪造历史。在强调要突出宣传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背景下，为收集有关资料，我们又走访了贺清华同志。他不愧是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生活多年的具有高度党性原则的老同志。他没有赶潮流，依然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回答我们所提出的问题，知道的就讲知道，不清楚的决不信口乱说。

贺清华清醒的头脑和对历史对延安高度负责的态度，使我们产生了一个想法：利用这批历史见证人记忆力、身体尚好的有利条件，通过实地考察搞清楚党中央和毛泽东在陕北的活动路线和具体实践，这样既对得起历史，对后人也有个交代。如果再不抓紧时间抢救这部分资料，就会造成永远的遗憾。贺清华以主人翁的身份大力支持了我们的行动计划。

1969 年 12 月 17 日开始到 1970 年元月 20 日，以延安地区革委会圣地管理组的名义特邀贺清华、石国瑞，毛主席的秘书高智，还有孙振发、齐吉书、白海山、张瑞岐等毛泽东转战陕北时的卫士，用一个多月的时间，沿着当年党中央、毛泽东转战陕北的路线，采取访问群众与现场回忆的方法，基本上搞清了为期一年零五天，路经 12 个县上千个村镇、行程 2000 多华里，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居住过 38 处地方的情况，

解决了纪念馆建馆以来说不清的一道难题。这次调查所获的资料同根据档案编纂的《毛泽东年谱》所载，除个别几处时间有点出入外，基本上是一致的，准确率相当高。

尝到了甜头，取得了经验，我们的计划又接着实施。1971年初，我们又邀请贺清华和白海山同志，历时35天，搞清了下列三条路线：一是1936年1月到5月红军东征期间在陕北境内的活动路线与实践。往返755华里，经过4个县140多个村庄，居住过13处地方。

二是1936年6月22日—7月3日由瓦窑堡转移到保安的路线，途中行走320华里，经3个县67个村庄，居住过5处地方。

三是1937年元月10日—13日由保安进驻延安的路线。途中行走216华里，经三个县50余个村庄，居住过3处地方。

在先后两次两个多月的实地考察中，贺清华同志冒着天寒地冻，坐着吉普车整天在崎岖不平的小道上颠簸。当时有些村子车子到不了还要步行，饭菜也吃不上可口的，经常在农户家啃山药蛋，吃钱钱饭（稀粥），饥一顿，饱一顿。但他从不计较这些，始终以饱满的热情，认真地走访老乡，精心地回忆思考，找不到充分的证据，决不轻易下结论。他的这种精神深深地感动了我们跟随的工作人员，使我们从他身上理解了什么叫一丝不苟，何为任劳任怨、兢兢业业。

1976年秋，我们抓住长征时毛泽东的卫士陈昌奉来延的机会，又实地踏勘弄清了党中央、毛泽东1935年10月19日落脚吴起镇到12月13日经直罗镇战役进驻瓦窑堡的行动路线。从此，党中央、毛泽东在陕北领导中国革命的活动路线全部搞清了。如果为这一成果的获得论功劳大小的话，贺清华同

志为首功。

80年代，国家经拨乱反正，纠正了极左路线，把工作重心转移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正确轨道上。但是一种倾向又掩盖了另一种倾向，忽视了精神文明建设，放松了思想政治工作，一度使资产阶级自由化甚嚣尘上，外国人称中国搞“非毛化运动”。受这股阴风浊流的影响，“延安精神过时论”出现了，来延安的观众骤减，一年仅区区数万人。纪念馆的宣传工作也遇到了严重的挑战和考验。

贺清华这位久经考验的延安老战士以高度的政治敏锐感，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不相信毛泽东思想可以不要了，延安时代的优良传统作风过时了。面对逆流恶浪，他忍无可忍，拍案而起，联络了北京、天津、石家庄等地的一批老战友、老延安提出了在延安成立延安精神研究会的倡议。这一举动得到了当时任延安地委书记的郝延寿及延安广大干部群众的响应和支持，很快就成立了筹备委员会，并组织召开了首次全国性的延安精神理论研讨会。贺清华不顾身体有病亲临会议，而且在大会上发言。他对圣地的深厚感情和对宣传弘扬延安精神的执著，使到会代表受到了极大的感染和启发。会议期间，纪念馆又邀请贺清华和其他老延安到各旧址现场回忆介绍延安时代的优良作风和老一辈革命家的具体实践，丰富了纪念馆的宣传内容。

90年代，贺清华同志因患病，说话和行动受到了限制。但他依然关注着延安的经济发展和希望工程的建设，用自己省吃俭用下的钱资助贫困家庭的子女入学，鼓励延安希望小学的孩子们好好学习，将来成为建设新延安的有用人才。

贺清华同志虽然离开了我们，再也听不到他那铿锵有力的

话语和看不到他那慈祥忠厚的面容了，但是，他的崇高精神和品质已融入我们的伟大事业。我们将加倍努力奋斗，以他为榜样，坚守在这块圣洁的黄土地上，建设一个现代化的新延安，让党中央放心，让全国人民放心，让老延安放心。

贺清华作为延安时代的历史见证人，延安革命纪念馆的全体人员将永远怀念他。

（作者：延安革命纪念馆研究员）

从毛主席身边走来的人

刘 滢

贺清华去世了，他的家人和老战友要出纪念文集，袁宝莹同志给我这个《圣地》杂志的小小编辑打来电话，希望我写点什么。要对一个自己并不熟悉而且是已经故去的人说点什么，很不容易，也很不负责任。我把这种想法告诉父亲，他老人家却恼怒了。

父亲开始急切地在屋里踱来踱去，激动地用手在空中比画着，并用很响的嗓门儿说：“怎么能说不熟悉呢？对这么一个人，这么一个把一生交给党和人民，出生入死打江山的人！怎么敢说不熟悉呢，对一个十余年忠心耿耿保卫毛主席的人，一个一辈子活在过去的人，一个一生对国家、对延安、对延安革命纪念馆做出过巨大贡献的人……”

父亲有些语塞，背过了身子，给了我一个颤动着的微驼的脊背。我知道他是在掩饰自己的泪。父亲在纪念馆里工作了36个年头，曾多次访问过贺清华，聆听过他深情的回忆。难怪他难以克制自己的感情。

深夜，望着书桌上极其概括的几百字的关于这位已去老人的简历，第一次，我感觉到了文字的冷酷。思绪如天马行空，在已逝的延安岁月的长长时空，寻找着对话的切入点。

忽然间，我有了一种想与已故者说点什么的欲望，而且这

种欲望竟异常地强烈。为什么这种交谈不是在生前，而是在死后，在我想关注他却永不再成为可能时？我不知道，真的，只是望着这薄薄的两页就能说得清一生的纸，我无法说服自己不去了解。

这位从黄土高坡走出去的劳动人民的儿子，苦大仇深的放羊娃，一个最值得依靠的阶级，注定了这一阶级出身的他具有的最最朴素的阶级感情，无论是当初跟随刘志丹、毛主席的老资格的红小鬼，还是到后来的中南海的红管家，以至于再到后来的老公安、老延安、老干部，透过那厚厚的缀满军功章的履历，我们清清楚楚看到的其实只有一条“一颗红心跟党走！”这难道不是那一代人所特有的历史，独有的忠诚吗？曾几何时，这样一份红色履历放之四海而皆准，千人对号入座都不会有些许的差错！

贺清华，这位从主席身边走来的人的身上就深深地打着这样一份烙印，他们这一代人心里只有一曲亘古不变的旋律——“咱是党的人”。为此，他们可以去当一块砖、一片瓦、一张纸、一滴水、一颗螺丝钉……一件只要是社会主义事业所需要的任何东西，而惟独不能成为自我，一个完完全全的自我！这是何等让人羡慕的单纯！

11年的悉心照料，30年的忠诚守卫，一个把主席的饮食起居当做毕生事业的人，又该是怎样执著的一个人的呀？！

那是一个纪录片的镜头，镜头中当记者问起主席的有关情况时，这位耄耋之年的老人没有表情的脸上忽儿有大滴大滴的泪珠滚滚而下……在长达一分多钟的时间里，老人自始至终都在流泪，没有讲一句话。

我猜想那一刻老人是不是想起了1937年冬天凤凰山麓寒

冷的窑洞里主席亲手为他加盖棉被；我猜想老人是不是想起了主席睡衣上他亲手补上去的一块又一块的补丁；我猜想难道是老人想起杨家岭星空下他一次次为彻夜写作的主席添油挑灯心的情景；我猜想难道是枣园的那株紫丁香又一次开花，老人家再一次听到主席那朗朗的笑声；要么就是王家坪小石桌旁父子俩亲切交谈的身影，要么就是那位房东，那株国槐，那孔土窑……

一个心中没有爱的人是不能明了这种感情的。在这种感情里，主席已不再是主席，贺清华也不再是一个警卫员；在这种感情里，主席是一个需要别人提供帮助的人，是父亲，贺清华是儿子，仅此而已。这种超越世俗的纯粹的感情对如今许多人来讲，现在无法体味，将来也不会。

推开窗户，下雪了。我知道对这位老人我已经有了足够的了解，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活在纪念里，就像没有人能够永远活在崇高里一样，而他却能。贺清华，一个普普通通的名字，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一个把纪念和爱写在生命里的人！

默立于延安革命纪念馆广场的主席塑像下，我虔诚地告诉他老人家：您的忠诚守卫——贺清华，一个从您身边走来的人，又将永远回到您的身边。

（作者：延安革命纪念馆馆员）

周总理回延安

李秀梅

1973年6月9日，周恩来总理陪同越南党政代表团参观访问了延安。总理以他伟大的人格魅力和动人心魄的感情力量给延安几十万人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周总理要回延安来了。当时，尽管上级一再通知要保密，但消息仍不胫而走，迅速传遍了延安城乡，传到了安塞、甘泉、子长……年逾花甲的老人，农忙间劳动的农民，各单位的干部、职工，上学的学生一齐从四面八方拥进了延安城。天还没有亮，人们就伫立在街道两旁，从飞机场到延安宾馆，从宾馆到南关招待所，挤得水泄不通。数万人怀着一个共同的心愿，要看一看在艰苦岁月里和延安人民同甘苦共患难的亲人——敬爱的周总理。

到飞机场欢迎的队伍，举着彩旗，敲着锣鼓，昂首阔步地穿过延安街道、延河大桥，直奔飞机场。街道两旁的人群，以十分羡慕的目光注视着他们。

延安宾馆、南关招待所、延安革命纪念馆的工作人员熬了几个通宵后，心情紧张而又兴奋，不时来到大门口，探头探脑地向外张望，焦急地等待着总理的到来。

上午10点，一架银灰色的飞机出现在宝塔山的上空，顿时“总理回来了！总理回来了”的欢呼声震撼山谷。飞机徐徐

降落，机舱门打开了，第一个走出来的就是敬爱的周总理。他穿一件白的确良短袖衫和一条灰裤子，站在舷梯最高的一个台阶上，满面笑容，频频招手，向延安人民致意，并情不自禁地连声说道：“我回到老家了，我回到老家了。”从1947年3月胡宗南进攻延安，他和毛主席一起撤离，到这次回来已相隔26个年头了。“回老家”三个朴实而亲切的字眼，蕴含着总理对延安人民多么真挚深厚的感情！

这天，细雨濛濛。这是黄土高原夏天难得的好日子。老百姓说，这是贵人来临，天降甘霖。细雨正像人民与总理的情丝，连绵不断，清新而又悠长。

周总理徐徐步下舷梯，在停机坪上和前来欢迎的省、地、市党政军负责同志一一握手。戴着红领巾的少先队员，手捧鲜花，上前献给了总理。伴着锣鼓声，人们不停地有节奏地喊着：“欢迎！欢迎！”这欢呼声道出了150万延安人民的心声。总理乘车穿过机场，已经走得很远了，欢呼声还在山谷里回荡。

飞机场平静下来了，公路及街道两旁又沸腾起来了。“来了，总理的车过来了。”人们不约而同地喊着。鼓掌声、欢呼声此起彼伏。几万双眼睛，盯着一个方向，盯着迎面驶来的一辆辆轿车。人们伸长了脖子仔细地看呀看，看哪一辆车里坐着敬爱的周总理。向来以讲礼貌守纪律著称的延安人，再也顾不了许多，前挤后拥地一齐拥下了人行道，宽敞的街道突然变得狭窄起来。平时从飞机场到延安宾馆乘车只要几分钟，这一天花了近半个钟头才驶到宾馆。车子过后，交通警察和被临时抽来维持秩序的民兵，才长吁了一口气，自言自语地说：“今天的秩序真难维持。”其实，当总理乘坐的轿车从他们身旁驶过

时，他哪里在维持秩序，而是目不转睛地看总理，完全忘记了自己的职责。还是多亏群众自觉，不管他们如何热爱总理，多心想让总理的车开慢些，在公路上街道上多停些时间，总还是让开了路，让车子顺利地驶了过去。让车子开慢些，何止是延安人民的心情，和人民骨肉相连的总理也何尝不想让车子开慢些，借此机会看看在艰苦的战斗岁月中同党和军队鱼水相依、患难与共的延安人民。事后，据总理的随从人员讲，这几年总理从来没有像在延安这样高兴过，他高兴终于实现了因工作繁忙一直未能实现的探家夙愿。

总理在宾馆稍事歇息后，即步行到凤凰山麓——党中央和毛主席到延安的第一个旧居参观。下午参观了枣园、杨家岭革命旧址和延安革命纪念馆。纪念馆选派了最好的讲解员接待总理。担任主讲的同志是既高兴又紧张。高兴的是可以亲耳聆听总理的教诲和指示，学到以前不知道的东西；紧张的是，因总理是延安时期革命历史的当事人、见证人，又陪同有外国贵宾，怕讲不好。结果一见总理，所有的心理压力和负担都没有了。因为总理是那样和蔼可亲，每到一处，一下车就主动上前和工作人员一一握手，并问：“你叫什么名字？多大了？是哪里人？”几句亲切的话语，一下就把彼此的距离拉近了，使对方一点也不感觉紧张了。

在参观中，总理从不表白自己，只是宣传介绍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人。延安时期，他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等要职，党中央的重大活动他都亲自参加，重要会议、重大决策他都亲自参与，重大事件他都亲自处理。讲解员多么盼望总理能详细讲述他在这里所经历的一切。可是每经过一处他的旧居，讲解员再三恳求进去看看，总理总是说：“我

的窑洞没什么看的。”总理就这样三次过“家门”却始终没有去看一下自己当年的家。当给外宾介绍到总理的活动或照片时，总理总是双手插在腰里，笑着说：“你怎么知道呢？没有那回事……”直到外宾亲自指着照片说：“这不是你在“七大”会议上讲话的照片吗？”总理才笑着说：“不知他们哪里搞来的这张照片，不是什么重要讲话，只是个简单发言。”对外宾提出的问题，讲解员答不上来的，他都一一解答。总理对新馆陈列内容作了全面审查，肯定基本方向是正确的，但也提出一些意见，他说：“要一分为二地宣传历史，一个陈列，就是一部党史。”“革命不是几个人，要有群众观点、干部观点，要多出一些人的照片和名字。”讲解员的讲、唱、跳受到了总理的高度赞扬，临别时总理握着讲解员的手说：“讲得很好，讲解灵活，自然大方，请你晚上来参加宴会。”讲解员真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了。

总理在延安的每时每刻，心里都记挂着人民群众。他在参观枣园时，一下车就问：“这里有公社的人吗？有大队的人吗？有当年的老同志吗？”枣园大队党支部书记雷治富、总理的老邻居高同有和女儿立即走到总理跟前。总理握着他们的手，像久别重逢的亲人一样，问高同有多大年纪了？身体、生活怎么样？并详细询问了公社、大队各方面的情况。接着又问：我有个侄子在这里插队，你知道吗？雷治富说：知道，去年他上大学去了。总理说：为什么要把他送去上大学？当农民不好吗？雷治富说：他劳动好，群众推荐他上大学。总理说：你们别因为我的关系，大学毕业后让他再回来继续接受锻炼，为延安人民工作。

在周总理回延安之前，延安地委领导曾反复开会，就总理

回延安后的饮食起居问题进行了周密而精细的研究和安排，延安人想尽其所有热情招待总理。谁知他到延安后让外宾住宾馆，自己却住在干部招待所，睡着普通的硬板床，并让随从人员转告延安地区有关负责人，午饭、宴会要简朴，就吃南瓜、洋芋、小米等“家乡饭”。午餐时，他只顾和省地负责人谈工作，一碗荞面饸饹搁凉了，服务员换了碗热的，他看见了和藹地说：“那碗还能吃嘛，倒掉就浪费了。”服务员只好把半碗饸饹还给总理。当总理吃完一碗小米饭后，看见碗里还有米粒，就盛了勺汤倒进去冲净全喝了。他又端起小米粥喝了口说：“真香啊。”并满怀深情地说：“延安的小米好啊，是延安的小米哺育了我们，哺育了革命。”总理回延安吃小米干饭、喝小米稀粥是意味深长的。

午饭后总理没有休息，利用外宾休息的空隙悄悄乘车上了宝塔山。在宝塔山上，总理长久地俯视着延安全景，仿佛在回忆延安过去的一切。当他把深沉的目光投注在松柏苍郁的清涼山上时，他变得严肃起来，问：“那里的路好不好走？那里掩埋着跟我一起打仗而牺牲了的两位战士，我要上去为这两位烈士扫墓。”那时清涼山汽车上不去。山路很陡，同志们劝他不要上了，但他却执意要去，谁也说服不了。后来还是因为陪同外宾参观的时间到了，才没有上去。

在宝塔山一块写有《复电》的语录牌前，他站立了许久。在念完《复电》后，他指着最后一行重复念：“永远保持过去十余年间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工作人员中所具有的艰苦奋斗的作风。”念完后他说：“战争的创伤是恢复了，但是文化经济建设还有问题。农业落后，粮食没有过关，现在有不少同志还不够艰苦奋斗。希望延安的同志恢复和发扬延安革命精神，加

快步伐，把延安的建设迅速搞上去，把人民的生活搞好。”地市的领导难过地说：“我们没有把延安的工作做好。”总理说：“我在中央，对延安的工作关照不够啊！”

当时延安市区至宝塔山之间的河上没有桥，车要加大马力从河水中开过去，不巧总理的车在返回途中陷进河中，任凭司机用什么法儿汽车也不能动了。延河两岸的群众远远看见便不顾警卫人员的强力阻拦，潮水般涌到了河床，许多人连鞋也来不及脱就跳进河里，人们齐声呐喊：“一二三起”！硬把汽车连同总理一起抬上了河岸。总理从车里下来，望着河滩上无数笑脸，激动地频频挥手致意。

总理对延安人民生活是十分关心的。在深夜召集的省、地、市主要负责人会议上，他多次询问延安的工农业生产建设、延安人民的生活状况，更关心粮食生产。他提出：“延安三年变面貌，五年粮食翻一番，可以吗？”当地委负责人回答说“可以”时，总理激动了，他让服务员拿酒来，为早日实现这个目标干杯。本来总理当时已重病在身，医生是不准他喝酒的，但当他听到延安的同志有尽快改变延安落后面貌的决心时，他异常兴奋地与大家一一碰杯。知心的话，舒心的酒，像滴滴甘露洒在延安儿女的心头，像团团火焰，燃烧在万里高原！

6月10日上午10时，周总理陪同外宾登上飞机，延安人民挥手告别。总理在延安只逗留了短短24小时，他给延安人民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等你们把延安建设好了我再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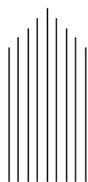
总理回到北京后，由于政治上受到迫害，身体状况愈加不好，而强烈的使命感使他仍旧日夜操劳国务。他多次打电话给有关部门，设法解决延安人民的困难。在总理的亲切关怀下，

延安的工农业生产很快得到了发展。现在延安的丝绸厂、毛纺厂、卷烟厂、钢厂、化肥厂、炼油厂等企业都是在总理的直接关怀下建起的。从1973年起，延安人民更加拼命地大干苦干，发誓要把延安建设好。延安人民一刻也没有忘记总理的嘱托和殷切希望，他们只想从心底呐喊一句话：“周总理，您再回来看看延安吧！”

可是，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匆匆地走了，永远离开了热爱他的人民。1976年1月8日早晨，延安人民从广播里听到总理不幸逝世的噩耗，和全国人民一样经历了感情上从来没有过的悲痛。这天早晨，没有人能咽下一口饭。宝塔肃立在铅灰色的天空中，冰层下的延河在呜咽。从延安到枣园十几里的大道上，人们一队队、一行行，冒着零下二十几度的严寒，迈着沉重的步子，去总理旧居吊唁。在悲痛的行列中，经过几十年严峻战争考验的老人，伤心得像孩子那样捶胸顿足地号陶；平时活泼淘气的孩子们，像霎时长大了似的抽泣着。在延安枣园追悼总理的在会上，当悼词念到：“抬头望见宝塔山，敬爱的周总理啊，你什么时候再回咱延安？低头看见延河水，敬爱的周总理啊，延安人民时时刻刻怀念着您”时，人们泪如雨下，放声痛哭！此时此刻，谁能不想起敬爱的周总理1973年在延安那短暂而难忘的24小时！

周总理永远活在延安人民心中。

（作者：延安革命纪念馆馆员）



YANAN BOYUAN

● 宣 教 论 坛 ●

延安博苑

讲解员培训工作之我见

于延俊

博物馆不仅是历史文物、标本的收藏和科学研究机构，也是对社会的宣传教育机构。讲解工作是实现博物馆宣传教育职能的重要形式，是联系广大观众的桥梁和纽带。在中国博物馆学概论中，对讲解人员的要求是：熟悉陈列内容，明确讲解对象，选择讲解重点，研究讲解方法。也就是说，讲解工作是以博物馆陈列品为依据，由讲解人员运用生动形象的语言，娴熟的讲解技巧和真挚的感情，把自己所掌握的符合陈列宗旨的要求及与之相关的知识传递给观众的过程。所以，一个讲解员要达到这样的标准，必须经过培训、学习，有一个逐步提高的过程。下面谈一谈自己在讲解员培训工作中的一些粗浅的认识和体会。

一、讲解员培训工作的必要性

博物馆是以文物、标本为基础，组成形象化、具有特色的陈列展览，给观众提供具体的、直观的、形象的感性材料，使观众能够概括地了解某一事物发展的全貌或发展过程中的几个重大环节。但是由于陈列展览中的每件文物，本身是固定的、静止的，它们无法根据不同的参观者、不同的知识和理解水平，自动地进行说明。尤其随着社会的发展，博物馆已成为提

高人们鉴赏能力和培养审美情趣的最重要的场所之一。那么观众既然来博物馆参观，如果无所得，就有大失所望之感，教育作为博物馆的重要职能也就无法体现。要让观众对博物馆产生一种需要、一种喜爱，使观众有所收获，就要借助某种形式来架起观众与展品之间的桥梁，讲解则是达到这种目的的重要途径。

观众在博物馆获得知识，一是靠视觉，二是靠听觉，心理学实验这样证明，同等容量的知识以视觉的形式去刺激观众，能够被观众记下来的仅剩 25%，如果再辅以讲解这一听觉形式去同步刺激观众，则能够被观众记下来 65%，所以说，讲解在传授知识方面具有独特的效力。此外，讲解可通过讲解员自身的主观努力去渲染气氛，烘托环境，增强观众对文物陈列的兴趣和爱好。同时，讲解员的介入可以诱发观众在心理上产生一些积极的变化，激发观众潜在的兴趣和爱好，特别是那些风度翩翩、举止得当的讲解员就更具有这方面的才能，这有助于观众更好地调动情绪、发挥想像，进而增强对文物价值认识的主动性。

由此可见，讲解工作的成功与普及讲解水平的高低，也直接影响着博物馆工作在观众心目中的形象。然而，讲解员要根据观众的需要达到日臻完善，受到观众的喜爱，也不是一日之功，而是要经过由浅入深的刻苦钻研和专业培训方能达到。从全国讲解比赛的资料来看，一、二等奖的获得者全部都是经过专业培训的讲解员，而三等奖的获得者大部只受过短期突击性培训，有的则是临阵磨枪。笔者认为，博物馆的讲解工作，不论是从考古文物、陈列内容的科学性，还是从语言表达的专业性、仪容仪表的技术性来讲，都离不开专业学习与培训，只有

经过认真、系统的专业培训，讲解队伍的整体水平才能不断提高。

二、讲解培训的方法与内容

根据自己多年来从事讲解员培训工作的经验来看，笔者认为，讲解培训要经过三个阶段，包括岗前培训、岗位培训、专业培训。

1. 岗前培训

新招收的讲解员，尽管是按照博物馆讲解工作的基本要求招收的，具有高中文化程度，五官端正，口齿清楚等等，但是他们对讲解工作都是陌生的，不了解的，因此岗前培训是她们从事讲解工作的第一步，也可称为入门培训。岗前培训一般为三个月的时间，培训内容为：

- (1) 讲解工作范围和职业要求；
- (2) 学习陈列内容；
- (3) 认真背会讲解词；
- (4) 上岗前的业务考核。

三个月的岗前培训，使讲解员明确了讲解工作的职责和要求，对工作范围有个初步的了解和认识，经过口试、笔试和现场讲解考核后达标上岗接待观众。

2. 岗位培训

岗位培训是讲解员做好讲解工作的重要环节，它主要是指讲解员经过实践中的学习和训练，逐步掌握讲解工作的规律和特点，能够较好地做好讲解工作。岗位培训一般为两年的时间，培训内容是：

- (1) 职业道德教育，树立为观众服务的观念。

（2）熟悉陈列内容，这是做好讲解工作的基础，作为一名讲解员不是仅靠背诵讲解词就能从事讲解工作的，还应当熟悉陈列环境，逐步深入地了解陈列内容，主题思想和展品知识，也就是说，要对物质的东西有个全面的认识，在了解的基础上不断掌握它。

（3）了解讲解对象，观众千差万别，在实践中，讲解员要学会掌握各类观众的特点和要求，确定讲解内容的主次和详略。

（4）学习博物馆学，对群教专业从理论上有所认识。

（5）业务考核。

经过两年的在岗培训，讲解员从理论和实践上对本职工作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培养了良好的职业素质，业务知识和讲解水平都有了提高，能够较好地完成讲解、接待任务。

3. 专业培训

经过两年的讲解实践的锻炼和岗位培训，讲解员已经可以独立地承担讲解工作，但是要真正做到因人施讲，得心应手地开展宣教工作，必须要经过专业培训。专业培训是指脱产一至两个月参加国家文物局、省、市文物局系统组织的专业学习培训班，专业培训是讲解员讲解水平提高发展的重要一环，可为一名普通讲解员向优秀讲解员的转化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培训的内容是：

（1）系统学习博物馆学，对博物馆理论尤其是宣教工作理论有个全面地较深入地了解 and 认识，能用理论指导工作。

（2）对陈列内容、文物知识有了深入地了解并结合本馆陈列展览，写出具有特色的并适合多类观众需要的讲解词、专题报告和演讲稿。

(3) 系统学习语言学，掌握科学的讲解基本方法，结合实际经验，不断研究讲解方法，做到因人施讲。

(4) 根据博物馆学的理论，结合实际工作，写出有关讲解工作的论文。

经过专业培训的讲解员，应当成为一名优秀的讲解员，应当具有敬业、精业、乐业的崇高职业精神，应当是本馆讲解队伍的骨干，优秀率越高，说明一个馆的讲解队伍素质越高，博物馆的宣教工作做得更好。

三、培训效果

多年来，各博物馆逐渐认识到讲解工作水平的高低是举足轻重的问题，忽略不得，因而大都开展了不同程度的讲解员培训活动，有力地推动了讲解队伍的建设。

1. 提高了从业人员的实际工作能力

讲解人员大都是高中毕业后从业的，到馆后经过入门培训对他们今后从业大有益处。抗战馆自 1988 年起对先后招收的四批讲解员进行培训，使其行为规范，标准统一，整体效果较好，已连续多年被全国文物局和市文物局评选为先进集体、青年文明岗。

2. 培养出了一批优秀讲解员

就全国博物馆看，大多馆还处在岗位培训阶段，一部分省、市博物馆进入了专业培训，从全国及部分省市讲解员大赛情况来看，凡是培训工作抓得好的，就是比赛获奖多的。黑龙江省、河南省、陕西省等常抓不懈，进而优秀讲解员也涌现的最多。抗战馆重视讲解员的培训工作，1992 年、1997 年获得北京市讲解员比赛第一名、全国三等奖好成绩。特别是一些优

秀讲解员善于总结工作，写出了许多高水平的文章，使人感到博物馆大有希望，充满活力。

四、探讨与研究

随着改革开放旅游事业不断发展，博物馆事业也蒸蒸日上。观众利用闲暇时间到博物馆观光、游览逐渐成为社会生活的时尚。面对形势的发展，怎样使我们讲解工作受到观众的喜爱呢？笔者作为博物馆的管理者，认为在讲解员的培训工作上也应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多年来，我们已从传统的模式中走了出来，由口授模仿自由发展向专业训练发展。1992年、1997年国家文物局举办的两届全国讲解员大赛的情况就可以看出，博物馆讲解队伍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和要求逐步向专业化方向迈进。几年来，全国各地博物馆在博物馆学会社会教育专业委员会的组织下，定期或不定期地举办讲解员培训班，使讲解队伍在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等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然而要想真正担当起博物馆宣传教育的职能，目前博物馆讲解队伍的水平是远远不够的。因此，对于讲解员的培训工作也要经常地分析，找出存在的问题与不足，磋商对策，以便更好地适应当前形势的要求和博物馆事业的需要。

1. 讲解工作理论滞后

目前我国还没有形成完整博物馆学社会教育专业理论，尤其是讲解工作理论尚未形成。博物馆学理论是一门边缘学，在中国的形成也是不太成熟的。因此，在讲授讲解工作理论时还是靠讲解工作者（大部分是靠老讲解员）在总结自己长期工作实践经验基础上，带有总结性的经验之谈，他们的授课对实践工作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然而由于还没有完全上升到理论

高度。因而缺少理论依据，规范性的东西较少，所以笔者认为，讲解工作还没有从理论上形成系统的科学标准和要求。

2. 培训方法单一

就目前讲解员培训工作情况分析，讲解员培训还处于摸索阶段，方法是以老带新，传教式的教学，不够深入。尤其在教育内容上，处在浅显的阶段，在专业知识方面学的不深，讲解技巧的培训不系统，基本功训练上也没有形成独到的体系，广播学院在培养播音员是自成体系的，有理论有专业，有训练，而博物馆的讲解员也是专业人才，但在培养、培训的教科书、理论专业、实践指导、基本功训练等方面都没有一个专门的机构去研究、去组织、去实施，因而，讲解员培训方法还是停留在简单的讲座形式上。今后如何使讲解真正成为一门艺术，还需要进行认真研究。

3. 培训工作没有与人事制度结合起来

目前，博物馆的讲解培训工作只是与使用综合在一起，凡经过培训的讲解员大都在本馆的宣教工作中干得很出色，是骨干分子。然而讲解员培训工作却与人事制度结合的少，在这方面，首先应当由国家文物部门从制度上有个根本的改变，在没有建立大规模的博物馆学院之前，应当明确一年之内从国家到地方举办几次什么档次的讲解员培训班，规定出具体标准要求，几年内是初级、中级和高级，各种级别所享受的待遇，从制度上做出明确的界定。

4. 设想

丁关根部长在视察博物馆时讲到，讲解员一定要经过很好的培训，要有一批高素质、高水平的讲解员。这是博物馆发展的必然需要，笔者认为，讲解员培训工要下大力气去加强。

（1）建立有机的培训制度，真正把讲解员培训工作列入到人才培养的大工程中去，与人事制度结合起来，成为奖励、晋级的重要依据。

（2）加强教师队伍的建设。提高师资人员的综合素质，逐渐形成既有理论水平较高的学者、又有实践经验丰富的专家相结合的教师队伍。

（3）培训方法要改革。全国有几千座不同类型的大、中、小型博物馆，讲解队伍也十分庞大，培训方法也要因地制宜，培训内容要多层次，既有普及培训，也要有提高培训，坚持理论学习，专业提高，业务考核等方法，使讲解员培训工作纳入专业化、系统化、规范化的轨道。

（作者：抗日战争纪念馆副馆长、副研究员）

浅谈博物馆宣教队伍的 科学化、规范化管理

蔡琳

宣传教育工作是博物馆联系人民群众的纽带，它的好与坏，直接关系到博物馆陈列展览、保护利用和科学研究等方面工作的社会效益的发挥。那么，如何来切实加强博物馆宣教队伍的科学化、规范化管理呢？笔者就延安革命纪念馆宣教部在这一方面的工作实践及有关问题作一初步探讨。

延安革命纪念馆是为纪念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延安领导中国革命 13 年历史而设立的专业性博物馆，始建于 1950 年 6 月。该馆的任务主要是保护、开放革命旧址，征集革命文物，在对文物资料进行科学研究的基础上，向广大人民群众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在完成这一任务过程中，宣教部起着沟通博物馆和观众之间的桥梁作用。宣教人员的业务素质和宣教队伍管理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着宣传教育管理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着纪念馆的宣传教育效益。多年来，延安革命纪念馆在没有现成的管理模式可借鉴的情况下，坚持在实践中探索经验，循序渐进，强化管理意识，从而逐步走上了宣教队伍建设的正规化、科学化管理的道路。

一、严格把好进人关，树立正确人生观

从本质上讲，讲解工作属于艺术范畴。招收新讲解员时，只有经过严格的考核和选拔，才能保证讲解员素质的可塑性。把好进人关，是宣教部培养合格讲解员至关重要的第一步。多年来，延安革命纪念馆坚持按照以下五条标准选拔讲解员：1. 思想进步，品行端正，热爱宣传讲解工作。2. 身体健康，相貌端庄，举止大方，精神面貌好。3. 必须具有中专（或同等学力）以上文化程度，知识面广，有一定的自学能力和文字水平。4. 身材匀称，身高：男 1.73 米以上，女 1.65 米以上，年龄在 18—20 岁之间。5. 普通话标准，音色圆润甜美，口齿清楚，具有一定的语言表达能力和歌唱、表演技能，有文体专长者更佳。从建馆至今，延安革命纪念馆严格把关，先后招进 19 批讲解员。特别是 1989 年，先后从大、中专院校毕业生中择优录用了一批各方面素质都比较高的讲解员，以充实宣教队伍。经过几年的培训和工作实践，使纪念馆宣教队伍的整体素质达到了建馆以来的最高水平。陕西省讲解行业的老前辈亲切地称赞这支队伍是陕西省博物馆宣教战线上的“龙头”。

讲解员既是精神文明的建设者，爱国主义的传播者，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因此，必须具有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高尚的道德品质和朴素的工作作风，树立献身于本职工作的事业心。为了切实加强宣教队伍的建设，在严格把好进人关的基础上，延安革命纪念馆还注意从以下几个方面做好人生观教育：1. 抓政治理论学习。坚持每周三政治学习日制度，认真学习《毛泽东选集》、《邓小平文选》等经典著作，写心得体会，举办学习专栏，联系实际开展各种形式的讨论会，既锻炼了口

才，又提高了大家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2. 抓时事政策学习，及时了解改革开放新动向，对中央和省、地各级领导部门的有关文件理解吃透，使大家的宣传口径和党中央保持一致，起到党的喉舌作用。3. 抓职业道德教育，经常请老同志给讲解员上职业道德课，传授搞好宣传工作的宝贵经验，并用自身经历说明讲解工作的重要意义和美好前景。每年开展一次“怎样做一个合格的讲解员”、“假如我是一名观众”的讨论会，增强大家搞好本职工作的自信心和责任感，树立“创优质服务，讲职业道德”的思想意识，不断提高服务质量。4. 坚持延安精神教育，经常请老红军、老八路讲光荣传统，从而促进大家端正工作态度，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在理论学习的基础上，延安革命纪念馆还开展了领袖人物故事和革命故事演讲会，绝大部分讲解员自己编写演讲稿登台演讲，她们从故事中得到启迪，受到教育。宣教部还组织了20多人的“送温暖小组”，多次给老红军，八一敬老院的老同志表演节目，担水劈柴洗衣服，使这些当年曾为革命事业做出很大贡献的老人们在晚年得到欢乐和温暖。

由于延安革命纪念馆在宣教队伍的建设上坚持严格把好进人关和进行树立正确人生观的教育，从而使宣教队伍出现了“四多一少”的新风气，即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多了；好学上进、钻研业务的多了；无私奉献的多了；争做好人好事的多了；讲吃穿、图享受的少了。

二、加强专业培训，提高业务水平

随着博物馆事业的迅速发展，文博知识在现代人类发展中有着越来越重要的社会作用。现代人类的社会生活，需要高层

次的文化修养，而这种高层次的文化修养，在博物馆事业上所显示的认识功能、教育功能和美感功能中很大程度上得到了体现。但是，如果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尤其是宣教人员的知识水准属低层次的话，就远远满足不了人们高层次文化修养的需要和社会需求。有鉴于此，延安革命纪念馆采取送出去培训和在岗培训两条途径，来提高讲解员的总体文化水平。近年来，延安革命纪念馆有计划地在西北大学、西安政治学院、延安大学、延安地委党校等大专院校先后培养出大专生 25 名。目前，在现有的 43 名讲解员中，除 18 名是中专程度外，其余均已达到大专文化程度。在岗培训，是一种既不误工作，又见效快的有效培训途径。对未达到大专文化程度的讲解员，每年定期举办文化知识学习班，请大专院校的讲师讲授写作知识和语法知识，拓宽她们的知识面，提高写作水平，为适应博物馆事业的发展奠定坚实的文化基础。

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延安的伟大革命实践，是中国共产党史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教育者必须先受教育。系统地学习中国革命现代史，把中共党史弄通吃透，才能胜任本职工作。从 1988 年起，延安革命纪念馆就做出了党史学习计划和安排，以《中共党史讲义》上、下集为教材，以“十三年”、“延安精神”为专题，由本馆研究员和宣教部负责人共同给讲解员讲课，每周集中一天时间授课，每学完一课，都要分专题讨论，举办竞赛，并进行严格考核。为检验学习效果，有 19 名讲解员参加了成人自学党史课考试，并都取得了合格证。1993 年，延安革命纪念馆派出 3 名讲解员参加了地区举办的“党史党建知识大奖赛”，取得了优异成绩，获得集体二等奖。

为使本馆的讲解员逐步实现“三员一体化”（即集资料员、

讲解员、研究员于一身)，延安革命纪念馆从1989年开始，即规定每个讲解员一季度必须写一篇业务论文，年终进行评比。由宣教部组织的、全馆业务人员参加的业务论文研讨会，让专业研究人员给予指导，使每个讲解员都达到了能讲会写、知识面广的水平，从而打破了人们普遍认为讲解员只会讲不能写的传统观念，增强了讲解员的自信心。1993年，延安革命纪念馆又提出了有职称的讲解员每年必须要写两篇文章在报刊上正式发表的要求。据统计，延安革命纪念馆的讲解员几年来共撰写了260多篇文章，其中有40多篇受到馆里奖励，另有30多篇在报刊上发表。

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陕西省文物局对博物馆宣教工作尤为重视，提出了“讲解水平上台阶”的要求。讲解水平要上台阶，讲解技巧无疑是极重要的一环。讲解技巧，是指讲解技能在讲解实践中的巧妙运用。实践中的讲解技巧很多，归结起来，主要是对讲解词的熟练掌握，普通话的准确发音，讲解的表达，讲解的态势等四个方面。基本条件良好的讲解员，不一定就能成为一名合格的讲解员，因此，除了自身努力外，还要组织起来，加以严格培训，使其聪明才智得到充分发挥。

为此，延安革命纪念馆对宣教队伍讲解技巧的提高作了详细的培训计划，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利用旅游淡季，举办了两次讲解技巧培训班，开设语音语法、讲解技巧、仪表仪容形体等课程，聘请延安教育学院的语文教师、延安歌舞团的声乐教师亲临授课和现场指导，从语言、语音表达、普通话、形体训练抓起，并作嗓音、气息、口齿辅助训练。其次，根据每个讲解员的自身条件，采取集体辅导与个别指导相结合的方法，针对讲解内容，分别采用平直调、高升调、弯曲调、

降抑调这四种语调进行认真指导。再次，根据讲解内容，确定总体讲解基调，或轻松明快，或高昂悲壮，或深沉平稳，然后考虑各部分的表达方式，设计每个段落的讲解语气，如轻重缓急，断连疏密，刚柔扬抑等，特别对重点段的表达，作细致的设计处理。

三、推行目标管理责任制，促进宣传接待工作规范化

延安革命纪念馆在总结以往经验的基础上，从本馆实际出发，由宣教部制定了《延安革命纪念馆宣传接待工作规范》。“规范”分别对部主任、各点组长、讲解员、接待服务员、售票员、文物安全员规定了比较细致完整的工作职责和服务接待规范。其中包括服务条约，服务礼貌用语，接待观众程序，对观众讲解应掌握的四个要素，对外宾接待，服务质量标准，业务水平要求，讲解的技巧和方法，等级讲解员条件等诸多方面，使宣传接待工作从实践上升到理论，形成了一个系统网络，既适应时代需要，又不死板教条，同时又具有科学性和可操作性。

在“规范”实施之前，延安革命纪念馆组织全体宣教工作人员，认真学习“规范”细则，使各点负责人、讲解员、接待人员等在明确各自岗位职责的基础上，两次组织现场观摩，按“规范”的程序示范表演，使全体工作人员受到了很大的教育。“规范”实施以来，收到了明显的效果，为创规范化优质服务走出了一条新路子。一位讲解员深有感触地说：“刚开始按‘规范’接待观众时，觉得很是不习惯，好像和日本人一样，礼节太繁琐了，观众不一定能适应。但通过实践，发现观众对这

种接待方式很乐意，还能激发观众的听讲兴趣。”“规范”中规定的讲唱跳相结合的宣传方式，结合文物内容和旧址场所，唱一首当年的革命歌曲，跳一段拥军秧歌。巧妙的讲解艺术，生动地再现了当年的情景，大大激发了观众情感，常常出现讲解员边唱边跳边讲，观众也跟着唱、跟着跳的动人场面，把人们又带回了延安时期的火红年代，令人流连忘返。1989年9月，江泽民来延安视察时，和讲解员一起唱、一起跳，他高兴地对讲解员说：“你用这种方法宣讲，把延安精神讲活了！”此后，李鹏和李瑞环来延安，都对延安革命纪念馆这种宣传方式给予了表扬和肯定。1991年6月，国家文物局马自树、张柏副局长来延安革命纪念馆检查工作时说：“你们用讲、唱、跳的形式，把讲解内容和文艺形式融为一体，很吸引人，有较强的感染力，很有特色，在全国还是第一家，值得推广。”他们看了规范化的接待工作后说：“你们馆的宣传接待工作搞得很好，讲解员的精神好，管理工作有条不紊。”

强化管理是目标管理的一条有力措施，以强制的手段实现目标管理，以定额、制度、奖惩等条列为制约手段。从1989年以来，延安革命纪念馆对讲解员实行岗位责任制和量化考核奖惩制，定讲解批数指标，规定旅游旺季每个讲解员每月必须完成40批讲解任务，旅游淡季为每月20批，完成任务者发给全月奖金，超额完成任务者，每超一批奖励1元；完不成任务者，除扣掉当年奖金外，每少一批罚1元。全勤者在完成任务的前提下，每月奖励10元，因工作失误或与观众发生争执者，依情节轻重给予罚款处理。以量计酬，以质计奖，极大地调动了讲解员的工作积极性，平均每个讲解员每年讲解观众达484批，8135人次，讲解覆盖率由1992年的50%上升到1994年

的 80%。

四、坚持量化考核，建立等级讲解员制度

延安革命纪念馆在宣教队伍建设中，坚持把业务考核作为管理制度来抓，并以此作为检验讲解人员业务素质和讲解水平的重要标准，同时也为宣教部制定下年培训工作计划提供依据。由于一切从实际出发，所以这项活动事先都有安排、有计划、有准备、有要求，方法、内容、形式每年各有不同，大体可分为三类：一是现场试讲，二是观摩试讲，三是离开现场的讲台式试讲考核。由参加考核的人员自选题目，写出书面讲词试讲并进行评比，还邀请地委宣传部、地区文教委、文化文物局、外办等有关部门负责人和专家组成评委会，当场亮分、录像，排出名次，成绩张榜公布，进行表彰奖励，达到相互学习、相互促进、取长补短、共同提高的目的。

在严格考核的基础上，延安革命纪念馆还逐步建立和完善了等级讲解员制度。讲解员在自己特殊的工作岗位上，努力完善讲解艺术，不断研究提高，成绩突出者已享有一定的地位和待遇。1991年以来，延安革命纪念馆经试讲考核，党史知识考核，论文评选等全面衡量，每年评选一次等级讲解员。等级讲解员在完成讲解任务的前提下，每月分别给予不同标准的岗位津贴，以资鼓励。这一制度的建立，激发了大家的竞争意识，出现了研究讲解技巧及多写文章多投稿的好现象。

近几年来，延安革命纪念馆已形成了较科学、系统、严格的宣教队伍培训和管理制度，建立了宣教工作人员业务档案，制定了业务考核量化表，对每个讲解员一年来的思想状况，服务质量，工作任务，业务实绩通过量化表，得出公正的结论，

为讲解员今后不断进取指明了方向。

延安革命纪念馆宣教队伍在培训、提高的工作实践中，经过不断探索、研究、创新，形成了一整套较为科学规范的建设体系，为培训工作摸索出一条新路子。辛勤的劳动，结出了丰硕的果实。经过培训，延安革命纪念馆宣教队伍的整体素质得到很大提高。目前，大部分讲解员均已达到较高的讲解水平。近年来，延安革命纪念馆多次派讲解员参加全省、全国范围内的讲解比赛，都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在同行中引起强烈反响，从而赢得了较高的声誉。

延安革命纪念馆采用这一系列培训方法，不仅较快地提高了本馆宣教队伍的整体水平，而且还先后为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纪念馆、西安事变纪念馆、志丹陵管理所、黄帝陵管理所、清凉山管理所、宝塔山管理所等单位培训了 40 多名合格讲解员。

宣教队伍的培训工作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工作任务，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发展，博物馆的宣教水平也要不断提高。延安革命纪念馆的宣教工作者一定要向全国文博系统的同行虚心学习，互相协作，不断完善、提高讲解员的培训水平，为培养出具有更高水平的宣讲队伍而努力。

（作者：延安革命纪念馆馆员）

讲解技巧初探

——谈“主”与“辅”的灵活运用

张 娴

讲解是一种集表演、朗诵、演唱于一体的综合艺术。它不仅具有教育作用且有很强的感染力，一场成功的讲解就是一堂生动的人生观教育。在此，笔者就“主”与“辅”在讲解中如何灵活运用，作一初步探讨。

“主”与“辅”是讲解内容与讲解形式的两个方面。所谓“主”：一是说，以讲解词为主要讲解内容；二是说，讲解的形式必须以讲述为主；三是说指导思想要以颂扬为主。而“辅”则指的是：要用故事、事例、数据等辅助内容丰富主内容；要用演唱、讲故事、表演等辅助形式烘托、渲染主形式——讲解，二者必须有机地统一。

好的讲解应以讲词为主导，补充说明的辅内容必须为主内容和主形式服务。辅内容的取舍，讲解以外的辅助形式的采用，要根据主内容的需要存留。离开讲解词，辅内容则离题万里，辅助形式也是画蛇添足。不要辅内容，单凭干巴巴的讲词或不要辅助讲解形式，光靠单调地讲，讲解就会枯燥乏味，失去吸引力。只有巧妙地将“主”、“辅”穿插进行讲解，才能把讲词讲活，把历史再现。

怎样才能灵活运用主内容、主形式和辅内容、辅形式，提

高讲解效果呢？

1. 主内容要讲清

主内容是必须向观众交代的内容。因而，主内容的讲解，要详细、清楚，不能随意取舍，更不能任意捏造，而要尊重历史，实事求是地介绍历史，反映历史的本来面目。任意添枝加叶，歪曲历史，都会使讲解产生不良效果。

要讲清主内容，第一，讲解者必须具备满腔热忱的服务态度。讲解工作是一项重复性的工作，讲解效果如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讲解者的服务态度。是全心全意，还是半心半意，是决定能否讲清的关键。如果只是蜻蜓点水式一带而过，那么，讲主内容只能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残缺不全。第二，讲解还应具备扎实的基本功。讲的基本功，即就是要讲得真切，记得准确，层次清楚，主题突出。这些是讲清主内容的基础。

2. 辅助内容要借助多种技巧讲活

辅内容是对主内容的补充，辅助形式又是增强气氛、讲活主内容的手段。如果说，主内容的讲解是画了条腾空欲飞的巨龙的话，那么表演、演唱等辅助形式就是巨龙身下的祥云。没有“祥云”，讲解就会死气沉沉。只要辅内容讲活了，主内容也就会生动感人。要讲活辅内容：①辅内容的选材要生动感人，紧扣讲词；②讲辅内容要把口头语言和身体语言结合起来，充分调动口、手、神、情的技巧，使文字变活，故事变真。比如讲到《群众秧歌队》时，要利用秧歌舞和演唱把静止的图片，变成亲眼目睹的现实，从而增强讲解效果。

3. “主”与“辅”的灵活运用

一次成功的讲解，是主内容、主形式，辅内容、辅形式成功搭配的结果。主内容讲清了，辅内容和辅形式也较为生动感

人、优美逼真，但这还不够，更主要的是在讲解实践中灵活运用。“主”与“辅”的灵活运用，无论是内容穿插，形式交替，都没有固定的模式，它是根据讲解对象灵活运用：（1）对一般观众讲解时，应以讲词为主，点带一些辅内容说明讲词和一些辅形式烘托主形式；（2）对中小學生讲解，应多采用生动有趣、浅显易懂的小故事贯穿讲解全过程，一味平均用力，同样没有好效果，轻则提不起小观众的兴趣，重则就会把小观众讲糊涂，起不到教育的作用；（3）对学生团体讲解，要掌握他们多理性认识，少直接实地感受的缺陷，应采用讲文物引事件，看场景忆当年的方式，既不能滔滔直述，又不能故事连篇累牍；（4）对老干部讲解时，要考虑到老干部熟悉历史又体力不支的特点，采用点“主”带“辅”的方式，用表演技巧再现昔日场景，缩短老同志昔日与今日的时间差。

总之，讲解的主内容（讲词）、主形式（讲解）与辅内容（故事背景）、辅形式（表演、演唱）在讲解过程中，只要能恰当运用，讲解这门艺术就会步入一个新的境地。

（作者：延安革命纪念馆馆员）

也谈讲、唱、跳的讲解艺术

刘 滢

延安革命纪念馆从成立至今，已有 50 年的历史。半个世纪来，我馆对宣教工作中的一线讲解进行了长期的多渠道、多形式的探索和研究，最终形成了以讲、唱、跳相结合为主要形式的讲解风格，在全国博物馆系统独树一帜。

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告诉我们，任何一种事物的发生发展都有一个过程，人们对其认识也要有一个过程。既是该事物实现这个过程后，也不应看作是其发展的终端，而应随着时间空间的推移，继续得到充实、完善、发展或改弦更张。革命博物馆在发展的同时，既有机遇又面临严峻的考验和挑战。客观地讲，挑战多于机遇。近几年中参观人数锐减，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均不容乐观，有的甚至到了难以为继的程度。出路何在？急需我们去探寻开拓。尽管一些来自社会的客观因素我们无能为力或难于左右，但可以从内部、从主观上挖掘潜力，加大改革力度，增强人员素质，改善宣传服务设施，尽可能吸引更多的观众。这里，仅就博物馆工作中的宣教工作，特别是我们选择的讲、唱、跳三结合的讲解艺术谈一点粗浅的认识，以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首先，纪念馆的宣教工作主要是将所陈列的内容通过一定的形式宣传给观众，以收到教育作用为目的。内容决定形式，

形式是为内容服务的。延安时代生动活泼的革命斗争内容，决定了宣传的形式也应该多姿多彩，讲、唱、跳相结合的方式便应运而生。

讲解是由主体讲解员的“讲”与客体观众的“听”构成一体的，讲解过程，是讲解员与观众双方共同完成的。讲解员的职责是必须以一种观众最容易、最乐意接受的方式，加上浅显、优美、生动的语言，把自己的所知传达给观众。在施讲过程中，讲解员不能仅是文物、版面的直白，也不应是不加变化地千百遍讲词的重复，更不能我行我素唱信天游，而应该从内容的需要为出发点。

延安时代虽说物质贫乏，但精神生活丰富多彩，文化活动异常活跃。延安文艺座谈会后，群众性的文艺活动更是如火如荼。那是个充满歌声的年代。只要人们聚集到一块，便会情不自禁地载歌载舞。在解放区这块明朗、自由、民主的土地上，昂扬进取，乐观向上成了时代的主旋律。

特定的岁月，特定的文化氛围决定了延安革命纪念馆讲解员讲解的特殊性，新颖性。他们必须选择一种方式，这种方式将最大限度地再现昔日火热丰富的延安生活，而不单单是就事论事给观众讲述那段历史。延安革命纪念馆讲、唱、跳相结合的宣传方式的运用，可以追索到 70 年代初。

1970 年，在周恩来、邓颖超的关怀指导下，以中联部的名义组织延安革命纪念馆部分讲解员到南方各纪念地考察。在前往韶山、井冈山的路上，大家自发地唱起了刚学会的“毛委员和我们在一起”等江西民歌，就在这时不知是谁甩出一句话：咱们干吗不唱咱的《南泥湾》、《绣金匾》呢？对呀，如果在咱馆的讲解过程中，讲到文艺座谈会就演唱《兄妹开荒》、

《夫妻识字》，讲到大生产运动就唱《南泥湾》、《纺线线》，观众一定会欢迎的。如果说要寻根索源，这可能就是讲、唱、跳这一讲解形式的最初考虑。从南方回来后，讲解员试着在讲解过程中加入一两段相应的歌曲，结果观众显出极大的好奇和赞同，往往是讲解员与观众同声歌唱，气氛异常热烈。因为得到了观众的认可，这一形式从一开始便显示出了极强的生命力。这时这种讲解方式只是讲解员一种不自觉的举动，只是觉得观众喜欢，可以活跃气氛，拉近观众与讲解员的距离，并没有固定成一种讲解模式。

1973年6月9日，周恩来总理回到阔别26年的延安。为了接待好总理和越南贵宾，根据参观时间缩编了讲词，而且大胆确定运用讲、唱、跳相结合的方式，以求得到周总理的首肯。具体规定了在什么地方唱什么、跳什么。在枣园书记处小礼堂介绍到当年军民鱼水相依的关系时，讲解员吴欢显唱了《绣金匾》，总理一边听，一边点头。在杨家岭，当讲解员李秀梅在文艺座谈会旧址讲到王大化、李波演出《兄妹开荒》时模仿了其中一段，一边唱一边跳。总理饶有兴趣地看着、笑着，并对周围的同志说：“当年我把这个节目还带到重庆演出过，盛况空前呀！”在纪念馆大生产运动部分，讲解员郭荣在陈列的纺线车前唱起了《纺线线》，总理随着节拍拍着手，听完后大步上前握着小郭的手说：“你把我们都说服了。”接着又打趣地问：“你怎么知道气得蒋介石扑闪扑闪干瞪眼呢？”全场哄堂大笑，参观气氛被推到了高潮。可以看出总理对讲解员的讲解是满意的。

总理的满意无疑是对这种讲解方式的一种肯定，从此我们在接待重要客人时，都强调用这种讲解方式。招收讲解员时也

特意增加了一条：能歌善舞。

这时的讲、唱、跳形式虽较前有了很大的规范性，比如在哪儿唱，唱什么，唱多少等都有了详细规定，但并不普遍，仍有很大的随意性。1982年整台延安时期小节目开始登台亮相，讲、唱、跳成为讲解的一种方式被正式确立。

1989年9月，江泽民来延安可以说是讲、唱、跳这一讲解方式发展的一个重要契机。在杨家岭中央办公厅楼前热烈的拥军秧歌声中，江泽民也加入了扭陕北大秧歌的行列。他说：“你们把延安精神讲活了。”如果说在这之前许多人对这一讲解方式还存有异议的话，总书记的这句话等于给这一讲解方式开了绿灯。从此，讲、唱、跳作为延安革命纪念馆独有的一门讲解艺术开始进入全面发展阶段。1991年宣讲队成立，1996年扩建为宣讲团。这时的讲、唱、跳讲解艺术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方面已都系统化、规范化了。在省和全国组织的讲解比赛中，延安革命纪念馆独领风骚，使这一形式以崭新的姿态展现在全国各大博物馆面前。

这期间也并非没有异议。但1997年在延安召开的全国革命博物馆联席会议上，延安革命纪念馆作为东道主，全方位地展现了自己独具特色的讲、唱、跳相结合的讲解艺术，使代表们耳目一新。联席会从另一个角度讲相当于一个鉴定会。讲、唱、跳作为一种独创的讲解艺术获得了各大革命博物馆权威人士的承认。

其次，当宣教工作在实践中形成一种比较可行的方式后，不能公式化、简单化，也不能一劳永逸，而要正确引导第一线的同志通过学习，提高业务素质，不断研究解决一些深层次的问题。我认为，今后应注意处理好以下三个问题：

一、讲解并非演讲

讲解并非演讲，不是说讲解不需要激情，而是说激情的表达只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讲解，使讲解变得更加生动，更有感染力。讲解是一种诱导，而不是强加，它是一种简单明了的说明文，是以史和物的自身的价值和情节去感动人。但它不应是一首激昂的抒情诗，声情并茂地要求别人去感动，这样将会造成喧宾夺主的不良局面。演讲是产生语言艺术效果的一种方式，决不能取代讲解。针对革命旧址讲解和我馆展厅讲解的具体环境，应循循善诱，娓娓道来，而不应慷慨陈词，说教大于以理服人。随和、平易的讲解易于拉近观众与自己的距离，从而使观众在信任自己的基础上，再与自己的讲解产生共鸣。试想，如果以一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姿态讲解，即使你再慷慨、再激昂，观众也只是以旁观者的姿态欣赏，决不会产生共鸣。笔者曾多次进行过这方面的尝试，结果证明，平和的叙说更容易打动人心。许多观众反馈：“这样的方式好，千万不要以教育人的口吻，把我们置于小学生的境地。”

二、讲是根本，唱和跳只是讲的一种辅助或补充

讲、唱、跳三者中讲自然是主要的，占主导地位；唱和跳是讲的一种调和剂，是一种动态的形体语言。它的作用就是要活跃观众思维，使观众兴趣盎然，不致因枯燥无味而打瞌睡，提不起精神。如果没有首尾相连，贯穿全过程的讲解，突如其来的唱、跳只能使人感到莫名其妙。我们的唱、跳绝不是游离于讲解之外而独立存在的。唱的是那个时代的歌，跳的是那个时代的舞，而这一切都不应该脱离大背景，只能是情不自禁，

油然而生，而不应生搬硬套强加于人。可以说，脱离了特定氛围的唱跳是毫无意义的。如果观众只是想欣赏一场精彩的演出，那就大可不必在这里浪费时间。因此，唱跳只能是一种水到渠成的情感交流和共鸣。讲到文艺座谈会，讲到小纺车，讲到那时的延河，那时的小米，讲到那时火红的斗争秧歌，优美的秧歌剧，你轻轻地唱，缓缓地跳，观众打起节拍与你同歌共舞，沉浸在那个时代，观众与讲解员的眼里溢着泪花，那才是一种最理想的讲解效果。说到底，所谓的讲、唱、跳，我认为是讲解员在接待观众过程中，观众与讲解员的交流达到一定火候，而叙说已不能更好地服务于讲解，只有唱起来、跳起来才能使观众的情感找到最大宣泄口的一种情感解决方式。这时的观众决不会以讲解员的唱歌跳舞水平的高低来说长道短，而只是把讲解员的这种宣传方式作为一种载体，使自己对那个时代的怀念之情有一种依托。他感动的是那个时代，是一张照片或者一件文物带给他的震撼力，而不是唱、跳本身。即使你五音不全，他也会为你真心地鼓掌喝彩。

三、充实、丰富的讲解内容是发展、完善讲、唱、跳讲解艺术的关键

讲解的内容，是每一位讲解员进行每一次讲解的依据。当你已获得了观众，你主动热情的讲态已感化了观众，使每一个观众都能围着你转成为你的朋友时，充实、丰富的内容便是决定你成功与否的关键所在。作为一名讲解员，必须掌握较充实的理论知识和历史知识，这样才能在具体实际工作中得心应手，能在观众中间游刃有余，能及时解答观众所提出的疑难问题，使观众不仅有听头、有看头，而且有学头，参观之后能有

所收获。如果你腹中空空囊中羞涩，只烂熟了条条框框的讲解词，对于观众所提出的问题，一问三不知，那么你此时的唱、跳只能是你浅薄无知的证明。即使你有再好的讲态也是徒有其表，难以弥补内在的空虚。所以建设一支高素质的讲解队伍才是这一讲解形式坚持下去的关键，千万不可本末倒置。

总之，革命博物馆的宣教工作如何在新的世纪走出一条新路，是所有有志于革命博物馆事业同仁义不容辞的责任。延安革命纪念馆在这方面已经做出了有效的尝试，所采用的讲、唱、跳相结合的讲解形式，已经引起各方的关注，这是一件好事。我热切希望能够组织一些专门工作者，对不同类别的博物馆的宣教实践进行认真总结，给予理论上的深入研究，以期使博物馆的宣教工作收到更好的效果。

（作者：延安革命纪念馆馆员）

用讲解展示革命旧址的历史 价值和永恒魅力

高延红

王家坪革命旧址是延安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每年都有数以万计的各地游客到这里参观学习，接受革命传统、爱国主义和延安精神教育。解说历史史实，展示伟人风采，弘扬爱国主义主旋律是讲解员的基本职责。做好这些工作，既能告慰革命前辈，又能教育子孙后代，意义是非同凡响的。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努力学习有关知识，全面提高整体素质，长期坚持口才训练，特别是要探索实践，总结提高讲解艺术水平，用讲解充分展示革命旧址的历史价值和永恒魅力。

一、开讲必须吸引观众的注意力

好的开讲等于成功的一半。能否在开讲之时，用三言两语紧紧抓住观众的心，吸引他们的注意力，就成为讲解能否有效发挥作用的重要一环。许多观众，特别是组团参观的游客和学生观众，列队进入旧址之前，相互之间总有许多话要说，注意力常常分散在其他一些事情上。为了吸引他们的注意力，引导他们进入特定的参观思维之中，讲解员必须匠心独具地运用新颖、奇趣、智慧的开场白，一开始就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牢牢把握讲解的主动权。

开讲的方式很多，比较常见的类型有下列几种：

1. 故事型

在开始讲一个与讲解内容有密切联系的故事，从而引出所要讲解的主要内容。这样的故事要完整，有精彩细节和主要人物，从而唤起观众听讲的欲望。

2. 开门见山

也就是一开始就用高度凝练的语言，把讲解的基本目的和主要内容介绍给大家，引起他们对下文内容的兴趣，然后再给观众仔细道来。

3. 幽默型

即以幽默诙谐的语言及事例作开场白，通过幽默的智慧启发观众集中精神，进入特定讲解情境之中，自觉接受讲解的内容。

4. 引用型

即引用名家、权威人士和观众所熟知的人物，具有高度的感染力和极强说服力的语言，为讲解主要内容做好铺垫和烘托。

5. 悬念型

即通过设置悬念，使观众产生极大的好奇心，并跟着悬念的思路进入讲解的主要内容。

6. 抒情型

即借助诗歌、散文等抒情文学样式，通过艺术文化的语言和汹涌澎湃的激情，感染观众，把观众带入讲解内容的氛围和情境之中。

7. 闲聊型

即先与观众以对话的口吻谈一些与讲解内容无关的话题，

然后逐步引向讲解内容，从而与观众建立起友好的融洽的关系，为讲解发挥作用奠定基础。

二、针对观众的不同需求，对口进行讲解

我们每年接待的数以万计的观众，他们的年龄结构，生活经历，知识修养，兴趣爱好各不相同，如果用固定不变的方式讲解固定不变的内容，讲解效果势必受到影响。因此，在讲解过程中，我们应该十分重视根据观众的不同特点和不同要求。根据多年的经验，把他们分成几种类型，因人而讲，有的放矢，使观众获得更多的收获和极大的享受。

第一类，专家学者类。这类观众不仅对领袖人物在延安的革命实践有较多的了解，理论修养也比较好，思想认识水平也比较高。他们参观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增加感性认识。因此讲解不宜做过多的情节描述和理性评判，只需说明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什么人物，什么事件即可，声调适中，语言平实，只需要介绍清楚真实情况就行。

第二类，大中学生类。这类观众的特点是思想活跃，联想丰富，兴趣广泛，又是进行爱国主义、革命传统和延安精神教育的主要对象。对这类观众，讲解的语言方式要适合学生特点，要有文采，有激情，讲解过程中要夹叙夹议，要强调讲解内容的思想教育成分。对他们感兴趣的部分可加大讲解容量，对他们提出的一些问题可进行平等的探讨，对于不同的理解和看法可以求大同存小异，留给他们一定的思考余地。

第三类，是高校部队的学员。讲解必须全面正规，不仅要介绍旧址的基本概况，还要比较详细地介绍重要旧址、重要人物、重要历史事件和重要故事的详细情况，使他们对党中央、

毛主席在这里的革命实践活动有比较全面的了解，对人民解放军的光荣传统更是要认真学习，继承发扬光大。对他们的讲解，我们扮演的就是教师的角色。

第四类，是老革命、老延安和老干部。他们是最为特殊的一类。他们有的在延安生活战斗过，或者是对延安早已向往已久。他们来这里重游故地，重温那光辉的延安岁月，或者是圆延安之梦。对于老革命、老干部，我们的讲解要内容丰富，感情饱满，声情并茂，表现出我们对革命前辈的崇敬之情。对于老延安，我们既是讲解员，又是小学生，最好的讲解方式，就是漫谈式或交流式。要按老延安的意愿，和他们一起边参观，边交谈，边讲解，有时，甚至能和这些老延安一起沉浸在对延安岁月的回忆之中，使我们受到深刻的教育。给他们讲解，有时还能收集到一些延安岁月的动人故事。这对我们加深对革命历史的理解和提高讲解水平有很大帮助。

三、要善于推出讲解的重头戏

波澜起伏，引人入胜。在讲解过程中切忌平铺直叙，而应有变化，有转折，有波澜，有精彩的“戏眼”，能提得起观众的兴致和精神，对讲解过程中的重头戏要浓墨重彩，特殊处理，从而起到画龙点睛的重要作用。

1. 人物重头戏

在王家坪旧址住过的领袖人物有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他们在王家坪住的时间虽有长有短，主要事迹也各有不同，但伟大却各有千秋。所以，在讲解过程中，抓住最能表现这些伟人精神气质的重要内容进行重点讲解，突出王家坪旧址的重要意义，展示人物的个性风采，就成为讲解过程中的精彩

片段。比如毛泽东的战略远见，革命胆略和幽默风格，朱德的朴实风格，彭德怀的将帅之才、英雄之气，都具有极强的吸引力。处理好这些重点，是讲解取得成功的重要前提。

2. 事件重头戏

毛泽东会见新四旅负责同志，是在王家坪发生的重要事件。面对大家的思想疑点，毛泽东阐述了放弃延安的重大意义，既表现了毛泽东对陕北人民的无限深情，又表现了一个革命领袖面对危急情况的高超智慧和战争艺术，情理交融，胆识超群，在讲解过程中，语调、表情、动作都应随着事件本身的发展变化，表现出特定的起伏规律，使观众真正信服毛泽东克敌制胜的法宝。

3. 故事重头戏

好的故事对观众的吸引力是极为突出的。毛泽东送毛岸英上“劳动大学”的故事是一个千古佳话，里边蕴含了毛泽东对中国未来的期望，表现出毛泽东超乎常人的教子观。所以，毛泽东对毛岸英的谈话，毛岸英在农村的突出表现，都应形象具体地给观众讲解清楚。甚至对毛岸英在朝鲜光荣牺牲的补充介绍，都能对今天的观众产生强烈的冲击力量，对培养“四有”新人也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4. 细节重头戏

在伟人的生活中，往往一个细节都能折射出他的思想光辉和精神个性。如敌人轰炸延安，警卫员拿了弹片给毛泽东看，毛泽东的从容回答让人从心底里敬佩：“噢，这个很好啊！可以打两把菜刀用。”领袖的无所畏惧和幽默风趣在片言只语中尽得风流。又如朱德手把手教人纺线，把劳动人民的本色表现得十分成功，讲解得好，让观众能产生极强的亲切感，自然也

容易在不知不觉中受到教育和启发。

四、要讲究讲解的结尾艺术

必须根据具体情况，选择最佳结尾方式，以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难忘的印象。

1. 高潮式的结尾

即在讲解主题得到升华，情绪氛围得以渲染的最高点时结尾。使讲解的最主要内容在最后时刻给观众留下难以忘怀的印象。

2. 总结式结尾

在结尾之时，对讲解内容进行提纲挈领的归纳和总结，把讲解内容的总体脉络明晰地告诉观众，使观众在重新回味之时纲目分明。

3. 回忆式结尾

可以用那些语言简洁，内涵丰富，富有劝诫与教育意义的精练语言，把讲解主题浓缩在一两句话中，使观众既方便于记忆，也能受到深刻教育。

4. 赞颂式结尾

一是对所讲解的内容或人物事件由衷赞颂，引发观众的同样心理。二是对观众的认识进行赞颂，鼓励他们学习光辉历史和伟人风采，在今后工作生活中追求更高境界。

讲解艺术是一门内容丰富的大学问。愿我们共同努力，在讲解中不断探索，为发展独具个性特色的革命旧址讲解艺术，努力奋斗。

（作者：延安革命纪念馆馆员）

独具魅力的讲、唱、跳讲解风格

张 娴

讲、唱、跳讲解艺术，是延安革命纪念馆在讲解工作实践中，不断尝试、探索、总结，并加以创新的一种独具特色和魅力的讲解风格。这种讲解风格鲜明的特点是：讲解员用演讲、解说、表演和形体语言，多层次、多角度、多种艺术手段生动形象地展现历史，活灵活现地刻画人物，惟妙惟肖地描述事件，使人耳目一新，受到广大观众的喜爱。

一、讲、唱、跳讲解艺术的尝试与实践

革命纪念馆陈列的内容，具有特别鲜明的革命性、阶级性和斗争性，这就要求讲解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用浓厚的感情色彩感染观众、影响观众、教育观众。建馆初期，讲解仅局限于“背诵式”复述，观众处于“填鸭式”被动接受。那时观众普遍的存在“朝圣”心理，加之“左”的政治空气的压力，讲解唯政治而讲解，观众更不敢妄自挑剔。“背诵式”讲解，针对一遍与千遍的关系，观众倒不觉着什么，然而，久而久之，讲解者却犯了腻味，倒了胃口。有人大胆提出，与其这样，还不如反复播放磁带，这不一举两得吗？于是，播放磁带也尝试过，背诵式讲解也试图改进过，但都不尽如人意。讲解形同一潭不动的水，到了非改进不可的地步。

“文化大革命”后，政治空气明显宽松，讲解员初步尝试着把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崇敬，对人民领袖的热爱和对敌人的憎恨，用自己的激情表达出来，或喜或悲，或抑或扬，营造了一种独特的气氛。虽然仅是内心自然质朴的真情流露，却深深地打动了听众。70年代初期，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回到延安，当介绍到延安大生产运动中用过的纺车时，讲解员情不自禁地边表演、边演唱了一曲《纺线线》，将总理的思绪带回到了火热的延安岁月。总理十分激动地赞扬讲解员的讲解风格好，讲的灵活，自然大方。

在尝到成功的喜悦之后，延安革命纪念馆没有停留在初步成果上，而是大胆地在讲解实践中探索和总结，鼓励讲解员结合讲解内容，尝试着创新和改革。从此，讲解工作新的局面开始了。

二、讲、唱、跳讲解艺术的形成与发展

80年代后期，在自发实践获得成功的基础上，这种“无名”的讲解风格，普遍受到了广大观众的好评，表扬信似雪片般飞到讲解员手中，引起了领导和宣教工作者的普遍关注。为使这种新生的讲解特色日趋成熟，纪念馆投入了大量的精力，专门邀请了有关语言文学、表演、播音、舞蹈等方面的专家教授评估，讲学，示范，现场指点；组织讲解员开展创新后的讲解业务比赛，相互交流，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兼容并蓄，吸收众家之长，接受专家指导。

这项讲解改革分五方面进行实施：

一是岗位实践。引导讲解员在本职岗位大胆实践，细心总结普遍受到观众好评、反响强烈的讲解方式，从实践中摸索一

再实践—提高。

二是内部交流。在实践中获得成功的基础上，适时组织内部观摩演示，讲解座谈和年终业务考核，通过内部交流，正确引导，不断改进和完善。

三是外出锻炼。讲、唱、跳的讲解艺术形成雏形后，在馆领导的支持下，宣教工作者走出阵地，积极投身到广阔的社会大舞台中接受锻炼，广泛听取不同层次观众的意见并逐步改进。

四是与兄弟馆交流。革命馆有革命馆的讲解特色，历史馆有历史馆的讲解风格，讲解员在保持自身讲解特色的同时，也吸收了历史类质朴自然、平静细腻的讲解风格，做到刚柔并济、搭配得体，以此不断修正、丰富讲解内容和讲解技巧。

五是不拘形式，博采众家之长。为了丰富完善讲、唱、跳讲解艺术，我们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方法，博采众长，补己之短。在坚持在岗培训的基础上，每年有计划、有目的地选送讲解员进入专业类学院学习，培养造就高水平的专业人才，逐渐使讲、唱、跳讲解风格成长为别具特色的艺术门类。

讲、唱、跳讲解艺术中讲的方面，主要突出的有这么四种风格：第一，号召型。纪念馆的陈列内容，大多具有简捷、明快、激昂的政治鼓动性，这要求讲解员讲解时，要充分调动情绪，利用声调、表情、手势，生动形象地将号召性的讲词变成观念的真实感受。如讲到黄河保卫战一段时，要用近似呐喊的激情和黄河奔涌般的气势以有力的手势，使观众如身临其境，热血沸腾。第二，缅怀追忆型。革命馆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可歌可泣事迹的浓缩，对他们的缅怀追忆是整个讲解的一条主线，后代人在缅怀追忆他们丰功伟绩中才能受到教育和启

迪。因此单靠平铺直叙难以达到良好的宣传效果。讲活这类素材，讲解员必须饱含浓厚的阶级感情，用追忆的语气、深沉的情感、悲伤的表情讲述，用动人的情感加上语言的魅力震撼听众的灵魂，达到教育的目的。比如：讲“四八”烈士遇难这段，要首先营造一种特定的氛围，讲解员可如泣如诉地讲述“四八”烈士为争取和平民主而英勇献身的伟大壮举，以此感染观众，影响观众，从中受到教益。第三，欢快型。讲伟人趣事、文艺题材等内容时，要克服呆板的讲解，采用欢快、喜悦的形式讲解。如讲解文艺座谈会时，要用表演式的综合讲解，充分调动声音语言和形体语言，声情并茂，绘声绘色地把那时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的火热场面描绘给观众。第四，授课型。如讲解理论性较强的内容时，讲解员就不可随心所欲、口若悬河，而要求措辞严谨、语言规范、阐述明确。总的说来，要用哪一种形式，是依据讲解题材而定，力戒机械照搬。熟能生巧，活则受益。

三、讲、唱、跳讲解艺术的完善与提高

为使讲、唱、跳讲解艺术日臻完善，走向全国，延安革命纪念馆统一修编了《延安革命纪念馆解说词》，编写了《讲、唱、跳讲解技巧实施方案和培训制度》，制定了讲解员选拔条件，严把讲解员选苗、培养、上岗关，从而形成一套完备的讲解员产生、成长机制。讲、唱、跳讲解艺术形成一个完整成熟的体系后，进一步用于讲解实践。活讲活用是发挥好这门艺术的又一关键环节。在这方面，着重把握好四个环节：

(1) 在阵地讲解时，依据陈列内容和讲词需要，灵活把握讲解技巧，插播式穿插小节目，小片断，小故事和小段歌曲，

烘托主题，映衬主题，铺垫主题，为讲解主题服务。

（2）在参观间隙，利用观众休息之际，归纳总结，高度提炼前面所讲内容，集中表演一组精彩的文艺节目，使观众放松了疲劳的身心，既饱览了黄土风情，又领略了历史风貌，并为下一阶段的参观作了充分的铺垫。

（3）在观众晚间休息时间，从事社会活动，主动和他们搞些联欢活动，给他们提供参与的机会，使白天的参观更具体化、形象化，真正使观众入耳、入眼、入心、入脑，终生难忘。

（4）组织流动宣传队。利用参观淡季，主动出击，变固定的阵地讲解为流动的舞台宣传；变繁杂冗长的文字图片为一台短小精彩的文艺节目，节省了时间，扩大了教育面。

90年代初，延安革命纪念馆组建了延安精神宣讲团。宣教工作者凭着多年大胆实践，勇于探索出来的讲、唱、跳成功讲解经验，靠着一个包、两盘磁带，百余张幻灯资料，几把扇子，几条彩绸和数篇精彩的宣讲稿，把延安精神请出窑洞，走向全国。他们下农村，进工厂，走城市，走一处火一处。近年，我们先后赴北京、天津、上海、山东、河北、云南、郑州、南京、深圳、厦门、福建等十几个省市宣讲300多场，听众达30余万人，被人民群众誉为播撒精神文明的“天使”。

从1990年起，延安革命纪念馆先后数次参加全国全省的各类业务比赛，取得可喜的成绩。尤其是讲、唱、跳讲解风格在文博界独树一帜，令同行们刮目相看，兄弟单位相继上门取经，派徒学艺。讲、唱、跳讲解艺术普遍得到同行业和社会各界的一致认可，国家文物局马局长、张局长说：“你们用讲唱跳的形式，把讲解内容与文艺形式融为一体，很吸引人，有强

的感染力，很有特色，在全国还是第一家，值得推广。”

延安革命纪念馆独辟蹊径，大胆尝试、实践，逐步完善的这门讲解艺术至此迈进了艺术的殿堂，成为独具特色的讲解艺术。

（作者：延安革命纪念馆馆员）

增强讲解员的责任感 加大宣教工作力度

孙麦才

如何使讲解工作得到根本的加强，最大限度地激发讲解员的职业道德感、责任心是一项长期而艰苦的工作。做好这一工作的关键在于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完善的规章制度、科学的管理和运作等。笔者试从以下几个方面对这一问题进行一个粗浅的阐述。

一、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增强工作动力

责任感，从根本上讲是一个政治觉悟问题。政治觉悟的提高，有赖于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当前有些领导同志受社会上“一切向钱看”思想的影响，错误地认为调动讲解员的积极性，少讲道理，多给“实惠”；低估思想教育的作用，同时忽视教育者应先受教育这一基本常识，没有认识到讲解员在工作中的双重身份，即他们本身既是教育者又是受教育者。另外缺乏思想教育的针对性，在安排政治教育时只跟大形势走，却忽视了本单位以及个人的思想实际。

如何改变上述状况，抓好对讲解员的思想教育呢？首先，各级领导要坚信思想政治工作是我党的一大优势，思想教育有着巨大的潜移默化的作用。坚持不懈地对讲解员进行马克思主

义基本理论和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教育，把帮助讲解员树立远大的理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信念作为根本任务来抓。其次，要把讲解员作为特定对象，从他们的特点出发，着重解决好三个问题：一是要引导他们全面看待和正确处理得与失，解决好得失观的问题，进而热爱讲解，安心宣教工作；二是引导他们全面看待和正确处理苦与乐，解决荣辱观的问题，进而以苦为荣，以苦为乐；三是要制定讲解员学习计划，使学习教育走向制度化、规范化。在工作安排上，要把讲解员的教育列入工作日程，保证教育内容、时间、人员三落实。

二、健全目标责任制，增加讲解压力

一些讲解员工作缺乏主动性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讲解员工作目标不明确，责任不落实，缺乏压力感。因此，必须建立健全讲解员的目标责任制。

要科学地制定目标。一是职责对应，即根据不同等级的讲解员提出不同的目标。二是目标合理可行。目标既要有一定的难度，又必须是经过努力才可以达到的。具体说主要是根据本单位的客流量订出每月应完成的基本讲解批数，达到基本讲解批数就算完成任务，不奖不罚；低于基本讲解批数，每批酌情给予处罚；超过基本批数每批给予适当奖励。三是措施得当，以保证目标完成的真实性。具体讲，要制作一个一式两联的《讲解情况回执单》，让观众为讲解员打分。这既能记载讲解批数，又能反映讲解质量。

三、加强专业培训，提高讲解能力

专业培训是讲解员讲解水平提高发展的重要一环，它能在

普通讲解员向优秀讲解员的转化中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专业培训主要是系统地学习博物馆学、博物馆理论尤其是宣教工作理论。对本馆的陈列内容、文物知识有深入的了解并结合本馆陈列展览，写出具有特色并适合多类观众需要的讲词、专题报告和演讲稿。要重点抓好“双达标，双过关”活动，即：“普通话达标、形体训练达标”，“过职业道德关、过党史知识关”。

专业培训的方法应因地制宜，可以划分为初级、中级、高级三个层次进行培训。初级除学好基本理论外主要应采取以老带新的方法；中级应送省、市文物系统组织的专业学习培训班学习；高级应送国家文物局组织的专业学习班或西北大学文博系深造。

四、开展研讨活动，挖掘讲解潜力

许多讲解员在任职期间，有一个热情和能力发挥的低谷阶段。出现这个阶段大体有两种原因：一种是刚从学校毕业的学生，当他们从事一段实际工作后，特别是在工作中碰了不少“钉子”后，发现理论和实际之间存在着一定距离，于是在工作上表现出迷惘或困惑。另一种情况是一些老讲解员，尽管他们对陈列及旧居情况熟悉，临场经验也很丰富，但他们发现仅凭这些还不能适应新形势下观众的需要，于是出现知识“饥饿”现象。出现这两种情况并不是说他们能力的枯竭，应该说他们的潜在能力需要采取有效的方法进行诱导和挖掘。那么怎样挖掘呢？前者是要把他们从书本中解救出来，从实践当中感知理论；后者则要使他们把实践经验加以升华和提高，而要达到这一点，最有效的办法是组织他们开展工作研究和探讨，挖

掘他们的潜在能力。

每个讲解员应该进行深层次的专业研究，出观点、出成果，逐渐成为专家型讲解员。总之，随着博物馆社会影响力的扩大，博物馆社会教育职能范围也日益扩展，过去那种讲解是讲解，宣传是宣传，联络是联络的单打一工作方式已不适应今天形势的发展。今天的博物馆社会教育需要的是一专多能的复合性工作方式和思维活跃、博学多才的复合型人才。每一个讲解员都应成为既是讲解员、资料员，又是研究员的复合型人才，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把宣教工作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作者：延安革命纪念馆副书记）

“我”与观众

刘 滢

讲解是一门系统的综合性艺术。作为一名革命历史遗址、文物的讲解员，其主要目的就是要将当年的真实情况生动地讲授给观众，使观众获得一定的历史知识。那么，如何才能实现这一目的呢？我从事讲解工作多年，从实践中探索，总结出了几点浅见拙识。下面就“我”与观众的关系谈谈自己的几点看法，以供同仁们共同切磋。

一、观众是“我”的上帝

犹如生产者把消费者作为自己的上帝一样，对于一个讲解员而言，观众就是自己的“上帝”，所不同的是，前者为物质产品，后者为精神产品。生产者的目的是为了满足消费者的需要，所以时刻要将目光投向消费者，察言观色，以变换自己的产品种类和产品结构。对于讲解员，同样也要时刻抓住观众，目光盯着观众，传授有关的历史知识，以满足观众的心理需求。如果观众满意了，说明你的讲解是成功的，否则，就是失败的。因为，只有观众对你的评价才是衡量你讲解成功与否的惟一标准。所以，我认为，不妨把观众当做“我”的上帝，是言之有理的。

二、实现观众与“我”的“二元统一”

像舞台上演员演戏时，能成功地进入自己所扮演的角色一样，一场生动、精彩的讲解，可将观众和自己同时带入那火热的历史岁月，犹如身临其境，使观众与“我”融为一体。我们不妨谓之观众与“我”的“二元统一”。那么，如何才能实现这一统一呢，我认为必须要做到以下几个方面：

1. 主动、热情、大方的讲解是实现“二元统一”的前提

作为一名讲解员，当你给观众进行讲解，首先要善于提起观众的兴趣，善于打开观众心灵的窗户，消除观众的杂念心理，使观众注意力集中，想听、愿意听下去。这是你讲解能否成功的必要前提。那么你自身必须要做到主动、热情、大方，否则，你即使后面讲的再生动，内容再丰富，也将会事倍功半，收效甚微。因为你一开始就没有获得观众，未能揪住观众的心，如果连你自己也拘谨放不开，蹑手蹑脚，那么，你这台戏必然是唱不好的。

2. 充实、丰富的内容是实现“二元统一”的关键

内容是讲解的主体。当你已获得了观众，你主动、热情的讲态已感化了观众，使每一个观众都能围着你转，成为你的朋友的时候，充实、丰富的内容便是决定你成功与否的关键所在。作为一名讲解员，必须掌握较充实的理论知识 and 历史知识，这样，才能在具体工作中得心应手，能在观众中间游刃有余，能及时解答观众所提出的疑难问题，使观众不仅有听头、有看头，而且有学头，参观之后能有所收获，你才能得到观众的承认、赞赏。如果你腹中空空，囊中羞涩，只烂熟了条条框框的讲词，对于观众所提出的问题，一问三不知，那么，你即

使有再好的讲态也是徒有其表，难以弥补内在的空白，难以收到满意的讲解效果。所以，我认为，要想让自己的“上帝”满意，首先得从“我”做起。提高“我”自身的业务素质是非常必要的。

3. 灵活多样、娴熟完美的讲解技巧是实现“二元统一”的主要途径

“对牛弹琴”这句成语有两种含义，即比喻对不懂道理的人讲道理，对外行人说内行话。相反的，也讥笑说话的人不看对象。讲解也是这个道理，讲解员要视不同的观众以不同的讲解方法，也就是说要因材施教讲，不管你的“琴音”弹得多么优美，多么动听，但观众不同，收效也就不同，有时甚至适得其反。对于同样的内容，面对不同的观众，要善于采取灵活多样、不拘一格的讲解技巧，以使自己的讲解变得生动形象，无论是什么身份的观众都易于接受，都乐于接受，从而使“我”与观众达到相互沟通，消除“我”与观众之间的距离。这就要求“我”在具体实际工作中，认真探索，总结经验，寻求有效多样的方法，以使自己的讲解技巧逐步完善，达到娴熟完美，得心应手。

总之，我认为，作为一名讲解员，具备了以上几方面的能力，那他就一定会获得成功，会成为一名合格的讲解员，也就能得到自己“上帝”的认可、赞誉。

（作者：延安革命纪念馆馆员）

讲解员应矫正的不良心理

孙麦才

讲解员是联系博物馆与观众之间的纽带，发挥着人与物之间的桥梁作用，是博物馆形象代言人，因而，这一职位显得非常重要。但讲解员在反复地讲解中容易产生一些不良现象，影响着这种“桥梁”作用的发挥，有损博物馆整体形象。下面，试对几种现象及纠正措施谈一点自己的看法。

一、“应付”心理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每天多次重复同一个内容，一些讲解员产生了厌倦情绪。尤其是遇上对陈列无兴趣，对讲解缺少回应的观众，应付地讲一下就算完事。要消除这种“应付”心理必须做到：第一，素质上加强培养，努力提高讲解员的政治素质。政治素养的培养提高，重点要放在爱岗敬业这个核心问题上，加强对讲解员职业荣誉感、职业道德观的教育。正确认识自己讲千遍和观众听一遍的关系，大力培养他们的集体荣誉感和全局观念；培养奉献精神，在单一的工作中，调整好自己心态，摆正位子，明确自己的职责。第二，实行讲解员等级制，以科学的考核方法对讲解员分级，挂牌上岗，按讲解批次多少、水平高低、服务优劣等，给予不同的奖励或补贴。当然，最理想的办法是把讲解员的工资与业绩、水平挂钩，体现

多劳多得、按业绩定酬劳的分配激励机制。延安革命纪念馆多年来就是按照试讲、党史、史料积累、讲解批数、工作质量的考核成绩评出一、二、三级讲解员，每月分别给补助 40 元、30 元、20 元，大大提高了讲解员工作的积极性、责任心。第三，宣教部主任、宣教组长，要看到自己在宣教工作中的影响力。有道是，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如果宣教部主任、组长不带头讲，那么，很难说服讲解员。领导不应付了，讲解员就不敢马虎。

二、“怯场”心理

在实际工作中，真正不愿做讲解工作的是个别现象。而对所讲解的内容研究不全、不深、不透的占绝大多数。他们不注意社会科学和相关科学的学习，理论根基浅，知识面较窄，对观众提出的问题，从历史上讲不清，从理论上讲不透，为此不敢大胆地讲解，怕丢面子、失身份。要克服“怯场”的心理，首先要在业务素质上提高。主要应放在专业知识总量和相关知识结构，讲解语言的组织、表达能力和态势技能上。特别要加强博物馆学理论的学习和实践，不能认为背会了讲解词就是一个合格的讲解员。要想成为一名优秀的讲解员就要经历一个相对漫长的知识技能和经验的原始积累时期，且要付出很大代价。给观众一碗水，自己要储一桶水。作为一名讲解员，一方面要热爱本职工作，有强烈的事业心，另一方面就是要有扎实的理论功底，开阔的眼界。其次要大胆地投入实践，要使讲解员懂得经验是在实践中获得的，光靠书本上知识是不行的，还必须深入生活，勇于实践。只要不怕丢面子、失架子，敢于总结和摸索，一定能够成为一个优秀的讲解员。

三、“威严”心理

有的讲解员认为，讲解员就是老师，有师道尊严的心理。我讲你就得听，因此板着脸，没笑容，语言生硬，没感情，使观众望而生畏，拉大了讲解员与观众的距离。有的观众有不明白的问题不便问；有的观众干脆不听了；有的观众借题发挥寻机闹事。消除这种威严心理主要应从认识上“归位”。要把讲解和教书这两种职业区别开来。首先是受教育的对象不同。讲解的受教育者是文化层次不同的不固定游客观众，而教书的受教育者是文化层次基本一致固定的学生；其次是目的不同。对于观众来讲是寓教于乐，在乐中教，在玩中学，对于学生就必须学懂弄通。因此要把讲解员看成服务员并不是老师，要热情给人以亲切，诚恳给人以信任，关心给人以沟通，这样才能达到共通、共识、共鸣的教育目的。

四、“依赖”心理

目前大部分博物馆对讲解员的管理还是“大锅饭”式的管理，或有改革但还没有突破性进展。“工资靠上拨，工作靠自觉，质量由人说”的状况一直困扰着宣教工作。因而有的讲解员认为，讲解是“软指标”，做多做少、干好干坏一个样，观众要求讲解时，老讲解员说新讲解员应该多“锻炼”，新讲解员说老讲解员应成为“模范”，你推我，我拉你，谁也不愿多讲。要纠正这种依赖的心理，主要还是要改变现有体制下的分配模式，充分运用好经济杠杆的调节作用，用经济手段促进和管理好讲解工作。湖南芷江受降纪念馆在这方面的有益尝试，或许能给我们以启示。在讲解收费的同时，为了鼓励讲解员多

讲解、讲解好、服务好，采取了承包制，讲解员原档案工资全部封存，改由收取的讲解费支付。讲解收费标准对外公布，统一由馆里收取并开出正式收据。将正常的讲解时间和需讲解的景点向观众明示，如有观众投诉、讲解质量不高、服务不好等，一经查实，对当事人处 10 元以上罚款。同时张榜公布讲解员的姓名、照片；讲解员上班佩戴胸章，等候点派或轮流上讲。讲解收费总额的 30% 上缴馆里，70% 作为讲解员工资，以讲解批数多少、质量高低、服务优劣来分配和发放。这种分配体制上的改革，依据劳动者个人贡献的大小、水平高低来评定其工资待遇，合理拉开收入差距，体现了按劳分配、多劳多得、优劳优得的原则。这是那种在“大锅饭”下滋长的依赖心理得以矫正的优方良药。

以上四种心理是讲解员讲解过程中最易出现的心态。希望我们的讲解员同志能从中受到一点启发，从而重视自己的职业，在工作中不断地发现自己，完善自己，当一名合格的讲解员，发挥好观众与博物馆之间的桥梁作用。

（作者：延安革命纪念馆副书记）

如何培养一支建设精神文明的宣教队伍

刘 滢

延安革命纪念馆于 1950 年组建，1958 年后陆续对外开放，在全国来说，是一个比较大的馆。下面，仅就如何培养一支建设精神文明的宣传队伍，谈一点很不成熟的体会。

一、培养一支德才兼备的宣传队伍是继承发扬延安精神的需要

党的十二大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重要保证之一。而继承发扬延安精神，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支柱和主要内容，也是反对和清除精神污染的有力武器。宣传好延安精神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义不容辞的责任。

什么叫延安精神？它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是什么？这些问题必须首先搞清楚。延安精神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它是中国共产党及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领导中国革命的长期斗争中，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培育形成的，它的实质概括为一句话就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因为它在延安时期发展成熟并在实践中证实了它的强大威力，所以人们称它为延安精神。其基本出发点是一切依靠我们

自己的力量，“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要获得自由、独立、解放，“全靠我们自己”。其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坚定不移地相信人民是创造历史的主人，是推动历史车轮前进的真正动力，只要坚决相信、发动和依靠人民群众，就一定会渡过难关，战胜强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它不仅体现于根据地的经济建设上，而且体现在思想、政治、军事、组织各个方面，成为党中央制定一系列方针政策的主要依据。

毛泽东同志在建国初就提出要“发扬革命传统”，希望“全国一切革命工作人员永远保持过去十余年间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工作人员中所具有的艰苦奋斗的作风”。邓小平同志在1980年12月的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宣传、恢复和发扬延安精神。1983年10月，邓立群同志来延检查工作，同地委领导同志交谈中，对延安精神的历史意义作了深刻阐述。他说：延安精神在战争年代起过伟大的作用，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仍然有伟大的意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的延安，经济、文化比许多国家落后，也比不上北平、南京、上海。可是，因为有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集中了一大批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优秀青年，有政治觉悟很高的边区人民，所以延安就成为全国乃至全世界革命者和进步人士向往的、敬仰的地方。左右中国命运、掌握历史发展主动权的力量，不在当时的北平、南京、上海，而恰恰在延安。延安是出政策、出干部、出经验的革命圣地，成为中国革命的落脚点和出发点。大批干部在延安学到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学到了艰苦创业的革命精神，成为治党、治国、治军的英才。他们从这里出发，把真理、把革命精神带到全国各地，到处生根开花。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小油灯下撰写了许多不朽的著作，

延安的小油灯照亮了全中国。正是依靠延安精神，我们取得了革命的胜利。这个历史经验，是永远有新鲜意义的。他还兴致勃勃地写了一首诗，以抒发他重返延安的激动心情：

廿九离延六七回，
圣地景色新又新；
追思往事犹在目，
展望前程花似锦。

就当前来说，我国的经济建设仍然还需走一段艰苦的路程，这就要求我们保持发扬延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热情，那么一种艰苦创业的精神。

纪念馆是进行精神文明的建设和宣传单位。战斗在第一线的讲解员直接肩负着宣传延安精神的重任。所以，必须以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搞好宣传队伍的培养工作。只要有了一支革命化、专业化的宣传队伍，精神文明的建设，延安精神的发扬光大才会有可靠的基础和切实的保证。

二、如何建设一支革命化、专业化的宣传队伍

1. 加强思想教育，增强讲解员的政治素质，是搞好宣传工作的可靠保证

纪念馆是进行党的历史和传统教育的好课堂，搞宣传的同志其工作性质同教师一样崇高，被人们尊称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教育者必自己先受教育。这就要求这支宣传队伍必须有很高的政治素质，才能适应工作的需要。由于种种原因，在相当一部分讲解员中存在着模糊的思想认识，具体表现为：对自己所从事的职业缺乏认识，没有责任感和职业荣誉感等。因此首先应对新讲解员用举办学习班的方式进行延安光荣地位的教

育，延安精神的学习，确定热爱本职工作的思想，明确搞好宣传接待工作的重大意义，力争使他们的工作与其思想状态保持一致。

第二，把政治理论学习经常化，制度化。每周定期安排半天学习时间，学习党的方针政策，中央领导人的文章、讲话与报纸重要社论，使讲解员的思想能保持常新，以适应形势的发展，自觉地同党中央保持一致。

第三，宣传接待工作是一项服务性很强的工作，必须讲究职业道德，才能收到好的社会效果。为此，应在每年都进行一次大的普遍的不拘形式的职业道德教育。

第四，坚持一月一次民主生活会的制度。对于工作中反映出来的一些思想问题，在生活会上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摆明情况，分清是非，扶正压邪，提高认识，增强团结。

第五，广泛征求群众意见，接受观众监督。除设置意见箱外，不定期地赴外事办、老干局、统战部等客人较多的单位收集意见建议，特别是了解批评意见，以便及时掌握宣传工作的客观效果，克服松懈、麻痹思想，及时堵塞工作中的漏洞。

对一些糊涂观念，如认为“搞宣传每天迎来送往没意思”，“讲解员是青春职业”等，应有针对性的予以澄清，以便形成急观众所急、帮观众所需、主动宣传讲解的良好局面。

2. 认真坚持业务学习，提高宣传质量

作为一名宣传战士，只有好的态度，而没有较为渊博的专业知识是不行的。有人认为，讲解员最好当，讲词背熟就行了。其实并不那么简单。讲解员当然要背讲词，因为讲解词是研究人员根据展出的文物、图表、照片等经过多次研究编写而成的，概括了展出的基本内容，比较准确、简明、系统，任何

一个陈列馆，没有一个基本的解说词是不行的。所以首先应尊重讲词，学习熟悉讲词。但是又不能迷信，当成金科玉律，对任何观众都可照本宣科，千篇一律。因为前来参观的人是多种多样的，以国籍分，有本国的，有外国的，外国的客人中有懂中文的，有不懂中文的；从身份上分，有首长，有一般干部，有知识分子，有学员，有工人、农民；从年龄上分有老年、壮年、青年、少年，还有幼儿园的小娃娃；从程度上分，有大学、中学、小学、文盲等；从目的上分，有带着问题专程前来的，有游览观光的，有匆匆路过的，不一而足。要满足所有观众的要求，显然只靠一本讲词是不行的。这就要求能灵活地运用讲词，突破讲词。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要通过刻苦的业务学习才能实现。

第一，采取讲什么学什么的途径，弄懂弄通各自宣传点的宣传内容。如凤凰山要着重学习准备抗战及抗日战争战略防御阶段的内容，南泥湾则要学习延安大生产运动及三五九旅屯田垦荒的内容，陈列室则按单元逐次学习。学习方法，可以自学，或组织小组，或办党史专题讲座等。

第二，脱产进修。进入相关大专院校深造。从几年来的效果看，成绩显著。

第三，实行研究员同各宣传点定点挂钩的办法。让专业人员加强对讲解员的学习辅导，解决业务学习中的疑难问题。

第四，每年利用冬、春接待观众的淡季，组织部分讲解员外出参观并进行文物资料的调查、征集访问及整理工作。使他们开阔眼界，增长知识，多掌握第一手材料，提高业务能力。

通过学习，吃透了所宣传的内容，又能分析研究接待的对象即吃透观众，这样，加强针对性的主动权就牢牢掌握在手里

了，就可以做到三看三定：看时间定长短，看对象定深浅，看要求定重点。力求使每批观众都能高兴而来，满意而去。

3. 注意研究讲解艺术，增强感染力。

宣传讲解艺术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它不仅包括语言修辞学、逻辑学，也包括心理学、美学及组织才能和表演艺术等多种因素。要达到宣传目的，必须加强讲解艺术的研究，总结摸索出带有规律性的东西来。

有人说讲解员是不化装的演员，这话有一定道理。戏剧演员以“情”动人，歌唱演员以“声”动人，杂技演员以“艺”动人，讲解员兼收并蓄，需要各方面的技能，要声情并茂，机动灵活，自然大方。为了提高讲解技巧，我们每年都进行的1—2次的试讲或观摩讲解就很有可操作性，让同志们普遍“表演”或让一些技巧较好的同志现场“示范”，互相学习，取长补短。为了解决针对性的问题，我们可按照观众的类型分老干部、学习团体、一般零散、小学生等六个类别分别进行观摩性讲解，集思广益，总结提高。

第一，看语言的基本功，有没有逻辑性，重点选得对不对，语调合不合规范，字音是不是标准，意思是不是表达得清楚完整等。

第二，看有没有感情。用表演术语说就是能不能迅速进入“角色”。讲解员不能以一个局外人的面孔在观众面前出现，而要做一位当事者，像著名评书演员那样，把自己融进战火纷飞的年代与艰苦创业的岁月。只要讲解员能置身其中，观众自然就会有身临其境之感，宣传者与被宣传者之间就容易发生“共鸣”。

第三，看表情、手势、眼神，对观众情绪的揣测是否自然

得体，专注准确。要有教师的严肃庄重，要有播音员的音色，要有演员的精神状态。要将各个特色糅为一体，自然、形象、生动地表现出来。

第四，看组织能力。能不能吸引观众，引导观众，有一个良好的参观秩序和气氛，等等。

总之，在讲解艺术的研究摸索方面，我们还刚刚开始，深度、广度都很不够。我们相信，只要同志们能虚心学习，不断探索，不断实践，讲解艺术的规律性总会被掌握的。

如何培养一支革命化、专业化的宣传队伍，我们只能粗略地谈这几点，作为引玉之物。

今后，我们应继续以较多的精力放在宣传队伍的培养提高上，用多种形式、多种渠道把艰苦创业的延安精神宣传好，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优秀品质与党的优良传统宣传好，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迈出新步伐，做出新贡献。

（作者：延安革命纪念馆馆员）

弘扬先进文化与纪念馆宣教队伍建设

张 娴

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这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富有创新意义的内容之一，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根本方针。作为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革命纪念馆（地），在宣传发展先进文化方面担负着特殊的使命，因此研究探索革命纪念馆（地）与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关系，以及如何按照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要求建设一流的宣教队伍，既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实践课题。本文结合延安革命纪念馆的实际，拟就这一问题作一些粗浅的探讨，以求教于各位专家同仁。

一、革命纪念馆（地）记载着中国共产党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历史进程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高举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旗帜。正如毛泽东所说：“我们共产党人，多年以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①在“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的过程中，产生了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形成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反帝反封建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新民主主义文化同形形色色的反动派、复古派、殖民派等

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而广泛的思想文化基础。

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文化上全面走向成熟的时期，其标志就是产生了毛泽东思想，其中当然包括毛泽东的文化思想即新民主主义文化。新民主主义文化是在延安发展并走向成熟的，代表了当时中国最先进的文化。延安时期，我党不仅从理论上发展成熟了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而且在延安全方位地进行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伟大实践，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为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发挥了巨大而独特的历史作用。这些理论成果和实践成果在延安革命纪念馆都有丰富的展现。它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历史见证，对我们在新的历史时期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始终坚持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具有重要的鼓舞、启示和借鉴作用。

二、纪念馆宣教队伍在传播、发展中国先进文化方面的地位和作用

革命纪念馆（地）记载着中国共产党代表先进文化的历史进程，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然而这种历史进程的记载一般都是通过革命文物的陈列来完成的，这些革命文物包含着很丰富很深邃的历史、思想、文化信息。如何将这些信息完整、准确而又生动地传达给观众，革命纪念馆（地）的宣教队伍起着重要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它的好与坏直接关系到革命纪念馆陈列展览、宣传教育、保护利用和科学研究等方面社会效益的发挥。特别是先进文化方面的内容，它本身是生动、活泼和形象的，但作为革命文物陈列却又难免是静止和抽象的。如何将其

还原成为生动和形象，以感染和教育观众，这就需要宣教工作者做媒介。如延安革命纪念馆在长期的实践中摸索出的讲、唱、跳相结合的形式，就是一个很好的“还原”形式。所谓的讲、唱、跳，就是讲解员结合文物内容和旧址场所，在讲解的同时唱一首当年延安时期的革命歌曲，跳一段当年的舞蹈，再现当年的情景和文化氛围，以感染和教育观众。同时纪念馆的宣教人员还组成“宣讲演出团”宣讲和演出延安时期的经典文艺作品，生动地再现延安时期我党在代表中国先进文化方面的丰功伟绩，宣传教育效果十分明显。这些做法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广大观众的肯定和赞扬。由此可见，革命纪念馆（地）宣教队伍在传播、发展中国先进文化方面的确有着特殊和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它充分说明，革命纪念馆（地）宣教队伍既是精神文明的建设者、爱国主义的传播者，又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宣传者，所以必须给予高度的重视。

三、按照先进文化的要求，建设一流的宣教队伍

革命纪念馆是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基地，是宣传展示中国先进文化的重要阵地。纪念馆汇聚了中国先进文化的精华，展示了中华民族先进文化建设的巨大成就，汇集了中国共产党实践“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发展方向的丰硕成果，是人民群众接受先进文化熏陶、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德育教育的基地。宣教工作的主要任务就是宣扬先进文化，传播先进文化，用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革命时期“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伟大实践，教育人民，武装人民。这一伟大使命，决定了革命纪念馆（地）宣教队伍必须首先具备实践“三个代表”的思

想基础。

1. 必须以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集中体现了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是我们坚持改革开放，不断取得两个文明建设新胜利的根本保证。革命纪念馆（地）宣教工作的性质和任务决定了它必须旗帜鲜明地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作为惟一指导思想。只有一如既往、始终如一地坚持这个思想不动摇，才能沿着正确的道路健康发展，才能保持革命纪念馆（地）宣教工作的先进性。

政治上坚定，是党对宣教工作的特殊要求，是做好宣教工作的前提和条件。科学理论是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具有重要的指路导航作用，而且具有净化灵魂的作用，只有理论上的成熟，才能达到政治上的坚定，宣教工作才能紧跟形势站稳立场，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所以确保理论上的成熟就成为抓好宣教队伍建设的首要任务。

2. 必须切实提高宣教队伍的业务、文化素质

发展先进文化的主要内容和中心环节，就是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促进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和文化素质的提高。如何适应这个要求，建设一支走在时代前列的宣教队伍？我以为必须依照“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要求，全面提高宣教队伍的业务、文化素质。

第一，要注意提高宣教队伍的文化素质。宣传先进文化，首先自身必须具备宣传先进文化的文化素质。要悉心学习文化，打牢文化底子，采取自学、函授、派送院校培养等渠道，循序渐进，不断丰富宣教队伍的知识面，全方位提高宣教队伍的文化素质。

第二，要注意提高宣教队伍的业务素质。宣教人员肚里有了东西，还要有把自己的东西完整地传达给大众的能力。就是要有很高的业务素质，把先进文化用很精彩的形式宣传出去，教化人民。一方面要会宣传，要有为人民服务之心，做到不厌其烦，把千遍当一遍做，用心宣传，用情感染；另一方面要善于宣传，要不断博采众长，利用传统的、现代的等不同手段，灵活地再现历史，教育群众。延安革命纪念馆在实践中探索出来的“讲、唱、跳”相结合的宣教工作经验，就是一个很好的经验，但它还有待不断创新，使其尽善尽美，为人民大众所接受和赏识。

第三，按照先进文化的要求，塑造宣教队伍的良好形象。“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是新形势下对革命纪念馆（地）从事宣教工作者提出的新要求，要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个主要的问题就是宣教工作人员要对照“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要求，树立自身良好形象，言传身教，用自身良好的形象教育人、影响人。良好的自身形象，是宣教工作者能力水平、工作作风、人格魅力等综合素质的外在表现，对他人具有很强的影响力和感召力。强调宣教工作者要有良好形象，是宣教文化工作的优良传统。常言道：“喊破嗓子，不如做出样子。”宣传工作只有带头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规范自己的言行，并在实际行动中贯彻落实，才一定能把自身的形象树立起来。从言谈举止、待人接物、文明用语等方面进行培养，使观众全方位地感受到宣教人员良好的服务态度。从中受到教益，获得精神上的满足和文化上的需求。

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是发展先进文化的主要内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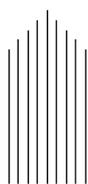
和中心环节。江泽民指出：“不讲道德，人们就会失去共同的奋斗目标，失去行为的正确规范。”^②革命纪念馆（地）的宣教工作者是共产主义道德的倡导者和忠实践行者。因而，必须倡导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思想，自觉抵制和反对腐朽思想的侵蚀，旗帜鲜明地高唱社会主义文化的主旋律，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教育引导宣教工作者爱祖国、爱人民、爱岗位，从点滴抓起，从一言一行抓起，不断提高宣教队伍的思想道德水平，结合实际实施“宣教队伍形象工程措施”、“文明用语规范”、“宣传接待十不准”等职业道德建设系列工程，真正把每个宣教工作者塑造成文明的使者。在抓好阵地教育这一基本宣教形式的同时，积极采用各种宣教艺术形式，创造群众喜闻乐见、乐于接受的宣传教育方式，确保宣教工作与时俱进，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和需要。

注 释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3页。

②江泽民2002年1月11日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的讲话。

（作者：延安革命纪念馆馆员）



YANAN BOYUAN

● 旧 址 观 览 ●

延安博苑

“七大”会址的变迁和维修

党全义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中国有个延安，延安有个杨家岭，杨家岭有个中央大礼堂——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就在这里召开。从此，人们亲切地称她为“七大”会址。

变 迁

说起“七大”，人人皆知，然而为召开“七大”修建礼堂的过程并非个个清楚。

修建“七大”礼堂第一次选在安塞县李家塌。不知何年何月，也许是几万年前，黄土高原的地壳运动，形成了一些四面高耸，中间下陷的塌地。沟壑纵横的安塞，俗有七十二塌之说，而李家塌就是安塞县招安乡的一个小山村。60多年前，就在这里第一次修建了“七大”礼堂。

李家塌“七大”礼堂位于李家塌寨南部下方一个小渠内。现在，这个长约30米，宽约15米的小渠壕内长满了芋子，没有一丝建过大礼堂的痕迹，只有四周的几百孔窑洞，张着黑洞洞的窗口，似乎在诉说着当年的风风雨雨。这是1939年秋动工，1940年秋建成的。据说，当时连李家塌四周能打窑洞的地方，都打了窑，大约打了三四百孔土窑，还修建了运动场。礼堂除正门外，还有两个地道，分别向北、东穿过山岭。礼堂

建成后，还放过电影，部队开过会。那时，由于抗日战争刚刚进入相持阶段，许多领导干部无法离开工作岗位，加之王明的投降主义路线虽基本克服，但党内的认识仍未能统一，中央决定“七大”延期，故在这里没有开成“七大”。后来形势好转了，拆了礼堂上的白木料和窑洞上的门窗，运往延安重修礼堂去了。

如今 60 多年过去了，这里的窑面全都坍塌了，当年准备供“七大”代表住的窑洞，窑内大部完好。当年这些窑都用白灰粉刷过，现在仍然可以看出。

修建“七大”礼堂第二次选择在枣园后沟柳树坪。安塞李家塌因离延安较远，所以拆了礼堂后，就在延安枣园后沟的柳树坪修“七大”礼堂。窑洞打好了，礼堂盖成了，后来由于国民党正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胡宗南调集重兵准备闪击延安，党内正进行审干工作，高级干部的路线学习尚未结束，“七大”只好再次推迟举行。加之柳树坪条件差、生活用水也困难，所以又拆了礼堂。

修建“七大”礼堂第三次定在中共中央所在地杨家岭。

位于杨家岭沟口的中央大礼堂，占地 1056 平方米。1942 年由杨作材同志设计，中央机关同志自己修建的。建成后，中央较大的集体活动大都在这里举行。礼堂设计风格中西合璧，具体表现在礼堂的整个外部轮廓和东厅门的一根石柱上。这根石柱系一块整石雕琢而成，按照希腊建筑艺术设计制作，被称为希腊多列斯柱式。礼堂的内部为穹隆式的陕北窑洞石拱结构，礼堂内没有木梁和木桩，视野开阔。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这种设计都是科学和先进的。

维 修

新中国成立后，延安革命旧址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杨家岭旧址是其中之一。1947年，“七大”会址——中央大礼堂遭到国民党部队的严重破坏。1954年人民政府依照原样予以修复。60年代也曾进行过一些零星的维修。1996年，为迎接党中央毛主席进驻延安60周年纪念活动，在杨家岭旧址全面维修中对中央大礼堂做了部分整修（因当时全面维修时间来不及），包括门窗油漆、花椅补修、制作党旗、更换主席台幕布等五个项目，投资1万多元。

1998年5月17日，在革命旧址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前，杨作才的女儿杨秘如将5000元钱捐献给旧址管理处，希望将此款用于礼堂维修，以了却其父临终遗愿。

1997年，在党的“十五大”召开前夕，由上海市解放日报社发起，上海亿人企业发展公司出资，延安革命纪念馆负责施工，对“七大”会址进行了比较全面的修缮。这次修缮工作是7月25日动工，8月25日竣工，修缮内容为8个项目，包括屋面翻修、内外墙面油漆粉刷、主席台和小会议室木地板修复、室外砖铺道路等内容，总投资30万元。

这次“七大”会址的维修，是在我省领导和上海市领导共同倡导下的一项具有特殊政治意义的工程。7月16日，在上海签订维修协议书，18日上海一大会议旧址举行出发仪式。7月22日，在“七大”会址前举行了隆重的开工仪式。8月上旬，上海亿人公司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先进工作者代表一行10人赴延安参观革命旧址并参加了“七大”会址修缮工程义务劳动，接受革命传统教育。8月30日，在“七大”会址

门前举行了竣工仪式。在竣工仪式上，陕西省文物局向上海解放日报社和上海亿人公司颁发了维修延安“七大”会议旧址工程质量良好的证明书，上海、陕西两地合作单位互赠了锦旗和铜牌，赠给上海解放日报社的锦旗上写着“血脉相连 情系延安”，赠给上海亿人公司的锦旗上写着“延安精神 亿人发扬”。竣工仪式上，市长刘孝文代表市委、市政府向专程来延安的上海各位代表表示欢迎，对支持延安的发展表示感谢。他指出：保护和管理好旧址是延安人民义不容辞的政治责任，也是全国人民的共同要求。这次修缮工程既是向“十五大”献上的一份厚礼，也体现了上海人民对延安人民的深情厚谊。

由省文物局和延安革命纪念馆镌刻的石碑，竖立在杨家岭“七大”会址前侧。碑文如下：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奠定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基础的一次重要的大会。在迎接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夕，由上海解放日报社发起，上海亿人企业发展公司出资，于1997年7月18日至8月30日，对位于延安杨家岭的“七大”会址——“中央大礼堂”进行了全面修缮。兹立碑为纪。

陕西文物事业管理局
延安革命纪念馆

在整个修缮“七大”会址过程中，上海、陕西、延安的电台、报社等18家新闻媒体作了宣传报道。

2000年4月23日，是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55周年。当年在“七大”路线的指引下，全党高举毛泽东的旗帜，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今天，在迎

接新千年到来的时候，我们仍然要发扬“七大”的革命精神，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实现“十五大”提出的三步走的宏伟目标。

（作者：延安革命纪念馆副馆长、副研究员）

延安时期的光华印刷厂

栾锦萍

光华印刷厂是抗日战争时期我党在延安创办的一个专业印刷货币的机构。

党中央到陕北之前，陕西省苏维埃政府就建有一个印制苏币和铸造铜元的印刷所，地址设在永坪石油沟，后迁到瓦窑堡。1935年9月，陕甘晋省委成立，陕西省苏维埃银行改称为陕甘晋省苏维埃银行，并将原印刷厂扩充到十多人。1935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长征到达瓦窑堡，改组为西北分行，原陕甘晋银行所属的印刷所并入西北分行，贺子珍、朱华民、黄秋胜先后任所长。1937年1月，印刷所迁入延安。后来，由于统一战线的建立，停止了苏维埃货币的印制，这个印刷所就并入中央印刷厂石印部，承担边区各种有价证券的印制。

1940年10月，由于国共关系日趋恶化，军饷停发，外援断绝，边区财政经济状况日益困难。为此，边区政府决定在中央印刷厂石印部基础上成立光华印刷厂，归边区银行直接领导，并着手进行边区货币的发行准备工作。

光华印刷厂于1940年10月成立后，厂址设在延安新市场孤魂沟（今市场沟后沟），先后任厂长的有曹承宗、高秉仁、范耀武。建厂初期，只有五六台石印机，两台号码机，一台切

纸机。大小不等的六孔窑洞就是厂房，其中两孔窑洞作为印刷车间，一孔窑洞是制版室，其余三孔住着三四十个职工。大家不论年纪大小、干部工人、职务高低，都挤在一起睡大通铺。点钞、打码、切纸等工作没有地方安排，就在窑洞前搭个棚子临时作为车间。孤魂沟原来是埋死人的地方，茔坟遍地，野草莽莽，偏僻荒凉。有一天夜里，4点来钟，肖煌和孟立贞下夜班回宿舍睡觉，两个人一边说笑着一边往宿舍走，走着走着孟立贞觉得饿得慌，就让肖煌等着，自己回厨房找东西吃。孟立贞走后，肖煌站在山坡上的平台等他。这时，山沟里漆黑一片，伸手不见五指。突然从光华厂豆腐房那边亮起两盏蓝绿色的灯光。那时，孤魂沟根本没有电灯。那是什么东西呢？肖煌心里嘀咕着。再看时，只见那两个蓝绿色的亮光不但会动，而且越来越大，越来越近，肖煌心里感到阴森可怕，他不时地给自己壮胆。后来，两个亮光停了一会儿，就消失了。孟立贞从厨房出来，肖煌立刻把自己看到的情况说给孟立贞，两人急匆匆地回宿舍去了。第二天，肖煌到原来的地方一看，只见地上有一个一个的梅花印，这才知道昨天夜里看见的是一只出来寻食的豹子。

光华印刷厂建厂的当月，就赶印了5角和7角5分两种光华商店代价券，并抓紧设计壹万元面额的边币（制版印刷后未发行）。光华商店代价券（亦称光华票）和陕甘宁边区银行币（亦称边币）大部分是黄亚光设计和绘制的，厂长高秉仁也兼设计，制版雕刻商伯衡，书写高秉义，绘画范耀武、薛兆林。印制材料先是道林纸，后为边区生产的一种特制的马兰纸。那时生产设备极为简陋，如修版用的刮刀和描笔，跑遍延安城也难以买到，他们就用自行车的辐条制作刮刀，用狼毫毛笔替代

描笔。至于设计绘图用的圆规、米尺和雕刻用的放大镜，还是高秉仁和商伯衡从沦陷区带到延安的，大家倍加珍惜，轮流使用。那时印刷用的石头印版，是用外汇买来的。国民党实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后，石头版进不来，没有办法，就用当地的石头来代替，由于质量太差，印不了多少就不能用了。为了解决石头版的问题，工人们就用水泥托在用过的石头版下边加厚之后再使用。由于水泥质地太脆，用不了几次，水泥就断裂了，损坏了不少石头印版。后来，高秉仁提出改进意见，把用得很薄要报废的石头，再用麻、黄蜡、铁条加厚重新使用，总算解决了石头版的问题。由于印钞量大，库存的道林纸很快就用完了。1941年3月15日，朱理治行长检查工作时，得知这一情况后，提出用边区振华造纸厂造出的证券纸来代替道林纸印钞票。之后，又让振华造纸厂的工人在造证券纸的纸浆中掺上麻，这样一来，经过喷水压平处理的纸印出来的票子，颜色鲜艳，花纹清楚，从而解决了印边币纸张缺乏的问题。

1946年6月，国民党顽固派发动全面内战。7月底，胡宗南在西安召开了进攻陕甘宁边区的军事会议。延安的安全受到了威胁。为此，党中央和西北局做出决定，陕甘宁边区银行金库、贸易公司和光华印刷厂等单位先行转移到志丹县。七八月间，光华印刷厂告别延安，奉命转移到志丹县城原红军大学旧址，不到一个星期就恢复了生产。

新的工作场所比在延安初建厂时更为困难。工人们把窑洞既当工作间又当宿舍，睡觉前总要先盖好眼睛，不然窑洞上掉下来的沙子会打坏眼睛。为了适应战争环境，工人们把凳子、桌子、床铺等都制作成折叠式，并开始实行军事体制。最困难的是没有菜吃，大家只好到山上挖野菜。这时负责伙食工作的

老红军李万玉提出派人到延安去，摘收搬家前种的西红柿等蔬菜。大家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于是李万玉带上两个年轻人，赶着毛驴回到了延安。当他们来到孤魂沟种西红柿的菜地一看，搬家前的小柿子已经长得又红又大。大家高兴极了，满满地摘了几箩筐，兴高采烈地返回志丹城。

1947年3月21日，由于战争局势的变化，光华印刷厂接到上级通知，迅速向东转移。在范耀武厂长的率领下，光华印刷厂开始了艰难的转战陕北的旅程，经过千难万险，于11月到达山西临县都督村。在这里光华印刷厂又迅速展开了生产钞票的工作。

1948年4月延安收复。七八月间，光华印刷厂又从山西陆续搬回延安。那时，延安城被胡宗南军队破坏的不成样子了，到处是房倒屋塌，残垣断壁，最糟的是城外有许多地雷还未清理完毕，因此，农民到地里劳动时常常发生触雷事件。

光华印刷厂迁回延安后选择了新的厂址，即原火柴厂的旧址——拐峁村。当时回到延安的单位很多，都急需盖房的材料，大家都抢着去拆敌人留下来的炮楼。为了保证光华印刷厂能及时把厂房盖起来，孟玉贞等同志去找贺龙，请他帮忙。贺老总得知情况后，立即派了一个警卫连，帮助他们拆炮楼。边区银行也派汽车把木材运到了拐峁。这样一来，光华印刷厂不仅新建了大厂房，还招收了新工人，扩大了生产规模。

1948年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在石家庄成立，并发行了人民币。1949年2月，光华印刷厂不再担负印刷货币的任务，光荣地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从成立到结束，九年期间，光华印刷厂为陕甘宁边区经济和金融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作者：延安革命纪念馆馆员）

抗日战争时期的延安交际处

米晓蓉

延安交际处，全称为陕甘宁边区政府交际处，它的前身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外交部的招待科。

1935年10月，党中央长征到陕北。11月，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驻西北办事处，博古任主席，下设七部一局。1936年1月26日，为加强对外宣传和联络交涉事宜，西北办事处发布了第四号命令，宣布增设外交部，博古兼任部长。外交部下设交际处，处长由西北办事处秘书长伍修权兼任。不久，交际处改为招待科，科长为胡金魁。1936年夏，美国记者斯诺访问保安（今志丹县）时，就是由胡金魁具体负责接待的。

1937年9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原西北办事处下属的部、局，相继改为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厅、处。调整后外交部被撤销，只保留了一个招待科，负责外来宾客的生活接待。1937年11月底，陈云同志回到延安，鉴于外交部撤销后对外宣传联络工作受到影响，他建议中央要加强这方面的工作。1938年1月，中央组织部派曾在白区做过上层统战工作的金城去陕甘宁边区政府做边区主席的对外联络秘书。这年5月，边区政府决定将原招待科改为交际科，金城任科长。1940年交际科又改为交际处，处长仍为金城。

延安交际处在行政编制、经费开支、支部生活等方面，归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处管理，政治上、业务上初由中央组织部，后由中央办公厅领导。人员编制方面，初期有五六名干部，十多名勤杂人员。处长下设有秘书、联络科、招待科和总务科。联络科科长石峰，招待科科长金耐，总务科科长杜维。

交际处初到延安时，驻地在城内大东门北侧，管理着三个招待所，其中第二招待所的条件、设备较好一些，是一个坐东向西的临街小院，里面设有三间“特级”客房，美国友人史沫特莱、海伦·斯诺以及英国记者贝特兰访问延安时就住在这里。1938年5月，国民政府行政院派考察团到延安时也在此下榻。1938年11月，日本飞机轰炸延安后，交际处由城内迁往延安南关，在市场沟南侧西山下，即现在的延安交际宾馆所在地，现仍保留有旧时的土窑洞和小礼堂。

延安交际处成立初期，党中央就为交际处制定了“来则欢迎，去则欢送，再来再欢迎”的接待原则。仅从1938年到1941年统计，接待来客7000多人。据1942年交际处的总结报告，这一年就接待了中外客人2000多人。其中有世界学联代表团、印度援华医疗队、华侨司机服务团、国际友人白求恩、路易·艾黎、爱国华侨陈嘉庚等等。还有许多国内享有盛名的社会贤达，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高级知识分子和许多知名的学者、专家、教授。有少数专家到延安后，因生活不习惯或工作上产生一些矛盾、误会，又离开延安。他们到国统区后，经过亲身对比又返回延安。比如著名的肺结核病专家何穆夫妇，1938年8月来延安后，不久离延去了重庆。对何穆夫妇的离去，许多人感到惋惜。毛主席曾对金城说：“不要惋惜或看不起他们。他们回去后会以亲身经历来做比较，如果他们

经过对比，觉得我们解放区好，又要回来，我们再欢迎他们也不迟。因为经过再一次反复，他们与我们合作的信心会更足，决心会更大，也会在这里工作得更好。”果然，何穆夫妇于1940年12月又返回了延安。在延安，何穆曾任中央医院院长，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抗日战争时期，延安交际处承担了我党大量的外事接待工作和统一战线工作。1944年6月，中外记者参观团来延，党中央对这次接待工作非常重视，中央决定由周恩来副主席亲自主管这一工作，并决定交际处在政治、业务上归军委秘书长杨尚昆领导。周恩来对这次接待工作作了具体指示，一是宣传要实事求是，不浮夸、不弄虚作假。要以诚恳、坦白的精神同他们交朋友，以利于进一步开展国内外的统一战线。二是对中外记者既要一视同仁，又要区别对待，重点要做外国记者的工作。三是生活方面的接待，要热情周到，尽量予以优待，但切勿不要搞铺张浪费。中外记者的延安之行，给他们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中外记者返回大后方和本国后，对延安和解放区作了比较客观的宣传报道，对大后方人民和世界人民，重新认识了解延安起了积极的作用。

1947年3月，胡宗南军队进犯延安。3月14日，交际处的最后一批客人和工作人员撤离延安，在绥德住了一个多月后又转移到了山西。此后，金城处长调离交际处，到西北野战军教导团做敌军俘虏军官的工作。1948年4月延安光复后，交际处迁回延安原址。1949年6月以后，改为陕北行政公署招待所。现为延安交际宾馆。

（作者：延安革命纪念馆馆员）

干部休养所——红楼

钱竹梅

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里，为使中央首长及来延安的贵宾有个较好的休养地，中共中央在南泥湾北部 5 华里处的桃宝峪修建了干部休养所——红楼。

这是一座砖木结构的二层楼，由客房、俱乐部、餐厅等几部分组成，建筑面积 287 平方米，张协和负责设计，三五九旅、总部炮兵团于 1943 年 3 月至 9 月修建。因外表涂为红色，故称红楼。

干部休养所，除红楼之外，还挖土窑洞 30 多孔，由中央事务管理局主管，所长蔡疾呼。这里依山傍水，林木葱郁，环境幽静，风景优美。1944 年 8 月 5 日，谢觉哉在此休养时写了《桃宝峪休养所》一诗，其中这样写道：“苗秀山头绿，梢深沟底青。入沟二三里，拓地百余弓。四五小屋绕，洋房峙其中。花叶竞秋艳，树阴犹春浓。……”朱德、林伯渠、徐特立、吴玉章、续范亭、李鼎铭、林彪以及外籍友人冈野进、金日成、胡志明都在这里休养过。朱德、林伯渠、徐特立、续范亭等创立的文艺组织——怀安诗社，就曾设在红楼。

高干休养所于 1945 年底撤销。后因年久失修，土窑洞大部分垮塌，红楼也损坏严重。1975 年西安“五七”干校利用当年的炮校旧址办校时，对红楼进行维修后办起了展览室，展

出老一辈革命家和国际友人当年工作、学习用过的实物及赠送的一些纪念品。据统计，1969年到1978年，这里接待了79个国家和地区的国际友人668批6090人。西安“五七”干校撤销后，延安革命纪念馆先后委托延安地区林校、武警延安地区支队，养羊试验站保护管理（因这几个单位曾在此周围居住）。1990年9月，延安革命纪念馆负责补修了部分建筑。1992年4月20日，陕西省人民政府将其公布为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作者：延安革命纪念馆馆员）

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

白 芸

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的前身是八路军军医院。该院筹办于1938年11月，院址设在拐峁村（今属延安市李渠镇）。苏井观任院长，汪东兴任政委。1939年5月3日，八路军军医院举行开院典礼，八路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副主任谭政、军委参谋长滕代远到会祝贺。印度援华医疗队成员也参加了典礼。11月12日，伟大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白求恩不幸在华北前线以身殉职。为了纪念白求恩，12月13日，八路军军医院正式改名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1940年初，和平医院迁驻柳树店（今属延安市桥沟乡），和中国医科大学在一起。院长鲁之俊，政委刘新权。

1943年3月20日，和平医院由柳树店迁到刘万家沟。初期，因房舍不敷，小儿科仍暂住柳树店，至同年6月始迁刘万家沟。医院设内科、小儿科、外科和妇产科等。1944年春，马海德由军直门诊部调到该院外科工作。医生还有祁开仁、黄树则、谭壮、李亭植、徐根竹等。董均伦在医院担任翻译工作。

和平医院的手术室是医院的同志们于1943年6月至8月自己动手建成的。

和平医院设有病床200多张，是当时延安规模较大、医疗

设备较为齐全的医疗中心之一，该院除主要收治军队系统伤病员外，还为周围群众治疗疾病。据统计，该院 1943 年为群众治疗 270 人次，1944 年上半年为群众治疗 1096 人次。刘伯承、贺龙、陈毅、徐向前、关向应、陈赓、续范亭、王观澜等人，先后在该院住院治疗。

从 1944 年起，和平医院将驻在李家圪的中央医院作为总院第一部，驻柳树店的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为第三部，总院机关和第二部驻刘万家沟。

1945 年初，和平医院在驻地开办了民办小学，学校用具和师资都由医院提供。10 月起，黄树则任和平医院院长。

和平医院得到了国际红十字会和一些国际爱好和平人士的大力资助。加拿大、美国援华医疗队、印度援华医疗队、公谊救护队的医务人员曾先后在该院服务。1946 年 10 月 30 日，英国援华会会长克利浦斯夫人一行在延安访问期间，专门参观考察了和平医院。

1947 年初，和平医院总院机关和第二部前往华北解放区，与晋察冀边区的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合并，逐步发展成为今天设在河北石家庄的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

和平医院旧址现有大门一扇、手术室一间、病房和工作人员住石窑 16 孔，土窑数十孔。1984 年曾予以维修。

（作者：延安革命纪念馆馆员）

鲁艺简介

王一美

为了培养抗战艺术人才，1938年2月，毛泽东、周恩来、林伯渠、徐特立、成仿吾、艾思奇、周扬等发起成立了鲁迅艺术学院。她是我党在延安创办的一所综合性艺术学院。

鲁艺校址，起初设在延安城北门外西侧，凤凰山北部的山坡上。1938年3月14日，鲁艺开始上课。4月10日在城内中央大礼堂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1939年8月2日，鲁艺迁至延安城东桥儿沟。创办初期设有戏剧、音乐、美术三个系，学员不到100人。1938年8月27日增设文学系。沙可夫、赵毅敏、吴玉章、周扬先后担任过院长或副院长。先后担任各系负责人的有：

文学系：周扬、沙可夫、任其芳、严文井

戏剧系：张庚、田方

音乐系：吕骥、冼星海

美术系：沃渣、江丰、王曼硕、钟敬之等

鲁艺的课程分必修课，选修课和专修课三大类，必修课有社会科学、中国问题、艺术论、哲学等；选修课有日文、俄文等。学制九个月，前后三个月在校学习，中间三个月离校实习。这种独特的学习方法，使鲁艺很快成为一所优秀的艺术学院。

鲁艺在艺术上作了大胆的探索，先后成立了木刻研究班、实验剧团、漫画研究会、美术工场、平剧团、战时文艺运动资料室、俱乐部、美术供应社等。此外还组织了宣传队、秧歌队、访问团、工作团，还编辑了文学刊物《草叶》，为革命文艺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如鲁艺编演的京剧《打渔杀家》、秧歌剧《兄妹开荒》，歌剧《白毛女》等在延安上演时，在各界引起强烈反响。

毛泽东对鲁艺的发展给予了充分关注。1938年5月12日，毛泽东亲临鲁艺作报告，并为《鲁迅艺术学院纪念刊》题写刊名。1939年鲁艺成立周年纪念时，毛泽东、朱德、张闻天、刘少奇、陈云、李富春等中央领导亲临祝贺，毛泽东给鲁艺题写了“抗日的现实主义，革命的浪漫主义”的题词。1940年，鲁艺成立两周年纪念时，毛泽东亲笔为鲁艺题写了“鲁迅艺术文学院”的校名，并题写了八字校训：“紧张、严肃、刻苦、虚心”。1942年5月30日，即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不久，毛泽东又亲临鲁艺，向鲁艺全体师生员工作了重要讲话，号召大家从鲁迅艺术文学院这个“小鲁艺”走到工农兵群众的“大鲁艺”中去，有力地推动了鲁艺的整风运动。

（作者：延安革命纪念馆助理馆员）

后 记

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是对青年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和延安精神教育的重要基地。延安革命纪念馆是延安的重要窗口，是研究党中央、毛主席在延安 13 年光辉战斗历程，宣传和弘扬延安精神的主要阵地。从 1998 年起，延安革命纪念馆掀起了学习党史、研究党史的新热潮。广大业务人员以严谨务实的科学态度，一丝不苟的进取精神，开展党史研究及博物馆学研究，在中央、省、市各级报纸杂志上发表了大量论文。为了给业务工作者提供更加广阔的学习研究空间，加强各地博物馆、纪念馆之间的学习与交流，1999 年，延安革命纪念馆创办了《圣地》季刊。这份杂志同时也成为众多党史工作者和文博工作者研究党史、考证史实、探索纪念馆发展的阵地。

至 2003 年年底，《圣地》已走过了五年历程，共出版了 19 期，发表论文 350 多篇，达 160 多万字，为三大教育基地的建设做出了贡献。为了把这几年的研究成果系统集中地呈现给广大读者，我们从中选编了 170 多篇具有代表性的论文（其中包括部分兄弟单位业务工作者的论文），汇集成书。这些论文有党史方面的，也有博物馆学方面的，其中的许多论文已达到较高的学术水平，有些则具有很高的水准。例如：米世同的《“蘑菇”战术的由来》一文，后来在《党的文献》上发表；马

广荣的《毛泽东与延安精神》一文，后来在《求是》杂志上发表；霍静廉的《陈云在延安二三事》一文被中央文献研究室收入《缅怀陈云》一书，《延安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与建设》一文，获陕西省“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建设研讨会”优秀论文奖；党全义的《延安时期的中央组织部》一文，后来在《党史研究资料》上发表；张明胜的《叶挺将军与延安》一文，获中国新四军研究会举办的“叶挺生平思想研讨会”论文一等奖。但不容否认，也有一些论文内容一般。为了比较全面地反映延安革命纪念馆近年来的研究水平，这样的文章也选录了一部分。

为了使选收的论文适应书籍出版的要求，同时也为了使该书达到较高的质量与水平，编辑人员对每一篇文章都重新作了反复审阅、修改，并对一些文章做了必要的删节。由于选收的文章涉及的面很宽，有些文章不易详细分类，因此，在文章的分类上可能不完全准确。

由于作者及编辑水平有限，该书难免存在错讹和不足，恳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2003.12

(陕)新登字 001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延安博苑. 第2辑/张明胜主编.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4

ISBN 7-224-07083-1

I. 延... II. 张... III. 社会科学-文集

IV.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第113279号

书 名: 延安博苑(第二辑)

主 编: 张明胜

出版发行: 陕西人民出版社(西安北大街147号 邮编: 710003)

印 刷: 西安市建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50mm×1168mm 32开 4插页 18.125印张

字 数: 400千字

版 次: 2004年12月第1版 2004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1000

书 号: ISBN 7-224-07083-1/C·220

定 价: 28.00元
